

被人民改造

专题史

大叙利亚
解放军的
夺权始末

[瑞士] 埃尼

[法] 德雷翁

著

王揆

译

負典編譯

UN-CANON

被人民改造

大叙利亚解放军的夺权始末

帕特里克·埃尼 热罗姆·德雷翁 著

版本说明

本书据下列底本译出：

Patrick Haenni & Jerome Devon, *Transformed by the People: Hayat Tahrir al-Sham's Road to Power in Syria*,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25. ISBN 9781805264101. © Patrick Haenni and Jerome Devon, 2025.

译文体例：阿拉伯语专名经原书的英语转写转译，人名地名循新华社《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惯例，首现于括注中附原书转写，其后用定译。原书尾注五三四条按原书形制移至书末《注释》，按章分组、组内自一起编号。页脚另有两套注：署“——译注”者为译者所加的背景说明，署“——编注”者为编者对底本讹误的说明；其余一概为原书作者的注。

目 次

致谢	5
导言：意识形态重组的革命视角	7
第一章 奠基母体：支持阵线在圣战窠臼中的不安演变	21
第二章 争夺主导权：大叙利亚解放军在叙利亚反对派中的霸权企图	48
第三章 拆解激进过去	70
第四章 退出圣战主义	94
第五章 掏空萨拉菲主义	110
第六章 面向苏菲主义的热月开放	133
第七章 不再是齐米，尚未成公民：以世俗少数群体语汇重塑他者	147
第八章 亲近沉默的大多数：大叙利亚解放军的主流化转向	161
第九章 2024 年伊德利卜的阿拉伯之春：作为权力政治的去激进化	182
第十章 尊重烈士，但别扼杀市场：伊德利卜新生公共领域的道德化	201
第十一章 大叙利亚解放军的静默革命：去激进化为何不需要温和派，意图为何无关紧要	221
第十二章 非自由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重归中间	241
跋 寻找自我：逊尼派认同政治的暧昧崛起	255
注释	270

谨以此书纪念拉伊法·萨米娅，她在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袭击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地震中罹难。

拉伊法既不隶属大叙利亚解放军，也不曾表示支持。然而她体现了伊德利卜正在生成的那场保守的革命运动。她是个革命者——既在精神上，也在她那些牺牲了的兄弟的献身之中。

作为旧叙利亚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她与国际社会持续对话。更要紧的是，她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做事：一面主张妇女的政治权利，一面坚守一套保守的伊斯兰信仰体系。她还倡导叙利亚反对派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潮流之间的和解。

在她的政治眼光里，伊德利卜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促成三者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趋同：主导该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团体、更广泛的革命运动，以及整个社会。这种趋同并不只是一位主张包容的活动人士的愿景——它是一条早在七年前就已启动的轨迹，最终以大马士革的解放告终。

致谢

xi

本书出自我们一次次走访大叙利亚解放军（Hayat Tahrir al-Sham, HTS）的大本营，也出自与一些人的持续往来；没有他们，这本书根本写不成。

首先要谢的是瓦利德·塔梅尔——一位坚定的亲革命活动人士，绝非什么伊斯兰主义者——他很早就确信，应当支持大马士革新统治者正在进行的这场转变。那时他们还在伊德利卜巩固权力，一面背着国际污名，一面承受着来自国外的猛烈反对，他就已经看出了这份必要。

本书还出自与那些曾经塑造伊德利卜、如今统治大马士革的领导人的大量交流。我们与他们的讨论不仅为本书打下了理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影响了我们在这些篇页中所探讨的那场转变本身。

若没有海外叙利亚反对派与留在国内的活动人士提供视角，这项研究的可信度就谈不上完整。他们中许多人宁愿不具名，可他们的洞见对于核实、打磨那些经由与该运动代表的正式会面所收集来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放回语境，都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本书得益于同一群研究者数不清的讨论时间、WhatsApp 往来和批评性的辩论；他们从一开始就跟着本书的理论推进。我们向奥贝达·阿梅尔、让-弗朗索瓦·巴亚尔、吉勒·多龙索罗、博杜安·迪普雷、阿涅丝·法维耶、让-诺埃尔·费里耶、奥利维耶·菲利厄尔、H.A. 赫利尔、斯特凡·拉克鲁瓦、费利克斯·勒格朗、托马斯·皮埃雷、阿蒂尔·凯内、莱拉里法伊和奥利维耶·罗瓦致以最深的谢意。经由这些往来，本书的分析框架逐步演变：从最初倚重伊斯兰研究，转向更为世俗的眼光，一种聚焦于革命动能与走出激进主义之路径的眼光。我们也要热忱地感谢达琳·哈

xii

利法与诺亚·邦西，他们是我们数次田野走访中的“同谋”，那些走访常常激起富有见地的政策讨论。

本书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之余、用自己的时间、在职务范围之外写成的。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反映的是我们各自的分析与责任，绝不代表我们各自所属机构的立场。

导言：意识形态重组的革命视角

2024年12月，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a，此前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①，Abu Muhammad al-Jolani）向我们描述了他所称的“闪电战”（Blitzkrieg）：一场迅速而出人意料、令世界措手不及的攻势。就在几天前，一个由大叙利亚解放军^②（Hayat Tahrir al-Sham，HTS；下称“叙解军”）牵头的组织联盟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政权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攻势。叙解军的前身是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后者在与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分裂后成为基地组织（al-Qaeda）分支。该联盟迅速进逼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并在数日内将其攻占。

这是令人震惊的转折。2016年末，武装反对派失去了对阿勒颇郊区的控制，那一刻被普遍视为其挑战政权的雄心的终结。然而此时，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经济枢纽已牢牢落入其手，比它自己最乐观的预期还提前了数月。数周后，叙解军时任军事领导人、现任叙利亚国防部长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Murhaf Abu Qasra）证实，尽管行动开始时他并未预料到政权会垮台，但阿勒颇的意外陷落是明确的信号：政权气数已尽。

① “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是库尼亚（*kunya*），即阿拉伯人名中以“阿布（某某之父）”起首、常再缀出身地的称名，意为“朱拉尼人穆罕默德之父”。圣战组织成员多以库尼亚行世，掌权后改用本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译注

② 原名 Hay'at Tahrir al-Sham，直译“沙姆解放机构”。“沙姆”（al-Sham）是阿拉伯语的地理概念，指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一带，旧译“大叙利亚”。本书取意译，作“大叙利亚解放军”，正文简称“叙解军”；“大叙利亚自由军”（Ahrar al-Sham）、“大叙利亚军团”（Faylaq al-Sham）等名中的“大叙利亚”皆同此。——译注

叙解军及其盟友察觉到阿萨德政权的积弱不振，于是继续向南推进，先后夺取哈马和霍姆斯，继而兵临大马士革。12月8日，在近十四年残酷内战夺走数十万平民生命并引发大规模难民危机之后，巴沙尔·阿萨德逃往莫斯科。他的政权已经覆灭。

又一个意外接踵而至。2014年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摩苏尔时曾引发全球反弹，国际联军随即对该组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这一次，² 各方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世界各国的国家代表蜂拥赶到大马士革，争相会见如今已入主总统府的艾哈迈德·沙拉，以及他的情报主官阿纳斯·哈塔卜（Anas Khatab）和外交部长阿萨德·谢巴尼（As‘ad al-Shaibani）。叙利亚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的中心。

这场速胜自有军事上的解释。过去几年，武装反对派在叙解军的领导下重组了军事力量，强化指挥与控制，改进纪律与训练，战斗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闪电战”所进攻的这个政权，多年来一直在积极拆解国家机器，使其沦为由各路民兵拼凑而成、支撑阿萨德毒品国家的碎片化网络。在外国支持者的供养下，该政权日益依赖向本地区出口苯丙胺类毒品卡普塔贡（Captagon）。这场政权自酿的国家崩溃严重削弱了军队，使其在最后的攻势中无力组织有效防御。最终，连政权自己的支持者也无法再提供有效援助。俄罗斯几乎把全部军事资源投入了它自己的乌克兰战争；伊朗及其盟友，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本土屡遭打击，以色列瞄准了它们的大部分基础设施。真主党在黎巴嫩也损失惨重，其多数最高层领导人被消灭。组织涣散、士气低落、作战乏力、准备不足、国际社会抽身、资源枯竭——种种因素汇合，最终促成了对大马士革的攻占，即阿拉伯语所称的 *Fath al-Sham*（“征服大叙利亚”）。这正是艾哈迈德·沙拉十多年来唯一的目标与政治方向。

然而，2024年12月8日的胜利绝非仅靠军事战略：它的根基在于叙解军近年来经历的深刻意识形态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其得以缔结关键联盟、赢得一定程度的地方正当性、并培育必不可少的国际联

系。这一演变不仅仅是胜利的背景。它是胜利的主要推手，也正是本书的主题。

3

静默革命：论去激进化及其他若干关键概念

叙解军是昔日的圣战组织、曾经最强大的基地组织分支，它的转变发生于 2016 年至 2024 年间，地点是其大本营伊德利卜，叙利亚西北部的一个乡村省份。我们认为，这一发展属于**去激进化**，它沿四条主轴展开。

第一，叙解军摒弃了圣战主义^①：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由形形色色的组织构成，往往隶属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拒绝接受未能贯彻其伊斯兰教法解释的穆斯林政权，并且往往也与西方作战。叙解军是第一个曾同时隶属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却公开宣布与这两个全球性组织决裂的组织，此后更禁止两者在其控制区内活动，并镇压其头目与指挥官。我们将看到，除了切断形式上的关联，叙解军还积极削弱全球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在其自身基层成员以及滞留叙利亚的外国武装人员中的影响力。

第二，与基地组织决裂后，叙解军疏远了萨拉菲主义^②：这是一种对待伊斯兰教的进路，旨在彻底重塑穆斯林的宗教实践与信仰，并按照自己对伊斯兰教法的解读来治理穆斯林。叙解军转而逐渐接受了一定

① 本书中的“圣战主义”（jihadism）特指把武装斗争抬为首要宗教义务、并以此对抗穆斯林国家政权的当代激进思潮，与伊斯兰教法学传统中的“吉哈德”概念不是一回事。——译注

② 萨拉菲主义（Salafism）主张回到“先辈”（salaf，指最初三代穆斯林）的信仰与实践，反对后世教法学派与民间习俗的“增益”。它是一种教义取向，与是否使用暴力无关：既有主张服从统治者的“寂静派”，也有本书所论的圣战派。——译注

程度的社会惰性^①，而不是试图以强制手段全面推行民众并不想要的强硬伊斯兰主义生活方式。我们把社会惰性定义为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与宗教实践抗拒急剧或强制性变化的倾向。

第三，叙解军策略性地借助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在叙利亚西北部挫败了余下的伊斯兰主义强硬派。举例来说，这一转变使传统伊斯兰教法学和大众化的伊斯兰实践，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苏菲主义^②，得以重新融入宗教与社会肌理。

第四，该运动逐渐调整自身，以适应当地的社会与宗教环境。这一再地方化过程不仅标志着与全球圣战的脱离，也标志着与地方动态的重新联结，以及在社会视为具有社会正当性的主流宗教观之内行事的意愿。换言之，这个昔日的基地组织分支让自己“被人民改造”。

叙解军的转变是深刻的，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可持续的，甚至在大马士革被攻占之前便已如此；但它始终是一场**静默革命**：没有一套连贯的叙事来解释自身的演变，该组织从未正式阐明其转变，也从未将其建立在明确或公开的教义修正之上。叙解军的去激进化与埃及或利比亚其他圣战分子走过的道路形成鲜明对照：那里的前武装分子在未能实现目标之后才公开发布教义修正，当时他们已被削弱，多数头目与成员都在狱中。¹相反，叙解军的意识形态转变没有经历教义上的彻底翻修，而且是在强势地位上发生的。该组织是在巩固了对敌对派系武装的主导地位之后，才踏上自己的去激进化之路，同时又始终保留着未来武装夺取大马士革的雄心。

① 法国史家孚雷论法国大革命时指出，革命者对社会的改造终究要撞上社会自身的惯性；本书借这一说法解释叙解军何以从改造社会退回适应社会。——译注

② 苏菲主义（Sufism）是伊斯兰的神秘主义修行传统，重师承、结教团（*tariqa*）、行集体记主与拜谒圣坟墓。萨拉菲派视其中多数实践为“异端”，故苏菲与萨拉菲的关系是本书衡量叙解军转向的一把尺子。——译注

叙解军的**去激进化、意识形态重组或主流化**(这几个术语在本书中交替使用)在其早期阶段很大程度上并非有意为之。它也不是叙解军起初就规划好、受其驱动或赖以行事的刻意转变。相反,其新的意识形态面貌是该组织适应外部与内部压力的结果。对外,叙解军在巩固对叙利亚西北部控制的同时,不得不周旋于与外国的关系之中,尤其是与土耳其的关系,同时在西方国家各自反对伊朗和俄罗斯的背景下寻求修复与它们的关系。对内,叙解军无力也无兴趣以强力强加其意志,只能谨慎地把握分寸:既要管治并不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的民众,又要避免强硬派的反弹与挑战。

静默,但……是政治的、不可逆的、有方向的、稳定的

我们辨识出支撑叙解军意识形态转变的四个关键特征。

叙解军的转变是**由政治驱动的**。尽管该运动有其意识形态根源(圣战派系的谱系、与萨拉菲主义的渊源、以及革命气质),我们仍认为,政治实践而非意识形态才是转变的首要驱动力。叙解军之所以发生演变,并非源于教义上的转向,而是源于对政治现实的适应,而这种适应反过来又重塑了其意识形态框架。这挑战了常见的假设,即圣战分子,或任何意识形态团体,会盲目地追随其教义。意识形态固然重要并影响政治选择,但它并不直接支配这些选择;相反,它在政治行动中被塑造、被提炼,有时还被重新定义。⁵

叙解军的转变似乎是**不可逆的**。我们认为,超过某个阈值之后,战术性妥协便会累积为一场更深层的战略转变,一场持久的、越过之后便无法回头的转变。我们将在叙解军的轨迹中具体辨识出的这种“棘轮效应”,使意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无论其转变出于纯粹的机会主义还是真诚的意识形态反思,结果都是一样的:基于我们将要探讨的结构性原因,在攻占叙利亚的前夜,叙解军的转变已然不可逆转。

这场转变是**有方向的,有战略罗盘**。主流叙事强调叙解军许多决策的战术性质,这自有其道理,但把这些选择一概框定为机会主义或实用

主义，在分析上是局限的，有时甚至具有误导性。机会主义者随机应变，随意改变方向。而叙解军并不是一时兴起地随机应变。尽管叙解军从未撰写任何正式的教义修正，其演变却遵循着清晰而一贯的政治轨迹，而非漫无方向的漂移。该组织并未盲目航行，也没有在立场之间摇摆；相反，其转变沿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展开。第一条是**再地方化**。如前所述，这并非仅仅是否定性的过程，比如与基地组织决裂或放弃全球圣战；它还代表着肯定性的重新联结动态，由该运动与其地方环境的持续互动所塑造。我们把这称为**社会的复仇**或**社会性的惰性**，以捕捉地方环境的要求、约束与现实如何重塑了叙解军的本性。第二条路径则是作为持续适应的**去激进化**，即对社会宗教现实、地缘政治约束和内部权力斗争的持续适应；所有这些改变了该组织的轨迹与政治面貌。

在 2024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该运动已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可以称之为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或温和的**教义终局**。这一终局由叙解军在伊德利卜的地方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所框定。叙解军的去激进化，是通过从意识形态边缘向“社会正统”位置的过渡实现的，它由此成为**主流的**，把自身安置在大体上被社会接受的宗教世界观的边界之内。由此看来，激进化与去激进化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正是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与革命的环境，为叙解军划定了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边界，以及何谓“可接受”。这些观点恐怕仍不为别处的穆斯林所认同，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向主流靠拢并不等于温和化。

为这场转变定框：作为热月情境的伊德利卜

我们关注的是叙解军本身：它首先是政治行为体。这意味着，在分析该运动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我们避免采用圣战组织研究中常见的以文本为中心或以教义为焦点的方法。我们发现，教义在其整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我们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叙解军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来理解它，而非通过神学话语（这类话语大体上并不存在）。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也不深入探究穆斯林历史或古典伊斯兰思

想,无论是关于萨拉菲主义,现代的还是中世纪的,还是关于它与其他伊斯兰传统的互动。我们仅在有助于分析叙解军的限度内处理这些方面。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叙解军自身的行动,即运动内外众多行为体所感知到的行动。我们还纳入了比较视角,但以一种“去东方主义化”的方式:我们跳出政治伊斯兰的框架,考察穆斯林世界之外那些经历过类似的主流化、去激进化或中间化的意识形态重组进程的运动与政党。

我们不把本书单纯锚定于地理语境,而是采取主题式的方法,从历史类比中汲取洞见,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轨迹,它是我们考察叙解军演变的方法论罗盘。我们的参照点是革命性的,就政治意义而言。如前所述,我们认为,理解叙解军的转变,最好的途径是考察它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它如何在区域和国际两个层面(主要是土耳其和西方)定位自身。然而,仅此尚不足以充分解释叙解军为何一方面与其地方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与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建立起交易式的关系。关键就在于叙解军的热月^①轨迹——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一条既构成约束又促成自我转变的道路。因此,我们关注的是革命退潮的时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激进变革的愿景“伟大之夜”不再迫在眉睫、行为体重新定位自身的时刻。

在法国和叙利亚,正如在其他革命语境中一样,热月标志着革命与政治现实正面相遇、被迫在最初的理想与承诺上作出妥协的时刻。正是在这个节点上,革命领袖们重新发现了社会的惰性、政治谈判的必要性,以及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鸿沟。然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叙利亚,热月都不是革命的终结。这一阶段的关键人物在政治上始终忠于革命的核心抱负,革命也继续塑造着他们的期待与追求。正如让-弗朗索瓦·巴亚尔提醒我们的:“热月并不想翻过革命这一页。它仍然忠于革命,哪

① 热月(Thermidor)是法国共和历的十一月,一七九四年七月罗伯斯庇尔在热月九日倒台,雅各宾专政告终,革命由激进转入守成。本书借这一典故指革命运动放弃对社会的乌托邦改造、转而经营既得权力的阶段。——译注

怕只是通过战争。”² 这挑战了把热月视为温和时刻的通行看法，它指出热月往往表现为军事冒险主义和扩张主义野心。就叙解军而言，艾哈迈德·萨拉从未放弃向反对派控制区扩张或夺取大马士革的目标。正是这种热月式的韧劲（尽管作出战术调整仍坚守革命目标）最终驱动了2024年12月对巴沙尔·阿萨德摇摇欲坠的政权发起的最后胜利攻势。

法国大革命热月阶段的许多概念都适用于叙解军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历史类比上，也有助于理解该组织采取的战略进路。诸如**社会性的惰性**之类的概念（它描述了革命运动必须如何调整自身世界观以适应社会的核心信念）凸显了调和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这一根本性挑战。这一挣扎正是热月时刻的核心：运动被迫直面其变革雄心的极限。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的复仇**这一概念，它强调社会不是被动的、可随意揉捏、容易被掌权者重塑的实体。相反，社会往往奋起反击，最终影响并改变那些试图改变它的行为体本身。这一动态与叙解军的演变相呼应，尤其是考虑到支持阵线乃至后来的叙解军的萨拉菲派血统。

然而，社会对叙解军核心信念的这种反馈，并非简单地强加于该组织。相反，这是其领导层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这一**热月战略**的要义，在于与沉默的大多数结盟，以化解仍抗拒变革的强硬派活动分子这一声音响亮的少数所带来的内部反对。凭借广泛的社会正当性，叙解军得以巩固自身的转变，同时将其队伍内部试图抵制这一转变的人边缘化。

因此，本书的思考较少植根于对其他圣战分子的研究，而更多植根于政治的历史社会学。这种方法考察的是：当革命在早期意识形态热忱消退之后走上热月式道路时，革命行为体的轨迹。尽管按惯例应当交代知识上的师承，本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方法论实验。多年来，我们自由地汲取同事与朋友的洞见，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阐释，包括**消极团结**、**身份陷阱**、**重新落地**和**去激进化**动态等概念的复兴。这些术语并未牢固扎根于既定的学术或理论传统，而是代表了我们的解读当下进程的尝试。这种即兴式的探索虽不合常规，但我们希望它能尽可能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

本书对叙解军的静默革命（它在其大本营伊德利卜完成的中间化的意识形态重组）提出了一套连贯的分析；这场转变为第二次远为戏剧性的剧变奠定了基础：对大马士革的征服。本书基于在伊德利卜开展的大量实地研究，自 2019 年以来，我们在那里与叙解军本身、其附属政府，以及活动人士、平民、支持者、反对者、异见人士、外国组织和外交官直接接触过。

到 2024 年，全球对叙利亚的兴趣已然消退，但本书如今至关重要，因为叙解军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在我们撰写本书时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这个组织，如今正治理着地处中东心脏、战略意义重大到无法忽视的国家。它的统治将对该地区 and 西方都产生深远影响。理解这一发展不仅是智识上的必需；对于那些无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与大马士革新统治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它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

抓住机会、控制偏见与审慎的政治乐观

对叙解军转变的怀疑依然存在。长期以来，许多人，包括昔日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反对派在内，都认为该组织仍然信奉激进观点，并试图强加严格威权式的伊斯兰治理。他们把任何表面上的变化或公开表态都视为战术性动作、肤浅的改动，或仅仅是面向西方的政治姿态。怀疑者认为，所谓的转变可能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其核心原则的延续性压倒一切。外交界同样如此：由于 2025 年之前的恐怖组织认定，他们难以直接评估局势并与该组织接触，加之质疑主流叙事无利可图，长期以来也在无意间延续了这种叙事。

多年来，叙解军以及此前的支持阵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难以接触的政治实体，直到我们开始与其领导层直接接触。该组织最初在默默无闻的圣战论坛上发布最早的公报。接下来的几年里，艾哈迈德·沙拉开始出现在半岛电视台和叙利亚电视频道上，但始终遮住面容。直到 2016 年该组织正式与基地组织决裂，沙拉才公开露面。随后，该运动开始转

¹⁰ 向西方,采取更为中间化的立场^①,而我们的初次接触也恰在此时开始。最初的接触是应其领导层的要求发生的,并非出于我们主动。叙解军希望找到中间人,把它的新立场传达给西方受众,以摆脱其国际恐怖组织认定;而对组织内部的某些人来说,则是为了寻求与西方的战略结盟。

我们与该运动的最初接触自上而下、始于领导层且应其要求,这既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挑战。叙解军认为我们可信,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学术研究:热罗姆(Jerome)研究圣战主义,帕特里克(Patrick)研究政治伊斯兰。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得以进入领导层的最高层,实质上是艾哈迈德·沙拉的核心圈子,其中包括宗教学者、政治人物和主要军事领导人(但不包括内部安全部门的领导层),并最终接触到沙拉本人。五年多来,我们与他们围绕从地缘战略到政治神学、宗教少数群体和军事动态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持续、定期而深入的对话。因此,我们能够直接了解叙解军领导人构想和谈论自身转变的方式。

如果没有这种对话,我们不可能充分理解他们观念的演变,也不可能充分理解这一演变在组织内部和伊德利卜造成的挑战。这些互动挑战了一种误解,即叙解军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按照预定的战略计划展开的;事实上,那是一段复杂而曲折的旅程,也伴随着临时起意的战术性政治决策。这种最初接触所带来的偏差既是主观的,源于与社会或政治行为体长期接触中可能产生的亲近感,也是客观的,因为它把我们的理解限制在该运动愿意披露的范围内。

为了应对这一双重偏差,除了与叙解军领导层接触以及经其批准的会面,无论由我们发起还是由他们提议,我们还大幅扩展了与伊德利卜其他行为体的独立接触。其中包括我们在2012年至2013年间首次造访叙利亚西北部时建立的联系:民间社会团体、2011年革命的活动人士、政治团体、地方研究者、知识分子、持不同立场的宗教人士、商

① 原书此句缺宾语(“adopt a more centrist position”后无所承),补词属编辑判断,译文按上下文补足。——编注

人,以及仍在当地活动的女性活动人士。我们还与其他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或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附属组织的领导人和指挥官讨论过,无论他们与叙解军结盟、对立还是曾被叙解军击败,也同叙解军及其前身支持阵线的异见人士讨论过。在叙利亚境外,我们还与反对派代表保持着对话,即叙利亚反对派联盟(Syrian Opposition Coalition)和叙利亚临时政府(Syrian Interim Government)。¹¹

不过,我们与境外反对派的接触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他们身处国外,又与叙解军处于政治竞争关系,这种处境所能提供的分析价值有限。一些行为体专注于争夺反对派的政治代表权,面对外国研究人员时也更不愿意承认叙解军内部的变化,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研究者是在为使叙解军正当化的议程服务。尽管这些互动让我们对反对派内部的竞争动态有了一些了解,但对我们首要目标的贡献甚微:理解叙解军的转变,以及经由这些转变所催生的新的政治身份。

归根结底,尽管我们确实接触了叙解军的反对者(在高度极化的叙利亚语境中,包括在反对派内部,对话往往被等同于同谋),我们无疑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取得了平衡,尽管盲区依然存在。一些关键方面,例如官方司法体系的运作,以及更甚者,安全部队(安全机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发布裁决的作用,对我们来说仍然不透明。围绕该运动较阴暗面向(具体而言即其强制手段)的不透明,部分源于接触渠道上的困难。它也源自我们方法上的认知偏差:鉴于该运动的圣战派血统,我们关注的是它与政治—宗教领域不断演变的关系。因此,规训实践并不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政治暴力和人权与其说是独立的研究对象,不如说是我们用来揭示(如同照相显影剂一般)正在发生的更广泛转变的分析工具。

由此看来,我们的认知偏差可能在两个方面产生使其正当化的效果:其一,我们没有把该运动较阴暗的面向置于分析的中心,尽管我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并辟出两章讨论伊德利卜的威权主义问题,以说明该运动与宗教之关系的转变如何影响控制与强制的模式。其二,由于聚焦¹²

去激进化以及中间化的意识形态重组或“主流化”的具体进程，我们的工作可能有助于为一个运动，或其部分，去妖魔化：在其近期历史的某些时刻，它曾信奉圣战观念并据此使用暴力。

这为本书引入了内在的政治维度。与此同时，写作本书的过程本身，经由我们与该运动的接触，同样不无政治意味，它或许以微末的方式，促进了叙解军自身的反思，以及它对伊德利卜之外世界不断演进的理解，为变革开辟了新的途径。叙解军的轨迹可以标示出走全球圣战的潜在出路。它不是预防暴力极端主义（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的蓝图，而是审慎、严谨的政治乐观的基础。

全书导览

我们对叙解军演变的分析不是线性的历史叙事。相反，我们在第一章中以其前身支持阵线的早期岁月为参照点，以更好地理解该运动此后的道路。在这一章中，我们凸显其实地务实行动与其更为强硬的意识形态信念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还考察了该组织如何适应冲突不断演变的动态，包括外国行为体（如西方国家）的介入、与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其他组织的互动、与其他盟友和对手的往来，以及导致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决裂的种种压力。

接下来的两章考察叙解军如何借助理来确立对叙利亚西北部的控制并重构自身。第二章分析叙解军对武装反对派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力巩固，这些组成部分从较主流的派系到它选择在叙利亚西北部正面对抗的全球圣战分子不等。随后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出，治理通过把权能授予其他行为体，在叙解军的去激进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同时也是对土耳其战略利益（包括土耳其自身与俄罗斯的政治进程）的适应。

¹³ 我们还提出，治理不仅使叙解军能够、也迫使它改革其内部权力结构，并在组织内部擢升新一代技术官僚。

第四章和第五章探讨叙解军如何疏远圣战主义和萨拉菲主义。第四章中，我们论证在与基地组织决裂之后，叙解军通过制度化进程进一

步边缘化了自身的宗教强硬派。这一战略成为遏制内部话语、同时使武装文化部分主流化的手段。第五章中,我们分析叙解军如何背离萨拉菲主义并重新定义伊斯兰教在治理中的角色。它不再追求伊斯兰化社会的目标,而是采取了基于教法政治(即“教法指导下的公共政策”, *al-siyasat al-shar'yya*)的进路,以此使其统治正当化,并对宗教法令施加控制。

第六章和第七章考察叙解军与穆斯林主流的关系以及它与宗教少数群体的互动。我们认为,在这两个案例中,叙解军对霸权的追求以及它对革命的热月式处理,即在激进时期之后进入巩固与温和阶段,塑造了它日益增强的、尽管仍有限的开放性。第六章中,我们展示叙解军如何寻求接触苏菲派,将其作为战略定位:依托沉默的大多数,让不构成威胁的穆斯林团体充当抗衡萨拉菲民粹派的力量。第七章中,我们论证,尽管最初与宗教少数群体关系紧张,叙解军对他们的接触最终服务于其更宏大的抱负:把自己定位为叙利亚反对派内部的霸权力量,强化其作为面向全国、志在建立国家的行为体的形象。

第八、九、十章考察叙解军在伊德利卜监管道德的方式及其持久的威权主义。第八章分析叙解军威权主义的演变,勾勒它对革命的战略性重新占有与垄断。此外,我们还探讨该组织如何逐渐减少针对活动人士使用武力:部分出于精心算计的转变,部分也因为活动人士日益内化了叙解军的主导地位。第九章考察 2024 年针对叙解军的抗议浪潮及该组织的回应,包括其管控公众反对意见的策略。我们分析了叙解军提出的改革,例如受控选举,这与该地区其他半威权政权的做法相似。第十章将展示,作为其转变的一部分,叙解军逐渐放弃了对宗教规条的严格执行,甚至叫停了一场日益壮大的民粹运动所提出的推行道德警察的提案,这场运动得到伊德利卜有影响力的地方行为体支持。这一决定出于维持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部门和避免国际反弹的需要。于是,叙解军在各行为体持有的较为僵化的宗教观点与抵制此类措施的部分民众的反对之间周旋。对伊斯兰规范执行的管理是微妙的平衡术,它不仅是教义

性的，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这种此消彼长，我们将其定义为“自上而下的去激进化”与“自下而上的再激进化”的叠加，在 2024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后愈发明显。

第十一章采取更具本体论色彩的方法，探讨该运动的“意识形态结局”，并试图界定叙解军当前的身份。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说清叙解军不再是什么，远比清楚界定它变成了什么要容易。由此看来，我们认为，考察该运动的转变，远比试图确定其最终身份或把它归入当代伊斯兰政治的现有类型学更能提供洞见。

因此，第十二章给出略带颠覆性的结论，提出大胆的比较观察：与在虚弱时期通过意识形态转变实现去激进化的圣战组织不同，叙解军是在强势地位上通过务实行动实现去激进化的。所以，与其把叙解军与其意识形态上的同类相提并论，不如把它与西方极右翼政党作类比：后者走过了一条类似的主流化轨迹。本章以总结中间化的意识形态重组带来的经验教训、并考察西方（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极右翼运动走过的相似道路，为全书作结。

尽管叙解军已显著远离了早期的激进主义，其中间化的意识形态重组现已抵达最终阶段，在 2024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再发生进一步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伊德利卜并不是自由派、性别敏感或民主式伊斯兰解

¹⁵ 读的孵化器。恰恰是因为这场转变以攻占大马士革为顶点、且如今已大体完成，在本书中记录并理解它才既正当其时，又在分析上至关重要，

¹⁶ 在政治上更是势在必行。

第一章 奠基母体：支持阵线在圣战窠臼中的不安演变

任何转型，若不先清楚把握其起点、其奠基母体，都无法得到充分理解。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早期的母体具有若干关键特征，塑造了该组织的轨迹。自创立之初，该组织便公开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意识形态根基，这巩固了它在国内外圣战圈内的合法性。它据此与基地组织结成战略同盟，这不仅出于意识形态亲和，更是一种精心盘算的激进务实之举，使其得以在竞争高度激烈的武装格局中周旋，尤其是应对伊斯兰国的崛起。面对派系竞争，支持阵线还发展出垄断倾向，竭力巩固并扩大其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控制。

本章讨论支持阵线历史上的若干重要事态发展，以便更好地理解该组织在大叙利亚解放军（Hay'at Tahrir al-Sham, HTS）随后转型之前的起点。由于支持阵线仅存在五年，而叙解军已存在八年，本分析无意涵盖他处已广泛记载的每一细节。¹相反，这一回顾性概述考察该组织与伊拉克伊斯兰国（ISI，2013 年改称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ISIS]，2024 年改称伊斯兰国 [IS]^①；本文按所涉时段使用相应缩写）、后来又与基地组织及叙利亚其他武装团体的互动，以及它在实地不断变化的战术决策，包括其对治理的参与。理解支持阵线及后来的叙解军在这一时期如何与平民人口打交道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为理解叙解军此后的轨迹提供了背景。

① 原书作“2024 年改称伊斯兰国”，疑为二〇一四年之误——伊斯兰国是二〇一四年六月宣布建“哈里发国”并改此名的。译文照原书年份，谨此说明。——编注

支持阵线因其与全球圣战的关联及其在叙利亚冲突中的显赫地位而受到国际关注。该组织是唯一先后依附于 ISIS、再依附于基地组织，随后又摒弃这两家组织并打压其在叙利亚成员的组织。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支持阵线的能见度也因其作为叙利亚武装反对派最显赫行为体之一的角色而达到顶峰：它主导了多场战役与派系联盟，并引来包括美国、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在内的多国的关注与警觉。多年来，美国尤其以无人机袭击定点打击了该组织多名头目，包括曾前往叙利亚的所谓“基地组织中央”的头目，但美国从未以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本人为目标。

支持阵线向叙解军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叙利亚冲突的演变。该组织最初由艾哈迈德·沙拉创建，他曾是 ISI（ISIS 及后来 IS 的前身）一名驻扎伊拉克的叙利亚籍指挥官。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武装反对派中崭露头角，随后于 2013 年拒绝 ISIS，公开与基地组织结盟，又于 2016 年与扎瓦希里的组织决裂。叙解军于 2017 年作为数个活跃于反叙利亚政权武装斗争的团体的联盟而出现，尽管其中多数后来叛离。叙解军虽由支持阵线发展而来，却因自身的新性质而不同于后者：它是一个在叙利亚西北部治理数百万平民的组织，这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涉及在 2024 年接管大马士革之前如何与其他武装团体、国家和平民互动。因此，本章对支持阵线早期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叙解军相较于其前身的早期发生了多大程度的转型：既包括该组织过往遗留的遗产，也包括关键的断裂点。

支持阵线在 2011 年至 2016 年间存在的五年，凸显了其实地务实行动与更为强硬的意识形态信念之间的持久张力。为了将自己与其母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区分开来，支持阵线强调本土经营，开始与其他派系合作，并对平民采取更宽容的方针。尽管如此，支持阵线虽已与当时的 ISIS 分道扬镳（其根源在于领导层与战略分歧，后文将更详细探讨），在全球圣战问题上仍保持着暧昧立场。它公开把自己的斗争表述为只针对政权，并抵制任何在叙利亚境外发动圣战的企图，但同时又

在宣传中维系与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纽带，使全球圣战派叙事正当化，并将基地组织的高级指挥官和头目纳入自己的队伍。

把圣战带进叙利亚革命的“支援阵线”

关于支持阵线的组建与早年，已有大量研究问世，但仍有重大误解需要澄清。² 过分强调 ISIS 和基地组织对该组织早期选择的作用，会削弱支持阵线的自主性，也无法充分解释该组织的决策。这种取向往往夸大该组织长期战略规划的程度，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仅仅在适应战争不断变化的必需的政行为体。这是现有圣战派研究的一种常见偏见：把它们当作深谋远虑的长期规划者，清楚知道自己的战略未来将如何展开；而现实中，它们的大多数决定都是反应式的、短期的尝试，只为应对眼前的挑战、确保自身生存。因此，回顾支持阵线的早期根源及其不断变化的政治取径，对于理解该组织如何在其存在的头五年适应新的挑战、以及这对叙解军后续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支持阵线的奠基时刻发生在 2011 年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起义期间，当时一波民众运动动摇了多个阿拉伯国家，始于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示威成功促成了立竿见影但并不持久的政治变革；而在利比亚，暴力镇压促使反对派运动走向军事化。随着起义于 2011 年蔓延至叙利亚，民众反抗开始在叙利亚各大城市蔓延，其走向军事化是最有可能的事态走向。

20

叙利亚政权被复兴党（Baath Party）、家族与商业网络，以及由阿拉维派^①军官控制的军队和安全机构所垄断，它不可能简单地号召制定新宪法、继而选出新领导人。埃及或突尼斯军队那样相对自主的权力中心在叙利亚并不存在，无法迫使政权就范。此外，政权在伊朗和俄罗斯的盟友，也绝不会像西方国家最终在突尼斯和埃及所做的那样，逼迫阿

① 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教义上远离主流，历史上长期受歧视；阿萨德家族出自该派，其成员在旧叙利亚政权的军队与情报机构中占据要津，人口约占全国一成。——译注

萨德开放。和平的权力交接实际上不可能；在缺乏非暴力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政权应对的军事化与反对派的军事化，都是最可预见的结果。

支持阵线是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的造物。沙拉是 ISIS 前身的一名叙利亚中层指挥官，2003 年美国入侵后曾前往伊拉克，2005 年成年之初加入伊拉克叛乱。此后数年间，他间接并入 2006 年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ISI)的队伍：他在摩苏尔加入的当地组织圣战者小队(Saray al-Mujahideen)，在叛乱期间与后者合并。³ 艾哈迈德·沙拉被监禁五年，这意味着他在伊拉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而非战场上度过的。这也意味着沙拉几乎没有打过仗，因为他抵达伊拉克后不久即被捕，远早于 2006 年冲突进入教派化阶段。他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由美国人控制的阿布格莱布 (Abu Ghraib) 监狱和布卡 (Bucca) 监狱，许多 ISIS 头目都曾被拘押于此，并随后在狱中形成了 2012 年后扩张该组织的战略。

关于艾哈迈德·沙拉狱中岁月的详细信息很少，不过他本人和他的反对者似乎都认同：他的观点彼时已与伊斯兰国不合。沙拉本人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地区内反对美国入侵的民众情绪强烈。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去那里参战。我们当时不像今天这样清醒。后来，伊拉克监狱中出现的极端意识形态、极端主义文化”[过激 (*ghulu*)] 令我们措手不及。⁴

21

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加入伊拉克叛乱的新来者，都是以反抗外国占领的同情者身份加入的，往往并不完全理解这场正在成形的叛乱的意识形态根基。如今他正向西方国家伸出橄榄枝，这么说固然便宜行事；但 ISIS 主要头目之一、当时或许是该组织三号人物的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的一封信，也从相近的角度揭示了艾哈迈德·沙拉与该组织在狱中已存在的一些分歧。⁵ 阿德纳尼在 2011 年致阿富汗基地组织领导层的一封信中指出，沙拉虽举止得体，但早在 2000 年代双方就存在重要分歧，尤其是在对“暴君的党羽”(*ansar al-tawaghit*，圣战派以此谴

责为不施行其伊斯兰法观念的穆斯林政权效力的穆斯林)和议会议员宣判叛教的问题上。换言之,沙拉在狱中就已反对 ISI 所主张的无条件宣判叛教。阿德纳尼甚至补充说,正是出于这一原因,ISI 协商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反对沙拉领导支持阵线。《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提到,一名曾在伊拉克与他共处的叙利亚武装人员称,沙拉当时曾威胁要杀死任何危及雅兹迪(Yazidi)宗教群体的人,而 IS 后来在与支持阵线正式决裂后奴役的,正是这个群体。⁶ 萨利赫·哈马维 曾参与创立支持阵线,2015 年因反对其部分政策而离开,据他说:

沙拉在伊拉克期间,就在一系列问题上持有与 ISIS 相异的立场。即便到了叙利亚,他也支持接纳艾什尔里派(Ash'ari)[即非萨拉菲派]成员加入支持阵线,只是不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我当时反对这一立场。他还反对以平民市场为目标,以及类似的无差别暴力行为。⁷

根据来自沙拉本人及其 ISI 反对者两方面的信息,沙拉在创建支持阵线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眼见叙利亚冲突不断升级,沙拉提议移师叙利亚、与政权作战。虽然沙拉并非高级成员,但值得注意的是,ISI 彼时已沦为相对较小的组织,失去了其大部分领导层。

22

据称,沙拉得到残余头目之一的信任,这大概解释了为何选中了他。由于他仍是该组织成员,不能径直前往叙利亚。于是他把这个问题在内部提出,ISI 头目们让他就此写一份报告。⁸ 事后回望,沙拉称他把叙利亚冲突描述为不同于伊拉克冲突:那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反抗外国占领的战争。这就要求与民众培养不同的关系,避免 ISI 所犯的那些侵害,那些侵害疏远了众多平民,也疏远了伊拉克各部落,ISI 自己在其内部文件中也承认这一点,例如其 2010 年的《战略计划》。不过,沙拉与 ISI 后来在这个伊拉克组织所提供的支持力度上说法不一。支持阵线创建之时,ISI 已被严重削弱,多达 90% 的头目被杀。ISI 头目们后来声称,尽管在伊拉克遭受这些损失,他们仍在人员和武器上大力支援支持阵线,以致削弱了自身的战事;沙拉则称实际提供的金钱和武器少得

可怜。沙拉反而坚称，他“要求派 100 人，结果只来了 6 人，外加每月 5 万至 6 万美元，持续了六七个月”。⁹

这一点对理解该组织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说法表明，从一开始，发起组建支持阵线的是沙拉，而不是 ISI，更不是基地组织。这与常见论调相矛盾：常见说法认为基地组织借阿拉伯起义之机扩张，同时隐匿自身以规避审视、推行长期议程；而现实中，基地组织对支持阵线的早期几乎一无所知，只能靠 ISI 从伊拉克发出的寥寥数封秘密信件了解情况。就连 ISI，从一开始也并未完全掌控局面。这个伊拉克组织只是批准了己方一名指挥官提出的方案，却无力在他身处叙利亚期间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无意中给了他相当大的自主权，让他依情势相机行事。

很快，艾哈迈德·沙拉与 ISI 之间出现了紧张，尽管支持阵线在技术上隶属 ISI 管辖。事实证明，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扩张及其早期的成功，是伊拉克人难以控制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他的副手阿布·西卜（Abu Sib，又名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以及该组织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接连致信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头目，对艾哈迈德·沙拉的行为表达了不断升级的抱怨。¹⁰ 巴格达迪向基地组织中央抱怨说，艾哈迈德·沙拉不遵守他们的计划、自作主张，理由是通讯困难以及艾哈迈德·沙拉身处叙利亚事件现场，这些正是沙拉后来反过来用以对付基地组织的说辞。ISI 头目们还批评艾哈迈德·沙拉在招募上把关不严，甚至接受那些曾在伊斯坦布尔参加政治会议者的效忠^①。更糟的是（或许在 ISI 看来更糟），该组织指责沙拉谈论由支持阵线设立政治局，而这个伊拉克组织和圣战派认为这无异于异端，因为他们把政治等同于民主。这些信件暴露了 ISI 很早就担心分裂，促使他们派出阿德纳尼（后来正是他指挥了 IS 在欧洲的境外袭击）前去摸底。据阿德

① 效忠 (*bay'a*) 是向领袖宣誓服从的仪式，源自伊斯兰早期对哈里发的拥立。在圣战运动中，一个组织向另一组织“宣誓效忠”即意味着接受其领导，撤销效忠则等同于分裂。——译注

纳尼本人说，艾哈迈德·沙拉心存犹豫，不愿给伊拉克人评估其领导的机会。他把阿德纳尼贬到北方去执行迎接外国武装人员的次要任务，随后干脆把他打发走，遣回了伊拉克。

与 ISI 之间也存在切实的战略分歧。起初，支持阵线对平民更为宽容，叙利亚反对派内的许多行为体也因此对该组织抱有几许同情。这与他们几年后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他们把支持阵线瓦解其他武装反对派团体的账算在它头上。艾哈迈德·沙拉提到，他拒绝过 ISI 的具体命令，例如策划针对平民社区、令人想起伊拉克那种做法的自杀式袭击；更重要的是，他坚称自己拒绝按 ISI 的意愿袭击伊斯坦布尔的反对派。¹¹ 据萨利赫·哈马维说：

从一开始，沙拉与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关系就很紧张。巴格达迪一度派出六名副手，劝说沙拉采纳他的路线：教派主义与全球圣战。巴格达迪要支持阵线袭击什叶派人口，并遵从他的全球圣战构想。然而，沙拉始终拒绝境外行动和按宗教归属袭击平民的想法，无论对方是什叶派还是阿拉维派。¹²

24

在实践中，沙拉及其同伴抵达叙利亚后，便开始在一个已与他们有所关联的现有人脉网络内建立联系。与其他迅速扩张的团体，尤其是依附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的那些不同，支持阵线的对外拓展更为聚焦，招募方式更有纪律，只面向选定的人员，因为该组织的主要行事方式（*modus operandi*），即袭击特定地区的政权目标，尚不需要更大规模的动员。¹³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阵线力求通过该组织已熟识的武装人员的举荐担保（*tazkiyya*）来遴选成员，这有利于建立信任、限制渗透者的威胁，并避免招募到不称职者。这一做法不同于支持阵线的其他盟友，如大叙利亚自由军（Ahrar al-Sham），后者把既有派系纳入自己的组织架构。由于当年为伊拉克所作的动员，许多曾因支持伊拉克叛乱或持有相近思想而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塞德纳亚（Saydnaya）监狱的人，在全国各地本就广为人知、深受信任。尽管这些囚犯大多加入了

大叙利亚自由军等其他团体，但他们广泛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也让支持阵线得以动员其中一些人，在不同地区扩大影响。¹⁴

许多居民观察到，支持阵线积极在他们认为倾向伊斯兰主义者的家庭内部招募。该组织拥有一个民众温床，这在那些被视为伊斯兰主义、渊源可追溯到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与叙利亚政权漫长冲突的家庭中尤为明显。某些家庭因在那段动荡岁月同情或靠拢伊斯兰主义者而博得了名声。在采访中，一些当地居民坚称，正是这些家庭自愿向各个圣战派系敞开怀抱，支持阵线只是其中之一。一名反对伊斯兰主义者的自由叙利亚军地方人物称：

25 有许多伊斯兰主义家庭与 1980 年代末的事件〔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首次与阿萨德政权交战〕有关联。这些家庭憎恨政权。在我生活的地方，支持阵线是通过他们进入社会的，而不是通过大家族。这使他们有能力向政权复仇。与此同时，他们内部也存在差异。即便在我所在的城市，支持阵线也有不同的成分。有些人确实深信不疑，在当地颇得人心。另一些人则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与社会、与反对他们的地方人物作对。¹⁵

支持阵线最初的行事方式侧重轰动性行动，而非大规模叛乱。2012 年，该组织控制的领土有限，便借助精确情报袭击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等城市的战略目标。这套借自其伊拉克行动经验的办法，主要以军事目标为对象，而不像其伊拉克同侪那样以宗教少数群体相关场所为目标，尽管也有平民伤亡。这一战略意味着支持阵线不需要庞大的武装干部队伍，只需少数可信赖、有经验者，来维持这些行动所需的保密。保密工作卓有成效，以至于连叙利亚反对派有时都怀疑这些袭击是否支持阵线所为，反而猜测可能是政权在袭击自己，以抹黑反对派运动。

民众对支持阵线的看法未必一致，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内部各路指挥官的政策。直到 2017 年，该组织的组织管控仍是碎片化的，给其地方头目留有很大余地，后文各章将论及此点。当地人对该组织评价不一。有些人敬重支持阵线只专注于作战、不干涉日常生活；

另一些人则视该组织的坐大为对叙利亚革命及其非教派目标的威胁。¹⁶ 他们同样反感该组织日益高涨的声望及其宗教议程，并为此经常指责支持阵线受到所谓的外部支持。

支持阵线与占主导地位的大叙利亚自由军等其他倾向圣战的盟友一道，开始发展一种针对政权阿拉维属性的宗教与教派叙事，这偏离了起义最初的诉求。这一转变部分源于这些团体自身的宗教观点，也源于政权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外国什叶派战斗人员日益加深的依赖，尤其是在 2012 年真主党（Hezbollah）介入之后。支持阵线尤其主张在叙利亚施行伊斯兰法，并谴责政权的阿拉维根基。不过，该组织的做法比 ISIS 更为审慎。ISIS（及后来的 IS）把非穆斯林和不遵奉其伊斯兰解释的穆斯林都指为不信者和叛教者，支持阵线则把对政权的政治批判与宗教批判结合起来。例如，2015 年，艾哈迈德·沙拉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阿拉维派不属于伊斯兰教门，应当改变其信仰。但他同时强调，问题在于他们对政权的支持以及他们在政权军事指挥层中的大量存在，他认为这种局面应当终止。¹⁷ 因此，支持阵线当时的反对立场，把针对阿拉维派的教派理据与政治理据交织在一起。

支持阵线的怀柔策略在叙利亚反对派内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接受，许多人赞赏它不施加僵硬控制。尽管国际审视与批评日增，支持阵线仍从反对国际上对该组织敌意升级的人那里获得支持。在 2013 年的多次周五抗议中（其中一次名为“我们都是支持阵线”），叙利亚反对派发出了集体的声音，反对国际上把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最初承诺避免伊拉克的前车之鉴（那里的叛乱以严苛管制和暴力疏远了平民），这在叙利亚语境中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对照表明，支持阵线采取了更细致、更审慎的方针，避开了在其他冲突中所见的那些错误，尤其是伊拉克以及此前 1990 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视角与著名圣战战略家阿布·穆萨卜·苏里（Abu Musab al-Suri）的观点相合，他反对圣战萨拉菲主义教派主义的某些方面。然而，叙解军领导层，包括艾哈迈德·沙拉和该组织最高宗教人物阿卜杜勒·拉希

姆·阿通等，坚称这一立场是他们自己的。据他们说，叙利亚起义是一场民众革命，不同于伊拉克语境，那里的叛乱者抗击的是外国占领。在叙利亚的情势下，他们认为必须使自己与多数人口站在一起。据叙解军最高宗教权威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

2011年的局势与2003年的伊拉克大不相同。叙利亚冲突的军事化，是一个穆斯林民族在进行一场民众革命。这与伊拉克及其外国占领大不相同。我们的圣战是一场革命，而不只是对占领的反应。因此，我们的斗争必须依照本地语境、顺应本地事态来展开。我们不可能与周遭的现实区隔开来、孤立自处。¹⁸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外国武装人员卷入冲突，尤其是在派系归属尚不清晰的初期。许多人加入各个派系，如依附自由叙利亚军(FSA)的派系、大叙利亚自由军及其他团体，并不清楚这些团体之间的区别，也不加以区分。其缘由往往更多在于非正式人脉网络的存在，而非对这些团体意识形态的全面了解。例如，圣战者协商委员会(Majlis al-Shura al-Mujahideen)盘踞在毗邻土耳其的战略边境口岸巴布哈瓦(Baab al-Hawa)，成功招募了取道这里而来的欧洲人，这触发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动态：新来的欧洲人会被吸引到已有熟人的团体。¹⁹局势的流动性使战斗人员转换效忠对象或在团体之间流动都相当容易。往往是较有经验、事先可能受过军事训练的新招募者为不同团体提供训练而不正式加入，至少在2013年与ISIS的交战迫使他们选边站队之前是如此。²⁰然而，尽管界线模糊，合作仍达到了相对有效的程度，甚至在绑架记者之类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控制权可以在各团体间无缝转移。记者西奥·帕德诺斯(Theo Padnos)的经历尤其如此：他最初被一个当地团体绑架，随后在多个派系之间辗转，最终落入叙利亚南部支持阵线指挥官阿布·马利亚·卡赫塔尼的控制之下。²¹

28 外国武装人员招募的性质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支持阵线总体上比ISIS更为挑剔，倾向于审查招募对象，而不是来者不拒。支持阵线的招

募重点主要是有军事能力、能够参战的男人。相比之下，在与那个伊拉克组织分裂（后文将论及）之后，ISIS 采取了更包容的招募策略。ISIS 欢迎各种背景的人，包括妇女和家庭，因为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能力，还包括多样形式的支持。这是这一时期支持阵线与 ISIS 在招募方式上的显著区别。ISIS 着力招募整个家庭，既获得战斗人员也增强动机，还招募犯罪分子，可用于类似他们在本国所从事的暴力勾当。其中包括先前曾涉毒和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人。

母体的裂痕：圣战派之间最初的争执点

尽管艾哈迈德·沙拉尚未正式脱离 ISI 便已显露独立的迹象，该组织在若干层面上仍牢牢扎根于圣战圈子，首先是意识形态层面。支持阵线视自己为更宏大圣战运动的一部分，信守大体界定的萨拉菲圣战原则。这一思潮由基地组织自 1980 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以来所倡导，传遍穆斯林世界，宣扬如下观念：与西方合作、又不施行伊斯兰法的政权不具合法性。支持阵线的创立声明最初发布于伊拉克战争期间人气颇高的圣战论坛。在这份声明中，沙拉强调自己反对西方国家，指责它们尽管反对阿萨德，却参与了对穆斯林的犯罪，是“罪恶的同谋”。他还批评土耳其，称它是美国的盟友，对伊斯兰并无真正的忠诚。

由于缺乏本组织著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支持阵线的意识形态观点取自基地组织的立场，尤其是阿提亚·阿卜杜勒·拉赫曼·利比（Atiyah Abd al-Rahman al-Libi）的立场。基地组织掌控着圣战叙事，这塑造了该组织初期的思想。支持阵线总体上与基地组织的总体观点保持一致。与其说它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创新，不如说支持阵线折射了当时与穆斯林政权作战的武装团体的普遍氛围。该组织不加多少创见地采纳了这些观点，尽管在实践中，它在某些问题上的处理有所不同。例如，支持阵线对其他团体采取了更细致的态度，没有因参加民主选举而把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宣判为叛教者，这一话题曾在圣战派中引发争²⁹

论。据萨利赫·哈马维说，颇为悖论的是，某些基地组织文本支持了支持阵线相对更宽容的方针：

艾哈迈德·沙拉在选举之后没有把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宣判为叛教者，也没有笼统地把政权的支持者一概宣判为叛教者。他说这要视个人情况而定。当 ISI 仍属基地组织时，在宣判叛教这类问题上反驳他们要容易一些：可以援引其中一些著述，如阿提亚·利比的著作，来抵制过度的宣判叛教做法。例如，沙拉只需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领导层立场比他们更克制。不过，沙拉有时也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看法，以避免不必要的内部争执。²²

支持阵线也没有发布过正式的论纲或宪章。相反，该组织内的关键人物随时间推移以音频或书面公报的形式阐明了他们的部分立场。许多人对伊拉克发生的事、以及 ISI 对平民实施的暴力尤其持批评态度。例如，该组织首任穆夫提阿布·马利亚·卡赫塔尼很早就发声批评他们所认为的 ISI 的过激行为，²³ 告诫圣战派切勿重演针对当地民众的暴力、宣判叛教的做法及其他侵害，这些行为可能使当地社群疏远圣战派，并导致各部落自 2005 年起与美军结盟对抗他们。就连 2014 年继卡赫塔尼之后出任穆夫提、并与约旦著名圣战派学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关系密切的萨米·乌赖迪，也在一段视频中断言，该组织的信条（‘*aqida*）恪守萨拉菲主义，强调承诺不对民众宣判叛教，并主张与其他团体合作。²⁴

30

支持阵线最详尽的意识形态信条，存在于其后来的宗教穆夫提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为训练营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之中，此人后来成为基地组织和 IS 两者的著名批评者，为向叙解军的转型辩护。沙米（al-Shami）^①的著述起初与基地组织的立场一致。在 2016 年出版的《圣战之树的荫底下》（*Fi Dhilal Dawhat al-Jihad*，该书汇编了此前数年写成的文字）中，阿通表明了他与基地组织立场的一致：即必须与现存不施

① 原书此处的“沙米”与前文的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实为同一人，“阿布·阿卜杜拉·沙米”是阿通的库尼亚，原书未点明。——编注

行伊斯兰法的穆斯林政权作战。他坚持认为，治理的合法性取决于对伊斯兰法的严格遵奉，拒绝任何与伊斯兰原则相抵触的外部影响或立法。对于那些不施行伊斯兰法的穆斯林政权，他写道，“我们相信，与目前统治穆斯林土地的暴虐政府作战居于优先地位，应依据伊斯兰法下的基本义务予以优先对待”；所谓暴君，即“叛教的统治者及与之类似者，包括拥护不信的实体与组织，如议会、立法机构、联合国和安理会”。阿通还明确断言，支持阵线的本地战略与基地组织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以本土化方式] 偏离战略，是属于那些理解该组织[基地组织]战略之人的做法，而不是背弃战略。我们对本地暴君的作战，并不脱离对其主子[美国]的作战。这不是一场脱离本地暴君与国际暴君之间相互依存与同盟关系的单独斗争。相反，这是在同一框架内的集中努力，以强力打破他们的同盟、削弱他们的团结。

不过，阿通也以对宣判叛教(*takfir*，即宣布教内同胞为叛教者)之实践更细致的处理，把支持阵线与 ISIS 区分开来：他强调其适用条件，以避免过火行为，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期间针对平民人口犯下的那些。

这些原则体现在宗教训练营的教学之中，教学聚焦圣战萨拉菲主义核心的若干意识形态原则。据萨利赫·哈马维说：

直到 2016 年，支持阵线的培训都把六本小册子列入课程。这些文本涉及的题目包括：信仰(*iman*)的条件、不依照真主降示的启示进行治理者的律例、阿布·卡塔尔达(Abu Qatada)的反民主论述[《两种方法》]、马克迪西论忠诚与决裂(*al-wala wal-bara*，即忠于穆斯林、弃绝非穆斯林)、阿布·叶海亚·利比(Abu Yahya al-Libi)的《属地律例》(*Abkam al-Diyar*)，以及阿布·阿卜杜拉·穆哈吉尔(Abu Abdallah al-Muhajir)的《圣战教法诸问题》(*Masa'il Fiqh al-Jihad*)。新招募者会在训练营里用一个月时间研习这些材料。然而，这些内容在 2016 年被全部取消。²⁵

随着叙利亚境外的圣战老兵不断涌入，该组织对这一意识形态思潮的信奉多年来愈发巩固。一些著名圣战人物从该组织创立之初就

来到叙利亚，如阿布·朱莱比卜·乌尔杜尼（Abu Julaybib al-Urduni），他是 ISI 前身最初创建者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姻亲兄弟，在 9/11 前夕就已身在阿富汗。另一些人后来加入，如阿布·菲拉斯·苏里，他是叙利亚军队前中尉，曾参加 1970 年代末首次反抗阿萨德之父的起义，随后前往阿富汗加入抗苏圣战。埃及人阿布·法拉杰·马斯里（Abu Farraj al-Masri）自 1970 年代末起就是艾曼·扎瓦希里的长期同僚，他在 2013 年埃及军事政变后加入。再后来，2015 年伊朗与也门基地组织交换囚犯之后，数名基地组织核心人物获释，也相继加入。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副首领阿布·海伊尔·马斯里（Abul-Khayr al-Masri），以及另一位基地组织头目阿布·卡西姆·乌尔杜尼（Abul-Qasam al-Urduni），他于 1980 年代末在阿富汗结识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后来成为其心腹顾问。

不过，支持阵线内部未必是一个完全凝聚的实体。ISIS 强制推行严格的意识形态一致，无情清洗任何不完全信奉其政治与宗教教义的人，支持阵线则表现出更大的内部多样性。一位来自大马士革望族的年轻活动人士回忆，在起义初期他加入该组织时：

32 在所有军事单位里，我们凡事都要争论。有人赞成跟随这位谢赫礼拜，有人反对；有人主张与自由叙利亚军各派系结盟，有人则想与他们作战。对什叶派群体该取何种立场，我们也没有共识：有人说该杀，有人说他们是穆斯林。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经历，同样没有明确的评价。有人视穆尔西为接受了民主的不信者，另一些人则想支持他。那个时候，支持阵线对什么人都是什么样子。是存在过激，但支持阵线不只是过激。²⁶

前述支持阵线与 ISI 之间的紧张逐步升级，最终在 2013 年走向分裂。这一裂痕可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控制权之争，以及在暴力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支持阵线力求保持决策自主，因为它对叙利亚的理解比伊拉克领导层的指令更为细致，而后者往往鼓吹大规模暴力，包括针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暴力。正式分裂发生在 2013 年 4 月，当时巴格达迪宣布了一项重新统一两个组织的计划，把支持阵线并入 ISI，组建伊拉

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ISIS)。对沙拉而言, 这不可接受。面对不确定的局势, 他寻求向基地组织这一更高的权威宣誓效忠, 以维系内部合法性、留住追随者。时任基地组织首领艾曼·扎瓦希里不得不介入。他对这一局面不满, 决定把两个组织拆开, 声明二者之间“不存在组织联系”。²⁷ 然而, 伊拉克人拒绝了这一决定。事后回望, 艾哈迈德·沙拉称:

与巴格达迪决裂时, 我们没有任何好的选项。我们眼看就要被他们消灭, 于是我召集核心圈子, 要迅速作出决定。我告诉他们, 我在考虑向基地组织宣誓效忠。他们劝我不要, 有人说这无异于自杀之举。但没有人能给我提供替代方案。除了向基地组织宣誓效忠, 我们别无选择——否则所有人都会投向 ISIS。²⁸

分裂及其结果, 深受管理外国武装人员的不同方式影响。巴格达迪及其同伙哈吉·贝克尔 (Haji Bakr) 在叙利亚四处奔走, 争取效忠誓约,³³ 尤其是争取外国武装人员的效忠, 他们大多不了解内部冲突, 却很容易被建立国家的理念说服。通过吸纳足够多的指挥官和关键人物, 巴格达迪壮大了对其构想的支持。这一策略包括把阿布·奥马尔·希沙尼 (Abu Omar al-Shishani) 等有影响力的头目招入麾下并授予权柄, 从而便利了他们追随者的并入。当时也有许多欧洲人向 ISIS 宣誓效忠。巴格达迪不断招募并赋能外国武装人员的做法, 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动态。久而久之, 这使 ISIS 比其他团体更容易巩固权力、日益壮大。利用外国武装人员及其对伊斯兰国家理念的投入这一策略, 对巩固 ISIS 的地位与影响至关重要。

IS 固然是一支高效的作战力量, 但招募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叙利亚武装反对派从没有过大批战斗人员, 其麾下人员分属各不相同的派系, 只在特定地区松散协调行动。相比之下, IS 据估计拥有 3 万至 4 万名外国武装人员; 与本地武装团体不同, 他们不受地区或地方忠诚的束缚, 可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灵活调配。这种战略上调动战斗人员的能力, 使 IS 得以发挥其人力优势, 在战场上占据了显著上风。

分裂对支持阵线构成了重大挑战。该组织失去了至少半数战斗人员，以及其在叙利亚东部的石油资源。它被严重削弱，面临迫在眉睫的解体风险。另一个叙利亚武装团体大叙利亚自由军在帮助支持阵线存活下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靠的是资金支持。大叙利亚自由军担心，若没有这种支持，支持阵线几乎所有战斗人员都会叛投 IS，而一个存活下来的支持阵线则可以成为对抗那个伊拉克组织的强大盟友。²⁹ 尽管支持阵线的议程是在本地对抗政权，全球圣战也在维系该组织凝聚力、确保其生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多数有影响力的跨国圣战人物站在该组织一边，包括其意识形态鼓吹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他积极鼓励其追随者加入支持阵线的队伍。这种支持对艰难时期维系内部团结至关重要。据马克迪西说，

34

2013 年与 ISIS 分裂之前，我与支持阵线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身在狱中，无从通信。直到获释、分裂已然发生之后，我才得以重新联络。我全力支持他们，发布公报，呼吁年轻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大多数爱戴基地组织的人都站在了他们一边。然而，许多较年轻的新招募者，尤其是来自欧洲的，却被 ISIS 吸引，往往出于个人情感、人脉关系，或对全局动态的有限了解。支持阵线把圣战萨拉菲主义用作燃料，来推动革命。我说不准沙拉是否从一开始就打算利用我们然后再抛弃我们——我看不透人心。清楚可见的是这个趋势：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加入了这一事业，包括欧洲人、巴基斯坦人和海湾国家的人，其中许多人愿意为这一事业引爆自己，而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反而更为迟疑。³⁰

因此，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境内为支持阵线壮大声势方面发挥了象征性作用，使其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存活下来，当时 IS 正咄咄逼人地试图挖走它的指挥官。没有这种支持，支持阵线或许早就面临解体乃至最终消失的风险。尽管如此，艾哈迈德·沙拉坚称这并未改变他的“叙利亚优先”政策：

我把向基地组织宣誓效忠附加了条件：我们不会把叙利亚用作对外行动的发射台，也不会让别人把它用于这一目的。我把这一点写信告诉

了艾曼·扎瓦希里，他同意了。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作出脱钩决定后我对扎瓦希里的回应，就会看到我在这一点上的立场从未改变。归根结底，我认为基地组织的头目们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脱离了现实。这个组织更像是一句口号，而不是一个提供物质支持的伞式组织。比如我们这家，就从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³¹

该运动的一名干部回忆，当时：

只有加入基地组织，才止住了大规模倒戈投向 ISIS 的势头。2014 年 1 月，我们大量失血，有时一天就有近 70 名战斗人员离开我们投奔伊斯兰国。沙拉别无选择。当时作出的一些决定——比如积极施行伊斯兰法，或宣布建立埃米尔国——是留住战斗人员的办法，尽管沙拉反对适用肉刑，因为我们身处战争环境。最终，这一策略奏效了，失血止住了。³²

35

所谓呼罗珊（Khorasan）网络的到来，与支持阵线领导层无关。它不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而是一张松散的网，成员自 2014 年起陆续抵达叙利亚。其关键成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同伙穆赫辛·法德利，以及萨纳菲·纳斯尔。该网络还包括法国制弹专家戴维·德吕容（David Drugeon），以及参与训练和行动的土耳其武装人员阿布·优素福·图尔基（Abu Yusuf al-Turki）。他们的存在加剧了美国对从叙利亚发动境外袭击的担忧，尽管许多分析人士和记者断言，呼罗珊团伙更多是把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巩固和加强支持阵线地位的契机，而不是立即策划境外行动。³³ 美国以这一团伙的头目为目标，自 2014 年起在一系列空袭中将他们击毙，这是破坏其境外袭击策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其非正式头目穆赫辛·法德利于 2015 年 7 月在叙利亚西北部乘车途中被美军空袭炸死。另一名高级人物萨纳菲·纳斯尔于 2015 年 10 月在伊德利卜省死于美军无人机袭击。

支援革命，间或与革命者作战

支持阵线在叙利亚叛乱中从未居于霸权地位，它直到 2017 年转型为大叙利亚解放军之后才取得主导权。在此之前，叛乱的格局极为多元，各色团体在叙利亚各地活动。一些派系与自由叙利亚军（FSA）结盟，另一些则带有伊斯兰主义乃至圣战倾向。2014 年起，武装反对派内部的主要共识是与 ISIS 作战。反对派一致同意反对 ISIS 在其控制区的存在，并积极打击该组织。然而，各派系彼此之间的关系远谈不上稳定。各团体频繁转换盟友，调整其战略优先事项。

36

这种流变性导致背信弃义的指控层出不穷，也导致支持阵线屡屡试图压服其他团体以巩固权力。

起义初期，派系归属模糊不清，派系间合作司空见惯。各色派系，甚至包括 2014 年之前的 ISIS，基于眼前的情势与优先事项结成联盟。这些合作是战术性的，聚焦于军事行动，如联手夺取军事基地、把守检查站、分担反对派控制区的各项职责。这些团体较低的制度化程度并未妨碍跨团体合作：合作以临时安排的方式进行，据此确定各自的投入并瓜分战利品。这包括协调检查站及其他职责，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和行动的成功。³⁴

在其存在的头两年，即 2012 年和 2013 年，支持阵线总体上努力与由本地活动人士、依附 FSA 的武装团体和地方委员会构成的革命圈子相调适，而不谋求施加自己的支配。该组织名副其实地把自己定义为叙利亚人民的“支援阵线”。当时，支持阵线被纳入 FSA 指挥官麾下的地方军事联合作战室。它并未试图自我隔绝。支持阵线在军事交战中效率尤为突出，经常使用汽车炸弹和精锐战斗人员强攻军营与基地。正如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所说，“面对那样一场群众运动，我们明白自己不可能把效忠誓约强加于所有革命者，也不可能把整个民族塞进一个组织。我们无法支配一切，只能同意结盟。”³⁵

然而,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原因之一是外国干预。许多国家和私人金主开始支持反对派,其援助以各自的人脉网络、既有的关系以及所认定的效率为依据。这种外部支持影响了武装反对派的内部动态,因为每个团体都设法从这些施主那里争取资源与青睐。一种常见的刻板印象,如蓄起大胡子、用伊斯兰术语给自己的组织命名,虽然或许失之简化,却暗示着更深层的动态在起作用:一些人采取了更一贯的伊斯兰包装,以获取更多外部支持。这种外部影响开始加剧内部摩擦与竞争,叛乱者们竞相争取支持,力求与施主的偏好保持一致。³⁷

但并非所有分歧都源于外国支持,内部派系动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各派系的轮廓日益清晰,围绕资源分配、战斗人员招募和意识形态偏好的紧张随之而来。另一个倾向圣战的团体大叙利亚自由军(它在军事行动中常与支持阵线结盟)的一名高级头目叹道:

我们围绕若干核心概念教化我们的成员:效忠誓约(*bay'a*)的必要性、哈里发国的复兴、以及对政权的圣战。支持阵线利用了这一基础,借着申明他们同样信奉这些共同理想,把我们的青年拉了过去。他们还指责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一国一地的(*qutri*)],拿它与他们据称更全球性的视野相对照,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发展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为回应。³⁶

这些问题在控制领土时变得更为突出。如何治理新获得的领土才是最好的?公民社会行为体试图推行自己的举措,但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派系支持,结果也就没有执行其司法裁决所需的武力。与此同时,各派系,无论伊斯兰主义还是非伊斯兰主义,就治理方式争论不休:是施行伊斯兰法,还是采纳其他法律框架。一些与自由叙利亚军关系密切的宗教学者提出了阿拉伯统一法典的构想,这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为协调各国立法而制定的一套示范性法律框架。对非伊斯兰主义者而言,这一框架的用处在于:既承认伊斯兰法的主导地位,又能博得地区上的一定接受度,并尽量减少与伊斯兰主义者的紧张。但圣战派以及萨拉菲派总体,包括支持阵线和大叙利亚自由军,反对阿拉伯统一法典,理由是它

把伊斯兰法实证化了：通过编纂成文，把神圣原则变成了人为制定的法规。³⁸他们认为这一过程扭曲了伊斯兰法，把它神圣而鲜活的性质降格为一个可被人间权力机构操纵的僵硬法律框架。

另一道裂痕是 IS 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国际威胁。IS 夺取了伊拉克的大片领土，把支配扩展到叙利亚东部，建立起以压迫性治理为标志的残暴统治。IS 在其治下强制推行自己对伊斯兰法的严苛理解，靠暴力和恐惧强制推行，打击任何抵抗或偏离其规则的人。IS 的所作所为包括公开处决、在高调宣传视频中杀害外国人质，以及有系统地奴役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口，该组织在其公开出版物中为此辩解。这些措施，连同其建立自封哈里发国的企图，因其对平民和少数群体前所未有的残暴而招致广泛谴责。

国际社会对 IS 的担忧，迫使叙利亚其他伊斯兰主义团体与之拉开距离，并表明自己反对那个伊拉克组织。他们担心 IS 的行为会给政权的叙事提供口实，即反对派完全受该组织摆布，从而可能使全球舆论转而反对他们。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需要把自己与 IS 区分开来，以缓解海外行为体的担忧。为了与 IS 划清界限，其他派系签署了一份公开宪章，阐明其原则。《革命荣誉宪章》(*Mithaq al-Sharaf al-Thawri*) 把伊斯兰阵线内围绕大叙利亚自由军的数个团体，以及大叙利亚军团 (*Faylaq al-Sham*) 等较小的组织联合起来。³⁷ 他们坚称，自己是叙利亚的战斗者，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家，维护包括宗教少数群体在内全体公民的权利。与圣战派的观点相反，他们还把与反对叙利亚政权的外国合作正当化了。

对圣战派而言，《革命荣誉宪章》突破了若干原则与底线，这构成了支持阵线反对它的理由。这些原则中包括接受外国的支持（圣战派对此激烈反对），以及对伊斯兰国家奠基性原则的所谓“稀释”(*tam'iya*)。支持阵线发布公报，谴责与被视为伊斯兰之敌的国家合作，谴责把国民公民身份置于宗教团结之上，并谴责任何缺乏致力于建立伊斯兰法治国家的行为。³⁹ 不过，这也在内部造成了分裂。该组织当时的宗教权威阿

布·马里亚·卡赫塔尼辞职以示反对，由立场更为极端的约旦人、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在约旦的亲密同僚萨米·乌赖迪接任。³⁹ 另一些人，如阿布·菲拉斯·苏里，也因宪章之事对大叙利亚自由军大加挞伐。

2013 年至 2014 年间，国际社会开始对支持阵线采取强硬立场，这一转变始于 2013 年 4 月该组织正式向基地组织宣誓效忠。在此之前，该组织与那个伊拉克组织的关系尚存某种可推诿的余地，因为这些联系一直是秘密的。然而，该组织一旦宣布效忠基地组织，便开始落入联合国制裁的范围。支持阵线因其与奥萨马·本·拉登创建的组织有关联，被列入安理会第 1267 号决议的制裁名单。这一举措遭到了一些反对，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在其回忆录中就特别提到，他对这一决定持有保留意见，因为他认为该组织效率极高，释放针对它的信号或许是个错误。⁴⁰

随着国际压力不断增大，支持阵线开始袭击它指控为接受西方支持的本地派系，声称此类援助最终旨在打击该组织。最引人瞩目的被打击派系包括叙利亚革命者阵线（Syrian Revolutionary Front）、坚定运动（Hazm movement）和第 13 师（13th Division）。支持阵线于 2014 年末率先拿贾迈勒·马鲁夫（Jamal Ma'ruf）的团伙叙利亚革命者阵线（SRF）开刀，指控其腐败和牟利。支持阵线发动攻势，迅速压垮 SRF 部队，夺取其关键据点，缴获大量武器与物资。马鲁夫的团伙无论在军事能力还是本地影响力上都无法与支持阵线匹敌，土崩瓦解，他本人及其战斗人员被迫撤退。随后，支持阵线瓦解了受西方支持的叛军团体坚定运动，指控其受美国支持。坚定运动内部本就虚弱、缺乏广泛的本地支持，无力抵抗支持阵线的进攻。据一位目睹了这些冲突的自由叙利亚军地方指挥官说：

看到支持阵线日益壮大，我们试图团结起来求生，但成功的希望渺茫。我们对自己的战斗人员没有足够的权威，他们都认为支持阵线是一支非常能打的队伍。数千名战斗人员中，只有五十人愿意还击支持阵线。⁴¹

支持阵线在袭击其他派系时保持着战略性和选择性。它精心选定特定的对手,同时继续与其他武装反对派团体合作。因此,支持阵线避免了与整个反对派为敌,也没有自称唯一的合法权威。相反,它继续积极参与与各派系的联合行动,包括当时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派系之一大叙利亚自由军及其本地盟友。当时曾有讨论,要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整合各方力量,如加入大叙利亚自由军主导的伊斯兰阵线,但这些尝试均未能落实。在这些谈判中,支持阵线对加入其他派系,尤其是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表示谨慎,理由是其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支持阵线还认为,这些努力不会在武装反对派内部带来真正的组织统一。⁴²

起初,武装团体并不把治理放在优先位置,但它们逐渐开始合作,以应对治理新解放地区的挑战。反对派控制区的权力真空要求一种协调的办法。一些公民社会行为体推动新的举措,如设立法院,但往往因资源有限和缺乏执行机制而举步维艰。这些法院偶尔依靠武装团体来执行其裁决,但这种支持通常是临时的,而非系统性的。随着治理努力的推进,包括支持阵线在内的各派系之间的合作变得更有章法。在阿勒颇等地区,武装团体的联盟设立了法院以取代既有的民间架构,从而在教法委员会(*al-Hay'at al-Shar'iyya*)等框架内形成了权力分享安排。大叙利亚自由军、支持阵线、大叙利亚之鹰(*Suqur al-Sham*)等主要派系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与地理分布划分权力。

41 对支持阵线而言,治理也受到与IS竞争的驱动。尽管支持阵线在分裂中存活了下来,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念依然具有吸引力。据萨利赫·哈马维说,这种竞争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治理策略:

2014年,许多人离开我们去投奔IS,尤其是在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并不认同IS,尤其是它过度的暴力,但仍然认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很重要。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治理。这始于我们宣布建立埃米尔国——许多团体对此抵制——直至设立司法院(*Dar al-Qada*)。但我们与其他团体,包括大叙利亚自由军,达

成过谅解：不应施行伊斯兰法定刑(*hudud*)，因为我们仍处于战争之中。而实际上，这帮助我们存活了下来，人们不再去投奔 IS，留在了我们这里。⁴³

2015 年夏，支持阵线建立了自己的法院，称为司法院 (*Dar al-Qada*)。其治理努力主要集中于司法职能，而非社会服务，后者始终微不足道。支持阵线坚称自己依伊斯兰法行事，但避免像其伊拉克同侪那样以公开处决作为恫吓民众的主要手段，尽管此类事件偶尔也有发生。这一做法是该组织内生的，并非受外部命令指使，不过它也与基地组织各分支在萨赫勒和也门等千差万别的地区所偏好的策略相吻合。此外，支持阵线也提供基本服务。支持阵线服务部门的一份裁决清单虽不完整，但显示其多数裁决相当日常琐碎。⁴⁴ 它们处理的都是日常事务，如平民过度用水、规定面包价格、招募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工作、禁止新建电力设施、管控基本商品价格等。据一位反对该组织的自由叙利亚军地方指挥官说：

我们抵抗支持阵线，在本地反对他们，坚持到了我们能够坚持的极限。然而，久而久之，他们被证明比我们更精明、更有战略。他们的影响力不是靠社会服务增长的，而是靠设立法院——这使他们得以深深渗入并扎根于社会之中。他们的治理方式迅速、务实、善于应变，这最终让他们占了上风。⁴⁵

42

尽管支持阵线从未能与 IS 相提并论，它也确实施以刑罚、执行杀戮，即固定刑 (*hudud*)，也就是伊斯兰法定刑罚，尽管有说法称各方曾约定在战争期间暂停固定刑。一批被寻获的文件详细记载了因谋杀、婚外性关系（包括卖淫）和叛教等罪名而处决的案例。⁴⁶ 平民还批评该组织严苛的地方管制，包括禁止音乐、吸烟和男女混杂，以及对非政府组织施压。因此，本地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支持阵线的反对，示威的录像和其他抗议形式可以为证。⁴⁷

尽管彼此合作，激烈的竞争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支持阵线与大叙利亚自由军之间。后者已崛起为该地区的支配性力量，坐拥雄厚资源与国际关系。它力求争取国外支持并倡导新愿景，包括在西方出版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招致了支持阵线内部较激进人物如阿布·菲拉斯·苏里的强烈反对，他公开批评大叙利亚自由军。此外，大叙利亚自由军还努力笼络较小的派系，防止它们与支持阵线结盟、为其壮大声势。双方合作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 2015 年的征服军（Jaysh al-Fath）联盟。该联盟汇集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外国支持者，以壮大反对派并协助夺取叙利亚西北部的领土。大叙利亚自由军与支持阵线成为该联盟内的关键角色，与较小派系并肩作战，控制了整个省份。随后，其他地区也建立了类似的联合作战室，从毗邻黎巴嫩的卡拉蒙（Qalamoun）地区一直延伸到阿勒颇。大叙利亚自由军内部有人批评这一局面，认为这是支持阵线试图确立支配地位，与大叙利亚自由军走向更大开放的努力背道而驰。⁴⁸

43

与全球圣战决裂与叙解军的浮现

在 2015 年 9 月俄罗斯介入之后，叙利亚叛乱接连遭遇军事挫折，逐渐认识到统一的必要性。阿勒颇的陷落、叙利亚各地战线上的压力，以及这些事件在亲反对派国家中引发的国际观感，都凸显了这一认识的紧迫性。事情变得清楚：武装反对派不能继续分裂下去。于是，所有武装团体都愈发强烈地感到，全面整合其组织架构正在成为关乎生存的军事必需。

2016 年，实现这种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多数反对派团体普遍害怕与支持阵线合并，因为后者被国际列名。美国和欧盟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将该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FTO）和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SDGT）实体。2014 年，支持阵线又因与基地组织的关联，依第 1267 号决议被安理会列名。这一列名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也必须同样取缔

该组织。因此，叙利亚其他武装团体担心，通过此种合并组建的任何新实体也可能被同样列名，并面临包括土耳其在内所有国家的压力。

走向反对派统一的第一步，是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早在2016年12月阿勒颇失守之前，实地的军事形势已在恶化，这加速了激烈的内部商议，最终促成支持阵线于当年夏天决定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支持阵线更名为大叙利亚征服阵线（Jabhat Fath al-Sham, JFS），以标志该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决裂。据该组织最高宗教人物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

起初，基地组织告诉我们可以按我们的需要行事。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想搞任何境外行动，他们同意了。但后来，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成了反对派联合的障碍。一些派系确实对这种关系耿耿于怀，另一些则拿它当借口。但我们不想重蹈与IS分裂时的覆辙。人人都害怕那个结局。我们想避免负面后果。⁴⁹

44

当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分裂时，围绕支持阵线真实意图的异议和争论相当激烈。有人认为此举是战略性的改换招牌，意在于叙利亚境内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与合法性，表明支持阵线真正背弃了这个全球性组织。反过来，许多分析人士和外国都怀疑，这不过是一种战术性动作，只在公开场合同基地组织拉开距离，实则仍忠于它。造成困惑的部分原因在于：早先的商议透露，艾哈迈德·沙拉曾向扎瓦希里提议，让他们的效忠保持秘密。艾哈迈德·沙拉还得到了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海伊尔·马斯里的同意。实际上，后续的事态表明，艾哈迈德·沙拉并不是在欺骗西方国家，让他们相信他在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他是在欺骗基地组织本身。他的首要意图是取得对方对公开断交的同意，这实际上是迫其就范，同时仍能约束那些仍效忠基地组织的指挥官的内部异议；而实际上，他是在强行确立自己的独立。据圣战派意识形态鼓吹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说：

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给我和阿布·卡塔达发来一条信息，表达了对美俄结盟打击其组织的风险日益增大的担忧。他认为，他们需要更改组

织的名称,并与其他派系结盟,以缓解这一威胁。阿通强调,改名只是表面的——不过是换个招牌——同时保持对基地组织的秘密效忠。阿布·法拉杰和阿布·海伊尔都支持这一战术性举动。阿通还提到,如果扎瓦希里博士拒绝这一方案,他们就后退一步,但他敦促我们支持他,以防止内部分裂。然而,不久之后,赛义夫·阿德勒(Saif al-Adl)从伊朗联系我,强烈反对这一提议。他认为阿布·海伊尔和阿布·法拉杰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又过不久,我收到了扎瓦希里博士本人的信息。他解释说,他无法转给我看沙拉发给他的信息,但他把自己回复的信息给了我。扎瓦希里博士指责沙拉为人狡诈。⁵⁰

45

研究者艾门·贾瓦德·塔米米(Aymenn Jawad al-Tamimi)搜集的一批文件的回顾显示,基地组织与前支持阵线双方的指挥官和头目之间有过大量的意见交换。⁵¹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组织问题、决策权限和资源管理,例如,支持阵线的武器归谁所有。文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证实了艾曼·扎瓦希里对该组织脱离基地组织的强烈反对。其他人物,如支持阵线前穆夫提萨米·乌赖迪,把这次分裂斥为非法叛乱,甚至否认基地组织副手阿布·海伊尔·马斯里完全知情的说法。批评者认为,既然艾曼·扎瓦希里反对分离,艾哈迈德·沙拉就应当退让,但他拒绝这么做。扎瓦希里措辞严厉的信息(“我们将与你们战斗,直到内乱(*fitna*, 分裂)不再存在”)凸显了他对艾哈迈德·沙拉离去的决定的严词驳斥。

在支持阵线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之后,叙利亚武装反对派面临两条分道扬镳之路的关键抉择。一方倾向于政治路线,主张与其仅存的主要支持者土耳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有重大战略利益),并保持战略纵深,以既维护叙利亚反对派的信誉,又避免新一波难民涌入叙利亚。另一方则把军事路线置于优先,抵制与土耳其之类外国走得太近。这一分歧在大叙利亚自由军内部尤为明显,该组织实际上沿此线分裂。一些成员主张与土耳其加强政治合作,视之为生存与战略收益的关键;另一些则专注于保持军事独立,对外部影响保持警惕。

叙利亚武装反对派的这一分裂，反映在 2016 年末旨在统一反对派的两项互异倡议上。第一项意在整合在自由叙利亚军（FSA）伞下活动的各派系，第二项则谋求联合伊斯兰主义各派系及其盟友。前身为支持阵线的大叙利亚征服阵线（JFS）加入了第二项倡议，后者于 2017 年 1 月最终促成大叙利亚解放军的创建。叙解军被设想为一个伞式组织，以整合所有参与该倡议的团体。大叙利亚自由军在两项倡议中都有身影。⁴⁶随后，大叙利亚自由军当时的头目阿布·阿马尔·奥马尔（Abu ‘Ammar al-‘Omar）同意并入叙解军，但该组织的领导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决定，理由是担忧艾哈迈德·沙拉的支配地位，以及与被国际列名的恐怖组织扯上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大叙利亚自由军的退出加剧了叙利亚西北部叛乱阵营内部的分裂，叙解军与大叙利亚自由军成为争夺控制权与影响力的两大主导派系。

与此同时，支持阵线与基地组织断交决定的最强硬内部反对者，因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而退却。这包括多数约旦籍武装人员，以及许多仍效忠基地组织的余留外国武装人员。从国外来到叙利亚的余留基地组织头目，多数很快死于美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最初认可与基地组织分裂的阿布·海伊尔本人，以及出席了沙拉记者会的阿布·法拉杰·马斯里，这在客观上帮助艾哈迈德·沙拉压低了该组织内部的异议。

第二章 争夺主导权：大叙利亚解放军在叙利亚反对派中的霸权企图

47

支持阵线起初并不是一个大组织，这一点不同于其他若干在 2011 年至 2012 年间迅速动员起数千名成员的武装团体。尽管如此，到 2019 年，它已经成为叙利亚西北部的主导力量，而其他武装反对派团体当时也仍在该省活动。这是如何发生的？在私下访谈中，大叙利亚解放军（Hay'at Tahrir al-Sham, HTS）的领导人强调一个简单的叙事：说来矛盾的是，这个组织本意并不是要成为独立的组织，而是要成为拥有统一军队的包容性政府。但这一雄心勃勃的愿景未能实现。若干团体连同一些较小的军事派系拒绝与支持阵线的下一面招牌大叙利亚征服阵线（Jabhat Fath al-Sham）合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叙利亚自由军，即叙利亚西北部除它之外最强的团体。这些团体担心沙拉对新组织的控制，也顾忌被大多数外国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列为恐怖组织的风险。随着与其他武装反对派团体的谈判陷入停滞，叙解军转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开始寻求确立主导地位，只是所凭借的手段各不相同。这包括对抗其昔日的伊斯兰主义盟友大叙利亚自由军；随后，它又向昔日的组织母体基地组织（它事实上已将其拆解）以及由外国人组成的武装团体强加条件；最终，它对叙利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回流人员发动了战争。

48

打击中间地带：叙解军向革命主流圈子施压

叙解军于 2017 年 1 月的成立加剧了武装反对派内部的紧张关系。统一武装反对派的失败意味着，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武装团体陷入了

一场关乎生存与支配的零和斗争。叙解军成立之后，叙解军与大叙利亚自由军这两支大派系的共存已难以为继。在俄罗斯与政权的压力之下，伊德利卜省承受不起被两个相互竞争的武装团体瓜分的局面；相反，它必须整合到单一、统一的权威之下。大叙利亚自由军与叙解军有着共同的圣战谱系，尽管大叙利亚自由军在冲突中更早的时候就曾试图与圣战分子拉开距离。¹但两者也有着根本不同的优先事项，并且在土耳其、叙利亚反对派的外国支持者以及内部权力结构等问题上观点相左。简言之，大叙利亚自由军奉行与土耳其及外国后台结盟的政治战略，推动一个与大多数其他武装团体共同参与的包容性项目，而叙解军则优先采取以军事为中心、以其紧密结盟的派系为核心的路线。双方无法调和这些分歧，这意味着分享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终，一方必须压倒另一方，并强加自己的条件。

2017年至2019年间，叙解军与大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爆发了数轮对抗，各自较小的盟友也卷入其中。这些冲突往往发生在双方某些地方指挥官遇刺之后，而每一方都把刺杀归咎于对方。但这些事件与其说是更广泛冲突的根源，不如说是催化剂，因为这场冲突关乎的是该省的领导权。这场冲突持续了大约两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团体及其各自的盟友实力相当，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叙解军对抗大叙利亚自由军有三条主要理由。阿布·法特赫·法尔加利是叙解军的前宗教学者，因反对大叙利亚自由军与土耳其等外国发展更密切关系的决定而离开了该组织。他认为，大叙利亚自由军的文职项目对叙解军构成了威胁。第二，他提到，叙解军需要控制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这些边境此前由大叙利亚自由军掌控，是进入该省的主要通道，能提供丰厚的经济资源，并在国际上提供政治筹码。第三，法尔加利本人虽然反对土耳其，但他提到，叙解军的内部霸权将迫使土耳其按照叙解军自己的条件与其合作。²此外，叙解军总体上还担心其他派系可能被外国利用来对付它。在随后几个月里，几个曾经加入它的派系相继分裂出去：自由人军（Jaysh al-Ahrar），它本身就是从大叙利亚自由

军分裂出来的；还有赞吉运动（Nur al-Din al-Zinki）。这种担忧由此进一步加剧。

相比之下，大叙利亚自由军成了制衡叙解军的力量，吸引着寻求保护的派系，其中许多来自自由叙利亚军。大叙利亚自由军迅速把众多对叙解军的企图心存警惕的较小团体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遵命正道组织（Fa-Staqim kama Umirat）、大叙利亚之鹰，以及伊斯兰军的北方分支。这一态势使大叙利亚自由军的重组努力变得复杂。大叙利亚自由军当时正从长达两年的内讧中恢复过来。内讧发生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派系之间，其中一个派系于2016年12月组建自由人军，随后于1月加入叙解军；这场内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内部改革。因此，大叙利亚自由军尚未做好对抗叙解军的准备。用一位大叙利亚自由军领导人的话说：

支持阵线利用我们拒绝加入他们以及我们与外国的关系来攻击我们。

我们的组织被内部纷争拖累了一年。我们才刚刚开始筹建一支中央军事力量，但还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我们本应推迟与他们的对抗。³

2017年至2019年间，大叙利亚自由军与叙解军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叙解军最终占了上风。叙解军最初于2017年7月取得优势，凭借的是其集中统一的军事力量，以及对大叙利亚自由军据点的成功孤立。⁴叙解军在大叙利亚自由军活动的各个地方建立了小型分支团体，因为后者继续主要依赖以地域为基础的军事力量，而不是脱离特定地区的集中建制单位。借助这些分支团体，叙解军得以阻止大叙利亚自由军较强军事单位的介入。叙解军的具体做法，是鼓励达成地方性协议，⁵⁰规定这些地方之内的所有军事团体都不参与派系间的战斗。作为回应，大叙利亚自由军于2018年与赞吉运动组建了叙利亚解放阵线（Syrian Liberation Front）以恢复实力，随后又于2018年8月加入由大叙利亚军团领导的全国解放阵线（National Front for Liberation），大叙利亚军团是与土耳其结盟的派系。这一联盟以一系列小规模交火与战术性交锋暂时稳住了冲突，使反叙解军联盟得以收复一些失地。

决定性的阶段发生在 2019 年 1 月，当时叙解军控制了整个省份。叙解军发动了一场全面攻势，压垮了叙利亚解放阵线，先是集中力量打击伊德利卜北部的赞吉运动，随后又追击扎维亚山区的大叙利亚之鹰与大叙利亚自由军。在短短几天内，叙解军拿下了包括阿勒颇西部与伊德利卜南部在内的关键地点，把赞吉运动逐出了阿勒颇北部的战略要点，如达拉特伊扎（Darat Izza）。决定性的因素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 TIP）的军事支持，以及受土耳其支持的派系大叙利亚军团所采取的中立立场，尽管大叙利亚军团隶属于大叙利亚自由军此前加入的全国解放阵线。⁵ 这些因素使叙解军在一场短暂而具结论性的战斗中占据了关键优势，并在战斗中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其他派系，包括要求它们接受与叙解军结盟的救国政府的权威；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一点。叙解军与大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它们的根本分歧。脱胎于支持阵线的叙解军，在意识形态上比大叙利亚自由军更为投入、更为团结，而后者已经沦为各个派系的联合体，受困于内部凝聚力不足与决策分歧。

然而，叙解军胜利的第一个悖论在于：尽管取得了成功，它在军事战线上仍然需要与昔日的对手合作。叙解军确立了对大叙利亚自由军及其盟友的支配地位，但它不得不允许它们留在该省，只要它们拆除被救国政府取代的文职架构。唯一的例外是赞吉运动，叙解军把它驱逐到了土耳其控制更为直接的地区。叙解军无法简单地解散其他派系，例如大叙利亚自由军，因为这样做会削弱该省整体的军事防御。强行把它们并入叙解军同样不可行，因为这些派系不愿加入那个刚刚击败过它们的组织，正如叙解军军事领导人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在一次访谈中所承认的那样。⁶

这标志着叙解军在 2019 年至 2024 年间的治理实践中反复遭遇的“社会惰性”首次清晰显现。我们所说的“社会惰性”，是指社会并非可以无限塑形，不能随心所欲地朝任何方向塑造。尽管实力强大，叙解军仍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武装派系同时也是社会现象。它们产生于

社会的特定阶层，携带着自己的身份、历史与地方纽带。叙解军不能简单地把它们边缘化，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它们所代表的社群，而不严重削弱该省抵御政权攻势的整体能力。

叙解军的胜利恰逢反对派在 2020 年春近乎崩溃。政权的攻势得到俄罗斯猛烈轰炸的加持，后者因此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这导致叙解军及其盟友在攻势前夕控制的领土损失了近 40%。当时许多人担心，政权与俄罗斯未必意在征服整个伊德利卜，而是寻求控制连接阿勒颇与叙利亚海岸线的两条战略公路，同时把反对派限制在沿土耳其边境一条 10 至 15 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内，其中甚至不包括伊德利卜市。只有土耳其在 2020 年初的决定性军事干预才阻止了这一结果：它既部署了大量地面部队，又发动了围绕阿勒颇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摧毁了可观的政权兵力。这次干预最终促成了俄罗斯与土耳其于 2020 年 3 月在莫斯科达成的事实停火，我们在其他章节中对此有所论述。

叙解军对竞争对手的胜利，加上最近的军事挫折，迫使武装反对派整体着手重大重新配置。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反对派不能再作为一盘散沙式的派系联盟运作，每个派系各有各的内部架构与目标。缺乏真正的军事制度化造就了碎片化的格局：一些派系扎根于本地村庄，另一些则作为更为专业化、集中化的力量运作，能够根据作战需要重新部署。训练也始终参差不齐、临时应付，缺乏与特定作战能力的发展相衔接的统一战略框架。此外，派系之间的竞争往往损害它们的效能。许多派系不愿把全部实力投入前线，担心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会使自己无力防备敌对派系趁虚而入、夺取权力。

因此，武装反对派集体同意协调各自的努力，并在一个新的指挥架构，即“明胜”联合行动室（al-Fath al-Mubin，字面“明显的胜利”）之内，把它们的军事行动正式化。“明胜”作为一间军事行动室，其构想是把所有派系重组为由若干旅（*liwa*）组成的统一架构，每个旅驻扎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并涵盖从狙击手、步兵到坦克与火炮的所有必要军事专业。此外还将设有类似于精锐部队的专门旅，它们由中央统一编组，

而不依附于任何特定地区,从而能够根据作战需要灵活部署。这个新的军事行动室最初由 40 个旅组成,每旅 600 人,全部隶属于现有的某个武装团体。⁷各派系最初同意合作,但因叙解军仍被国际列名而宁愿保持距离。正如伊德利卜一位自由叙利亚军领导人当时所说:

就目前而言,我们都保留着自己的架构。我们的训练也仍然各自分开。叙解军坚持要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但我们很难与一个被国际上列为恐怖组织的组织搞某种完全整合的项目。要超越行动室这一步将会很难。⁸

叙解军与土耳其都主张这种把伊德利卜军事架构集中化的路线,尽管它们的愿景并不相同。军事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关键的两难:它要么会稀释叙解军的支配地位,这是土耳其的愿景;要么会巩固这种支配地位,这是叙解军的目标。叙解军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倡导武装力量的统一,但遭到其他派系的抵制,后者认为叙解军是在谋求对权力的垄断性掌控。⁹这些派系认为自己已经拆除了文职架构,如果连军事架构也落入叙解军的控制之下,它们作为独立武装团体就将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对土耳其来说,目标是从根本上改造叙解军,并且,说来矛盾,还要把伊德利卜的军事力量统一在类似于东部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 SDF)模式的架构之下。⁵³叙利亚民主力量作为统一的军事委员会运作,最终受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的控制;同样,伊德利卜的军事架构也将作为由叙解军领导的统一委员会运作。用当时一位土耳其官员的话说:

最近的战斗挫了叙解军的锐气,打破了它先前的傲慢。叙解军的战斗人员并非天生就比别人强;叙解军只是组织得更好。过去,它们以为自己可以独力支撑。现在[2020年],叙解军意识到自己并不像原先以为的那样强大,因而更愿意妥协。另一方面,先前对叙解军怀有强烈敌意、甚至与之交战的派系,也更倾向于妥协了。我们看到,这些团体尽管存在分歧,如今却因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这就创造了合作的机会。¹⁰

因此,军事制度化的进程必须顾及派系主义持久的影响力,同时又要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削弱它。叙解军军事领导人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阐明了把“明胜”改造为军事委员会的最终目标,尽管存在实际困难:

如果我们设法把所有军事力量统一到一个军事委员会里,我们不认为可以把不同团体的军事旅混编在一起。那会制造紧张,削弱我们。更好的做法是让每个团体〔叙解军、大叙利亚自由军、大叙利亚军团以及其他较小的团体〕各自组建一定数量的旅(*liva*),履行所有的军事职能。每个旅负责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这有助于覆盖所有前线并加强问责。此外,我们认为这有助于在各旅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从而帮助它们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进步。

然而,安卡拉担心在无意中壮大了叙解军。如果不推行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就把反对派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可能会强化领头的派系叙解军的支配地位,而不是解决派系主义问题。土耳其还担心这个新统一的架构可能被国际上列为恐怖组织,这将损害土耳其使其正常化的努力;并且,据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土耳其担心“挑战派系主义意味着动摇一种脆弱但目前尚受控制的微妙平衡。派系主义的转型可能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扰乱当前的秩序。”¹¹ 尽管土耳其迫切需要精简它所支持的武装反对派团体的军事能力,它仍然保持谨慎,把干预降到最低限度。例如,薪水继续通过现有的派系架构发放。虽然土耳其密切监视着各军事行动室,但它的直接介入是有限的。此外,各派系仍自行组织军事训练,对行动室领导层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¹²

军事努力在“明胜”行动室内的集中化,也给其他团体,尤其是大叙利亚自由军,带来了新的挑战。后者的领导人发现自己身处充满争执的境地,被夹在立场相左的两派之间。大叙利亚自由军的历史领导层虽然最初对把军事力量改造为具有专门职能的新旅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却试图任命仍然效忠于自己的军事领导人来维持控制。他们尤其提防两个人物: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阿布·蒙扎尔(*Abu Mundhar*),另一个是大叙利亚自由军前领导人哈桑·苏凡(*Hassan Sufan*),认为这

两人与叙解军走得太近。¹³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该组织内部的分裂,历史领导层被边缘化。其结果是,受他们控制的领导委员会被解散,与叙解军关系更密切的第二派所支持的新领导层接管了控制权。

与激进派休战破裂：对基地组织的全面战争

如果叙解军真心致力于转型并放弃全球圣战,那么难免有人会问:它为什么把打击更主流的团体置于打击基地组织的支持者之上?答案其实相当直白:叙解军视主流团体为更为直接的威胁。这些团体是它最强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吸引外部支持,把自己确立为叙解军的可行替代者;而基地组织的支持者既缺乏广泛的号召力,又缺乏外部后台,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这并不表明叙解军变得更加激进,而只是战略上的轻重排序。然而,一旦这一威胁解除,叙解军也就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去钳制更激进的派系。⁵⁵

拒绝追随叙解军新方向的前支持阵线指挥官,对沙拉的组织有三条主要不满。他们最在意的是叙解军2016年夏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的决定,在他们看来,这是对全球圣战运动的背叛。这些指挥官中有许多人是海外历次圣战的老兵,他们拒绝转向以叙利亚为中心的议程,认为这会导致不可接受的让步。¹⁴另外两个问题出现得较晚。第一,2017年底,叙解军允许土耳其军队进入伊德利卜省,这些指挥官谴责此举是与“叛教的”北约成员国合作。争议更大的是叙解军接受了2020年在莫斯科批准的俄土停火协议,此前叙解军还接受了土耳其与俄罗斯在连接阿勒颇与海岸的M4公路上联合巡逻的安排,下一章将探讨此事。

2018年2月,叙解军的对手利用它与大叙利亚自由军的冲突,建立了一个新依附于基地组织的团体,即宗教卫士组织(Hurras al-Din),叙解军受到的威胁由此加剧。与大叙利亚自由军不同,宗教卫士组织算不上发育成熟的组织,只是结构松散的联合体,约有1200至1500名战斗人员。¹⁵尽管规模相对较小、组织架构薄弱,该团体还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国际关注,尤其是那些担心它有能力在海外策动袭击的外国政府。

宗教卫士组织网罗了大多数前支持阵线指挥官，这些人因拒绝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而团结在一起。该团体成员混杂，既有叙利亚战斗人员，也有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约旦人，以及其他外国武装人员。它的一些领导人与基地组织的中央领导层保持着牢固联系，如阿布·阿卜杜·卡里姆·马斯里（Abu ‘Abd al-Karim al-Masri），这进一步巩固了它与全球圣战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另一些人，如萨米·乌赖迪，则与身在约旦的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关系密切。

56

宗教卫士组织出现时，叙解军起初避免与之直接对抗。叙解军愿意同所有反对政权的派系在军事上合作。¹⁶ 叙解军军事领导人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当时强调了这一政策，称“我们的立场是接受所有参与战斗的团体，只要它们不介入破坏稳定的活动。”¹⁷ 其中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是，叙解军顾忌其部分指挥官与下属派系对宗教卫士组织抱有的同情，担心直接对抗会损害自身的内部团结。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了这一软肋。例如，此前逮捕宗教卫士组织成员的事件，曾导致某些下属派系与团体头目被暂停叙解军成员资格，这凸显了该组织内部的分裂。¹⁸

2019 年 1 月，大叙利亚自由军及其盟友的威胁被解除后，最直接、最重大的支配地位之争就此消除，叙解军得以把注意力转向宗教卫士组织。到 2019 年 3 月，叙解军为与宗教卫士组织共存立下了严格的条件。¹⁹ 这些条件要求该团体放弃对外行动，即在叙利亚以外发动圣战，同时解散其司法法庭、拘押中心与检查站，并服从叙解军军事法庭的管辖。实质上，宗教卫士组织必须遵守叙解军的规则，不得介入民政事务。²⁰ 这一遏制策略还延伸到军事与经济领域。叙解军控制武器供应，并向与宗教卫士组织有往来的金融中间人施压，以削弱该团体。它还控制该团体的军事活动。例如，2019 年 5 月伊德利卜南部激战正酣之际，叙解军阻止宗教卫士组织在阿勒颇发动一场牵制性战役，部分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招来伊朗的干预。²¹ 叙解军最后还阻止宗教卫士组织培植新的地方联盟。2018 年 10 月，“鼓动信士”（Harid al-Mu'mineen）

行动室成立,其成员包括宗教辅士阵线(Jabhat Ansar al-Din)与伊斯兰辅士组织(Ansar al-Islam)。此后,叙解军把另一个团体认主独一辅士组织(Ansar al-Tawhid)拉拢到自己的政治议程一边。²²自2020年5月起,叙解军增加了对认主独一辅士组织的物质支持,推动该团体逐渐疏远宗教卫士组织,转而靠拢叙解军自己的目标。²³

与宗教卫士组织的协议维持了近十三个月,直到土耳其于2020年2月在伊德利卜的重大军事干预打破了两个团体之间的脆弱平衡。在此之前,艾哈迈德·沙拉承认,“与宗教卫士组织的关系一直紧张。问题时有发生,需要我们介入,但到目前为止,它们总是得到了解决。”²⁴然而,土耳其的干预打破了两个组织之间的脆弱均势。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犹豫,叙解军选择站在新达成的俄土协议一边。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接受了俄罗斯军队借俄土联合巡逻定期出现在叛军控制区。一位接近叙解军的分析人士说:

普京—埃尔多安关于巡逻的协议立刻重塑了宗教卫士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叙事。这一转变恰逢伊德利卜局势逐步恶化,陷入财务困境的宗教卫士组织越来越多地诉诸绑架、劫掠与偷窃。²⁵

宗教卫士组织抢先出手,对加卜平原(Ghab plain)坦贾拉村(Tanjara)的政权部队发动了一场声势惊人的袭击,于2020年5月9日短暂控制了该村。事后看来,叙解军军事领导人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认为这是随后升级的开幕之举。他解释说:“这次大规模行动并不是针对政权的;它是一场政治运作,意在把所有反对叙解军政策的团体聚拢起来,并可能在我们的队伍中播下叛逃的种子。”²⁶

安全清剿始于2020年夏,此前叙解军对宗教卫士组织的遏制政策已经终结。按照叙解军领导层的说法,这一转变发生时,冲突的结局已无悬念。叙解军此时把宗教卫士组织视为安全威胁,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尽管宗教卫士组织不再对叙解军的支配地位构成直接威胁,它仍

保有造成重大破坏的能力。这包括袭击检查站、攻击土耳其巡逻队、挑衅俄罗斯阵地以破坏停火，以及潜在的对外行动。²⁷

58 叙解军与宗教卫士组织之间的对抗，始于叙解军向土耳其庇护政策的靠拢，以及叙解军内部权力动态的并行演变。冲突爆发于叙解军一位要人阿布·马利克·塔拉伊（Abu Malik al-Tally）的叛逃之后，²⁸ 他与另外两人联手：阿布·阿卜杜·阿希达（Abu Abd Ashida），前叙解军指挥官，曾建立名为“圣战协调”（Tansiqiyyat al-Jihad）的团体；以及阿布·萨拉赫·乌兹别基（Abu Salah al-Uzbeki），认主独一与圣战营（Katiba al-Tawhid wa al-Jihad）的前头目。²⁹ 这三位头领与宗教卫士组织合作，在“坚持住”（Fa-Ithibitu，意为“要坚忍不拔”）行动室的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行动室的成立，凸显了当年早些时候土耳其大规模部署军队所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分裂。正如一位接近叙解军领导层的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这标志着反对沙拉领导层的第一个异议阵线的出现。”³⁰ 阿布·马利克·塔拉伊与“坚持住”的关联导致他遭到逮捕，尽管“坚持住”对叙解军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正如这位分析人士所说，“在我们拥有的 320 个前线阵地中，只有 10 至 15 个掌握在‘坚持住’手里。”³¹ 冲突迅速升级并公开化。宗教卫士组织设立检查站以保护自己的阵地，尽管一些叙解军领导人认为，其目的是抓捕该组织的活动人士，以供日后谈判之用。对叙解军军事领导人来说，这无异于“宣战”。³² 作为对这一威胁的回应，叙解军禁止任何未经领导层事先批准的叛逃，并动员了自己的国际支持者。³³

叙解军采取了审慎的做法：它不去打击宗教卫士组织的正式头目，而是集中力量对付构成最大威胁的军事指挥官。这些头目包括其首领阿布·胡马姆·沙米，叙解军认为他软弱，在内部也受到挑战。沙拉在解释这一策略时强调，叙解军的意图是“给他们留出一些回旋的余地。逮捕头目很可能会触发舆论反应。让他们藏而不露、置于监视之下，把他们抬升为可能博得同情的受害者更为明智。”³⁴ 此外，叙解军还按照

一套有系统的政策与地方指挥官展开谈判，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事实上的地方协议。用同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

需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宗教卫士组织代表着反对叙解军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的一个阵线，而不是一个结构完善的组织。它的领导层尤其软弱，当宗教卫士组织的高级头目提出谈判时，叙解军拒绝与他们打交道。³⁵

59

这一策略结合了多种手段：拉拢收编，向对战人员许诺赦免，以及对选定的指挥官启动安全程序。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在 6 月的最后一周里，叙解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压制住了宗教卫士组织，使其无法在据点维持可见的存在，这些据点包括阿尔马纳兹 (Armanaz)、达尔库什 (Darkouch)、吉斯尔舒古尔与阿拉伯赛义德 (Arab Sa'id)。³⁶ 最终，叙解军选择不逮捕宗教卫士组织的所有成员，包括其首领阿布·胡马姆·沙米与其宗教权威萨米·乌赖迪。据一位叙解军安全官员说，该团体已经名存实亡，其领导层元气大伤，无力从事武装活动。逮捕这些人物反而可能无意中导致他们被更有能力的头目取代，这种风险大于让他们维持虚弱状态。³⁷

土耳其军事人员大规模涌入所引发的两极分化，以及随后的派系冲突，标志着叙利亚武装冲突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九年来第一次，基地组织在叙利亚不再有活跃的军事存在。该组织退入地下，放弃了前线阵地与军事基地。基地组织一度可观的组织与财政资源大幅萎缩，宗教卫士组织在 2020 年之后几乎不再活动。它既无从分享战利品，也失去了外国对圣战的支持，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决意维持控制的叙解军，坚决防止任何与基地组织相关的网络在该地区死灰复燃。2021 年 1 月，在远离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卡省发生的一起事件表明，该团体的指挥官们可能已决定把重点转向其他战场。³⁸ 此外，余下的外国武装人员，包括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车臣人，都站到了叙解军的新立场一边。基地组织最终在阿萨德倒台后，于 2025 年初解散了其叙利亚分支。

与叙解军领导人早先的担忧相反，与基地组织的对抗以及叙解军⁶⁰对土耳其新态势的接受，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内部分裂或大规模叛逃。尽管叙解军的战略调整遭遇了一些内部抵触，但投向更激进团体的人数仍然有限。叙解军领导层在这场冲突之后变得更强，其政治立场遭遇的挑战越来越少，激进的替代选项也明显缺位。与此同时，叙解军组建了新的专门单位，负责追缉直至 2024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仍盘踞伊德利卜的不结盟圣战分子。这一转型主要靠总安全机构 (*jihaz al-amn al-'am*) 的建设完成，该机构由支持阵线自身的内部安全或情报部门发展而来，下设两个专司“反恐”的单位，一个负责追踪基地组织，另一个负责追踪伊斯兰国。

对伊斯兰国更为暴烈的战争

2014 年初，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 对叙利亚西北部其他叙利亚武装团体的袭击，招致各武装反对派团体的强烈反击，最终导致它被逐出该地区。2014 年 1 月，一场协调一致的攻势打击了伊斯兰国在阿塔里布 (Atarib)、达纳 (al-Dana)、阿扎兹 (Azaz) 等地的关键阵地，参与者包括以大叙利亚自由军为先锋的伊斯兰阵线 (Islamic Front)、自由叙利亚军的地方团体以及支持阵线。这场攻势收复了若干战略城镇，削弱了伊斯兰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到 2014 年 2 月，联合抵抗迫使伊斯兰国撤出阿勒颇省与伊德利卜省的关键据点，其中地方支持以及对地形的熟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场驱逐是战略军事行动与广泛地方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各派系搁置内部分歧，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例如，阿勒颇的圣战者军 (Jaysh al-Mujahideen) 联盟就是专门为打击伊斯兰国而组建的，这在叙利亚冲突中尚属首次。到 2014 年 3 月，伊斯兰国已基本撤回其在拉卡与代尔祖尔 (Deir Ezzor) 的据点。唯一留在西北部、对伊斯兰国态度暧昧的团体是阿克萨军 (Jund al-Aqsa)，它宁愿在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

⁶¹ 之间保持中立。

此后，伊斯兰国又分几波卷土重来。2014 年被驱逐之后，一些同情者留在了伊德利卜，投靠亲友藏身，尤其集中在萨尔明 (Sarmin)、卡夫尔欣德 (Kafr Hind) 与吉斯尔舒古尔一带。第一波明显的涌入发生在 2017 年 10 月，当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哈马省北部被政权部队围困，转移到了伊德利卜东南部。政权放任数百名携带武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安全通行，明知他们很快就会袭击该地区的其他武装团体。包括叙解军在内的所有武装反对派团体都不得不应对伊斯兰国的这波新涌入。它们成功压制了伊斯兰国的存在，尽管并未俘获所有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伊斯兰国的最后一波渗透发生在 2019 年 3 月，当时俄罗斯空袭了叙解军设在伊德利卜的一座监狱，使许多伊斯兰国成员得以逃脱并组建新的分支。与此同时，2019 年巴古兹 (Baghouz) 陷落之后，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与指挥官从叙利亚中部与东北部单独潜入伊德利卜，不过这一波渗透的规模更为有限，且经由阿勒颇以北的地区。

叙解军的回应严厉且相对高效。该组织发动了一场反叛乱行动，以一系列突袭与逮捕拆解伊斯兰国的网络。据一位叙解军安全官员说，当叙解军感到该省受到威胁时，其中一些行动以公开处决许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告终，目的是儆戒其他人不要加入其行列。³⁹叙解军对圣战网络的深入了解，根植于共同的组织框架、昔日的密切关系以及共同的军事与安全专业素养，这使对该团体的追踪相对有效。2018 年之后，叙解军在伊德利卜逮捕了六名伊斯兰国的“总督” (wali, 瓦利) 或头目，并于 2021 年逮捕了拉卡前头目。2024 年之前，一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德利卜的活动寿命不超过几个月，这有效地阻止了该团体的再生。相反，唯一得以成形的伊斯兰国分支，是由 3 至 15 人组成的小团体，它们资金自给自足，因而资源有限，难以在该省发动大规模行动。⁴⁰叙解军还挫败了若干重大行动，如 2020 年在比克斯拉亚 (Biksraya) 针对叙解军盟友派系集会的未遂汽车炸弹袭击。叙解军还拆解了数个大型网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迁徙事务办公室” (maktab al-Hijra)，该团体由

⁶² 大约 20 名成员组成，正在筹备针对欧洲与土耳其的袭击。伊斯兰国此后再未在该地区实施任何重大行动。

据叙解军安全官员说，伊斯兰国最终寻求与宗教卫士组织中的异见者结盟，尤其是那些组建了阿布·伯克尔·西迪格支队 (Saraya Abu Bakr al-Sadiq) 与阿卜杜拉·本·乌奈斯支队 (Saraya Abdullah bin Unais) 等团体的人。⁴¹ 这些派系的一位头目发布了一份文件，指控叙解军叛教，理由林林总总，包括与土耳其及其他“叛教的”武装团体结盟、未能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及其规定的刑罚、征收非伊斯兰的税赋、允许世俗教育，以及支持联合国支持的政治进程。据叙解军安全官员说，伊斯兰国向这些团体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为这些团体的武装袭击宣称负责的权利，但这些努力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行动成果。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叙解军的反叛乱行动确实高效，为什么有两任伊斯兰国哈里发会在它控制的地区被发现并最终被击毙？尽管叙解军对活跃的伊斯兰国网络展现了有效的追踪能力，监视蛰伏分支所需要的却不仅仅是情报。它还需要扎实的人口管控，而这有赖于发育成熟的地方官僚体系，当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总安全机构把力量集中在主要城市与难民营。全面的人口普查当时正在进行，但优先对象是城区与营地。救国政府出于安全目的优先考虑城市，因为那里有地方行政机构，普查工作更容易开展。它还聚焦难民营，因为它们拥有行政架构，而且普查旨在收集向难民分发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援助所需的关键数据。⁴²

换言之，在城市与难民营之外，官僚式人口管控的制度化程度有限，加之这些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为非活跃武装分子制造了“灰色地带”。这些空间可以窝藏蛰伏分支，即便活跃分支在别处被迅速识别并清除。与活跃武装分子不同，蛰伏分支较难借情报网络侦知，必须有扎实的人口监测才能有效追踪。而这种监测又取决于发育成熟的行政

⁶³ 框架，叙解军当时尚未完全建立起这样的框架。例如，在伊德利卜市这样的城区，叙解军实施了全面的人口普查与房屋编号工程，进行了大量

逮捕，大大改善了城市安全。相比之下，乡村地区往往住满了新来者，人口混杂频繁，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行政监管之外。这种管控的缺失使识别蛰伏分支的努力变得复杂。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我们在乡村和偏远地区缺乏人口记录。我们的重点一直放在营地和主要城市，因为资源有限，必须分清轻重缓急。这些乡村地区游离于我们的监管之外。我们没有统计数据，没有姓名；房产交易完全是非正式的，人口流动性极高。”⁴³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伊斯兰国第二任哈里发阿卜杜拉·卡尔达什何以会出现在伊德利卜。他的藏身处是一栋租来的房子，房东是他的警卫，一个来自阿勒颇的低调商人，与该组织没有直接关联。⁴⁴租房事宜经阿特梅村（Atmeh）一家房产交易中介安排，该中介不向任何当局报备房产交易。⁴⁵卡尔达什千方百计隐匿行踪，身边只有一名武装同伙，既当信使又当警卫，武器只有一支步枪。⁴⁶他甚至避开了房子周围的监控摄像头，而他此前的住所都安装过这种设备。据一位叙解军安全官员说：“他藏在雷达之下，这正是他的强项，恰恰是因为直到今天，安全工作也无法依托一个有效的行政框架。”⁴⁷该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指出：“很明显，我们的安全机构存在弱点。我们不能把刚满五岁的安全架构同现存国家的安全架构相提并论。”⁴⁸沙拉也曾说过，这话未必没有道理：“我第一次见到[阿布·伯克尔·]巴格达迪是在巴格达以北，当时那里是美军驻扎的地方。头目们总是独来独往、居无定所。卡尔达什在这里，但他本可以在任何别的地方。”⁴⁹

对伊斯兰国的派系冲突，最初源于内部权力斗争与一些意识形态分歧，后来演变为一场还包含去激进化要素的反叛乱行动。叙解军认识到必须对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不只是因为叙解军没有那么激进（它确实如此），也是为了保住控制权。化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为的是维持其支配地位，防止其权威遭到侵蚀。例如，艾哈迈德·沙拉表示：

现在 [2022 年], 在伊德利卜, 伊斯兰国的招募能力已经非常低了。为了减少它可能仍然保有的吸引力, 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性的项目。我们不应去寻求一种亲美的伊斯兰, 而应寻求一种有吸引力的伊斯兰项目, 能够防止年轻人被拉向这个团体。重要的是, 西方允许我们不受阻碍地发展一个伊斯兰项目。⁵⁰

叙解军还试图借积极塑造宗教话语, 密切监督清真寺布道, 以及推行自己的宗教项目, 削弱伊斯兰国的吸引力。叙解军的高级宗教人物阿卜杜·拉希姆·阿顿 (Abd al-Rahim Atun) 连同他培训的法官们声称, 自 2013 年与伊斯兰国的冲突开始以来, 已经举办了数百场讲座与课程。这些努力依托植根于伊斯兰教法的务实论证, 同时凸显伊斯兰国头目的过激 (*ghulu*) 言行, 以声讨这个伊拉克团体、削弱其吸引力。其目的有二: 争取伊斯兰国的底层追随者, 并使叙解军成员免受其说辞的蛊惑。这些举措是叙解军控制宗教话语这一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此外, 该组织禁止了诸如宣判其他穆斯林叛教 (*takfir*) 之类的做法, 并禁止煽动针对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言行。尽管叙解军承认改变伊斯兰国强硬派的心态十分困难, 但它相信, 自己已经在自身队伍内传播了它对伊斯兰的诠释。这些诠释包括对非萨拉菲派穆斯林的更大包容, 以及对传统伊斯兰法学派系的重新强调, 叙解军声称这些在其基本盘中引起了共鸣。⁵¹

叙解军创建了贾米利亚营 (*al-Jamiliyya camp*), 作为一处兼具拘押中心、难民营与伊斯兰国回流人员再融入空间三重性质的混合设施。该营收容了大约 250 户家庭, 主要由外国妇女儿童组成, 多为阿拉伯人与中亚穆斯林。由于资源有限, 它的运作更像一座拘禁营, 而不是规划有序的再融入设施。那里没有正式的再教育项目; 当局把工作重点放在行为监测上。⁶⁵ 家庭获准离开营地, 以符合特定条件为前提, 例如接受救国政府提供的教育、承认其法庭对婚姻的管辖, 以及同意接受与叙解军治理架构相关联的非政府组织的援助。⁵² 获释的家庭可以租房居住, 但仍处于监视之下。当局总体上倾向于把这些家庭融入更广泛的社会, 尽管存在风险, 因为隔离可能加深他们的激进化。然而, 这一做法伴随着挑

战：据报道，一些家庭经网络渠道维持着对伊斯兰国的效忠，当局对此保持监视，但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容忍。⁵³

对余留外国武装人员的严密掌控

在叙利亚西北部，直到 2024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仍有少数外国武装人员留了下来，他们既没有加入伊斯兰国，也没有站队基地组织。这些人往往松散地依附于较小的独立派系，或者融入了那些主要聚焦叙利亚冲突而非全球圣战议程的地方团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冲突早期阶段的老兵，选择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拉开距离，宁愿支持叙利亚的目标，而不是跨国界的野心。

这些团体在规模与影响力上差别很大。其中最大的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Turkistan Islamic Party, TIP)，主要由中国西部的维吾尔战斗人员组成。这个团体军力可观，在冲突期间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共同体在叙利亚活动，同时与其在阿富汗的同路人保持着一些联系；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且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该团体的立场很明确，据它的几位军事指挥官说：尽管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叙利亚，每个分支在理论上仍然致力于其在中国的长期目标，但在实践中，它们尊重当地当局，在叙利亚是叙解军，在阿富汗是塔利班，并服从其要求。因此，如果当地当局指示它们不得袭击中国目标，它们就遵令行事。与此同时，它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其共同体的生存，同时保全其维吾尔身份，包括语言、学校与军事基础设施。⁵⁴

相比之下，其他团体要小得多，也无关紧要得多。其中包括向反对派力量提供支援的阿尔巴尼亚教官小群组，以及那些拒绝站队伊斯兰国的车臣战斗人员残部。尽管这些较小派系确实存在于当地，但同组织更严密、凝聚力更强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相比，它们的战略意义微乎其微。⁶⁶

在巩固了对该省的控制、解除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威胁之后，叙解军对那些不完全归附其议程的余留外国武装人员强加了严格的约

束。2020年6月对宗教卫士组织的清剿，尤其成为对付其他抗拒归附该省新军事方向的较小派系的蓝本。

在拆解宗教卫士组织之后，叙解军于2020年底对另外两个团体，即大叙利亚之军（Junud al-Sham）与真主之军（Jund Allah），采取了行动。这两个派系分别由阿布·穆斯林·希沙尼（Abu Muslim al-Shishani）与阿布·哈尼法·阿扎里（Abu Hanifa al-Adhari）领导，前者是参加过两次车臣战争的车臣武装老手，后者是塔吉克武装分子。叙解军指控阿扎里从事宣判叛教（*takfir*）的活动，并追究希沙尼窝藏他的责任。尽管叙解军与他们达成了初步协议，谈判还是迅速破裂。对抗来得很快。叙解军俘获了大部分武装分子，但并不止步于军事行动。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叙解军针对大约70名在押战斗人员推出了一项去激进化计划。它首次在监狱内实施了意识形态培训与驳斥课程。这些课程称为教法培训班（*dawrat shar'iyya*），历时三十多天，以强化讲座和“驳斥错误观念”为重点，旨在瓦解顽固的意识形态观点。然而，该计划遭遇了强烈抵制，尤其来自改宗者，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人。70名参与者中，有20人最终在担保人制度下获释，由地方头面人物负责监管他们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区。⁵⁵

叙解军对其他外国武装人员的政策遵循了类似的思路：遏制而不直接对抗。核心原则是，叙解军力求管控这些团体，只要它们尊重该省的总体秩序。这一策略适用于各种外国派系，包括乌兹别克人、高加索人，以及成员规模在50至150人不等的团体。叙解军禁止它们招募人员、创办民用媒体、策划境外行动、擅自对抗政权、建立治理架构，或介入司法事务。正如艾哈迈德·沙拉所说：

我们接受这些团体的原则，以尊重法律为基础。我们评判它们只依据这一条标准。关键是它们接受我们的制度化努力。守法者，我们容忍。举例来说，境外行动是严格禁止的。我们不从过激（*gbulu*）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守法的角度看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出在非法组织身上。⁵⁶

异乡人旅(Firqat al-Ghuraba, 字面“异乡人的团体”), 即由奥马尔·奥姆森(Omar Omsen, 真名奥马尔·迪亚比 Omar Diaby) 领导的团体, 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叙解军如何对待外国武装人员的实例。⁵⁷ 奥姆森是法国—塞内加尔双重国籍人士, 是著名的法国圣战分子招募者, 叙解军于2020年以涉嫌绑架一名阵亡法国战斗人员的女儿为由逮捕了他。经过围绕把这名4岁女孩送回法国的漫长谈判, 叙解军于2022年1月底释放了奥姆森, 条件是他交代女孩的下落。叙解军还指控他自办法庭, 处理婚姻与离婚等事务。获释之后, 叙解军允许奥姆森回到自己的小旅, 该旅当时在认主独一辅士组织(Ansar al-Tawheed) 名下运作, 但附加了严格的条件。他不得出现在媒体上, 不得招募新成员, 不得接触营地里的法国家庭, 并且始终处于安全监视之下。更重要的是, 叙解军明确禁止他独立主持任何形式的司法事务, 要求他服从救国政府的权威; 同样的限制也加诸其他外国武装人员团体与叙利亚人团体之上。

最终, 所有武装团体, 包括拥有外国武装人员的团体, 都必须服从“明胜”行动室的指令, 并被严格禁止擅自行动。叙解军利用这套体系, 借两个选项确立了对少数由外国人领导的旅的控制: 要么加入新组建的专门旅、并入叙解军自己的军事力量, 要么至少服从联合行动室发布的命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叙解军重组了大多数外国武装人员团体, 这些团体必须加入叙解军的新军事旅。这次重组强加了新的军事规章与组织调整, 使叙解军得以在把它们同该省更广泛的军事战略对齐的同时, 对它们施加控制。这表明叙解军不必与所有外国武装人员对抗。叙解军先是对抗那些与基地组织结盟的最桀骜不驯、最富敌意的外国武装人员, 然后再向其他人提供非对抗性的出路。对他们而言, 这份宽限的代价是双重的: 遵守叙解军的议程, 并彻底放弃在治理中扮演任何角色。从本质上说, 这些团体的生存取决于它们的去政治化。⁶⁸

叙解军的支配地位最终把外国武装人员置于其控制之下, 尽管他们曾经是武装反对派内部的强大力量, 而叙解军也曾是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叙利亚团体之一。对叙解军来说, 这首先是政治控制的问题: 它

不能允许这些派系拥有独立的军事话语权，因为这可能挑战它的权威，或者破坏它在该省的战略优先事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项努力也带上了去激进化的维度，因为叙解军开始把其中一些团体的意识形态立场本身视为威胁。

叙解军始终未能完全控制，或者说难以将其保持在控制之下的唯一问题团体，是伊斯兰辅士组织（Ansar al-Islam）。伊斯兰辅士组织于 2001 年作为圣战团体发源于伊拉克，主要由库尔德伊斯兰主义者组成。它以严格的萨拉菲圣战观点以及既反对世俗库尔德派系又反对西方势力而闻名。2003 年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之后，该团体基本被瓦解，但仍在叛乱活动中保持活跃。随着时间推移，伊斯兰辅士组织的残余在叙利亚重新冒头，在那里独立活动，抗拒完全并入叙解军。这种抗拒使他们成为叙解军的长期挑战，因为他们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意识形态上的僵硬，这往往与叙解军更广泛的战略目标相冲突。

总体而言，在攻占大马士革之前，各外国武装人员团体每个至多只有数百名成员，合计不过数千人。尽管人数有限，他们在前线上却表现得极为高效。然而，早在 2025 年之前，他们就给叙解军带来了国际层面的难题，因为其中许多团体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单独列名（此外叙解军自身也在列名名单上）。被禁的团体包括：主要由车臣人组成的迁徙者与辅士军（Jaysh al-Muhajirin wal-Ansar）；主要由摩洛哥人组成的大叙利亚伊斯兰运动（Harakat Sham al-Islam）；阿克萨军（现为认主独一辅士组织）；伊玛目布哈里营（Katiba Imam al-Bukhari）；以及认主独一与圣战营（Katiba al-Tawhid wal-Jihad），后两者主要由乌兹别克人组成。保留这些派系看似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各自只有数百名战斗人员，而叙解军麾下的叙利亚人数以万计，到 2024 年攻占阿勒颇时已经领导着 3 万人的武装力量。但它们继续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控制。叙解军安全官员强调说：

我们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只要余留的外国武装人员尊重这些界限，我们就允许他们在我们的队伍内继续活动。让他们的组织架构保持完

整，如今置于我们的部队之下，有助于我们维持对他们的控制。例如，如果一个团体有 50 名战斗人员，我们知道他们的指挥官是谁，我们就让他为这些人负责，确保他们遵循我们的指令、不违反我们的规则。如果我们解散这些团体，那 50 名战斗人员就会四散而去，难以追踪，也难以监视他们的活动。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被伊斯兰国招募，最终与我们为敌。把他们置于我们的监管之下要好得多。⁵⁸

尽管如此，一些外国外交官以及与各武装团体关系密切的人士，对余留的外国武装人员持有不同看法。⁵⁹ 他们承认，这些骨干中的绝大多数明确拒绝伊斯兰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基地组织，但他们也把这些入视为艾哈迈德·沙拉及其核心圈子的某种禁卫军：这些战斗人员高度投入、对他死心塌地，却因为是外国人而不是叙利亚人，无力挑战他的权力。例如，他们认为 2025 年任命约旦籍叙解军高级军事指挥官阿布·侯赛因·乌尔杜尼（Abu al-Hussein al-Urduni）出任新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司令，是防范针对新政府潜在政变的一着战略棋。

第三章 拆解激进过去

71

在伊德利卜这个由地方与国际因素共同塑造、制约条件独一无二的环境中，治理在支持阵线转变为大叙利亚解放军（Hay'at Tahrir al-Sham, HTS）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支持阵线以军事为主的结构，围绕着最低限度的治理展开，这一治理主要依靠临时设立的伊斯兰法庭执行，这与在救国政府（Salvation Government）之下建立中央集权结构并不相容。新治理框架的制度化，不仅服务于在土耳其与俄罗斯围绕伊德利卜的战略博弈之下稳定并统一该省的目标，也无意中使新的好战气质在该组织内部浮现出来。它最终助长了保守政治阶层的成长，该阶层培养出新一代技术官僚，其重要性在 2024 年接管大马士革之后变得愈发明显。

叙解军的领土化：一个新自由主义霸主

叙解军利用其对敌对派系的军事优势，借 2017 年 11 月建立的救国政府推行自己的治理；这一治理靠三项关键机制得到巩固：将所有治理结构集中化，包括此前由其他武装团体掌握的结构在内，把部分权力授予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以及将若干公共服务外包给既有行政框架之外的独立第三方。

72

促成救国政府诞生的那项倡议，是在叙利亚西北部推出文人治理项目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尝试之所以成功，有赖于叙解军的主导地位。2017 年之前，伊德利卜受过教育且持保守立场的城市精英曾多次试图在该地区建立统一治理。然而，地方武装团体压倒性的影响力与相互竞争的议程反复破坏了这些努力，使独立的行政结构无法得到巩固。¹矛盾的是，叙解军对竞争对手的主导地位为这批城市精英创造了活

动空间,尽管这空间处于控制之下。叙利亚学者领头发起了最后一次尝试,即“文人行政倡议”(Civil Administration Initiative),它最终于2017年促成救国政府作为伊德利卜的中央集权治理结构而建立。² 这批精英背景形形色色,包括城市出身、受过教育、持保守立场的非武装伊斯兰主义者,如巴萨姆·西休尼(Bassam Sihiouni)、法鲁克·基什基奇(Farouk Kishkich)与穆贾希德·纳伊斯(Mujahid Na'iss);学者如伊德利卜大学(University of Idlib)校长塔希尔·萨马克(Taher Samaq),以及来自阿勒颇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巴库尔(Muhammad Bakour);此外还有积极参与地方倡议的人士。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2011年之后的行动主义经历,而他们并无派系归属。相反,他们怀着的是:

一种被排斥感——被大多设于境外的叙利亚临时政府(Syrian Interim Government, SIG)以及其他派系排斥在外。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叙利亚全国联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 SNC)对代表权的剥夺,以及在境外活动的各反对派实体的欺骗。叙解军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批被排斥精英的存在,并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席之地。³

商人也加入了学者倡议的领导层,参与了救国政府框架内的制度建设。他们更关心的是重建秩序与安全,而不是受意识形态亲和性的驱使;他们相信,统一治理将改善安全状况,并限制派系对其营生的侵入。商会赞助并全额承担了第二个组建机构的费用,该机构于2019年2月任命了负责改革救国政府的首届立法大会,约有五十名参与者出席⁴。

救国政府按照自上而下的逻辑组建。首届政府设立了数量有限的部委,这些部委开始编纂内部规章,以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各武装团体与地方委员会。随着叙解军逐步接管该省,救国政府夺取了此前由各派系行使的治理职能。在司法领域,第一步是以武力或谈判接管各派系的法庭。救国政府让已被判刑的在押人员继续羁押,除非其家属提出请求,⁵并把档案移交给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一般也保留了法庭的

工作人员。同样，伊德利卜商会 (Idlib Chamber of Commerce) 承诺支持救国政府的创建，并把若干特权移交给新政府的经济部 (Ministry of the Economy)。商业登记簿也移交了，尽管在派系众多、割据一方的日子里它一直得到妥善保管。最后，叙解军把难民营与流离失所者事务的各个管理局移交给了人道主义事务部 (Ministry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叙解军推动集中化的做法加剧了它与地方委员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后者此前或是自治运作，或是与其他派系协调行事。叙解军并未采取整齐划一的策略，而是根据具体的地方力量对比采取了量身定制的办法。这种力量对比受到诸如此类因素的影响：平民抵抗的程度，以及各委员会与其他武装团体的既有关系。由于救国政府与地方委员会之间的谈判是按个案处理的，叙解军综合运用了笼络、地方协议与镇压等手段。在叙解军 2019 年 1 月军事接管之后，所有地方委员会都不得不正式承认救国政府的权威，尽管它们并未立即被整合进新的中央结构。整合的进程各不相同。在支持阵线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哈雷姆 (Harem)，地方委员会往往很快被置于救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其他情况下，救国政府经其地方行政部 (Ministry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监督选举，有时甚至任命负责遴选地方委员会的选举机构。⁶

例如，2019 年 1 月叙解军夺取迈阿赖特努阿曼 (Maarat al-Nu'man)⁷⁴ 的军事控制权后，救国政府的代表团前来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头面人物谈判。他们寻求对救国政府权威的承认，并着手接管警察局与法庭。他们达成了交易：叙解军拆除其检查站，以换取对法庭的控制权以及不针对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承诺。不到一个月，救国政府便开始巩固权力，夺取地方收入来源，包括镇上的面包烤炉以及民事登记处与土地登记处，随后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监管与统计办公室。尽管地方委员会仍然保留，新当局却改变了它的构成，在前一届行政当局治下曾达到 20% 的女性代表比例不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城市的权力日益向叙解军与救国政府转移。⁷

在革命伊斯兰主义团体更有影响力的地区，如扎维亚山（Jabal al-Zawiya）的大叙利亚之鹰（Suqur al-Sham）和卡夫尔塔哈里姆（Kafir Takharim）的大叙利亚军团（Faylaq al-Sham），地方委员会得以更长久地抵抗救国政府的掌控。地方派系越强，委员会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能力就越大。得到前自由叙利亚军团支持、地处公民行动活跃地区的著名革命委员会表现出了持久的抵抗。他们反对支持阵线确立控制权的企图，后来又抵抗叙解军与救国政府治理结构不断扩大的影响。这在阿塔里卜（Atareb）、萨拉基卜（Saraqib）、迈阿赖特努阿曼、阿里哈（Ariha）和萨尔马达（Sarmada）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救国政府的制度渗透逐渐扩展到所有地区。一个关键机制是电力供应，它使政府即便在前地方委员会继续运作的领土上也能征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财政与行政策略侵蚀了抵抗委员会残存的自治。⁸ 警察职能移交给叙解军，司法事务移交给司法部。最终，萨拉基卜、迈阿赖特努阿曼与卡夫兰贝尔（Kafranbel）的地方委员会，随着政权于2020年初军事收复这些村镇而垮台。

救国政府获得了残存地方精英中部分群体的一定支持，包括参与其治理结构的城市专业人士、企业家与部落人物。⁹ 然而，这种结盟遭到公民活动人士与记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批评该政府与叙解军的关系、腐败以及对独立公民结构的压制。叙解军最初对公民社会组织采取强制手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为更为暧昧的策略，把宽容与新的社会控制机制糅合在一起。昔日的革命公民社会逐渐为一批对治理持纯粹管理式态度的去政治化官僚所取代。这个新公民社会的成员往往自称为“技术官僚”，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角色与过去的政治理想拉开了距离。¹⁰

把城市精英纳入救国政府的霸权工程，并不仅仅是威权式笼络。该工程还产生了结构性的效应，因为它使专业人士与商人这类行动者能够独立自主地确立自身地位，而另一些行动者，如部落群体，则被笼络并置于叙解军的间接控制之下。各类行动者与该工程结盟各有其理据：

意识形态亲和性，在学者当中尤为突出；社团主义利益，如商人与医生的利益；以及社会纽带的力量，这在南方部落中尤为明显。这种微妙的动态反映了自愿参与与策略性笼络的结合，由相互交叠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动机所塑造。¹¹

尽管叙解军在救国政府的建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与东北部的库尔德运动不同，该组织并未接受微观管理与日常控制的逻辑。¹² 由于意识到自身在治理方面的局限，加之并无真正承诺要直接统治民众，叙解军同意把权力授予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中的部分群体。尽管这种权力授予与其说是意识形态选择，不如说是资源匮乏所塑造的现实，它使该组织得以在部分前革命精英之外，再吸纳一批更具技术官僚色彩的精英。

除了治理的集中化以及把部分权力授予“技术官僚”精英之外，叙解军还把重要的公共服务外包了出去。救国政府没有财力为估计约 320 万的人口¹³ 提供全套政府服务，而这些服务本有助于增强地方民众的支持。与石油资源丰富的东北部不同，救国政府的资源极度匮乏，可以依靠的公务员不足 1 万名。¹⁴ 因此在司法领域，部落承担起法律的执行，包括在谋杀案件中适用部落规范。¹⁵ 整个整个部门的治理也分包给了私人行动者，其中大多数是得到捐助国支持的地方组织。在卫生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当地伙伴接管了在很大程度上已残缺不全的卫生部。该部门的 1600 名雇员由此受益于西方捐助方的援助。然而，这一援助于 2019 年终止，因为正如一位熟悉叙利亚事务的欧洲专家所指出的，“伊德利卜正在变成一个毒性越来越大的环境”。¹⁶ 在教育领域，趋势是把它交给第三方。救国政府设有教育部，但它只向行政人员支付工资，工资单上没有教师。教育部依靠一份 4000 名志愿者的名单，同时确保校舍的维护，并与大约二十个教育组织协调。往往由苏菲教团成员控制的私立宗教学校仍在参与教育。¹⁷ 此外，外国组织维持了对小学教育的援助，尽管它们在 2018 年停止了对其他项目的捐助。¹⁸ 卡塔尔

基金会 (Qatar Foundation) 资助了联合国认可的预备阶段与中学阶段学校课程的分发, 而最终由叙利亚临时政府颁发学业证书。¹⁹

由于缺乏资源, 叙解军与救国政府不得不让步。它们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与一些革命委员会妥协, 不得不依靠部落, 与 (本地与国际的) 非政府组织以及叙利亚临时政府谈判, 同时放弃组织公共服务部门, 以保住外国支持。因此, 这些前圣战派所推动的革命制度化始终是交易色彩浓厚的工程, 其中仍保留着自治的空间。它也为始终处于需求之中的民众开辟了获取外国支持的新机会。让步的一个例子是, 救国政府试图在巴布哈瓦 (Bab al-Hawa) 口岸 对国际援助车队征税, 而引发的抵抗足以让官员们作罢。同样, 叙解军曾两度放弃重新开放通往政权控制区的口岸, 因为民众反对并多次走上街头,²⁰ 尽管这些口岸是救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⁷⁷

归根结底, 救国政府是两者相遇的产物: 一边是被迫进入治理领域却缺乏专业知识的革命伊斯兰主义运动, 另一边是得益于部分权力授予而得以参与地方治理的虔诚中产阶级。救国政府或多或少独立地管理所有行政事务, 然而安全人员仍在处理涉及所谓政权合作者、伊斯兰国基层组织以及有组织犯罪 (包括绑架与勒索) 的案件。这个霸权工程无意中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 因而并非侵入式的一党模式, 因为它是靠多重授权与外包行为来运作的。救国政府对叙解军的权力战略有所贡献, 但不能视为叙解军管理层的分支, 也不能视为其文职分支。这一现实源于手段的匮乏, 而非特定的意识形态选择。

叙解军对土耳其战略棋局的因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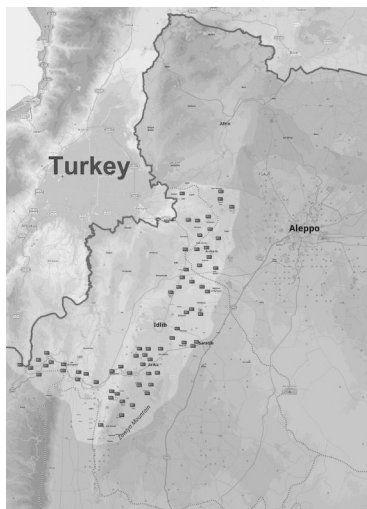
救国政府治下治理的巩固, 迫使叙解军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叙解军不再只是众多武装团体之一, 它不得不从自身的组织利益与意识形态偏好, 转向更像国家的逻辑。作为该省民政管理的首要负责当局, 叙解军不得不应对外部压力与地缘政治动态。这一转变在该组织如何因应土耳其与俄罗斯围绕伊德利卜的战略运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2017年至2020年间,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的军事存在不断深化。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的存在始于在阿斯塔纳^①进程(Astana Process)框架下、并依据与俄罗斯达成的2017年索契协议(Sochi agreement)设立的观察哨。土耳其设立这些观察哨,明面上是为了监测全国范围内的军事降级,但也是为了阻止政权对反对派控制的伊德利卜发动大规模攻势,因为那样的攻势将导致大规模难民潮涌入土耳其。此外,这些哨所还是安卡拉⁷⁸维持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影响力、在有关叙利亚未来的谈判中积累筹码、并对抗库尔德人主导团体的手段,后者因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有关联而被安卡拉视为安全威胁。尽管叙解军此前反对其他武装团体与土耳其的关系,这种相对温和的土耳其存在起初对该组织而言并不成问题。

2020年初,土耳其向伊德利卜部署了大量增援,估计派出1万至1.2万名士兵,以威慑迫在眉睫的政权攻势。此举显著重塑了安卡拉在该省的角色。2019—2020年叙利亚政权与俄罗斯的联合攻势,使众多土耳其观察哨孤立政权防线之后,令土耳其无力防守。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人们日益担忧2020年1月至2月对伊德利卜的全面进攻可能引发大规模难民涌入土耳其,从而在国内造成极大的动荡。作为回应,土耳其部署了大规模增援以保卫伊德利卜,并对驻扎在阿勒颇周边的政权部队发动了毁灭性的无人机打击。西方外交官后来表示,如果土耳其选择进一步推进,它本可以有效地歼灭该地区的政权部队。²¹俄罗斯随后同意了停火。

下页的地图描绘了截至2020年的土耳其观察点,这些观察点位于政权控制区与叙解军控制区之间。²²

① 阿斯塔纳进程是二〇一七年起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主导的叙利亚停火机制,与联合国主持的日内瓦和谈并行;伊德利卜的“降级区”即由这一机制划定。——译注



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地图，标出阿勒颇、阿夫林、伊德利卜等城市，
并以符号标示扎维耶山附近的战略或军事阵地。

叙解军承认为保护该省所必需的这股前所未有的土耳其军队涌入，从根本上重塑了双边关系，并在两者之间造成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土耳其的角色此前是间接的，如今成为负责保护该省的主导行动者，这使叙解军降格为被迫适应新战略现实的从属行动者。叶海亚·法尔加利（Yahya al-Farghali），一位曾依附叙解军数年的埃及宗教学者，恰当地概括了这种向庇护关系的转变；他的观点虽非官方，却反映了对这些变动中的动态的认知。法尔加利指出，土耳其的大规模军事存在使叙解军从相对自主的地位（彼时它握有“显现（*al-dhuhur*）”，即对棋局的掌控与对力量对比的主导）转向一种不对称关系，后者限制了它对其所治理领土相关战略决策的控制。²³

79

叙解军与土耳其之间的庇护关系在政治上并非天然成问题，因为双方共享关键的战略利益。叙解军的韧性战略与土耳其的目标高度契合。沙拉力图维持对地面的控制、保住自己的权威、保护并组织民众，并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拖垮政权。

80

与此同时,土耳其力图维持稳定的战略纵深,防止动荡外溢至其边境,同时把该领土的治理与绥靖委托给西北部的叙解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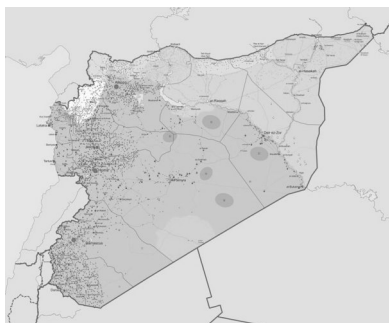
伊德利卜省的局势与阿勒颇北部大不相同,在后者,土耳其在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麾下各派系争夺影响力与地方控制权的竞争中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尽管叙解军较不易受土耳其要求的摆布(它有能力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解读这些要求,甚至拒绝某些请求),但它对土耳其而言仍呈现出更好打交道的动态。与在阿勒颇北部安卡拉不得不在对立派系众多的碎片化格局中周旋不同,在伊德利卜,它只需与准霸主打交道。

下一张地图来自 2024 年,描绘了截至当年叙利亚的领土分治。叙解军控制白色区域,北部两块绿色区域在土耳其支持下由叙利亚国民军掌控。黄色区域处于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控制之下。²⁴考虑到政权严重依赖伊朗与俄罗斯的支持,这张地图清楚地说明了每个地方行动者都需要一个外国靠山才能维持对叙利亚部分领土的控制。这使武装反对派在 2024 年 12 月基本上凭自身力量取得的胜利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对叙解军而言,问题在于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的庇护所战略与其同莫斯科的关系深度交织。尽管叙解军与土耳其在维持革命庇护所与战略纵深方面或许利益重叠,庇护关系仍给该组织带来了重大难题。恪守土耳其主导的庇护所战略,迫使叙解军作出艰难的政治选择,这些选择考验着叙解军的领导层,也检验着它的适应能力。这些选择还迫使叙解军转变自身,在其意识形态要务与同土耳其关系相关的务实考量之间取得平衡。

叙解军与土耳其之间的三个关键摩擦点很快显现出来:土耳其力图在叙利亚西北部确保的战略纵深之地理范围、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以及沿 M4 公路的土俄混合巡逻。尽管这些双边分歧起初十分尖锐,但随着双方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彼此都处于脆弱与相对弱势的时期

⁸¹ 保住伊德利卜庇护所,逐渐趋于一致,分歧也逐渐消减。



叙利亚地图，显示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代尔祖尔等主要城市，阴影区域与散布的圆点标示地理边界与要点位置。

第一个争议点关乎土耳其力图确保的战略纵深。2020年3月与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划定了停火前线，但在M4公路（连接阿勒颇与沿海地区）以南的地区仍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土耳其步兵主要部署在公路以北以及伊德利卜东侧翼，这使南部前线相对暴露。这一部署策略反映的并非与俄罗斯的共识，而是土耳其的后勤制约，因为确保整个周边地带需要大量资源。²⁵这一问题于2020年11月得到部分解决，当时莫斯科与安卡拉就被伊德利卜南部政权部队包围的土耳其观察哨的重新部署达成了谅解。该协议有助于巩固该地区脆弱的停火、稳定局势，同时反映出土耳其对其军事承诺的务实排序。²⁶

82

第二个争议点围绕“恐怖主义问题”展开。安卡拉不得不应对众多被俄罗斯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团体的存在，同时避免与它们直接对抗，也不像它在阿夫林（Afrin）与阿勒颇北部那样在伊德利卜承担亲力亲为的治理角色。土耳其的方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本地伙伴，这不可避免地把叙解军（尽管它自身也被土耳其正式认定为恐怖组织）置于关键玩家的位置。一位土耳其官员概括了这种务实立场：“我们需要打击恐怖分子，但我们不会对他们开战。我们需要的是—支本地力量来削弱他们。叙解军了解这些团体，能干这个活。但归根结底，叙解军也必须改变。”²⁷因此，土耳其支持沙拉的霸权工程，押

注于叙解军巩固权力的能力，同时设想其最终转型或融入更广泛的防务框架。

第三个争议点关乎俄罗斯参与沿 M4 公路的俄土联合巡逻。这次巡逻意在检验土耳其对武装反对派施加控制的能力，反映出俄罗斯希望评估沿关键公路开展联合军事巡逻是否可行。土耳其强调，无法落实巡逻将危及停火，而叙解军似乎指望民众抵抗来扰乱巡逻的实施，并最终迫使巡逻取消。²⁸

莫斯科协议达成后不久，一场名为“尊严静坐”（Sit-in of Dignity）的草根运动兴起，阻碍了巡逻。尽管叙解军官方否认参与，证据表明该组织与救国政府在策动抵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叙解军沿关键路线构筑了壕沟，随后，试图清理道路的土耳其部队与叙解军动员起来的示威者之间爆发了冲突。²⁹ 这些对抗揭示了叙解军内部两极分化的深度，土耳其官员很快得出结论：该组织在其巡逻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

沙拉周围的叙解军领导层接受了停火的构想，但中层指挥官发现难以遵行：“我们的巡逻队在叙解军内部遭遇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⁸³ 他们派巡逻队来保护我们的人，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反对巡逻。沙拉必须找到平衡的办法，而这很困难，”一位土耳其官员说。³⁰ 一位当地记者补充道：

尊严静坐必须被理解为叙解军领导层用以调节因莫斯科协议而起的内部反对的工具。让巡逻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通过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土耳其，叙解军被迫接受；但另一方面，因为内部反对，组织领导层又被迫拒绝。因此，叙解军选择了边让步边抵抗的做法，但只是小步推进。³¹

叙解军的愿景逐渐变得更清晰、在政治上更现实。2020 年 7 月，该组织的军事领导人承认：

当然，我们认为接受巡逻队通过存在道义上的问题。俄罗斯人的进入被大多数民众视为背叛。但对我们而言，作为领导人，我们很清楚这

是巩固停火的最好办法。我们批准了为期五十天的静坐，但局势一出现失控迹象，我们就介入，向民众解释其中的逻辑，并说服土耳其人以渐进方式实施巡逻，以便争取时间并准备我们的基地。³²

更广义地说，阿布·马里亚·卡赫塔尼，支持阵线的首任宗教领袖，承认国际体系（包括土耳其的角色）如何显著塑造了该组织的选择，并迫使它作出让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宗教观点：

国际体系青睐的不是最强者，而是能够适应它的人。作为支持阵线的前教法权威，我努力发展一种与现代相符的方法论，因为每个时代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教法断制。伊斯兰教法不是一个僵化的数学公式；它远比我们狭隘的解释宽广。你无法把激怒西方的圣战话语与建国任务调和起来。³³

问题在于，叙解军对莫斯科协议的事实上支持远远超出了仅仅接受新现实。叙解军不得不在保护巡逻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几周前它的一些人员还在与这些巡逻队作战。事实上，正是在2020年7月下旬，⁸⁴在铲除基地组织之后，最后一支巡逻队才首次顺利走完M4公路全程。此后巡逻停止了，因为其首要目标并非常规监视，而是让俄罗斯评估土耳其维持对伊德利卜局势控制的能力。³⁴

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审视更广阔的背景，为什么叙解军选择与土耳其结盟，尽管它此前曾对主张这样做的其他派系抱有强烈保留？最明显的原因是，考虑到土耳其在保住该省方面的关键作用，叙解军别无选择。但叙解军也有其他目标。第一，叙解军力图重组并强化其军事机器，提升面对外部威胁的防御能力。第二，该组织的安全部队需要一段停火期来稳定地区并重新控制领土，尤其是面对残余的亲基地组织团体可能转入地下、对叙解军开展秘密行动的迫近威胁。最后，救国政府认识到需要给民众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空间，并巩固其与土耳其的关系，这意味着该协议是保住内部稳定与外部联盟的关键一步。在概括这一新共识时，叙解军的军事指挥官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认为：

停火持续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民众需要喘息，而我们军方支持停火，因为我们需要重组。时间对我们有用，因为在政权与俄罗斯针对我们的上一场战役中损失了近 1000 名烈士与 2000 名伤员之后，我们有更多时间在训练与招募上追赶。³⁵

回过头看，阿布·卡斯拉的话在 2025 年读来非同寻常，因为它们怪异地映照了随后四年的事态进程。当政权日渐衰弱之际，叙解军利用停火为最后一战做战略准备，并在那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在实践中，土耳其倾向于在该地区推动军事重组。凭借超过 1.2 万人的兵力，包括特种部队与观察哨，土耳其开始与其他武装团体的一个作战室协调，即上一章讨论过的“明胜”联合行动室 (al-Fath al-Mubin)⁸⁵ 这使庇护关系正式化。据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前的语境在应对激进主义方面提供了新机会。随着我们的军事增兵以及与各派系的合作，我们现在对它们有了大得多的影响力。不仅在军事问题上，在政治事务上也是如此。”³⁶ 一般而言，庇护关系是一种不对称动态，庇护方对其受庇护方握有影响力。然而，在本案中，这一关系造成的与其说是庇护方与受庇护方之间的权力失衡，不如说是叙解军内部的裂痕。这种分裂在艾哈迈德·沙拉周围的核心圈子与一些中层指挥官的抵制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庇护关系在叙解军内部产生了凝聚效应，有助于巩固该运动在与基地组织对抗中取得的成果。尽管如此，土耳其对叙解军的压力始终未减。

当制度化服务于遏制激进主义的政策

一些前激进分子，往往是在被逐出运动之后，从政治或军事角色转向专注于宣教 (*da'wa*) 或宗教布道，为此建立了宗教学院，而这些学院本身日后也变得很有争议。尽管独立，它们却成了认知失调的新场域，因为它们的政治与宗教观点更接近支持阵线早年的立场，而非叙解军的新战略。叙解军的回应再度是制度化战略，即把这些宗教学者管理并约束在一个正式化的框架之内。

2020年之后，随着救国政府巩固其主导地位以及与政权的实战暂停，对宗教教育的监管不断强化。在政府把世俗教育纳入管控的同时，它把矛头对准了私立教法学院，尤其是在与强硬派的对抗加剧的时期。这标志着向集中化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对制度化的追求与对权威的追求相互强化。把宗教教育制度化，政府力图强化其政治权威、边缘化对立意识形态，并确保宗教教育符合其治理愿景，因为它把宗教教育标准化并置于自己的直接监督之下。⁸⁶

监管给这些学院带来了重大改革。例如，监管规定要求把宗教课程与世俗课程整合起来，以确保就读这些学院的学生不被局限于狭窄的职业道路。这种双轨方针意在为毕业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进入教法学院（Faculty of Shari‘a）这类机构。在意识形态上，教法学院在塑造宗教方向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方针与更宏观的政策保持一致。按院长的说法：

教法学院强制教授宗教信条（‘aqida）。但依据什么？对学院来说，这并不重要。教授信条可以参考沙斐仪学派（Shafi‘i school）的教义，也可以不参考。要紧的是避免重大偏差。除此之外，我们对任何进路都持开放态度，无论它源自艾什尔里学派（Ash‘ari school）还是圣训派（Ahl al-Hadith）[后者大体上与萨拉菲主义一致]。所有这些都落在一条可接受的总路线（khat‘am）之内。在这一框架内，各学院可以做它们认为合适的事。这条总路线界定了我们的宗教取向。它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分裂，因为我们不想卷入神学争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想避免意识形态极化。我们不想把任何东西强加于人，而只是奉行一种能够把所有人团结起来的宗教政策。³⁷

政府的制度化努力导致许多教法学院关闭。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在救国政府之前，人人随心所欲地开办学院。我们试图建立秩序，而学院抵制。许多学院因违反内部规章而被关闭”。³⁸只有十二所教法学院成功应对了新的监管约束。此外，还有少数几所，如脑威学院（Nawawi Institute）和阿卜杜·胡扎法·沙米教法中学（Abd al-Huzafa al-

Shami Secondary School of Shari'a), 仍未注册, 但在宽容的幅度内运作。这一例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们毫不含糊的宗教取向, 即牢牢扎根于沙斐仪学派^①教法并带有一些苏菲倾向, 这与叙解军的宗教教育框架相契合。³⁹

87

意识形态、行政与安全压力显著削弱了学院圈子的影响力, 按一位接近叙解军的人士的说法, 这个圈子已不再能被视为激进主义的温床。这一转变也标志着萨拉菲主义核心地位的衰落, 因为环境已偏离其先前的支配地位。这场转型反映了控制并调和该地区意识形态方向的更宏观努力。

掌控宗教领域：主流化战略

叙解军对其他宗教机构的方针同样揭示了真实的转变。起初, 该组织积极寻求确立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压制异见, 同时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然而, 面对日益增长的抵抗、实际的局限与资源约束, 叙解军逐渐放松了掌控。该组织不得不承认, 全面支配是行不通的。取而代之的是, 它的优先事项从遏制穆斯林社群内部的宗教多样性, 转向更侧重压制政治异见。

叙解军起初力图在力量对比对自己有利之处策略性地安插己方成员, 以确立对地方宗教领袖的控制。这一策略包括把持批评立场的伊玛目从叙解军影响区域内的关键职位上撤换。然而, 该组织在多个地方遭遇了抵抗。引人注目的抵抗案例发生在迈阿赖特努阿曼, 这座城市历史上就反对支持阵线, 后来又反对叙解军。叙解军试图推行的变革, 包括撤换伊玛目、宣礼员 (muezzin) 与知名布道者, 遭遇抵抗, 主要是因为阿勒万家族 (al-Alwan family) 等本地望族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叙解军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局限。尽管该组织声称它只罢免反对革命

① 逊尼派教法有四大学派: 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叙利亚北部民间传统上属沙斐仪与哈乃斐两家, 而萨拉菲派主张越过学派直接依经典断案——叙解军认可沙斐仪学派, 正是向本地传统让步的表示。——译注

或支持政权的教士，一些观察人士还是注意到其方针出现了可辨识的转变。一位前法官回忆道：

起初，叙解军试图更换反对其观点的教士，代之以从其意识形态训练营出来的年轻人。后来，它不得不让老教士复职，原因有二：一是弥补其干部之不足与稚嫩，二是平息民愤。⁴⁰

88

承认持续对抗当地民众以确立对清真寺的控制并不切实际之后，叙解军采取了管理下层教士的务实策略，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街区长老”（*shuyukh al-hara*）。这种办法糅合了笼络、宽容与强制的成分，每种成分的侧重随地方力量对比而变化。本质上，按该地区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的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庇护政策：

为地方名流所认可、为民众所喜爱的知名谢赫，会受到[救国政府]宗教事务部的接触，该部会试图影响他们。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他们反对其指示，就有被免职的风险。⁴¹

救国政府前宗教事务部长易卜拉欣·沙舒（Ibrahim Shasho）承认：我们管理着1200多座清真寺。而每座清真寺大约有五名工作人员。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换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并不试图推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也不试图更换人员。我们不拒绝任何具备必要知识的求学者（*talib al-'ilm*），也不在萨拉菲派、艾什尔里派或苏菲派之间作区分。⁴²

其结果是，叙解军对宗教版图的干预减少了，它不再自上而下地强推布道词。尽管地方布道者或许曾被鼓励就特定事件传达某些立场，但他们并未被要求遵从特定的宗教观点。例如在伊德利卜市，四十六座主要清真寺仍由救国政府建立之前就在任的同一批人员管理。⁴³

同样，清真寺内的神学教习圈（*halaqat al-ta'lim*）继续运作，叙解军并未试图强加其宗教教义，尽管这些教习圈在形式上受宗教事务部监督。监督神学教习圈的组织多种多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复杂的宗教版图。它们包括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下属的迪亚内特基金会

(Diyanet Waqf)、与流亡反对派立场一致的叙利亚伊斯兰委员会 (Syrian Islamic Council), 以及遵循苏菲传统与教义的伊玛目脑威学院 (Institute of Imam al-Nawawi)。这些实体共同塑造了该地区内部的神学话语与实践。⁴⁴

在教法学院内部, 叙解军采取了相对放手的方针, 这主要是因为力量对比不利。一位曾在伊玛目脑威教法学院任教、现居土耳其的教师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截至 2015 年, 我们在解放区建立了三十多个分支。三年前 [2017 年], 叙解军试图通过干预课程来施加控制。他们对支配权的渴望显而易见。参与教育事务的叙解军安全官员试图审查我们的教科书, 并推动改动内容。作为回应, 我们进行了抵制, 并借助了媒体关注。最终, 他们让步了。他们对媒体压力有反应, 其关注点随后转向个人, 偶有逮捕。⁴⁵

值得注意的是, 叙解军于 2017 年停办了自己的教法学院。一位与叙解军关系密切的教士解释说, 宗教培训并未经历与其他领域相同的制度化努力:

叙解军此前开办教法学院, 为其武装人员进行宗教培训, 尤其是在哈雷姆与塞勒根 (Salqeen) 等支持阵线的历史据点。然而, 他们在 2017 年关闭了这些学院, 当时叙解军开始依靠更非正式的方式, 比如在军营中进行意识形态培训, 以及由与该组织有联系的教士在清真寺里举办讲习。⁴⁶

除了由被叙解军击败的派系的一些前宗教领袖主导的若干独立举措之外, 伊玛目的培训仍由伊玛目脑威学院这类传统主义机构负责, 后者在培养本地教士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类似的非强制政策也适用于教育。争议事项之一是试图在哈斯纳维亚学校 (al-Khasnawiyya School) 与伊玛目脑威学院的宗教课程中强

加萨拉菲派进路。最终，双方达成了共同协议。其中一所机构的一位教师强调，“各学院有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授课的自由。”

90

所有教学法派都被接受，只要不公开宣扬苏菲主义，且各机构不教授敌视萨拉菲主义或叙解军所持立场的观点。”⁴⁷ 就连伊德利卜大学的教法学院，尽管其课程中纳入了萨拉菲派文献，也继续依靠大马士革大学（University of Damascus）教法学院的教义。此外，它的领导层中仍保留艾什里^①派苏菲学者。

叙解军还放松了对公立学校的压力。该组织起初试图改革宗教教育，并把救国政府的标志与国际社会承认的叙利亚临时政府的标志并列推出。例如，政府把前文提到的阿布·法特赫·法尔加利编写的教材分发给督导，尽管是否使用由他们自行决定。⁴⁸ 但世俗学校的课程，包括宗教教育在内，并无实质性变化。⁴⁹ 首要原因是资源匮乏。直到 2019 年 9 月，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国际捐助方，且主要是西方捐助方。接管这一部门需要大量人力与财政资源，而该运动并不准备划拨这些资源。教育部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行使监督职能，维持少量公务员，而不全面承担学校管理之责。正如一位本地分析人士恰如其分地指出的，“接管教育部门实在是太复杂了”。⁵⁰ 教育督导（*muwajih al-tarbawi*）试图借辅导课程和针对教师的特定宗教培训引入某些伊斯兰概念。然而，这些举措总体上受到欢迎，并未被教学人员视为过度干预。⁵¹ 尽管如此，仍出现了一些反弹，包括 2023 年夏在学校推行宗教服饰一事。

因此，在接管大马士革之前，叙解军对宗教领域的介入是务实多于意识形态的。该组织把以政治控制为中心的战略置于对社会进行宗教改造的热忱追求之上。叙解军不再把重点放在以清真寺的宗教引导积极重塑社会上，转而选择容纳并容忍宗教多样性。此外，叙解军在法特

91

① 艾什里派（Ash‘arism）是逊尼派主流的经院神学学派，在真主属性、理性与启示的关系等问题上与萨拉菲派立场相左；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城市的传统教界多属此派。——译注

瓦^① (fatwa) 的产出上启动了制度化努力, 此举最终把新宗教规范的创制边缘化了。另外, 由于人力资源的局限与地方动态的影响, 下层教士被撤换的情况减少了, 被接触笼络的情况增多了。这里的首要目标是政治顺从, 而非完全的宗教一致。⁵² 迄今为止, 叙解军并未持之以恒地推行萨拉菲式姿态所要求的特定世界观。

取代埃米尔与教法官：如何拆解支持阵线的组织遗产

治理权向救国政府的移交帮助叙解军重组了自身。2018 年, 叙解军决定拆解其去中心化结构, 在该结构中, 地方分部或权力结构, 即断绝者 (*qati'a*, 复数 *qawati'a*), 在地方事务管理上享有高度自治。由教法官 (即宗教领袖) 支持的地方埃米尔 (*amir*) (军事指挥官) 执掌大权, 在司法裁断上拥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叙解军于 2018 年作出的拆解地方分部体系的决定, 或许是该运动自 2016 年以来认可的内部转型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按一位曾与叙解军结盟的领导人的说法, “转向转型与去激进化的真正转折发生在 2018 年叙解军自我重组之时, 而非 2016 年与基地组织脱钩, 也非 2017 年创建救国政府”。⁵³

如果说叙解军的总体叙事是集中化与制度化, 那么其目标则更为宏大、更具政治性。它力图拆解此前由地方埃米尔与武装教士 (教法官, *shari'in*) 掌握的去中心化权力, 代之以新一代伊斯兰主义技术官僚。这些人受叙利亚革命精神气质的浸染, 并与艾哈迈德·沙拉本人直接相连。这种联系赋予他们管理地方事务所需的权威, 并确保一种更加集中、更加协调的治理方式。按沙拉一位顾问的说法:

过去, 地方层面的管理交给地方分部 (*qawati'a*) 的埃米尔。我们习惯于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治理, 但这把所有权威与权力都交给了埃米尔。因此, 我们决意解除各分部的权力, 把权威交给一种新型人物, 这些人

① 法特瓦 (*fatwa*) 是有资格的教法学者就具体问题给出的宗教裁断意见, 本身不具强制力, 其分量取决于出具者的威望。——译注

物将被剥夺对民众直接强制的任何手段。我们想要的是能够以权威口吻说话的人，但桌上没有手枪。⁵⁴

艾哈迈德·沙拉对此补充道：

地方分部的拆解，与支持阵线内部渐进的集中化进程同步发生。起初，集中化是内部的，即整合各法庭，使其不再留在地方教法法官手中。只有在我们完成内部集中化进程之后，我们才走向外部集中化，最终以救国政府的建立而告终。⁵⁵

除了制度性叙事之外，一个关键原因直接关乎内部权力动态。救国政府难以对支持阵线内部的地方分部确立自己的权威。按一个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领导人的说法：“救国政府建立之后，政府与各地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分部之间，后者并不总是响应政府的要求”。⁵⁶

按沙拉一位亲信的说法，拆解地方分部是一个渐进且深思熟虑的进程，始于城市中心。第一步是从这些地区撤出军事存在，随后建立法庭。安全部队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驻留，尤其是旧的地方分部体系仍在各省继续运作之时。一旦作出集中权力并建立文人行政机构的决定，这一进程就加速了。⁵⁷ 按一个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指挥官的说法：

与地方分部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些分部起初具有军事性质，抵制新成立的救国政府的权威。地方分部难以接受文人领导人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与叙解军没有关联的领导人。救国政府成立后，与只认沙拉为最高权威的地方分部之间一再爆发冲突。为应对这一局面，我们于2018年在地方行政部内创建了“解放区行政机构”(*idarat al-manatiq al-mubharara*)。这个新结构事实上与沙拉和叙解军站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拆解了地方分部，把其领导人重新吸纳回运动之中。一些人转任安全职位，另一些转入军事岗位，还有一些留在地方，加入行政机构。不过，地方分部的前成员如今已不再在解放区行政机构内任职。⁵⁸

派系宗教法庭的取消与司法的制度化，还剥夺了武装指挥官（他们往往执掌地方伊斯兰法庭）对民众的控制权。该省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由法庭而非宗教人士执行。

支持阵线地方分部的拆解，以及把其地方领导人与宗教学者重新安置进新的文人与军事结构，几乎没有遭遇抵抗。该运动的一位前成员提到，“没有抵抗。我们当时所处的运动纪律严明，对领袖绝对效忠。解放区行政机构的新干部全是新人，为新角色受过专门培训”。⁵⁹这主要是“因为沙拉对这些人握有真正的道义权威，而‘听从与服从’（*al-sama‘ wa al-ta‘a*）的原则在运动内部得到坚定奉行。没有这种道义权威，把宗教学者边缘化绝不可能如此顺利”。⁶⁰一些宗教学者不得不进入伊德利卜大学教法学院或叙解军附属的教法研究所学习，后者由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与叙解军领导委员会另一名成员马扎尔·维斯（Mazhar al-Weis）掌管。

94 解放区行政机构的地方负责人接管警察局与地方行政机构。他们充当叙利亚救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纽带。“救国政府来了，但事实上，起初监督学校、面包房与警察局的是解放区行政机构。随后，一切才逐步移交给各部委。”⁶¹

解放区行政机构：后圣战政治世代的孵化器

解放区行政机构（*Idarat al-Manatiq al-Muharara*）是叙解军集中化其结构以来伊德利卜地方权力政治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它是一个政治机构，由350人组成，分成若干地方分部，每部25至40人，分布在伊德利卜的七个“地区”（*manatiq*）。该机构于2018年依据协商委员会^①（Shura Council）的一项决定正式成立，以应对救国政府的弱点与功能失调；它的权威来自其与叙解军领导层极为牢固的非正式联系。叙解军

① 舒拉（*shura*）意为协商，源出《古兰经》所倡的议事原则。伊斯兰主义与圣战组织多设“协商委员会”作为最高议事机构，其权力大小因组织而异。——译注

领导层创建这一结构,是为了弥补它一年前建立的救国政府的缺陷,因为后者难以在地方上确立权威,当地社群质疑其合法性。它的权威也受到掌管旧分部的埃米尔与宗教教士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新结构已成为转型与去激进化政策的关键工具之一,因为它对沙拉核心圈子主导的集中化努力以及拆解支持阵线旧地方结构的政策至关重要——它取而代之的正是这些旧结构。

解放区行政机构起步时面对一个两难处境。沙拉明白治理的重要性,却不愿直接监督治理。因此,他主张把支持阵线的民政职责,包括法庭等机构的管理,委托给他人。正如叙解军一位消息人士指出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法庭更让你不得人心”。⁶²但沙拉也认识到,仅靠叙利亚救国政府无法有效应对治理的挑战。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失去控制、也不无意中退回效忠者(*mubay'a*)原则(即像过去那样,要紧的是对团体的效忠誓约)的前提下委托职责。⁶³叙解军选择创建一个“第二阶层”,其定义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阶层,它使统治者得以统治,而其自身并非精英”。⁶⁴按一位叙解军领导人的说法:

解放区行政机构创建于2018年夏[即救国政府成立一年半之后]。救国政府起初面临严重的权威问题。各派系或地方委员会仍执掌实权,往往不愿接受它的权威,其中也包括我们团体内部的人。我们不得不引入一个凭其与叙解军的联系而获得授权的阶层,去说服地面上的各股力量接受救国政府的权威。⁶⁵

叙解军的“第二阶层”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而是一批社会背景相对同质的政治人员。尽管他们的籍贯与派系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招募自支持阵线,另一些来自自由叙利亚军,还有一些此前从未参与武装团体,他们却共享若干关键特征。⁶⁶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大多持有大学学位,且相对年轻,以三十多岁者为主。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把叙利亚革命认作自己的政治参照,而非全球圣战,甚至也不是萨拉菲主义。他们的话语以国家为中心,讲求法条,带有技术官僚色彩。他们避开意识

形态辞令,专注于以务实办法应对治理与权威的挑战。解放区行政机构在调解地方冲突与落实治理举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介入土耳其军方与当地民众之间的争端,并支持部落名流执行仲裁裁决,尤其是在部落仇杀案件中。⁶⁷ 在伊德利卜,它处理了诸如街头摊贩阻塞市中心交通之类的问题。⁶⁸ 救国政府实施的每个项目都要经过解放区行政机构的正式核准程序,最终以该机构与救国政府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而告完成。

解放区行政机构是一党制国家逻辑的一种局部表达,但不应把它误认为复兴党(Baath Party)的翻版。它的起源在于一次真实(尽管有缺陷)⁹⁶的权力委托行为,即向救国政府的委托,后者被授予行政职责,却没有真正的权威。其结果是,救国政府在确立有效权威方面面临重大挑战——而这一挑战正是解放区行政机构组建与运作的核心所在。

从根本上说,解放区行政机构是在脆弱的制度框架内充当权威的提供者。它的目的是弥合中央领导层与社会边缘之间的鸿沟,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建立联系,同时试图弥补治理中的结构性弱点。

解放区行政机构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与叙解军领导层的密切关联。正如伊德利卜的一位干部所解释的,“我们拥有道义影响力,因为民众知道我们的身份。”尽管先锋主义的成分显而易见,伊德利卜的权力结构并不符合传统的一党模式——在那种模式中,政党先于制度框架而存在,并赋予后者意识形态意义。相反,伊德利卜的先锋主义是作为一种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矫正机制运作的。起初,叙解军依靠盟友网络承担有限的行政职责。然而,这些实体缺乏必要的权威,表现欠佳。许多合格人才要么离开了该地区,要么加入了非政府组织,加剧了治理缺口。大约一年半之后,艾哈迈德·沙拉迈出了战略性的一步,重新确立控制并重建体系。在此背景下,伊德利卜的先锋主义是再发明的产物,由一支缺乏既有政党结构可以依靠的主导力量事后发展出来——这与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不同。被迫进入治理领域的叙解军,不得不在地方层面创建一个新的权力“第二阶

层”，填补此前各类替代方案（自治派系、支持阵线旧地方分部与独立地方委员会）被拆解后留下的真空。

第四章 退出圣战主义

97

大叙利亚解放军（Hay'at Tahrir al-Sham, HTS）以支持阵线起家，曾是与伊斯兰国结盟、后来又与基地组织结盟的意识形态先锋；它不可能在毫无内部阻力的情况下强行推行与过去相悖的新战略方向。在不把武装组织的意识形态本质化的前提下，围绕某些意识形态原则动员武装分子并使之社会化，这意味着那些信念确实要紧，至少对为数不少的指挥官和普通战斗人员而言如此，他们或许真心信服这些信念，也不愿在方便的时候将其抛弃。要成功完成转型，叙解军必须说服自己的士兵和指挥官，让他们相信新战略不是机会主义驱使下的背叛，同时还要孤立并边缘化那些拒绝遵守新方向的人，即使不将其驱逐。在 2025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叙解军尚未为其正在成形的后圣战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因为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之中，它的最终目标依然模糊。尽管如此，它还是设法与全球圣战拉开了距离，边缘化了反对其新战略方向的强硬派，并着手培育不同于过去的武装文化。

斩断与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纽带

全球圣战的关键特征是其内部的分裂。历史上，基地组织是作为先锋组织崛起的，在 9/11 袭击发生时只拥有数百名追随者。基地组织并未像伊斯兰国后来那样试图成为唯一合法的圣战组织，而是与其他若干组织打交道，有时缔结同盟，有时则产生分歧。随着时间推移，奥萨

98 马·本·拉登的组织演变成分支机构网络，这一结构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全球圣战远远超出基地组织本身的范围。它涵盖松散而弥散的运动，由同情者与支持者构成，这些人缺乏正式的隶属关系、效忠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控制体系。2013 年伊斯兰国脱离基地组织，进一步加深了

圣战运动内部的分裂,并实际终结了基地组织的垄断地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基地组织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圣战的先锋,而伊斯兰国则宣称自己是全世界唯一合法的穆斯林权威,并拒绝承认其他所有组织和意识形态鼓吹者。

基地组织缺少能够发布毫不含糊的宗教敕令的正式宗教权威。它确实设有内部宗教委员会,由阿布·哈夫斯·毛里塔尼 (Abu Hafs al-Mauritani) 领导,此人在 9/11 前夕因反对即将到来的袭击而辞职;但该组织历来是向外部的宗教人物而非内部人士寻求合法性与支持。阿富汗圣战的关键人物、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阿扎姆 (Abdullah Azzam) 从未认同基地组织这项事业,在他早逝之后,该组织在 20 世纪 90 年代转向了独立的宗教学者。过去数十年间,它最引人注目的两位人物一直是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和阿布·卡塔尔·法拉斯提尼 (Abu Qatada al-Falastini)。尽管他们从未正式加入基地组织,却经常发表声明、发布宗教敕令以示对该组织的支持。这种对外部人物的依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无需缔结正式关系便拓宽了基地组织的合法性,但也意味着这些人物未必始终与该组织抱有相同的利益。尤其是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他往往强调把教义纯洁性置于政治考量之上,为此偶尔还会站到基地组织的对立面。

这些意识形态鼓吹者的重要性,在叙利亚冲突期间圣战派彼此冲突时显露无遗。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和阿布·卡塔尔等人屡次参与跨派系的冲突调解,因为他们在许多普通战斗人员眼中具有合法性,而这些战斗人员正是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在宗教阵营中完成社会化的。对叙解军而言,在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之后,他们的核心地位同样显而易见。如前几章所述,2020 年之前,围绕对宗教卫士组织应采取何种立场,紧张不断升级,叙解军的一些指挥官反对其领导层管教这个亲基地组织团体的企图。他们宣布暂时冻结自己的叙解军成员身份,并威胁说,如果叙解军拒绝接受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阿布·卡塔尔等人的独立裁决,就将脱离该组织。⁹⁹

因此,在2017年叙解军成立之前,支持阵线尽管奉行叙利亚优先的政策,仍部分具有跨国性。前几章提到,该组织多年来吸纳了若干全球圣战武装人员,其中包括与基地组织领导层关系密切的人物,如阿布·朱莱比卜·乌尔杜尼(Abu Julaybib al-Urduni)、阿布·菲拉斯·苏里(Abu Firas al-Suri)、阿布·法拉杰·马斯里(Abu Farraj al-Masri),以及后来的阿布·哈伊尔·马斯里(Abul-Khayr al-Masri)(他并未正式加入支持阵线或其后继组织)和阿布·卡西姆·乌尔杜尼(Abul-Qassam al-Urduni)。尽管这些领导人和指挥官中有许多人多年来死于战斗或美国的无人机空袭,他们的影响仍然塑造了该组织关于暴力的全球性叙事,这一点在其大量宣传中都有体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凭借与阿布·卡塔达、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等知名圣战学者和意识形态鼓吹者的关联,为支持阵线赋予了合法性与权威,这对帮助该组织挺过2013年与伊斯兰国的分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支持阵线的跨国性也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该组织对外部网络和意识形态鼓吹者的依赖,偶尔会与其本地目标和优先事项发生冲突。与主要依赖国内支持者基础的其他本地组织不同,全球圣战派尽管程度不一,仍依赖跨国意识形态鼓吹者和组织化网络来为其行动赋予合法性、动员资源并挺过困难时期。这一动态在2013年与伊斯兰国分裂时证明是有利的,因为著名的跨国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站在了支持阵线一边,帮助它留住了战斗人员并维持了其合法性。然而,这种对全球圣战派的相对依赖也施加了约束。全球支持者和意识形态鼓吹者可以为支持阵线这类组织在政治上能追求什么划定界限,尤其是在涉及重大战略转向时。按照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的说法:

你不应把基地组织视为一个等级制组织。相反,它的运作方式是一个组织网络,效忠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我认为效忠誓约(*bay'a*)这一概念既珍贵又有益,因为它有助于保持意识形态取向与方法论(*manhaj*)。它确保各项决定经由分支机构网络内部的协商集体

作出。这种结构维护了意识形态取向，并强化了我们最终目标的承诺：建立伊斯兰国家，确立认主独一（*iqamat al-tawhid*）。没有这种统一，就没有任何界限。看看阿富汗的阿卜杜勒·拉布·拉苏尔·萨亚夫（Abd Rab al-Rasul Sayyaf）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这类人物：尽管他们也曾谋求在那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最终却接受了民主框架。叙解军在拒绝向基地组织宣誓效忠之后，也在做同样的事情。¹

2016年夏，支持阵线正式脱离基地组织，首先是一场组织上的决裂。艾哈迈德·沙拉在首次公开讲话中强调，更名后的大叙利亚征服阵线不再与国外保持任何联系。实质上，他正式放弃了对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的效忠誓约（*bay'a*）。尽管基地组织从未把决定强加给支持阵线，与艾曼·扎瓦希里的联系也已中断三年，这一决裂仍然意义重大。它表明，今后的战略决策都将在叙利亚单方面作出，无需再与基地组织人物协商；矛盾的是，分裂发生时情况本已如此。此举还向其他武装团体发出了明确信号：该组织如今完全聚焦于叙利亚冲突。它也向外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该组织的国际野心实际上已经终结，尽管支持阵线此前从未直接威胁过它们。

然而，在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看来，一场意识形态转变显然也开始凝聚成形。背弃基地组织表明，该组织正逐渐偏离圣战萨拉菲主义的若干核心原则。这一发展并非无人察觉：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鼓吹者将其视为重大威胁，并作出了相应反应。他们的反应如同宝贵的政治晴雨表，可用以评估该运动的轨迹；要理解这一去激进化进程，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考察激进分子自身如何叙述和批评此类转变。这一点在他们之间的公开辩论中显而易见，在我们与他们的私下讨论中同样如此。尽管其中大部分内容此前已有分析，我们仍将简要回顾这一意识形态分歧的主要特征。

全球圣战主义与叙解军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两者与革命的关系。全球圣战分子采取先锋队式的路径，并强调圣战分子与革命者之间的

排他性区分，这种区分根植于“效忠”——忠于穆斯林——与“弃绝”——弃绝非穆斯林——(*al-Wala wa al-Bara*) 这一宗教原则，即穆斯林应当彼此忠诚、反对非穆斯林。他们谴责叙解军对革命采取的“融入式”路径。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尤其痛惜道：

叙解军把圣战主义当作工具。他们是圣战的投机分子(*mutasaliheen*)。为了革命，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忠诚的圣战分子。他们把圣战分子当作革命的燃料，随后又将他们出卖。在我们看来，事情很清楚。叙解军推动运动走向稀释(*tamiya*)与妥协(*talawun*)，而伊斯兰国则将其推向极端(*ghulu*)。²

在早期的辩论中，叙解军的最高宗教学者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与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交锋，并坚持认为，不仅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所有拿起武器反抗叙利亚政权的人也都应被视为圣战者(*mujahideen*)，即投身圣战之人。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完全无法接受这一立场。回顾这些讨论，马克迪西声称：

我强调，伊斯兰的建立只能通过忠诚的圣战分子的行动来实现。然而，(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认为，仅凭与巴沙尔·阿萨德作战，就足以把一个人认定为圣战者(*mujahid*)。这一看法反映的是革命者的心态，而非真正的圣战担当，因为它无视了忠诚与决裂(*al-Wala wa al-Bara*)的原则。这并不像他们起初声称的那样，只是为经受住国际社会的审视而对叙利亚情境作出的策略性调整。它代表的是一次深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向。³

叙解军对基地组织的拒斥，因此不仅是组织层面的，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决裂。全球圣战派认真对待这一隶属关系，因为它是确保意识形态凝聚力、避免信条被“稀释”(*ta'miya*)的工具：

由于革命往往操纵圣战派、为自身目的而利用他们，向基地组织宣誓效忠有助于捍卫某些定则(*thawabit*)。可以看到，当他们切断这一效忠关系后，便开始在缺乏任何防止偏离的指导规范(*dawabit*)的情况下

行事。没有了这种结构，他们的行动失去了方向，变得纯粹基于短期利益。叙解军领导人曾借用我们的语汇，强调诸如“为主道而战”(*fi sabilillah*)和认主独一(*tawhid*)之类的概念。举例来说，圣战者(*mujahid*)是指努力使真主之言至高无上的人。然而如今，他们把任何与巴沙尔·阿萨德作战的人都称为圣战者。这是对我们所代表立场的明确拒斥。⁴

尤其有趣的是，叙解军的决定使全球圣战派意识形态鼓吹者产生了分裂。他们并非都对叙解军采取相同立场。事实上，圣战派意识形态领域中两位最负盛名、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和阿布·卡塔达·法拉斯提尼，因对叙解军持相反观点而出现严重分歧。一位研究圣战主义的约旦专家强调了叙解军的选择所造成的意识形态裂痕之深：

对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而言，压倒一切的关切在于维护圣战主义的纯粹性，确保它始终区别于其他革命运动。相较之下，阿布·卡塔达采取更为务实的立场，把政治考量与广大信士共同体的公益(*maslaha*)置于优先位置。他并非仅凭叙解军的结盟对象来评判它，而是把它放在恪守伊斯兰治理(*al-siyasat al-shar'iyah*，教法政治)根本原则的更大框架之内来衡量。由此看来，叙解军对他来说并不构成重大问题。⁵

自然界厌恶真空；因此，叙解军断绝了与全球圣战主义意识形态人物的联系，就不得不以扎根叙利亚语境的新人物取而代之。这一转向是刻意的策略，意在削弱全球圣战主义学者对中层指挥官和普通成员的影响。尤须指出，叙解军回归传统教法学派(*madhhab*)，特别是采纳沙斐仪学派，以此重新调整了宗教框架；这一论点详见我们论萨拉菲主义的一章。叙解军还把发布法特瓦的职责移交给规模扩大且具包容性的委员会，这样设计是为了在不完全排斥强硬派的前提下将其边缘化。正如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所解释的：“为避免跨国界的法特瓦，我们决定将宗教教育同教法学派(*madhhab*)挂钩。”⁶本着同样的精神，叙解军把面向普通成员的教导本地化，把注意力从海外各处圣战之地转移开，优先关注叙利亚本土语境与革命。正如艾哈迈德·沙拉的一位亲信顾问

所解释的：“我们绝不想让战斗人员被拖入围绕不同全球圣战主义观点的争论与分歧。相反，我们力求聚焦于真正的敌人：政权。”⁷为进一步降低全球圣战主义学者的潜在影响，以及其战斗人员像2014年那样叛投更强硬运动的风险，叙解军在其意识形态培训方案中纳入了题为“警惕极端主义”（*tahdhirat did al-ghulu*）的专门单元，强调激进主义的危害，并引导成员走向更为本地化、更为务实的路径。

以再地方化对抗全球圣战影响：教法学的转向

在争取社会认可的过程中，叙解军脱离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传统范式，转而接纳古典的教法学派（*madhhab*）。这些学派主导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法律传统而存在，为解释伊斯兰教法提供指引。逊尼派的四个主要学派是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每个学派都有各自独特的方法论，用以从《古兰经》和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中推导出法律裁决。这些学派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礼拜事务、家庭法、商业交易等等。尽管各学派之间在解释与侧重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力求按照各自的方法论去理解并运用伊斯兰教的原则。穆斯林在个人与共同体的宗教实践中往往遵循其中一个学派，但在伊斯兰教法划定的界限之内，也存在个人解释与选择的弹性空间。

叙解军重新强调教法学派，有两个首要动机。首先且最重要的是，¹⁰⁴叙解军力求在其本地共同体中扎下深厚的根基。采纳教法学派一事，已在支持阵线的队伍内部争论了数年。然而，向治理角色的转变使这一立场得以固化。据领导叙解军宗教委员会的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所言，“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依循教法学派这一理念锚定在运动之中，因为这是一种贴近民众的方式”。⁸

强调教法学派有助于拉近运动与本地人口的距离。这些学派是叙解军内部培训项目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⁹叙解军选择了沙斐仪学派而非罕百里学派，尽管后者在历史上与沙特萨拉菲主义相近，并与萨拉菲

派教义相契合。这一选择并非出于教义上的考量，而是出于实际考量。正如叙解军政治局一名成员所解释的，“我们选择沙斐仪学派，是因为它与本地人口的多数相符”。¹⁰显然，这里援引的并非这一参照本身的内在品质，而是其社会效应。这是一种政治逻辑，其正当性来自该组织对教法政治（*al-siyasat al-shari'yya*）的倚赖。

恢复教法学派地位的第二个理由是管控。这一战略举措是一项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意在削弱与其相竞争的各种权威来源的影响力。其目标是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公共宗教话语。据法特瓦最高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救国政府前总理巴萨姆·西希乌尼（Bassam Sihiouni）所言：

教法学派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框架，得以在维护伊斯兰教律法、伦理与道德的同时，保持一种正确而富有创见的思想方向。反之，抛弃这些学派将导致以公正正直之思为基础的教法学走向衰落。¹¹

教法学派的复兴成了一种手段，用以管理并缓和叙解军自身队伍内部的激进主义。它促成了宗教话语的制度化，把全球圣战派人物的影响边缘化，并让组织内部的异议之声归于沉默。这种宗教权威的制度化¹⁰⁵，又因叙利亚救国政府治下治理结构的巩固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将内部强硬派边缘化

叙解军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管控自身的内部分歧。最激进的人物选择不加入该组织：他们要么分裂出去，与基地组织附属的宗教卫士组织结盟，要么在某些情况下早在 2013 年便已离开支持阵线、投奔伊斯兰国。尽管如此，叙解军仍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运动。这种多样性既包括组织内资历较深的长期成员，也包括新近招募的人员，尤其是那些此前并非支持阵线成员、而以独立宗教布道者身份加入叙解军的人。这些新加入者中，许多人带来了各自独特的政治与宗教观点，而这些观点日益与叙解军新的战略选择相抵触。

叙解军在推行新的意识形态路线的同时，吸纳了许多此前不属于支持阵线的宗教学者，以此将内部碎片化或两极化的风险降至最低。这

些人尽管观点各异，但在关键时刻偶尔能在各种议题上为围绕叙解军的团结提供合法性。然而，管控这些人始终是微妙的工作。正如艾哈迈德·沙拉的一位亲密同僚曾言：“我们需要务实地处理早期遗留下来的问题。”¹² 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是将这些人物整合进该组织的权力架构之中，例如其自身的教法委员会，或是救国政府的法特瓦委员会（Fatwa Council）或协商委员会。这种遏制策略使叙解军得以直接监督并影响他们。但当这些人继续独立行事，接触媒体、发表声明或发表主麻日讲道时，该组织感到不满；这些活动往往暴露出他们的世界观与叙解军不断演变的政治和神学取向之间的显著认知失调。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有效。据该运动一名如今已成公开批评者的前干部称：“随着时间推移，现任领导层成功压制了运动内部任何有意义的反对声音。今天 [2022 年]，已不存在任何能够抗衡领导层决策的真正力量。”¹³

106

在摆脱叙利亚境外的圣战派意识形态鼓吹者之后，叙解军在战略上着手将本组织内部的强硬派边缘化：这些人抵制该组织的转型及其新的战略选择；而这些选择标志着对圣战派传统立场的重大背离，并反映出叙解军正转向更为务实、立足本地的战略，即将政治与领土稳定置于意识形态纯洁性之上。

首要任务，是将叙解军内部那些反对组织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选择的成员孤立起来。据一位前支持阵线领导人称，这涉及约 1700 人：¹⁴

起初，抵抗十分强烈。2017 年，当叙解军决定接受土耳其军队在其控制领土上部署时，这一抉择难以作出。该决定得到艾哈迈德·沙拉的支持，但当他就此咨询运动的协商委员会时，遭到了强烈反对。¹⁵

抉择越艰难，组织就越两极分化，因此，据叙解军的一位盟友称，“三年前 [2019 年]，组织作出决定，边缘化那些可能表达异议的声音”。¹⁶

叙解军确立了新政策,在保持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对其队伍实施内部管控。叙解军对激进分子的政策务实而直接:无论其过往如何,只要与组织的新政治方向保持一致,或至少不公开反对,便一律接纳。为防止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结成竞争性团体或联盟,叙解军领导层努力维持合作关系,或至少确保在冲突发生时,个人或团体能够友好地分道扬镳。然而,当异议有可能危及运动的凝聚力或挑战其新轨迹时,叙解军便果断行动,诉诸排斥或镇压以维持控制。在随后的几年里,该组织尤其开除了两名埃及学者:阿布·雅格赞·马斯里和阿布·舒艾卜·马斯里。二人在加入叙解军之前曾是大叙利亚自由军成员;叙解军声称,二人公开反对组织的新政策,违反了内部规定。¹⁷

107

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布·法特赫·法尔加利,尽管日益反对叙解军的一些新战略选择,仍在组织内滞留了相当长的时间。长期以来,叙解军的转型一直是法尔加利的争议所在。他公开对该组织与土耳其的军事伙伴关系表示异议,在协商委员会的讨论中以系统性的阻挠著称,并经常持有偏离叙解军官方立场的政治立场。此外,他还对为武装分子引入的新训练手册表示关切。据叙解军一位领导人称,

与他的紧张关系——例如他屡次就民主问题发表不受欢迎的言论——目前尚可容忍,因为我们宁愿让他留在阵营内,也不愿冒他转入地下的风险。尽管我们保持了一定的容忍余地,但必须指出,他的言论并不代表我们领导层的观点。他与叙解军领导层的关系依然紧张,当前局面与他可能被逐出组织之间仅一线之隔。¹⁸

在此背景下,友好分手的逻辑开始发挥作用:

处理与法尔加利这类人的紧张关系总是充满挑战。他与我们共事多年,尽管他的公开言论常常存在问题,我们还是给了他一定的回旋余地。然而,在组织内部,他屡屡阻碍讨论,而且与我们的政治方向分歧重大。经过几番讨论,他最终决定辞去协商委员会的职务。我们不希望将他从我们的队伍或该地区排除,因此他仍留在我们这里,但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或承担任何职责。¹⁹

叙解军的一贯策略，是与难以适应运动演变的争议人物保持一定的疏离。阿卜杜拉·穆海萨尼 (Abdullah al-Muhaysani) 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策略。穆海萨尼是一位年轻的沙特神职人员，在 2017 年加入叙解军之前，曾担任独立调解人和宗教权威。²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与叙解军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这些紧张关系与其说是源于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不如说是源于战略优先事项上的分歧。在叙解军与大叙利亚自由军的冲突期间，在革命者中间以持调和立场著称的穆海萨尼主张各派系实现团结。当时他是叙解军教法委员会的成员，但在一次投票反对这种统一之后，叙解军便同他撇清了关系。2018 年，裂痕进一步加深：叙解军的教法委员会以 5 票对 6 票的微弱差距投票赞成与大叙利亚自由军作战，两组织由此爆发战斗，穆海萨尼宣布辞职。尽管已经辞职，他还是与叙解军找到了一种行事方式 (*modus operandi*)。穆海萨尼是个格外难以驾驭的人物。他的经历充满争议，美国曾指认他为基地组织提供资金并招募未成年人；这连同他的外国国籍 (身为沙特人)、他对叙解军人权记录的批评立场，以及他对任意司法的反对，使他成为难以预测且棘手的公众人物。最终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安排：穆海萨尼获准造访伊德利卜，但被禁止公开讲话，尤其是发表周五布道，以避免引发更多麻烦。

一些曾被视为强硬派的前公众人物也不得不退下，因为他们的激进立场已不再发挥实际作用。奥萨马·卡西姆 (Osama Qasem) 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卡西姆是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前领导人，在埃及度过了数十年的监禁生涯，2013 年军事政变后迁居叙利亚。他的背景解释了他为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辩护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贬低艾曼·扎瓦希里的领导地位，将其描绘成与地面现实脱节之人 (称他为“洞穴中的伊玛目”)。鉴于扎瓦希里曾领导卡西姆先前所属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一批评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卡西姆后来还为内部冲突提供神学上的正当性论证，例如针对赞吉运动和大叙利亚自由军等敌对派系的战争；他将这些组织斥为不信者 (*kuffar*)，从而把这场战争框定为一场对抗不

信的战斗。然而，随着他的立场日益与叙解军的新战略方向相抵触，卡西姆最终成为该组织的负累，不得不退出。

尽管叙解军不得不将自己与更激进的竞争者区分开来，并使自身的强硬派边缘化，但它始终避免公开对意识形态作正式修正。相反，该组织不断演进的战略观点是由新的实践塑造的：即领导层为维持该运¹⁰⁹动内部凝聚力而作出的务实调适。这些转变表明了一条通向去激进化或主流化的轨迹，但这并非某种新阐明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随时间推移采取的一系列务实调适所累积的结果。

“稀释”圣战主义：武装训练的现实检验

叙解军去激进化政策的最后一个维度，是全面改革面向战斗人员的意识形态培训。这一转变确保领导层的新方向与新战略清晰地传达给基层成员，帮助他们理解并内化这一转变。这一做法缓解了基层战斗人员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若非如此，他们可能难以接受背弃关键意识形态信条的做法，而这些信条仅在数年前还是其核心信仰。

2016年，支持阵线停止了此前的意识形态培训，其中包括教授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与阿布·カタ达等人所著的关键文本。该组织甚至更进一步，全面禁止制作与传播马克迪西的著作。²¹此前，该组织曾与马克迪西在网络上发生冲突，其间叙解军的宗教学者积极参与辩论，反驳并谴责他的批评。马克迪西则谴责叙解军，指责其行事宽纵、背叛圣战派原则，尤其是脱离基地组织之举，并将其行为称为“稀释”(*ta'miya*)。他还援引相关论点间接对叙解军宣判叛教^①；这些论点指责该组织与土耳其等国合作，甚至不惜以此对抗其他圣战派，因而已沦为伊斯兰的悖逆者。叙解军则回应称，尽管马克迪西与伊斯兰国存在分

① 宣判叛教即“塔克菲尔”(*takfir*)：判定某个自称穆斯林的人已脱离伊斯兰。逊尼派主流对此极为审慎，圣战组织却据以把攻击穆斯林统治者乃至平民的行为正当化，故本书屡以之为衡量激进程度的标尺。——译注

歧,他仍是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旗手。该组织还指责他脱离叙利亚冲突的复杂现实,无力把握其独特动态。

叙解军将重心从宗教信条(‘*aqida*)转向教法学问题,以此作为其新战略的一部分。一名前支持阵线指挥官证实了这一转变,他表示:“我们逐渐看到,该运动在其教导中淡化了对信条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加大的”“对 *fiqh* [教法学] 的重视。”²² 正如下一章所详述,宗教信条是萨拉菲主义的核心。它主要涉及界定真主的属性与特质(*al-Asma wal-Sifat*, 尊名与属性),例如真主是否有手、真主身在何处之类的问题。这些神学细节将萨拉菲派与其他传统区分开来,例如艾什尔里派,即全球大多数穆斯林所遵循的学派。对教法学的重新重视不仅避免了神学绝对命题的分裂性,还为叙解军提供了以适应当代情境的方式诠释宗教的工具。正如下一章将进一步阐述的,对教法学的倚重还催生了新工具,例如当代情境教法学,使偏离以往做法的战略选择得以正当化。这一借鉴沙斐仪学派教法学的方

法,事实证明有利于该组织对地方主义的强调和对宗教敕令的掌控。

叙解军还成立了宣教预备学院(*Ma’had ‘Idad al-Du’at*),以培训其宣教人员。该学院在伊德利卜大学教法学院的监督下运作,课程由该系提供。完成培训后,这些宣教人员有机会进入法学院继续深造。²³

信条研究的剩余部分反映了课程的简化,即刻意回避争议性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叙解军强调研习伊玛目脑威的四十段圣训集,该圣训集在穆斯林中极为通行。课程以一本简明的著作呈现宗教信条,即阿卜杜拉·哈马德·鲁克夫(*Abdullah Hamad Al-Rukf*)所著的《盟约:信仰支柱教法学导论》(*Mithaq: An Introduction to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Pillars of Faith*),该书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读者简化而全面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基础信仰。新的教学内容还更加强调伊斯兰历史,从对基地组织活跃其中的各种当代圣战派语境的关注转向别处。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称:

由于战斗人员的特点不断变化，我们不得不调整并修改培训方案（*manabij*）。上一代战斗人员政治化程度更高、更受意识形态驱动，也受过一定教育，其中许多人是学习伊斯兰知识的求学者（*tulab al-'ilm*），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解水平。如今，新招募的人员年轻得多，年龄通常在 18 至 20 岁之间，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伊斯兰主义背景。今天的新招募者不受激进思想影响，这让我们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因此，我们不得不大幅简化培训方案。²⁴

111

化解激进主义，使武装人员文化与领导层的新政治取向趋于一致。这一转变是适应性举措，为的是让基层成员所接受的内容同不断演变的政治环境保持连贯。在新阶段，与土耳其、联合国、外国媒体和智库的谅解与互动已变得司空见惯，意识形态立场随之软化。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

起初，我们把联合国视为一场针对我们的全球阴谋的一部分。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同样，我们也放弃了对“他者”的断然拒斥。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政治实践，需要使教导与我们所采纳的新视角保持一致。²⁵

培训项目还力图向武装人员说明这些政治选择。“我们促成教堂开放，与少数群体接触，并与各国发展关系。有必要构建一套叙事，来解释并证明这些新现实的正当性。”²⁶ 因此，新课程由艾哈迈德·沙拉的核心圈子亲自撰写，也就不足为奇；自 2019 年一开始，正是他们发起了这场转型。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我们不能在 2022 年还停留在 2012 年的样子。过去十年，极端主义——*al-ghulu*（过激）——兴起，还有我们对他们发动的所有这些战斗。因此，我们必须把自己与 *al-ghulu* 区分开来。”²⁷

一位与该组织关系密切的前法院法官指出，宗教教育课程已从侧重圣战教学法、谴责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倾向，转向以务实的政治方式回应当代语境与挑战。他强调，即使在五年前，“他们的领导人此前还经常大谈伊斯兰主权（*hakimiyya*）问题。如今已不再如此。他们将其限于

112

仅限于表示运动想要的是巴沙尔倒台，而不去深入探究替代方案的性质。”²⁸ 他认为：

宗教教育课程已经改变。此前，它深植于圣战教学法，此外还有对苏菲派伊斯兰教中存在的神秘主义倾向的谴责、与什叶派的对抗以及信仰的净化。但最近〔2020年〕它们已经改变。它们教授当代语境的教法（*fiqh al-nawazil wa al-azamaat*），而非像过去那样专注于圣战教学法。新的视野已经开启。²⁹

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以运动社会学的变化来为这一改变辩护。他提出：

伊斯兰教法仍然是我们的参照。我内心依然信奉这些概念。但其适用是有条件的。基层士兵未必理解这一点。我只能与达到一定理解水平的人探讨这些问题。例如，许多基层士兵无法理解 *al-wala wal-bara*（忠诚——对穆斯林——与决裂——对非穆斯林）。他们也不需要了解这些细节层面。³⁰

然而，叙解军从未把这一转向奠立在新神学的基础上。据一名密切追踪叙解军的外国研究人员称：“叙解军的宗教领袖们把更多时间花在为政策辩护上——比如同意引入土耳其人或支持停火——而没有真正向其战斗人员提供新的意识形态愿景。”³¹

领导层的新政策方向确实遭遇了内部阻力，尤其是在中层指挥官之中。一些成员难以接受这些变化，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此前秉持的原则。据一位与该运动关系密切的前法官称：

有明显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净化课程的时刻。但有些人拒绝接受叙解军和救国政府的新取向，因为它们接纳了此前被禁止的行为。这被视为在稀释旧有原则。昨日被禁止之事，今日竟成合法。³²

另有两位毕业于亲近叙解军的教法学院者认为，抵触情绪在支持阵线时期招募的早期人员中尤为突出，这些人曾接受其战斗化意识形态训练。教法学院副院长承认，一些学生最初持有强硬观点，尤其是在

支持阵线时期接受过军事和意识形态训练的学生。他强调说：“他们需要这种训练。不到一年前[2019年]，我们还在与最凶恶的敌人作战，所以为了作战，你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而那些观念能使意志得到强化。现在是时候谨慎地纠正它们了。”³³

据该运动一位领导人称，去激进化归根结底源于一个关键目标：差异化：

与伊斯兰国以及后来与基地组织的军事对抗，迫使我们澄清自身的立场。与这些组织开战，就必须清晰地阐明我们之间的分歧。最初，在与伊斯兰国的冲突中，我们意识到，若不对其界定立场，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战斗人员的忠诚。同样，当我们转而反对基地组织时，这再次迫使我们打磨并宣示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些转变的主要催化剂，是冲击圣战派格局的一系列内部震荡，它们驱使我们作出调整，并将自己与对手区分开来。³⁴

对他们而言，治理叙利亚西北部不仅关乎行政管理，也是打击激进分子的手段。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补充说，打击激进分子就意味着必须：

创建一个不同于过激 (*gbulu*) 者的逊尼派模式。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革命岁月里，伊斯兰国有一个可供推广的具体模式。他们围绕诸如哈里发国或伊斯兰国家等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重大口号进行动员。而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真正确立的东西能够激发青年的热情。伊斯兰国事实上是唯一现实存在的伊斯兰项目。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一个现实存在的、具体的政治项目，能够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丝毫不亚于[俄罗斯军事基地所在的]赫梅米姆或政权。³⁵

第五章 掏空萨拉菲主义

115

大叙利亚解放军 (HTS) 早期的意识形态与神学观点扎根于萨拉菲主义。萨拉菲主义是一种理解伊斯兰的神学进路, 它既讲明如何认识真主、如何崇拜真主, 同时也是一套宗教政治框架, 规定社会如何组织、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如何安排、伊斯兰教法如何施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叙解军在没有正式宣布与萨拉菲主义决裂的情况下, 一步步掏空了它的教义内核。塑造这一转变的, 是叙利亚所处国际格局固有的种种约束、当地公民社会的韧性, 以及该组织自身的内部演变。其结果是, 某些萨拉菲派成分固然仍嵌在它的武装文化里, 却已不再界定叙解军的政治取向, 也不再决定它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萨拉菲主义：以纯洁压倒传统的斗争

116

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对待伊斯兰宗教信条的进路, 帮助穆斯林理解真主以及崇拜真主的方式。萨拉菲主义之名来自虔诚的先辈 (*Salaf al-Salih*), 即紧随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的前三代穆斯林。萨拉菲派坚持认为, 自己对真主根本属性的理解与早期数代穆斯林相同, 其他穆斯林则不然, 尤其是居于主流的艾什尔里传统: 其宗教信条因穆斯林涉足别的思想传统、特别是希腊哲学而发生了偏移。萨拉菲派用以自别于人的, 是他们强调严格的一神论, 并拒斥他们眼中伊斯兰内部那些非法的异端创新; 他们认为, 这些创新在《古兰经》与先知传统 (圣训) 中都找不到直接依据。几乎所有萨拉菲派都批评其他穆斯林进路并与之划清界限: 在他们看来, 那些进路要么全然不合伊斯兰、理应宣判叛教, 要么往好里说也是偏离了正道。

但萨拉菲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信条。它同时是一场社会运动,以千差万别的方式,力求净化它眼中伊斯兰里那些不正统的异端创新,力求回到伊斯兰的奠基性源泉。萨拉菲主义是一场植根于中世纪历史论争的现代改革运动,它起初主要受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hammad bin Abd al-Wahhab)及其继承者在沙特阿拉伯的成功事业的启发。这些人相信,穆斯林世界走向强大的道路在于净化伊斯兰,而不在于接纳非伊斯兰的“创新”。阿卜杜勒·瓦哈卜是“瓦哈比主义”一名的由来,这个称呼通常为其信奉者本人所拒斥;瓦哈比主义秉持对一神论的严格解释,为此拒斥拜谒陵墓、尊崇圣徒一类的种种做法。瓦哈比主义是萨拉菲主义的分支,植根于沙特的罕百里学派法学,它之所以声势大起,靠的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与沙特家族的结盟,而这一结盟正是沙特阿拉伯立国的基础。

萨拉菲主义并不规定任何明确的政治立场。萨拉菲派的态度从对穆斯林统治者始终如一的服从,一直到主张对其诉诸暴力反抗,跨度极大。这是因为,过去一个世纪里萨拉菲派不得不与周遭变动不居的世界打交道,并须相应地拿出回应。重大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与美国领导的联军结盟对抗伊拉克,并允许美军进驻本国国土。萨拉菲派的回应使他们分裂了。萨拉菲运动内部的知名学者,尤其是沙特教士阶层,为美军驻留沙特阿拉伯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萨赫瓦(Sahwa)即觉醒运动由此兴起:它不但反对美军驻留,还要求沙特阿拉伯内部推行更全面的改革。另一些萨拉菲派则选择追随沙特阿拉伯的引领,在全球推广萨拉菲派的进路,把宗教教育与宣教置于政治参与之上。只有少数萨拉菲派,例如科威特的萨拉菲派,早在九十年代就开始参与政治,当时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恰好变得有利。二十年之后,埃及的同道也步其后尘,同样组建了萨拉菲派政党。

117

萨拉菲运动内部主张暴力的那部分人——叙解军正是从中脱胎而出——是独特的亚群体,而非整个萨拉菲派共同体。这些暴力主张者目睹了阿拉伯世界在1967年对以色列的战争之后陷入衰弱,认定必须重

振其力量。在埃及和叙利亚，他们相信夺取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国家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批埃及和叙利亚武装人员转向阿富汗，在那里与其他为抗击苏联及其当地盟友而汇聚起来的阿拉伯战斗人员会合。这些战斗人员中有一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奥萨马·本·拉登。本·拉登受到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感召。这位巴勒斯坦裔穆斯林兄弟会知名宣教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如下主张而闻名：把穆斯林土地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是每个穆斯林个人应尽的责任。他极具感染力的主张推动了数千名新人的动员，他们远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支援当地圣战者战斗人员的事业。在阿富汗展开的这些论争与往来，最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促成了基地组织的建立。基地组织在九十年代不过是众多圣战团体之一，但其他圣战派在本国与本国政权作战的失败（尤以北非为甚），加上 9/11 事件的全球冲击，把本·拉登的组织推上了新世纪头十年圣战运动的最前沿。这为附属团体构成的全球网络的成形创造了条件，叙解军的前身支持阵线也在其中。

驯服萨拉菲派的核心原则

萨拉菲主义至今仍是叙解军宗教观点的关键，只是其领导层一直在设法剥去它的政治含义。叙解军的前身支持阵线，其成员或是在认可暴力之前就已皈依萨拉菲主义，或是在卷入暴力的同时接受了萨拉菲主义；前一种人里包括新世纪头十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许多领导人。该组织领导层至今仍坚持萨拉菲派宗教信条（‘*aqida*’）的若干关键教义，尽管萨拉菲主义的核心原则既不指导它的政治战略，也不规定它与社会的关系。

在伊德利卜的宗教版图中，萨拉菲派的教诲在若干重要机构留下了印记，如伊德利卜大学法学院、法特瓦最高委员会、教育部和司法培训学院。举例来说，该大学的法学院一直在讲授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信仰根基书》（*Kitab Usul al-Iman*），这是现代萨拉菲派的一部奠基性文本。2019 年叙解军接管该省之后不久，一名前学生就

坚称萨拉菲主义在学院内部与学生当中都有影响力：“叙解军在学院里和学生里都有心腹。是他们把运动里的宗教人物请进大学，而校长无从反对。”^①

萨拉菲主义起初影响了叙解军的武装文化，不过它当时就已经与政治考量纠缠在一起。有一本书可以说明这一视角，即《求学者的给养》（*Zad al-Talib*），作者是曾隶属叙解军的宗教学者阿布·叶海亚·法尔加利（*Abu Yahyaya al-Farghali*）。这本书并不正式代表叙解军的立场，却让人得以窥见几年前、即叙解军控制伊德利卜省之后流行的冲突认知。就核心而言，《求学者的给养》维护萨拉菲派的宗教教义，反对宗教中“应受谴责的异端创新”（*bid'a*）与多神崇拜（*shirk*）的残余，并主张弘扬萨拉菲派信条（*'aqida*）。

不过，政治考量在当时同样塑造着叙解军的宗教观点。《求学者的给养》是按叙利亚各宗教群体的政治立场来给神学敌意分类的。比如说，此书并不强调自己与那些认同传统伊斯兰的群体的宗教分歧，因为叙解军正谋求与他们结盟，尤其是与下层教士结盟。因此，艾什尔里派穆斯林与苏菲派并不是神学攻击的直接目标；恰恰相反，此书着力申明与他们联手对付共同敌人的正当性。反过来，此书在宗教上毫不含糊地敌视什叶派穆斯林与阿拉维派，转而指责什叶派穆斯林与阿拉维派在它看来支持了政权，同时用承自伊斯兰早期的一个词——哈瓦利吉^①派（*khawarij*，异端）——来谴责伊斯兰国。此书最后还宣扬萨拉菲派反对民主的传统立场，认为民主与真主立法的施行根本上不相容。然而，它对伊斯兰国家应是何种模样的看法却相对主流：它把这一问题安放在伊斯兰教法的最高原则即教法宗旨（*maqasid al-shar'ia*）之上，主张守护正义、公共福祉、保全生命一类普遍原则，而不主张僵硬地照搬律条。

119

① 哈瓦利吉派（*khawarij*）是伊斯兰早期从阿里阵营出走的派别，以动辄宣判他人叛教著称。后世逊尼派用这个名字统称“过激者”；叙解军斥激进对手为“哈瓦利吉派”，用的正是这层贬义。——译注

尽管如此,叙解军还是逐步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宗教进路,同时保留了萨拉菲主义所固有的对民主与世俗主义的神学反对。这一转变伴随着公共话语的形成,其根基是“教法政治”或曰“教法指导下的公共政策”(al-siyasat al-shar'iyya)这一概念,而这个概念与萨拉菲派最看重的中世纪学者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相关联。教法政治帮助叙解军在伊斯兰传统的框架内为务实的政治立场取得正当性。叙解军把冲突界定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势必要求作出某些妥协,以此为自己确定敌人主次的做法辩解。这些妥协并未被明白讲出,但其中包括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结盟,以及默认俄罗斯共同促成的索契协议一类安排。叙解军还限制了宣判叛教(takfir)这一概念的适用,以防成员个人滥用。叙解军的宗教学者转而强调,穆斯林在某些宗教事务上可能缺乏知识,因而应当为其“无知”获得“宽宥”。萨拉菲派常常借助“无知可恕”(al-'udhr bil-jahl)来避免过度施行自己的宗教见解。在叙利亚,这一说法既是与当地民众建立融洽关系的策略,也是一种机制,好让不同的宗教见解能在他们那个总体规划之内共存。讲授萨拉菲派宗教信条的伊德利卜教法学院同样强调各教法学派的重要性,其中对沙斐仪学派格外用心,因为该学派在伊德利卜最为通行。教法学院副院长认可这一做法,他说:

120 “我们正在积极寻找共同点,好让教学能够兼容并包。在我们中间,我们拒绝使用宣判叛教这个概念;谁也不能宣布别人不属于伊斯兰。”²

叙解军调整了做法,着手建立更有条理、更加制度化的内部宗教权威,以便进一步管住萨拉菲派的宗教话语。该组织实行了更明确的规范与程序来管理新宗教敕令的发布,把着眼点从神学考量转向程序考量。说到底,叙解军是想用制度规范和行政规范来疏导组织内部的异见之声。艾哈迈德·沙拉强调,“现在有一个人人都必须接受的总秩序”。³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一开始我们被迫接受异见的声音。但渐渐地,我们通过立规矩稳住了内部秩序。”⁴另一位叙解军重要宗教领袖、协商(shura)委员则补充说,如今“你可以裁断违法之举,而未必要去裁断那个想法本身。我们已经为讨论立起了一个框架。”⁵

这场旨在管住叙解军领导层眼中萨拉菲派“过头之处”的转变，是一步一步展开的。第一步是禁止在其教法委员会下设的法特瓦委员会的管辖之外使用宣判叛教 (*takfir*)，这实际上终止了成员对它的广泛滥用；同时禁止“在教法总委员会复核之前发布法特瓦与裁决”。⁶ 这些规矩有助于让异见之声噤声，其中就包括那些叙解军的前埃及籍教士；早先大叙利亚自由军开始与土耳其打交道时，他们曾与之划清界限。举例来说，阿布·舒艾卜·马斯里因“一再不尊重本组织的政策”而被开除，阿布·雅格赞·马斯里则因未能“公开遵守叙解军经由其领导层与教法委员会所定的框架”而被开除。⁷ 这些举措推动了教法委员会的叙利亚化。随后，该组织又在训练营中禁止了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的著作，并明白地谴责了他。⁸

叙解军成员所受的意识形态训练同样在攻占大马士革数年之前就改了方向：它不再着重灌输宗教规范，而更着重按一条特定的政治路线激发战斗意志，而这条路线仍是以教派语汇讲出来的。就在几年之前，叙解军还在用“努赛里” (*nusayriyya*) 和“拉菲德” (*rawafid*) 来界定冲突，这两个词是对正在攻击“黎凡特诸国的穆斯林与逊尼派存在”的阿拉维派与什叶派穆斯林的蔑称；在叙解军看来，这是“不信者与众先知追随者之间的一场战斗”⁹，在这场战斗中，“迷失者——*ahl al-batil*——无法容忍持真理者置身其间，因此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¹⁰ 然而，该组织已不再坚持圣战萨拉菲主义的那些核心概念，例如对穆斯林的忠诚与对非穆斯林的决裂 (*al-wala' wal-bara'*)、“不得求援于不信者” (*'adam al-isti'ana bil-kuffar*)、宣判穆斯林领导人叛教 (*takfir*) 以及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权威即伊斯兰主权 (*hakimiyya*)。¹¹

与伊斯兰国的对抗给叙解军队伍内部的激进声音施加了压力。激进主义若还留存，也越来越只局限于某些战斗人员，他们发现自己夹在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不过，这些激进分子受到了叙解军安全政策的约束，因为该政策专门针对涉嫌加入伊斯兰国的人。伊德利卜教法学院的一名前教授指出：

与伊斯兰国的冲突从战场转到了观念之争。他们过去自称同道兄弟 (*ikhwat al-minhaj*), 但在那场对抗之后, 危机就转移到了宗教观念的领域。观念开始变化。如今, 立场过硬的领导人会被指责为伊斯兰国化 (*da'ashana*)。¹²

这些动向使叙解军的新政治进路与其宗教教义之间出现了脱节, 后者的内核基本上原封未动。政治姿态的变化快于武装文化的变化。武装文化是意识形态身份得以表达的首要平台, 其惰性也更大。一名出身于与叙解军关系密切之家庭的活动人士几年前就表达过担忧: 过度改动内部宗教话语, 可能会把武装人员推向当时更激进的团体, 例如基地组织在叙分支宗教卫士组织, 甚至伊斯兰国: “把内部的宗教话语削减得太厉害, 风险就是武装人员可能溜到更激进的团体那边去, 比如宗教卫士组织或者伊斯兰国的细胞。宗教话语不能变得太快, 否则有失去社会基础的风险。”¹³

规范性工程的悬置

考虑到叙解军此前的意识形态倾向, 为什么它在完全控制伊德利卜之后, 反而渐渐不再为社会推行意识形态工程了呢? 它的前身支持阵线曾明确谋求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然而, 在 2024 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的那个局面里, 对宗教领域的管理已不再充当规范性工程的基础——那种工程意在把一整套特定的宗教价值与原则强加于社会, 而这些价值此前并不为民众所接受。¹⁴

尽管许多人怀疑叙解军是否真愿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 但在实践中, 该组织维持了神学上的正统, 却有意不去强制推行。这不单是悖论, 而是精心算计的战略决定: 伊斯兰化社会已不再是该组织的首要目标。基地组织指责该运动阻止其他组织作战, 叙解军的高级宗教权威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对此作出回应, 解释了他们何以放弃规范性工程:

叙解军从未宣称自己代表全体穆斯林的共同体 (*Jama'at al-muslimin*), 而这样的共同体本身是有权建立伊斯兰秩序的。我们不过是穆斯林中的一个团体 (*Jama'at min al-muslimin*)。是的, 目前确实没有全面施行伊斯兰教法, 也不可能有宗教秩序, 因为我们并不处在掌权 (*tamkin*) 的阶段。另一方面, 在北部各解放区, 确实有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在社会、安全、经济各个层面组织公共事务, 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改进自己的表现。¹⁵

显然, 在这位宗教学者看来, 推行伊斯兰主义的规范性工程需要一些伊德利卜并不具备的条件, 而阿通为了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 很小心地不把这些条件说得太确切。这套讲条件的做法, 为规范性工程留出了多重妥协的空间: 因战事仍在进行而暂停肉刑、把引起分裂的萨拉菲派概念边缘化、向本地的参照系即沙斐仪学派教法学靠拢, 以及接纳逊尼派内部的宗教多样性即苏菲主义。¹²³

霸权企图还从另一个方向搅乱了规范性工程: 霸主是在战略弱勢的处境中巩固自身的, 这迫使它去迁就民众的期待和要求。因此, 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看来,

我们的理念不是改造社会、让它跟我们的观点一致。即便在早期哈里发时代伊斯兰居于强势之时, 他们也没有用强力把自己的想法加于人。把我们的想法强加于人, 是违背我们宗教信条的。这正是伊斯兰国的问题所在。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是违背圣训的。伊斯兰国的问题不只是使用了宣判叛教 (*takfir*), 而是那套进路本身。¹⁶

他尤其从伊拉克的经验中得出结论, 认为“迫使社会遵从我们的观点并不是一个战略目标。每一次你试图让社会的观点与控制着它的组织的观点对齐, 结果都是失败。”¹⁷ 换句话说, 宗教领域正在变成与社会交易的空间, 而不再是支配社会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社会的观点往往压过组织的观点。在伊德利卜大学教法学院前院长、教法最高委员会中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之一阿纳斯·艾鲁特 (Anas Ayroun) 看来,

一切都始于一场自发的革命。此后，谁也不能把一个派系的想法强加给别的派系。你一个人是划不动这条船的。随着文人政府的建立，派系主义已经被超越了。我们正在从一个派系的革命，走向一场广泛的集体革命。那么我们就得同社会打交道。苏菲主义是大多数宣教者和普通公众所认同的宗教取向。人们真正操心的其实是别的事，我们不会去跟他们开战。¹⁸

除了制度化带来的连带后果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教训之外，还有一重对可接受度的算计，也化解了规范性工程。据叙解军一名领导人说，“最重要的是强调在我们这个地区管控冲突。我们不希望宗教制造麻烦。我们接受差异，以免在我们控制的地区引发冲突。”¹⁹ 这种对社会接受度的算计，处在支配性组织与它所领导的民众之间关系的核心位置。研究者伊丽莎白·楚尔科夫（Elizabeth Tsurkov）访谈过一批叙解军成员，据她说，

叙解军对民意的在意，表现在与治理有关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对阿萨德政权和国际体系的政策上。以治理为例，叙解军禁了吸烟，却因为这项禁令不得人心而没有强制执行。有好几次，叙解军迫于公众压力释放了批评过它的革命活动人士，这些人很受欢迎。叙解军还试图避免向民众征收重税，2019年不得不征税时，它允许抗议发生，动用暴力的程度相对有限。叙解军领导人与战斗人员的公开声明和内部通信都证明，他们对公众情绪相当敏感。²⁰

叙解军牺牲了把萨拉菲派规范性工程强加给民众的做法，转而把由生存与巩固的迫切需要所驱动的政治务实主义放在首位，但并没有把全部核心原则一并抛弃。怀疑者也许会说，既然并无正式的意识形态修正，这种悬置是很容易逆转的。他们的论点有几分道理，因为萨拉菲主义的核心目标本就是改造社会、“净化”其信仰。然而，正如后面几章所论证的，当时伊德利卜战略环境所施加的约束，加上叙解军自身优先事项的演变，早在攻占大马士革之前就已经使这样的规范性工程越来越不可能推行。这也意味着，规范性工程的悬置不只是暂时的，而是

可以长久维持的。换句话说,叙解军虽然没有谴责萨拉菲主义的宗教教义,却在实践中放弃了萨拉菲主义。

教法法典化:一项去激进化政策

在建立起行政体系之后,叙解军必须应对的难题是:如何经由救国政府治理伊德利卜的民众。该组织出自萨拉菲传统,而这一传统大体上拒斥伊斯兰教法的法典化,因为它把这个过程等同于实证主义的人为立法。萨拉菲主义强调的,反倒是依靠《古兰经》与圣训这类权威源泉,¹²⁵以及既成的教法学。不过,一旦掌了权,叙解军认识到需要更平衡的做法。它的领导人明白,清晰的行政架构是必需的,否则法官的裁量空间会过大,可能导致过度的自主性,并作出他们不愿见到的激进裁决。因此,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可预期、也相对稳定一致的治理体系。这一转变对当时围绕治理的宗教论辩影响甚大。

2021年6月16日,伊德利卜大学教法与法律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伊斯兰教法法典化的会议。²¹ 教法学院院长、法特瓦委员会成员阿纳斯·艾鲁特^①主持了这次活动,与会者有法特瓦委员会的宗教教士、救国政府司法部的官员,以及若干外国要人和教士。这场活动的意义不止于学术:它直接落实了该运动近年来推行的主流化政策。据2022年任宗教基金部(Ministry of Awqaf, 宗教捐产)部长的胡萨姆·哈吉·侯赛因(Husam Hajj Hussein)说,其目标是“一举了结关于教法法典化问题的经院之争,让法典化的原则取得正当性。”²² 据这位部长说,两种主张之间确实存在一场热烈的辩论。一方是个人解释即教法创制(*ijtihad*)一派,主张让法官依据自己对伊斯兰教法的知识来裁断。另一方则力图把伊斯兰教法定型为一部成法的经典文本,从而减少教法的经文歧义,进而减少法官的裁量权。他解释说:“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做法,因为我们没

① 原书对此人职衔前后不一:本章前文作“伊德利卜大学教法学院前院长”,此处作“教法学院院长”。译文照原书分译,不代为统一。——编注

有足够的创制学者 (*mujtahid*)。我们想要一个单一的参照点,因为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法官有时会彼此矛盾。”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法典化如今是一种必要,各方对此已有共识。这次会议是对我们从一开始就推行的总方向的支持,遇到的阻力很小。”²³

126

会议指出,法典化尽管利弊互见,仍属于教法创制 (*ijtihad*) 与教法指导下的公共政策 (*al-siyasat al-shar'iyya*) 的范围,而在叙解军及其盟友内部,赞成者与反对者都有。不过,会议还是谨慎地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教法的法典化是统治者的一项宗教义务,只要他们认为这有益于公共利益。”尽管有些萨拉菲派反对,认为法典化会使成文法本与超验者之间不再有任何直接联系,从而落入某种形式的实在法、甚至落入“蒙昧” (*jahiliyya*, 前伊斯兰时期的无知),会议仍然把伊斯兰教法必须法典化一事定了下来。

法典化教法的念头并不新鲜,它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奥斯曼人开始把伊斯兰教法法典化为一部综合性的成文法典,即《司法裁判汇编》(*Majalla al-Ahkam al-'Adliyya*)。他们由此把伊斯兰教法变成了一部固定的、自我指涉的法律文本。这次法典化取消了法律解释中对宗教学者的需要,因为《汇编》在设计上就是包罗完备、自给自足的。这部文本催生了一批专门受训于《汇编》的法律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把传统的伊斯兰学者挤到了一边。从这个角度看,奥斯曼式的法典化标志着超验性在法律框架中的消失。正是这一点,使法典化这个概念在伊斯兰主义者、尤其是萨拉菲派眼中成了问题,他们像十九世纪末的许多宗教学者一样对它心存疑虑。

会议连同叙解军领导层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立场,也就在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辩论中站定了位置:辩论的一方是主张伊斯兰教法法典化的保守派革命者,另一方是要求施行伊斯兰教法而不要特定法律框架居间的萨拉菲伊斯兰主义阵营。支持阵线时期起初拒斥法典化,叙解军后来逐步公开接受了它。这一转变不只是法律或行政决定,还牵涉叙

解军自身的身份认同。推动法典化,使叙解军与更广泛的叙利亚革命阵营靠得更近,而它此前是与这个阵营对立的。阿通回过头来这样看:

127

我们此前在 2012 至 2013 年对法典化的迟疑,与这个方案当时已经政治化有关。教法学家 (*fuqaha*) 内部有分歧,有人认为它是禁止的 (*baram*),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允许,但要符合与伊斯兰教法一致的若干条件。从前的这些分歧如今已经过时了。

法典化的呼声还从另一个方向带有政治含义,因为它是去激进化政策的一部分。从工具的角度看,把伊斯兰教法法典化,目的是约束或限制教法学家在法律领域中的解释权。据法特瓦委员会一位重要成员说:

“唯教法裁断” (*Tabkim al-Shari'a*),也就是单靠伊斯兰教法,这个说法太含糊了。伊斯兰教法本身就有歧义,留给法官的裁量太多;宗教事务往往会变成争执的由头。我们不要一大堆观点;我们也不愿把公正交到法官的解释手里,这是其中一种看法。^{①24}

限制独立法律推理即教法创制 (*ijtihad*) 的类似做法,也作为更广泛的官僚理性化努力与宗教教育范围收缩的一部分而出现。2017 年救国政府成立之后,它出台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宗教教育机构必须取得宗教基金部的许可。这套监管框架既及于人员——要求教职人员持有大学学历——也及于课程,强制统一教材,并要求所有机构一律采用沙斐仪学派教学法。此外,该部还对这些机构施加了内部规章。结果,许多机构被迫关闭,到 2021 年 10 月仅存 12 家还在运转。²⁵ 与此相类,协商委员会的阿卜杜勒·萨拉姆·卡西姆 (Abd al-Salam Qassem) 论证说,若不实行法典化,

① 原书此段引文末尾缀有“was one perspective”(这是其中一种看法),在语法上悬于引语之外,疑为作者的转述语误并入引文。译文照原样保留。——编注

我们就等于为极端分子 (*mutashadideen*) 打开大门, 让他们把自己的裁决强加于人。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 这正是我们要把伊斯兰教法典化的原因。而且, 由于受沙特思想影响的那些人抵制得厉害, 出现了一堵木头般的反对之墙——这些人反对实在法。我们治理的是一片经历过伊斯兰国和形形色色极端主义的地方。我们必须把这件事管起来, 免得埋下一颗定时炸弹。²⁶

在这套对抗激进主义的战略里, 法典化与重新恪守教法学派在统一的框架内协同发力。法典化的目标, 除了那层使叙解军与革命阵营站到一起、对抗圣战派与铁杆萨拉菲派的身份意涵之外, 还在于限制宗教教士的解释权。要达成这一目标, 就需要由它掌控的法律框架, 而叙解军把这套框架安放在沙斐仪学派教法学之上。决定实行法典化与正式承认沙斐仪学派两件事相隔不过数月, 这并非巧合。这一双管齐下之举, 意在限制解释的伸缩空间、约束法官适用法律时的裁量权, 从而巩固叙解军意欲建立的那套制度秩序的权威。

遏制激进主义与推进制度化这两个过程互相强化, 尽管这未必导致个人层面的去激进化。叙解军允许昔日的强硬派保留自己的信念, 条件是他们遵守新立的框架与新的规范。他们或许不会变成温和派, 但这一新格局有效遏制了他们作出更强硬司法裁决的能力与权限。

叙解军的优先事项并不是创制一套新的法律体系, 而是确保新规章合乎伊斯兰原则。该运动并未系统地把伊斯兰教法转化为统一而融贯的法律体系——这项工作叙解军既无力承担, 因为它缺少有国际声望的宗教学者, 也并未列为优先, 因为它的重心在别处。相反, 重点放在把司法部的旧通令改造成正式法律, 同时确保它们合乎伊斯兰教法。换句话说, 该运动并不指望通过把一整套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法典化来实现某种宗教标准化, 而是指望通过教法合规的逻辑来实现——这正是教法政治 (*al-siyasat al-shari'yya*) 的核心所在。据法

¹²⁹ 特瓦委员会一名成员说:

我们现在需要法律，所以法典化成了必要。我们寻求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法律框架。在酌定刑 (*ta'zir*) 方面，解释的余地很大。但涉及固定刑 (*budud*) 的法律条文时，它们是明文规定的，没有留下争论的余地。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一套完备的法律框架，我们估计这个工程要花上两三年。²⁷

法典化把伊斯兰教法嵌进正式文本，同时又把宗教学者挤到一边、让位于法律专业人士，因而使这一过程世俗化了；与法典化不同，教法指导下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性。这一进路让决策者得以吸纳伊斯兰原则，同时对法律与政策决定保留相当的控制权，而不必把权威完全让渡给宗教学者。宗教成了法律生产的规范性向导，却不再像法典化的哲学所设想的那样，充当法律的奠基性组织原则。不过，教法指导下的公共政策在平衡其两个组成部分时，本身仍是含混的。它既可能助长政治权威向宗教扩张的趋势、推动世俗化，也可能反过来促成政治的“宗教化”，使两者纠缠得更深。

法特瓦与教法政治：又一次偏离萨拉菲主义

救国政府倚重法特瓦最高委员会 (*majlis al-'ala lil-ifta*)，这个机构是叙解军在 2019 年 3 月初设立的，用以监督并规范公共宗教意见 (*fatwa*)。法特瓦是集体审议的产物。审议过程中虽有各种声音，法特瓦最高委员会的最终控制权却掌握在沙拉的亲近顾问手里。宗教领导权的这种制度化，意在进一步削弱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家的权威，并遏制组织内部残余强硬派的影响。

设立法特瓦最高委员会是一步有为之棋，为的是把范围广泛的学者请进来，包括苏菲派、艾什尔里派以及与其他派系有关联的教士。它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垄断法特瓦的发布权，而是建立一个具备强大正当性、能够确立自身无可争议之参照地位的机构。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看来，纳入各种被视为具有正当性的声音至关重要，这既可以表明决定反映了广泛的视角，也可以遏制强硬派的声音。

我们特意把所有人都请了来：苏菲派、艾什尔里派、与其他派系有关联的谢赫。我们的目标不是垄断法特瓦，而是建立一个有正当性、能够确立自身为无可争议之参照的机构。最高委员会的意见不多，却分量很重；它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不让人们去追随来自国外的法特瓦。尤其是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哈尼·西巴伊（Hani al-Siba'i）这些人的法特瓦。²⁸

该委员会充当了遏制异见的机制：把这些人纳进来，使宗教学者得以在委员会内部发表见解，其中既有本地教士，也有温和派教士。然而，他们的见解不再具备公共的权威分量，因为委员会终究还是处在沙拉亲信的影响之下。以制度化手段管理宗教话语，对该组织的领导层极为有用，尤其有助于推动人们接受土耳其的存在、争取对伊德利卜作战部队的支持，而这原本是该组织此前所拒斥的立场。

在2024年攻占大马士革之前，法特瓦最高委员会主要着力于就天课、斋月一类主题发布传统的法特瓦。²⁹叙解军并没有试图把这个委员会当成推广某种世界观、宣讲温和立场或弘扬萨拉菲主义的平台。自成立以来，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发布的意见相对不多，且主要涉及有共识的仪式性事务。³⁰一个例外是就《查理周刊》讽刺漫画所发的一份法特瓦。³¹

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实际上发挥着教法监事会的作用。这个由若干人组成的机构，以合乎伊斯兰的名义，确保立法过程以及当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符合他们对伊斯兰原则的理解。的确，正如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在谈到法特瓦委员会时所指出的，“目标是在反对派控制区建立一个宗教参照机构，它与教法学院、司法委员会等其他相关机构协同运作。”³²

法特瓦是权威性的但并非强制性的意见，由各政府部门在面临某项政治决定时、或在把法律提交协商委员会之前向法特瓦最高委员会

提出请求而作出。^①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法特瓦虽然归根到底是不具约束力的法律意见,却越来越嵌入这些国家的制度肌理,通过国家穆夫提、高级学者委员会、法特瓦委员会等一系列架构影响立法。叙解军启动官僚理性化的过程,效法的正是现代国家的做法。它由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发布的法特瓦之所以具有约束力,不是靠正式的法律义务,而是靠该组织的支配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发布的法特瓦从未被公开辩论、质疑或拒绝,这凸显了该组织对宗教与法律话语的控制。原则上,法特瓦是援引超验者的一种方式;但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确保合乎伊斯兰教诲的是沙拉的核心圈子即政治领导层,而不是一个按自身团体逻辑行事的自主教士机构。他们在政治谘议上所起的作用,往往大于在神学意见上所起的作用,并且经常参与引导新生的、相对缺乏经验的权力结构的政治与立法行动。

我们设法接触到了最高委员会在 2025 年之前向各部、部长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等行政与立法机构发出的大部分法特瓦。这些法特瓦格外有价值,因为它们反映了该运动领导层在内部对宗教规范与政治规范的表述。它们提供的洞察,不同于那些为外部受众精心准备的对外立场。

法特瓦种类繁多,涉及范围极广的宗教问题,有时还带有政治含义。举例来说,部长会议主席团就交通法请求发布的那份法特瓦,很快确认提交给法特瓦最高委员会的草案与伊斯兰教法并无冲突。然而,这份法特瓦更进一步,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有些明显带有政治性质。这些建议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法律各要点的措辞,以及建议罚款以美元或其等值的土耳其里拉计,以免因叙利亚镑崩塌而不断调整。这份

132

① 原书此句字面作“依据来自法特瓦最高委员会的请求、由各政府部门给出的意见”,请求方向与本章其余各处(各政府部门向该委员会提出请求、委员会应请求发布意见)正相反,疑为原书笔误。译文取与全章自洽的读法,谨此说明。

法特瓦还要求尽量少动用本已不堪重负的法院，并尽可能限制预防性羁押的适用。为此，它主张在法律中专设一节，规定哪些罪行需要逮捕并移送法院。其目的仍然是通过清楚划定法院的管辖范围，把诉诸法院的情形降到最少。

另一些法特瓦则平常得多，比如经济部就某些面包房在制作面包时掺混小麦与大麦一事所请求的那一份。答复是，不告知消费者即构成欺骗与欺诈；同时说明，只要告知了消费者，掺混本身并无问题。法特瓦最高委员会援引了先知的一段圣训，称基于透明、双方自愿的商品交易是受福佑的。³³

法特瓦对宗教依据的调用，立足于宽泛的一般原则。举例来说，对于允许当局限制商业自由一事，它有着根本性的保留。不过，裁量权往往留给主管当局，并鼓励它们依据决定可能对共同善产生的影响来作判断。换句话说，法特瓦敦促决策者行事时不必死守某些具体的宗教规范，比如限制药房执照的发放；有时还建议他们设立专家委员会。这一点在回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一份咨询时表现得很清楚：主席团就基本商品限价原则征询法特瓦最高委员会的意见。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并不反对这个主张。它认为限价符合穆斯林的公共福祉，也是一种通过防止操纵价格与侵吞资金来稳定市场的手段。它强调，定价务求公平，以保证卖方与买方双方的利益。

133

许多法特瓦请求涉及商业交易与市场监管，包括价格的界定、经营许可的施行以及反垄断政策的采行。各部所关心的问题，反映的正是新生行政体系的关切：它与其说是在为行使权力寻求宗教指引，不如说更着力于划定自己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法特瓦委员会的答复虽然是以许可与不许可的措辞给出的，其依据却是对宗教资源的宽泛调用。这些答复实际上更像是对公共政策介入的一番思量，而不是把当局的行为严丝合缝地校准到具有约束力的宗教规范上。总体而言，从这个角度看，法特瓦委员会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从后面领导”，而不是一种神权秩序。

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向各请求机构提出的建议值得留意。³⁴ 有时, 这些建议会重申宗教规范, 房屋租赁法就是一例。协商委员会想给租金设定上限时, 法特瓦委员会提醒他们注意财产权原则, 同时也承认协商委员会在危机时期保护租户的用意是有道理的。法特瓦委员会建议延长合同期限, 以减少涨租的机会, 同时不损害市场自由。与此相类, 法特瓦委员会出于维护商业自由, 反对供应部试图监管某些基本商品的利润率并设定上限。不出所料, 在许多涉及私有财产或消费者保护的咨询中, 法特瓦委员会所取的取向, 若放在别处大概可以称之为右倾保守主义。

另一些场合, 比如工会法那一例, 重点落在税收与收入制度上, 不是为了合乎某项宗教规范, 而是为了前后一致, 确保工会遵守“收缴的最终裁定”。在这类情形中, 一如向法特瓦委员会提出的许多其他咨询, 那些建议所涉及的并不是教法指导下的公共政策 (*al-siyasat al-shari'yya*), 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 (*siyasa*)。举例来说, 在讨论人道主义组织租赁合同法时, 法特瓦委员会禁止承租人转租, 以维护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有些激进的穆斯林主张这些非政府组织是“不信的” (*kufriyya*), 其资产可以取用或变卖。法特瓦委员会反驳说, 这些组织所持有的资产服务于公共利益, 因此不得剥夺它们的这些资产。他们还处理了货币贬值问题 (货币崩塌法), 即把货币的原始价值与合同期满时的价值相比较, 取中间值来计算差额。这一做法可以上溯到伊玛目艾布·哈尼法 (Imam Abu Hanifa) 的追随者那个时代。总体而言, 法特瓦委员会的建议往往越出宗教考量之外, 触及更广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他们对这些法律法规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宗教权威看来, 每一部法律都应当有伊斯兰的根据。不过, 纯粹的实在法照其本来面目被接受, 交通法就是一例; 按法特瓦委员会一名成员的说法, 条件是“它们不与某项具体的宗教规范相抵触, 而且制定该法有益于公共利益”。³⁵ 但他们的建议远不止于考量是否合乎伊斯兰教法原则, 而确实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涵盖全局的政治决策与立法过程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批文本中,唯一有强有力宗教论证作根据的法特瓦,是关于新冠病毒的那一份。部长会议在2021年9月向法特瓦最高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应当考虑强制接种疫苗。法特瓦最高委员会作了肯定的答复,但给出了一整套宗教论证。这份法特瓦首先承认,病毒的出现是寻常之事,是真主降下的对人类的考验。不过它强调,没有哪一种疾病降下时不带着相应的疗治之法。接着,这份法特瓦援引教法学(*fiqh*)的一条规则来说明,权威(*al-Imam*或*al-Hakim*)可以基于共同善的考量,正当对其治下之人采取措施。它重申必要性¹³⁵(*darura*)之说适用于此,意思是公共的必要优先于个人的需要。除了伊斯兰教法之外,作者们还援引了伊斯兰历史,举出圣门弟子之一阿布·乌拜达·本·贾拉赫(*Abu Ubaida ibn al-Jarrah*)的例子:他曾下令让人们分散到山中去,以遏制一场瘟疫的蔓延。另一条论据是援引全球性伊斯兰机构的看法,具体说是设在吉达、隶属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国际伊斯兰教法学院(*Mujama'a al-Fiqh al-Islami al-Duwali*)。此外,他们还给出了一条实际的论据:国际组织认可了这些疫苗,各大国也推广使用。最后,若还有任何疑虑,他们便援引一条教法规则:在两害之间存疑时,若能借此避开更大的危害,就应当择其轻者。结论以伊本·泰米叶的教诲收束,引述他的一句通则:伊斯兰教法的到来,是为了汇聚并增益福祉,同时防止或遏制败坏。

关于新冠病毒的这份法特瓦之所以既有厚重的宗教根据,也有非宗教的根据,是因为叙利亚西北部 and 国外的许多宗教人物反对其中一些拟议措施。有些宣教者曾主张,主麻日在清真寺的集体礼拜是必尽之责,有人甚至坚持每日五番拜功都必须在清真寺完成。此外,对新冠病毒及其来源的种种怀疑在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有,也在某些宣教者和部分民众中引起了共鸣。有人相信这种病毒要么无足轻重,要么按更极端的说法,根本就是一场旨在加害穆斯林的阴谋。

法典化的过程,也就是把通令(*ta'amim*)转化为法律文本并使法律合于伊斯兰教法的过程,主要集中在行政法领域。这是因为行政事务

处理的是最迫在眉睫、最实际的需要,即便这些需要往往琐碎平常。叙解军并未触及更有争议的领域,比如刑法。原因之一是刑法会要求引入伊斯兰的固定刑(*hudud*),而这些刑罚在《古兰经》中有明文。这些刑罚——例如石刑处死与鞭刑——极具争议,因为它们会同时招致民间与国际的强烈反弹。叙解军不愿施行这些刑罚,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后果的考虑;但该组织也无法公开否定它们,尤其是在其他伊斯兰主义者、萨拉菲派乃至圣战派看来,这些刑罚因《古兰经》有明文而被视为必尽之责。

136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刑法(*qanun al-'uqubat*)。我们靠的是若干通令和法官的判例。原因有二。第一,我们有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我们想先解决程序法(*qanun al-ijra'at*)。第二,刑法的施行必须基于一种目前尚不具备的环境。我们认为,没有稳定、主权与掌权,刑法就无从施行。³⁶

“法特瓦委员会”这个名称,尽管有其字面含义,却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严格由宗教驱动的机构。它固然带有宗教意涵,但伊德利卜的治理并不像伊朗的专家会议那样建立在“神圣裁定”之上。伊朗有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教士等级体系来评断法律是否合规,伊德利卜与之不同,并无教士政府。相反,是一小群与沙拉关系密切的决策者在监督政治与立法过程,并确保其合乎伊斯兰教诲,而不是一个按自身制度逻辑运作的自主教士机构。在立法领域,法特瓦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与地方层面对该地区的管理相对应。两者都是新生制度的支撑工具与控制架构,因为这些制度还太稚嫩、太缺经验,无法独立运转。从这个角度看,重心更多在权力而不在宗教,尽管权力的策略有时也会倚重宗教原则。

这些年来,驱动叙解军各项决定的主要是政治考量,只有为数不多的决定明确诉诸宗教的超验性。不过,叙解军回避了法律建设中最可能引起争议的领域——刑法——既出于政治原因,也因为施行刑法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与国际反响。这种审慎的做法依靠精心的平衡:叙解军有选择地适用宗教原则,却把某些法律领域的复杂难题悬置未决,尤其

¹³⁷ 是那些涉及严厉刑罚或有争议后果的领域。这种战略性的含混,使叙解军得以在宗教权威与政治务实的微妙交界处周旋,同时在自身队伍内部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不断变动的态势面前保持灵活。

与萨拉菲主义的静默决裂: 教义与权力的潮向变动

叙解军是第一个完全接掌治理的(前)萨拉菲派组织,这标志着它与以往萨拉菲派的政治经验彻底分道扬镳。这也不同于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沙特模式:在那里,权力始终握在沙特家族手中,萨拉菲派教士、宗教机构与宗教警察在国家之内虽有分量,却处于从属地位。

政治实践深刻重塑了叙解军的萨拉菲主义,其途径不是直接否定或意识形态上的驳斥,而是逐步掏空它的核心原则。该运动并未公开与那些奠基性教义正面冲突,而是务实地把它们撂在了一边,让自己的教义去迁就治理的约束、本地的实情与战略上的迫切需要。这一转变并未导致对萨拉菲主义的公开弃绝,而是导致了它的稀释,因为政治上的必要已经压过了僵硬的教义纯洁。

这一转向源于领导层刻意的努力:防止意识形态上的过头之举,并务实地与社会打交道。这场转变的影响在几个关键领域清晰可见: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对待教育与治理的方式,以及叙解军与非萨拉菲派的交往。传统的萨拉菲运动往往强加对伊斯兰的僵硬解释,叙解军与之不同,它调整自己的宗教立场以适应政治现实,塑造出远比别处萨拉菲派更为灵活的治理模式。

与萨拉菲主义的第一处分歧,涉及它对待教育的方式,以及通过净化信仰与宗教实践来全面改造社会的主张。这一转向在教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叙解军虽然保留了宗教教学,但宗教教学只占少数、且有意设了上限,占主导地位的是世俗教育,这与经典的萨拉菲派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¹³⁸

此外,叙解军对教师和教材几乎不加控制,这就与传统萨拉菲模式拉开了更大距离,因为后者把教育中的宗教监管放在首位。叙解军把

教育委托给外部行为者,并限制私立宗教教育,确保它不与公立教育争夺地盘,而只作为次要的“宗教替代选项”存在,类似别处的教法中学(*Thanawiyya al-Shar'iyya*)模式;叙解军由此显示出非萨拉菲派的教育进路。

这一意识形态转向在该运动对待宗教教育的方式上同样显而易见。如我们此前所论,教法学院选来讲授教义的那本书《盟约:信仰支柱 教法学导论》,提供的是一个宽泛而有弹性的神学框架。同样,供战斗人员使用的意识形态训练手册也反映出,严格萨拉菲派的概念影响力在下降,比如对穆斯林的忠诚与对非穆斯林的决裂(*al-Wala wa al-Bara*)。在大学层面,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信仰根基书》(*Kitab Usul al-Iman*)已不再是各学院的基础课(*mada asasiyya*),只在教法系内部讲授。取而代之的是大马士革艾什尔里派学者穆罕默德·哈桑·哈班纳卡(*Muhammad Hassan al-Habanaka*)所著的《伊斯兰信条》(*al-'aqida al-Islamiyya*)。这进一步表明它正远离僵硬的萨拉菲教义,转而采纳中间化的意识形态重组。

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压力也松弛下来。举例来说,妇女们注意到,昔日在市场上强制推行道德规矩的道德警察即风纪监察^①(*hisba*)队已经不见了,对全身罩袍的强求也取消了。在斋月末与本地记者的一次交谈中,艾哈迈德·沙拉表示,唯一需要强制执行的规范,是那些在穆斯林中有广泛共识的规范,而这实际上就是主流的定义。在政治上,这体现了一次战略转向:他把温和的多数派的参照框架置于激进派系的参照框架之上。他强调习俗是一个正面的参照点,更加强了这一取向。然而,把权威赋予多数人的做法,也就挑战了萨拉菲派的一条核心原则:在萨

① 风纪监察(*hisba*)本是伊斯兰法中“劝善戒恶”的集体义务,历史上由市场监管官(*muhtasib*)执行,兼管度量衡与市容风纪;当代伊斯兰主义政权多把它落实为道德纠察机构。——译注

拉菲派看来，通行的传统不是可循的规范，而是在净化信条 (*tanqiyya al-mu'taqad*) 这一要求之下有待改造的对象。

139

既然不再着力于教育，对生活方式的压力也减轻了，叙解军也就同时远离了萨拉菲派对待社会的第二根支柱：净化教义 (*tathir al-mu'taqad*) 与摒弃应受谴责的异端创新 (*nahi 'an al-munkar*)。这一转向在民间伊斯兰传统的复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传统把本地文化、宗教与神秘主义伊斯兰的成分糅合在一起。

该运动领导人的表态与其更广泛的宗教政策相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不再持萨拉菲派对主流宗教性的传统疑虑，转而主张对正当宗教实践作更具包容性的界定，接受“除哈瓦利吉派与道团主义 (*turuqiyya*) 之外的一切”。³⁷ 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加论述的，就连道团主义的做法——比如拜谒陵墓——如今也不再受到惩处，

140

甚至还出现了复兴。

第六章 面向苏菲主义的热月开放

141

把旧日的萨拉菲派世界观掏空，不只是一次意识形态的转向，也是一步精心算计的政治棋，是一场押在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间伊斯兰”身上的“热月赌局”。这一战略上的重新定位，反映出该组织有意向那些更宽广、更扎根于社会的宗教潮流靠拢，而不再向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靠拢。这一转向在哪里都不如在该组织与苏菲主义关系的演变上表现得那样清楚。苏菲主义一度受它怀疑、甚至受它敌视，后来大叙利亚解放军（HTS）却开始与之打交道、容忍它，甚至把它当作制衡政治萨拉菲主义的砝码来用。这一转变凸显了一场更大的重组：一面向主流的宗教情感靠拢以巩固自身的正当性，一面同时化解潜在的意识形态挑战者。

对苏菲主义即伊斯兰神秘主义的管理，为理解叙解军如何与地方社会打交道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它是再地方化这一三步过程的试验场：倚重沉默的大多数、社会性的惰性，以及社会的重新抬头。要把握叙解军如何管理苏菲主义，就必须考察 2011 年以来整个革命时期苏菲主义的轨迹——它的关键人物、它的门徒（*murids*）与它的仪式。因此本章聚焦于叙解军进入热月阶段之后、尤其是 2017 年以来苏菲主义的变化：那时它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萨拉菲抱负与革命抱负，把意识形态推倒成一块白板^①（*tabula rasa*），转而务实地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打交道。

① 白板（*tabula rasa*）是拉丁语“刮净的蜡板”，此处指把既有社会秩序与民间信仰彻底涤除、从头写起的革命构想。——译注

142 第一,这一转向是叙解军更大范围的再地方化的一部分,也表明它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社会惰性:一种宗教取向,多年来一直为叙解军昔日的倾向所谴责、在意识形态上遭排挤,如今却在当局那里逐步重获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容许的仪式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这一开放同时是一项精心算计的政治战略,意在借重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路数与苏菲主义两方面的性质都合得上:它既是一种直觉性的宗教感,又是一股被迫转入地下的潮流。这一战略转向发生的背景,是一波激进民粹主义正试图借 2024 年那场空前的、针对该运动领导层的抗争浪潮重新抬头。

革命之前:作为直觉性宗教感的苏菲主义

苏菲主义本身并不足以概括民间伊斯兰,但它在历史上一直在其中起着深刻的结构性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伊德利卜有“小爱资哈尔”之称,此名取自埃及的那所大学与清真寺,因为该省有许多学者赴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宗教机构求学。据一位苏菲派谢赫说,“2011 年之前,苏菲主义处在伊德利卜社会大多数人的直觉性宗教感(*tadayyun wijdani*)的核心。”¹

不过,阿勒颇长期是苏菲教团的一大中心,这些教团在奥斯曼时代兴盛,并借胡特谢赫(*shaykh al-Hut*)等人物而扎根甚深;伊德利卜则不然,省内缺少与特定崇奉场所、扎维叶(*zawiyas*)或泰凯(*tekkes*,苏菲道堂)相联系的知名苏菲人物。除哈拉夫·阿布·哈穆德(*Khalaf Abu Hamoud*)谢赫的扎维叶之外,伊德利卜再没有拥有此类中心的重要苏菲人物。据托马斯·皮埃雷(*Thomas Pierret*)说,这可以用向上攀升的抱负来解释:哈松家族(*the Hassouns*)与萨利姆家族(*the Salems*)这样的宗教世家都是纳巴哈尼的门徒,随着地位上升而为阿勒颇所吸引。²

其结果是,苏菲实践中那些崇奉性的方面——例如门徒对谢赫的圣化,以及到圣徒陵墓求取其福佑(*baraka*)——在伊德利卜似乎不像在阿勒颇那样普遍。这一点得到了对伊德利卜教士与学者访谈的佐证。³阿卜杜拉·巴拉卡特(*Abdallah Barakat*)谢赫证实了这一区别,他

说：“苏菲主义在阿勒颇比在伊德利卜强得多。它也更传统。在阿勒颇，门徒（*murids*）会亲吻自己的谢赫，从触碰中求取福佑（*baraka*），甚至亲吻他们的手。这类做法在伊德利卜是不可想象的。”⁴

然而，八十年代初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对抗，导致宗教志业大为衰落。一位门徒回忆说：“兄弟会遭屠杀、扎维亚山遭清剿之后，人们对公开表露宗教性真的害怕起来。当谢赫成了冒险的事，连去清真寺都很危险。”⁵

九十年代，国家对宗教人士的种种限制逐渐放宽。巴沙尔·阿萨德上台后，宗教基金部部长开始正式造访，政府也给了宗教人物、尤其是苏菲派更大的活动余地。这十年间，宗教聚会大量涌现，扎维叶也扩展开来。先知诞辰（*Mawlid al-Nabawi*）的庆典在大多数清真寺恢复举行，苏菲派谢赫也越来越多地受邀为新生儿祝福。阿卜杜拉·巴拉卡特谢赫说：

那时候人人都参加集体庆典（*hadra*），人们会请苏菲派谢赫来给新生儿带来福佑。当时有一种深深浸透了苏菲仪轨的民间宗教性，尽管明确自认是苏菲派的人并不多。反过来说，除了少数几位知识分子和谢赫的弟子，没有人谈论应受谴责的异端创新（*bida'*），也没有人在苏菲派与萨拉菲派之间作区分——这类划分当时根本无关紧要。⁶

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苏菲教团是里法伊教团、卡迪里—纳格什班迪教团和沙兹里教团。不过，这次苏菲主义的回潮带有很强的改革派色彩。“政权给了他们相当大的空间，因为他们不搞政治，”阿卜杜拉·巴拉卡特谢赫解释说，“许多与苏菲主义有关的学者信奉一种改革派传统，对传统苏菲实践中那些较为神秘的层面，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公开反对。比如纳菲阿·沙米（*Nafia al-Shami*）谢赫就拒斥把教士圣化，而那正是某些苏菲传统的标志。”⁷与之相类，穆罕默德·桑达尔（*Muhammad al-Sandal*）谢赫是穆罕默德·纳巴哈尼（*Muhammad al-Nabahani*）的门

143

144

徒,他力图传播剔除了民间伊斯兰所附着的迷信成分的宗教知识。他的一位孙辈本人也是苏菲派,他解释说:

他到乡下去传播一种宗教知识,其中剥除了他认为不合伊斯兰的种种做法。他的目标是革除多神崇拜与他认为并非宗教的传统习俗。他采取的是改革派的进路,志在净化教义。他的苏菲取向与以物配主的倾向完全划清界限,只依凭圣训与《古兰经》,而不依凭各教法学派。⁸

一位谢赫认为,由于穆罕默德·桑达尔谢赫和哈拉夫·阿布·哈穆德谢赫这类有影响力的教士十分活跃,伊德利卜的改革派潮流大大削弱了本地苏菲版图中的神秘主义倾向。

革命激进主义的阴影下:苏菲主义在伊德利卜的隐遁

革命骤然终结了九十年代开始的那一轮不大的苏菲主义复兴,代之以三种主要形式的重新压制。第一,以苏菲取向著称的公众人物承受的压力陡增。第二,苏菲门徒分化了——有些人被迫沉默,另一些人则在胁迫之下加入武装抵抗,往往要以牺牲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为代价。第三,苏菲仪式基本上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革命起初并非由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纲领所驱动,但它的军事化很快强化了萨拉菲派的主导地位。与反殖民的圣战或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早期阶段不同,转入武装斗争把苏菲派边缘化了。除两个团体外,苏菲主义并不是任何派系的参照系:一个是哈马的阿布·阿莱曼旅(Liwa Abu al-‘Alamein),这是一支苏菲派系,后来迁到阿勒颇省西部并更名为苏菲运动(al-Haraka al-Sufiyya);另一个是苏菲自由人联合(Tajamu ‘Ahrar al-Sufiyya),由奥马尔·拉赫蒙(Omar Rahmoun)领导,此人后来投奔政权,成了一名激烈的反革命宣传家。

¹⁴⁵ 圣战派奉行萨拉菲式的伊斯兰进路,在这一轮对苏菲主义的重新压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日增的影响力不只见于战场,也见于社会领域。圣战派谴责拜坟者(*quburiyyun*),即那些崇奉圣徒陵墓的人,也谴责哈德拉之类的苏菲仪式,那类仪式讲究灵性的沉浸与同神圣者的

交融。这些团体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训练课程 (*dawrat shar'iyya*) 对本地的年轻战斗人员影响甚大。圣战派沿两条线拒斥苏菲主义: 他们把苏菲主义说成是对伊斯兰的教义偏离, 又说它因被视为与政权相勾连而构成政治上的负担。阿卜杜拉·巴拉卡特谢赫解释说:

随着时间推移, 萨拉菲派逐步确立了对自由叙利亚军各派系的主导地位, 萨拉菲主义也随之变硬。它的领导人把 2011 年之前所有学宗教的人, 哪怕是那些参加了武装斗争的人, 都一概视为骨子里的苏菲派——一个到圣徒坟前求福佑 (*baraka*)、同情政权、因而有教义偏离之嫌的人。⁹

苏菲派的神秘实践还惹来了意识形态上亲近什叶派的嫌疑。据穆罕默德·桑达尔之子说, “各派系把苏菲派看作接近什叶派的拜坟者。这是因为他们崇奉圣徒陵墓。许多神秘主义团体的人遭到杀害, 尤其是死在伊斯兰国手里。支持阵线也处决过一些人, 但主要是在阿勒颇。”¹⁰

在起初与自由叙利亚军关系密切的宗教学者哈桑·杜盖姆 (Hassan Dugheim) 看来, 战争壮大了萨拉菲主义:

战争期间, 一些国家向萨拉菲派提供支持, 而苏菲派求的是安稳, 基本上没有卷入武装斗争。结果, 萨拉菲主义借这场冲突壮大起来。它很快占据了政治空间, 主宰了媒体, 并把自己强加给各武装派系。¹¹

据穆罕默德·桑达尔谢赫的一位孙辈说, “过去自认是苏菲派的人, 多数都退了出去。2012 年以来, 伊德利卜就见不到苏菲主义了。没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是苏菲派, 因为怕遭各派系报复: 每一个团体或多或少都受了萨拉菲主义的影响。”¹²

苏菲主义的这次隐遁有三种主要表现。第一, 苏菲派的教士人物 (*ulama'*) 退出了公共生活。有些人被政权传唤, 要他们离开反对派控制区。另一些人同情反对派, 却仍记得八十年代的大屠杀, 担心国家会再掀起一轮针对宗教人物的镇压。有些人选择留下, 却选择了沉默。最好的情形是, 穆罕默德·桑达尔谢赫这样的人物还会受各派系咨询, 但

只要与苏菲主义、甚至只要与艾什尔里派——那是萨拉菲派之外最主流的宗教信条理解——沾上关系，关系终归还是要断的。

第二，这种压制表现为门徒 (*murids*) 在意识形态上的迎合或沉默。他们深深分裂为两种应对：或退入不问政治的沉默，或投身革命斗争而付出神学与教义上让步的代价。年龄在这一分野中起了关键作用。桑达尔谢赫之子解释说：

年长者退入沉默，把自己关在家里。与此同时，许多年轻门徒与武装团体作了妥协。有些人以教法官 (*shar'yyin*) 的身份加入，另一些人成了战斗人员。有些人是出于复仇的心思，尤其是那些家人在八十年代反穆斯林兄弟会的屠杀中受过难的人。然而，这些门徒一旦进了武装派系——那里萨拉菲主义压倒一切——就抛下了自己原来的意识形态，转而附和一种主流化的萨拉菲主义。¹³

最后，对苏菲主义的压制导致其仪式消失。清真寺里的记主 (*dhikr*) 不见了。以苏菲仪式庆贺新生的做法零星延续，却只在私宅之内。所有圣徒陵墓都被毁掉，扫墓祭祖也彻底停止。

社会惰性：隐遁十年之后，苏菲主义的回归

尽管在战争期间遭受压制与边缘化，苏菲主义还是通过两种机制重新抬头。第一，它借社会惰性回潮——所谓社会惰性，是指既有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即便经历压制期也仍然存续的那种倾向。随着萨拉菲派的影响力随叙解军崛起而消退，苏菲主义获得了更多容忍，得以在基

¹⁴⁷ 层逐步重建自身。第二，叙解军主动促成了它的复兴，把这当作一步争取沉默的大多数的战略棋，为它经由政治渠道、自上而下地回归铺平了道路。

苏菲主义的重新确立，并不是随 2019 年救国政府的出现而立刻发生的。倒不如说，它同我们在第八章分析的那个消费主义公共领域的发育一样，是由停火与武装冲突的结束所塑造的。新冠疫情又推迟了这场

复兴，直到 2021 年至 2022 年间它才充分显现出来，最初表现在仪式实践的领域。

举例来说，一位谢赫注意到，人们重新有了请苏菲派谢赫出席阿基卡 (*aqiqa*) 仪式的需求，那是为庆贺孩子出生、婚礼或其他喜庆场合而举行的宗教与音乐庆典。这类庆典不同于寻常的音乐表演，其中有宗教颂唱与赞词，并以手鼓 (*mazhar*) 击节相和。人们相信，苏菲派谢赫在场能给聚会和与会者带来福佑，此外也有助于这些宗教颂唱的完成。

另一些人注意到集体仪式诵念 (*majalis al-dhikr*) 与各种崇奉性聚会的复兴，比如共同诵念真主的尊名与宗教赞诗。这类活动吸引了数十名门徒与求学者 (*tullab al-‘ilm*) 到场，据说私人场所的聚会人数在 80 至 150 人之间。不过，这些聚会既不隐秘也不遮掩；相反，它们是公开通告的，标志着苏菲教团、尤其是里法伊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和赫兹纳维教团的谨慎复兴。在受萨拉菲主义影响较小的迈阿赖特努阿曼地区，苏菲派的灵修聚会 (*hadral*) 也回来了。

在更公开的层面上，先知诞辰 (*‘Aid Mawlid al-Nabawi*) 的庆典自 2011 年以来完全绝迹，却在 2024 年胜利之前的两年间重新出现。苏菲传统的线上与线下教学也恢复了，人们重新讨论起西拉杰丁 (Serajeddine) 谢赫的著作、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 (Ibn Sina/Avicenna) 的《治疗论》(*Kitab al-Shifa’*)、安萨里 (al-Ghazali) 的《圣学复苏》(*Ihya’ ‘Ulum al-Din*) 这类经典文本。伴随这场集体仪式实践复兴的，是苏菲取向的宗教机构一直照常运作，比如伊玛目脑威学院和侯萨里谢赫学院 (Shaykh Hussari Institute)，这两所学院多年来始终活跃。

148

苏菲仪式的重新抬头并非没有阻力。一些保守的宗教学者 (*ulama’*) 批评这场复兴；正如一位谢赫所说，“凡是有相当社会基础、又以有灵性洞见 (*mutabasir*) 著称的谢赫，都在监视之列”。¹⁴ 这番话点出了苏菲主义回归时始终存在的谨慎：它大体上仍是私下的、有节制的。

这场借社会惰性而来的回归，第二个方面是苏菲派在宗教机构中的存在日益增强。这一点在伊德利卜治理机构内苏菲派学者影响力的

增长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一位本地教士说,宗教指导委员会(*al-majlis al-shar'i*)就已经越来越向苏菲派的观点敞开。¹⁵此外,领导层面也存在密切关系:据说伊玛目脑威系列学校的负责人就与叙解军领导层关系密切。

从苏菲派机构毕业的学生也在稳步进入更广阔的宗教版图。仅伊玛目脑威学院一家,在反对派控制区就有 55 个分支,培养出大量学生,他们随后到伊德利卜和阿勒颇各大学的教法学院深造。这些毕业生中许多人此后成了清真寺的伊玛目,据一些本地教士说,他们近来开始组织记主聚会。¹⁶据估计,这些地区约 40% 的主麻日布道者持苏菲取向。¹⁷

一位谢赫这样概括这一现象:

说到底,人天生就倾向苏菲主义。他们喜欢庆典——一个男人结婚,谢赫来领着做记主、唱颂歌(*an'ash'id*),这就是文化肌理的一部分。这里的人浸润在这一传统里;他们默认就是穆斯林,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苏菲派。¹⁸

斋月报晓人(*misaharati*)负责在斋月里唤人起来做晨礼;说书人(*hakawati*)讲述《安塔尔·本·沙达德》(*Antar Ibn Shaddad*)或《贝尼·希拉勒》(*Beni Hilal*)这类传奇史诗;颂唱者(*munshideen*)是宗教赞歌的歌手,在婚礼、割礼与斋月结束时演唱:这些角色在过去两年里都出现了显著的复兴。¹⁹此前在公开冲突的那些年里,包括支持阵线在内的许多派系都以从事异端创新(*bida'a*)为由,大体上压制了这些文化传统。沉默了十多年之后,这些传统随着叙解军巩固权力、自 2019 至 2020 年起日益掌控宗教领域,以及该运动内部激进分子遭排挤,而重新浮现出来。伊德利卜的一位斋月报晓人解释说:

一开始,我们也被指为搞异端创新(*bida'a*)。许多激进分子四处追捕我们,有的自称是伊斯兰国的人,有的自称是支持阵线的人。但如今这些派系都解散了,秩序有了,我们也有了新的回旋余地。不过我们

跟主事的人开过会。我们向他们说明，这是我们做了很久的营生，我们想干这个，他们理解了，也就慢慢接纳了我们。²⁰

同样地，这位颂唱者（*munshid*）讲述了自己与叙解军所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打交道的经历：

我们跟当局打了交道。这些当局说他们代表人民。可人民想要的是我们的颂歌（*anashid*）。家家都有烈士，都想重新活起来。我们跟宗教事务部谈过。三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我被保安关了几个小时。但从那以后事情就平息了，颂唱者又被容忍了。²¹

其他一些此前受萨拉菲教条挑战的宗教实践领域，也悄然而显著地回来了。上坟在 2021 年之前完全禁绝，后来逐步恢复，起初还很低调，随后越来越公开。2024 年，多年来第一次有大批妇女参加，这在 2022 年还是不可想象的。²² 与之相类，“有担当的音乐”（*fan hadif*）——一种带有道德与保守主题的现代音乐门类——也重新出现。²³ 曾被迫转入暗处的录音棚重新正式登记，标志着宗教与文化版图上更广的一次转变。叙解军不只是接受了传统伊斯兰，还主动对它加以规管。

150

举例来说，就斋月报晓人而言，当局给个人登记造册，划分地段，还过问仪轨细节。同样地，对颂唱者，该部会审定他们演唱的颂歌。换句话说，叙解军一度以伊斯兰中的非法创新（*bida'a*）之名与许多民间伊斯兰实践作斗争，此后却不只容忍它们，还介入其内容，为这些传统定框并使之制度化。叙解军不再置身民间伊斯兰之外，而成了塑造它的积极参与者，把自己嵌进了它一度想要管控的那片宗教版图。据伊德利卜一位上了年纪的斋月报晓人阿布·阿卜杜（*Abu Abduh*）说：

去年我决定把塔布拉鼓（*tabla*）、塔尔图拉帽（*tartoura*）和阿拉伯民间服装都拿出来。我带上我的车、一匹马和一个孩子，一点一点把这些传统重新亮出来。我得从宗教事务部拿到许可，包括我要说的词，还有马和车的使用，不过办得很顺当。很清楚，叙解军现在是鼓励传统和仪式的，好跟老百姓走得近些。²⁴

据哈桑·杜盖姆说，“苏菲主义这次重新抬头，并不是谁筹划或操办出来的。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没有一项刻意扶持苏菲主义的政策。倒不如说，苏菲主义正在自然地重新融入叙解军控制区内正在成形的各种机构。”²⁵

哈桑·杜盖姆说苏菲派伊斯兰这次重新抬头有很强的自发成分，这话不错；但并非一切都是自发的。它同时也是倚重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热月式政策的结果。

押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热月赌局

因此，苏菲主义的这次重新抬头，并不只是社会在革命与武装斗争的势头压制了将近十年之后想要夺回空间；它同时也是伊德利卜由叙解军主导的新当局刻意推行的政策。在 2024 年攻取大马士革之前，¹⁵¹ 这项政策在两个层面上运作：第一，拓宽可接受的宗教表达的边界；第二，把苏菲主义当作制衡好战的反叙解军萨拉菲主义的一股力量来运用。

边界的拓宽有几方面的表现。举例来说，布道者培训学院此前不愿与苏菲派打交道，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借重他们，经手人是穆希丁 (Mohi al-Din) 谢赫。另一个清楚的例子是辅士书店 (al-Ansar Bookstore) 老板的遭遇，此人信奉苏菲主义。2024 年，令他大为惊讶的是，伊德利卜书展允许他的书店推广 3000 册传统派书籍，其中包括《圣训派与教法派之间的苏菲主义》(*Al-Tasawwuf Bayna Ahl al-Hadith wa Ahl al-Fiqh*) 这类论苏菲主义的标志性著作，该书探讨苏菲主义、传统伊斯兰学问与教法之间的关系，为苏菲主义是伊斯兰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辩护。据一位苏菲派谢赫说：

救国政府的建立大大改变了我们的处境。新政府的领导层想显得开明。宗教事务部部长一直频繁会见有苏菲取向的布道者和宗教学生。他们得以诉说自己的委屈——提到过去仅仅因为是苏菲派就被指为杀人凶手，或者苏菲身份被与支持政权混为一谈。救国政府到来之

后,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开放,但确实看到容忍的余地在扩大。他们想给人一点喘息的空间,如今也允许了一些以前所拒斥的仪式。²⁶

不过,这一转向不只是容忍度提高的事;它同时反映出一项精心算计的政治战略,即动员沉默的大多数来对付那些更敢发声的激进派系与异见派系。2024年夏末,在数月的反叙解军民众骚动之后,当局——据说是应了该运动最高教士的请求——下令所有未登记的苏菲学院办理正式登记。起初,这些学院的负责人把此举视为压力,担心它是由谋求施加控制的保守派系推动的。然而他们后来惊讶地发现,这次行政上的规范化并未附带教义上的限制。在一位重要的苏菲派宗教人物看来,

152

我们表示愿意照办,但担心政府干预我们的教学方法。然而这并没有发生。登记我们的学院没有附加任何意识形态条件,我们得以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的教学。我们一贯的立场是,不因教义分歧、礼拜方式或多神崇拜(*shirk*)与叛教的指控而制造分裂。我们强调,要把力气放在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上——也就是革命——而不要因宗教问题而四分五裂。²⁷

尽管当局并未正式确认,涉事者仍把这种教义上的开放视为政治算计。一位谢赫是这样说的:

当局很看重苏菲派没有参加针对他们的抗议这一点。苏菲网络里的多数年轻人力求缓和紧张,也不像萨拉菲派那样挑衅或号召上街示威。相反,他们始终强调,一致反对政权必须高于一切。

开放并不意味着教义争端得到了解决。叙解军曾因某些布道者与苏菲主义有牵连而将其免职,后来又在伊德利卜宗教学者联盟(League of Ulema)之类机构的压力下把他们复职。苏菲派的宗教学生(*tullab al-‘ilm*)则面临放弃崇奉性舞蹈的压力,不从者要受处分。在阿里哈,当局曾试图强制要求宗教学生取得官方许可才能公开布道,但苏菲圈子对宗教事务部施加压力,这项决定又一次被推翻。至于上坟,则仍在

继续，只是以一种“去苏菲化”的方式：比如在坟上系线（*rabt khutt*）这一传统做法就没有重新出现。

归根到底，对苏菲主义的政策是两可的：既给了有限的灵活，又仍然设有种种限制。伊德利卜的宗教当局也发出过警告，要求限制苏菲教团的活动，尤其是大型聚会形式的活动。苏菲派学院的宗教学生能否在宗教基金部谋得正式职位，则取决于他们介入神秘性宗教实践的程度。

正如一位谢赫解释的，“如果他们以从事某些做法著称，比如朱奈德（*al-Junayd*）的苏菲主义、吉拉尼（*al-Jilani*）的苏菲主义，或者向圣徒求援（*istighatha*），那他们就得不到正式的公职。”从苏菲派谢赫的角度看，对这次开放的总体评价仍然两可。另一位谢赫说：

对苏菲主义的压力减轻了，但仍然存在，主要是因为这场革命根子上就扎在教法政治（*al-siyasat al-shari'a*）的原则里。我们看到的其实不算开放，而是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而且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²⁸

改革派苏菲谢赫穆罕默德·桑达尔的一位孙辈看法还要悲观：

苏菲主义并没有卷土重来。今天没有人能公开说自己是苏菲派。如果容忍的余地更大些，苏菲思想或许还能回到伊德利卜。可眼下萨拉菲主义留下的印记很深，尤其是在198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当中。在他们看来，苏菲主义仍然与偶像崇拜脱不了干系——“拜坟的以物配主习俗”（*'ada shirkīyya quburiyya*）。²⁹

总而言之，苏菲主义得到容忍，但只限于它的改革派版本。凡是落入深度神秘主义（即道团主义，也就是传统的苏菲教团体系）范围的东西，仍在禁止之列。实际上，叙解军即便远离了自己的萨拉菲根源，也不过是转而拥抱一种威权的、改革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部分地反传统主义，并且以制度手段惩罚宗教上的“偏离”。推动这一转向的，既有社会惰性，也有押注沉默的大多数的战略。正如穆希丁谢赫解释的：

直到2019年，苏菲主义一直受着最大压力的政策对待。后来采纳沙斐仪学派带来了一些稳定。当局逐渐意识到，他们没法用强力改变人，只能接受人民那种直觉性的宗教感 (*wijdaniyya*)。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赢得民众支持，也是为了不让人民受外来意识形态议程的蛊惑。³⁰

154

苏菲主义回到叙解军政治战略的工具箱

2021年至2022年间，随着仪轨谨慎而有限地重新开放，苏菲实践在基层逐步浮出水面。然而到2024年，由于苏菲派在反叙解军的社会运动中保持沉默，与苏菲主义的关系部分地政治化了。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所述，萨拉菲派试图以民粹的方式借这场民众运动 (*hirak*) 获利，苏菲派却按兵不动，以“避免纷争”为由与叙解军站到一处。作为回应，叙解军推行了审慎的收编战略：给予苏菲学院正式认证，同时不干预其课程。

叙解军对待宗教意识形态采取的是务实进路：凡在政治上有利、在意识形态上代价又小的地方，就作出让步。举例来说，它对基督徒、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德鲁兹人的开放，就是由战略考虑驱动的：既向西方增添自己宽容的形象，又拓宽自己在叙利亚人口中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完全承认苏菲主义的意识形态代价更高，因为那有可能疏远叙解军内部的激进派系，却换不来多少实在的政治好处：苏菲派既不构成直接威胁，也不带来显著的战略优势。

因此，叙解军的威权程度因宗教群体而异，对那些在宗教上也与它竞争的同教穆斯林施加的压力最重。它把基督徒与德鲁兹人重新界定为少数群体，纳入一套民族主义的定位战略，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苏菲派与他们不同，是伊斯兰内部相互竞争的、“偏离的”潮流。叙解军并未完全承认苏菲主义，而只是容忍它，同时对它保持压力，迫使它低调行事。然而，苏菲主义一面借社会惰性在基层不断重新确立自身，一面在表现出忠诚时又自上而下地受到政治拉拢，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24年夏天反叙解军抗议的高潮期，我们将在第十章考察。

叙解军由此使自己常态化了,放在地区背景下看,它显得格外地处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央。像许多阿拉伯统治者一样,它把苏菲主义工具化,用作制衡政治萨拉菲主义的砝码。这一热月式的中间化重组是其威权战略的一部分:在这套战略里,向主流的重新定位与有选择的宗教开放,既用来规管宗教领域,也用来剥夺以信仰为基础的反派派的正当性。¹⁵⁵

这不只关乎威权与控制,也关乎现代化。这一过程是一场更大的社会学转变的一部分:在这场转变中,苏菲主义尽管在历史上对本地伊斯兰影响深远,却正被宗教现代化与叙解军对主流正统的重新表述这两股合力逐步抹去,而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叙解军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重新定位。

归根到底,叙解军对苏菲主义的管理,显露出它“常态化”的三重轨迹。第一,它表明了“本地化的常态化”:该组织逐步接纳民间宗教实践,而不再与之敌。

第二,这次再地方化并不构成向传统的回归;毋宁说,叙解军是把它安放在一种改革派心态之中,而伊德利卜最有名望的苏菲宗教学者也共有这种心态。这次回归契合于一条长时段的教义现代化轨迹,这条轨迹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考察过。

第三,它反映出“威权式的常态化”:把苏菲机构有控制地整合进来,首要作用是削弱作为反对派的萨拉菲派。这一现象是阿拉伯威权政体的典型特征,它说明叙解军已经告别激进萨拉菲主义,把自己重新定位为务实的政教行为者,愿意把苏菲主义工具化,以巩固权力,同时不动声色地拓宽自己的社会基础。¹⁵⁶

第七章 不再是齐米，尚未成公民：以世俗少数群体 语汇重塑他者

157

冲突期间，叙利亚的宗教少数群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主要原因是政权及其支持者把这些群体的安危工具化，用来对抗武装反对派的威胁。政权的支持者尤其大力散布一种说法：基督徒与德鲁兹人因叙利亚武装反对派的激进主义而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说法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反对派团体接连发动武装袭击，其中一些至今仍以宗教少数群体为目标。圣战派或与之接近的团体尤其如此。不过，如 2012 年与 2013 年田野调查所见，自由叙利亚军（FSA）内部的许多派系也绝非没有教派暴力的发作。¹

叙解军与基督徒、德鲁兹社群关系的转变，反映出它在如何对待非穆斯林“他者”这一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在意识形态驱动较弱的治理结构影响之下，加上叙解军领导层有意把自己呈现为民族主义的、革命的行为者，看待这些社群的方式便不再那么依循宗教范畴，而是以政治语汇重新界定为少数群体。

应对逊尼派的教派激进主义

叙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2011 年以前，这个国家容纳着形形色色的宗教与族群少数群体。基督徒约占人口的 10%，其中相当规模的社群聚居于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等城市。德鲁兹人约占人口的 3%，主要居于国土南部，尤以苏韦达省的德鲁兹山一带为多。其他值得一提的少数群体包括阿拉维派（占人口的 10 至 15%），集

158

中在沿海地区；库尔德人主要在东北部；此外还有伊斯玛仪派、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等较小的群体，散布于全国各地。

在西北部、尤其是伊德利卜省，许多宗教社群不得不生活在武装反对派团体的治下。起初，该地区的基督徒与德鲁兹人选择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不倒向任何派系，同时给路过其村庄的流离失所平民提供庇护。此后，自2012年末起，武装反对派的逐步伊斯兰化迫使德鲁兹人或者出逃，或者大幅改变自身。萨马克山历来是移出之地，因当地德鲁兹居民大量离去而变得抢手。据一位德鲁兹名流说，他们的处境也随之恶化：

这座山很穷，长期以来一直是移出之地，留下许多空置的房子。有些居民在冲突之初就走了，一波波来自叙利亚别处的新人取而代之。他们对待我们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该为他们的流离失所负责，成了新的压迫者，在他们眼里与巴沙尔并无二致。这局面带来了许多麻烦。我受到过威胁，宗教压力也在加大。他们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指责人不做礼拜、不封斋，还谴责我们的穿着。²

基督徒也经历了一段土地频遭征收、绑架与暗杀不断的时期。“别的叙利亚人占了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房子，”一位留下来的本地名流回忆说。³出人意料的是，伊斯兰国最初进入亚库比亚村时，反倒带来了一段暂时的安定，尽管代价不小。当时众多本地武装团体制造威胁与暴力，该社群深受不安全之苦；两名伊斯兰国指挥官——其中一人竟是法国人——对该社群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作为安全的交换，居民必须停止公开展示基督教的宗教标志，并服从这个新来的团体。伊斯

159

① 《欧麦尔盟约》相传为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与被征服的基督徒所订，逐条规定非穆斯林的义务与限制（不得新建教堂、不得公开展示宗教标志等）。其真伪与年代在学界久有争议，但历代伊斯兰政权常援为处置非穆斯林的成规。——译注

兰国称之为《欧麦尔盟约^①》。但这份安定很短暂：随着该省对伊斯兰国的压力增大，它很快就升级了暴力。

出现了个人改宗与集体改宗伊斯兰教的情形。许多德鲁兹人出于自保而改宗伊斯兰教，起初是以个人方式，逐步把更多逊尼派穆斯林的仪轨纳入自己的实践；有些人此前住在阿勒颇、适应保守的逊尼派城市环境时，就已经历过这一过程。随着要德鲁兹人改宗的压力步步紧逼，本地的调整变得更加实质性。2013年，情况从纳入宗教实践转为集体的、公开的改宗，由来自各德鲁兹村庄的三十来位名流出面、以拉比赫·萨布恩吉（Shaykh Rabeh Sabunji）谢赫为首，代表整个德鲁兹社群作出。据改宗文书的一位签署者说，“既然掌握宗教知识出于自愿，只有年长的智者（*uqal*）才可自认已经入教，那么信仰的选择、回归穆斯林信仰以及纳入伊斯兰实践就不成问题，对那些并非教义守护者的普通信众而言尤其如此。”⁴

2013年11月，在伊斯兰国的压力下，德鲁兹社群通过一份手写文书正式改宗伊斯兰教，该文书由一群名流代表伊德利卜省各德鲁兹村庄“最受引导、最有学识的人”签署。这一措辞似乎呼应了德鲁兹传统上智者（‘*uqal*，即已入教、通晓宗教事务者）与未入教者（*juhal*）之分。文书本身在几个方面反映出对激进环境的这种适应。第一，它标志着对德鲁兹信仰的断然弃绝，明确否定转世教义，并谴责该教派的历史人物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达拉齐（Muhammad Ibn Isma’il al-Darazi）是可诅咒的内学异端（*kufir*）的鼓吹者。第二，它包含该社群对逊尼派伊斯兰的归附，但归附的方式贴合当时伊德利卜主导力量的期待，也就是向该地区历史上通行的沙斐仪学派靠拢。除此之外，这份文书还带有圣战的一面，因为它强调圣战是伊斯兰的一项核心义务。它在两个方面也公然反什叶派。第一，它采纳了逊尼派关于哈里发的立场，把阿里列为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正统哈里发，从而否定了什叶派认为其前任都是非法篡夺者的信念。第二，它援引了对批评阿伊莎者的叛教宣判，阿伊莎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之一，批评她的立场通常与什叶派相联系。

叙利亚革命者阵线短暂控制该地区、随后被支持阵线击败之后,包括盖勒卜卢泽在内的萨马克山一带落入支持阵线控制。在他们治下,宗教紧张升级:该组织的外籍指挥官阿布·阿卜杜·拉赫曼·图尼西(**Abu Abd al-Rahman al-Tunisi**)质疑德鲁兹社群公开归附逊尼派伊斯兰是否出于真心。他指出圣墓依然存在,以此作为异端信念残留的证据。面对这番审视与压力,当地德鲁兹人重申了改宗伊斯兰教的立场,甚至捣毁了自己仅存的圣墓,以证明其归附之诚。⁵

尽管作了这些迎合的努力,猜疑仍旧不散,最终酿成2015年6月盖勒卜卢泽23名德鲁兹村民惨遭屠杀一事。事件起于图尼西与沙巴利家族(**the al-Shabali family**)之间围绕财产没收的纠纷。图尼西试图没收一名家族成员的房产,理由是此人身在政权控制区、是叙利亚军队的士兵,紧张关系于是到了临界点。然而那处房产坐落在此人亲属较大的一片地产之内,这些亲属与支持阵线的战斗人员发生了对峙。局面迅速升级,激烈争吵演成暴力,武装人员向居民开了枪。在随之而来的屠杀中,二十来名德鲁兹村民被杀害。支持阵线公开谴责阿布·阿卜杜·拉赫曼·图尼西对盖勒卜卢泽德鲁兹村民的袭击,并力图与这场杀戮划清界限。作为回应,该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并审判图尼西,把他关押了几个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后来声称,他本人曾要求以图尼西在这场暴行中的角色处决他。⁶然而,委员会最终裁定并无证据把图尼西本人直接与杀戮相联系,只有他的下属被认定负有责任。许多德鲁兹人认为这一裁决不够,因为它没有让这位指挥官为部下的行为负责。

161

德鲁兹社群走过革命时期的这段历程,也改变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宗教性发生了实质变化,在普通信众中尤其如此。封斋、在家与在清真寺做礼拜都变得寻常。随着压力加大,黎巴嫩德鲁兹领袖瓦利德·琼卜拉特(**Walid Jumblatt**)也曾提出让他们到黎巴嫩避难,但没有成功。德鲁兹人以形式上的宗教实践作自保性适应,此即所谓塔基亚(*taqiyya*);不过看来随着时间推移,它已经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宗教转变。“有个人说,我儿子八岁了,他不知道当德鲁兹人是什么

意思，他学了一部分《古兰经》，会做礼拜、会封斋。当德鲁兹人是有风险的。有新的一代人在新的处境里长大，这不是塔基亚了；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全部。”⁷

叙利亚的每个村子都有清真寺，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成了逊尼派穆斯林。但社会是分裂的。妇女待在家里，所以受到的压力较小，更倾向于守住旧信仰，男人则在改变。举例来说，盖勒卜卢泽清真寺的兴建始于2021年，是村中德鲁兹人自己的动议，但他们无力建成。土耳其宗教基金会各地巡访时决定给予支持，由救国政府监理。迈阿赖特伊赫万和其他村子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⁸这些转变有时很深，却往往伴随着痛苦与分裂。举例来说，山里的一位德鲁兹教授就作证说：

许多人从无宗教状态转入被迫的宗教性，盖勒卜卢泽的屠杀之后尤其如此，由此造出一种人格分裂的处境。孩子们受宗教教诲与宗教教育影响尤深。他们变得比一般成年人还虔诚。至于成年人，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不过，确实有些家庭真心改宗伊斯兰教，其程度连伊本·泰米叶在他那个时代都不曾见过。⁹

叙解军前身对待少数群体社群的态度，反映出更大范围内长期的意识形态与战略转变。起初，打量叙利亚基督徒与德鲁兹人的是萨拉菲派宗教教义的僵硬框架，或者更广泛地说，他们遭受社会边缘化；他们发现自己成了革命动荡的众多受害者之一。今天，这些社群大体散居于三个州、十八个村，其中各教派的基督徒约600人，德鲁兹人约6000人。在政治上，德鲁兹人倾向于与瓦利德·琼卜拉特的进步社会党走得更近，尽管在各派系治下困难重重，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共同体认同。¹⁰2015年征服军拿下整个伊德利卜省之后，与宗教少数群体的紧张关系加剧，宗教压力也随之加大。征服军是叙利亚各武装反对派团体组成的联盟，由大叙利亚自由军和支持阵线（转变为叙解军之前）领导。该联盟得到地区支持者的援助，目标是攻取叙利亚政权在伊德利卜省内残余的地盘。

实际生活起初变得非常艰难。房屋被没收、威胁、种种小的羞辱、陵墓与坟茔遭亵渎，加速了德鲁兹山区的人口外流与人口构成的改变。举例来说，在卡夫廷，60%的人口离开了。此前有3000人，如今只剩1500人。一位当地德鲁兹人确认说：

多数人离开，并不是因为不想要伊斯兰教，也不是因为支持政权。他们离开，是因为再也活不下去了。说到这十五个村子的社会结构。起初，支持阵线接管房屋，把它们给了乌兹别克人和突厥斯坦人。这些人被安置在两所学校里。一开始有些混乱，但自2015年以来，支持阵线逐步接管并重新分配了房产。他们声称只拿空置的房子。他们还清空了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IDP）营地，换上乌兹别克人和突厥斯坦人。叙解军起初推行的政策是优先照顾圣战者的家属。现在非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几乎更多了。¹¹

其结果是，有些村子的原住民彻底走空，代之以中亚穆斯林社群，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和维吾尔人，阿拉伯外国武装人员并无显著存在。随着时间推移，维吾尔人在德鲁兹人面临日增的伊斯兰化压力的同一些地区，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本地社群的地位。起初，本地居民与中亚人之间关系紧张。武装派系的存在带来了一段严格管控的时期，检查站、法庭与风纪监察（*hisba*，宗教警察）强制推行僵硬的社会规范。妇女尤其在衣着与举止上受到严重限制，男人则在外貌与日常行为上受制于种种羞辱性的规矩。然而，随着权力在救国政府与解放区行政机构（*Idarat al-Manatiq*）的治理下更趋制度化，局面逐渐稳定下来。权威的正规化有助于缓解一些较为任意的压力，为留下来的少数群体营造出更可预期——尽管仍是压制性的——环境。

自那以后，主要的争执点是德鲁兹社群拒绝把女儿嫁到本群体之外。德鲁兹人为这一立场辩护说：“我们的做法跟部落一样。”¹²而该地区一些逊尼派穆斯林新来者则议论说：“他们要是不肯把姑娘嫁出来，就不是真改宗。”¹³这一紧张关系凸显出更深层的问题：他们那被迫的或出于策略的改宗究竟有几分真心。尽管如此，塔基亚（即宗教掩饰）、

人口变动与改宗后一代人的出现，三者交织，已深刻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肌理。随着时间推移，德鲁兹社会经历了部分伊斯兰化，其中未入教者（*juhhal*）起初是这一转变最脆弱的入口。新一代人的成长，加上新治理之下的宗教教育，进一步固化了这些变化。其结果是，德鲁兹社会如今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片不断演变的、混居的社会版图，而中亚穆斯林、尤其是维吾尔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艾哈迈德·沙拉面向两个少数群体的公开亮相

2022年6月10日，艾哈迈德·沙拉在盖勒卜卢泽村一口水井的落成仪式上，出人意料地探访了德鲁兹社群，那里正是2015年屠杀的发生地。沙拉本人到场，意在发出强烈而有意为之的信号——不只对德鲁兹社群，也对整个伊德利卜——表明双方关系的动态正在改变。他的现身凸显出这样一种努力：在新秩序之下重新界定德鲁兹人的地位，标志着从此前的紧张转向共处。据沙拉的一位亲近同僚说：

164

这一次为什么要走媒体，而不是低调地跟他们打交道？原因有好几个。把接近与和解（*musalaba*）保密，对建立信任没有好处。我们想让他们安心，也想表明我们现在有能力公开为自己的选择背书。但我们同时也想向运动内部发出信息，把变革的势头强加于叙解军内部。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公开，而且是由沙拉本人出面探访来公开。出自领袖本人的决定有很强的可信度；出自其他层级的决定则可能被质疑。¹⁴

七年前，他曾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宣称阿拉维派应当放弃自己的信仰、也放弃对阿萨德的支持；与那时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的沙拉面对的是一小群寻求宗教承认的德鲁兹名流。¹⁵当他们为了建立信任而重申自己身为穆斯林的自豪时，他的回应是强调“宗教之事绝无强迫”。这么一说，他就对他们集体改宗的正当性提出了疑问，暗示那是强力施加的，而非出于真心信服。他同时也是在含蓄地承认撤回改宗的权利，至少在改宗出于胁迫时如此。有人把这一立场解读为对叛教的默许，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主流的教义立场：那种立场把改宗、尤其

是改宗伊斯兰教, 视为不可逆转的委身。他既然暗示胁迫下的改宗可以作废, 也就动摇了那种僵硬的神学观点: 那种观点把离教等同于叛教, 而在伊斯兰教法学的许多解释中, 叛教是重罪, 往往要招致严厉的法律与社会后果。他既然暗示胁迫之下的改宗可以逆转, 也就是在挑战这一根深蒂固的教义立场, 而该立场认为宗教委身不可撤回。

165

最初的惊讶过去之后, 出席会面的德鲁兹名流对沙拉的姿态是认真看待的。他们把他探访盖勒卜卢泽看作走向和解的一步, 也承认叙解军领导层的视野发生了转变。不过, 他们对这位叙解军领导人拒斥宗教强迫的说法仍持谨慎态度, 担心新方向未必得到执行, 甚至可能遭该运动基层反对。一位名流评论说: “光有领导层的善意还不够。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沙拉来过一次, 可当地那些指挥官在这儿待了十年。”¹⁶ 另一位则指出, 他们已决定盖一座清真寺, 免得让周遭的团体扣上不信者的帽子。¹⁷ 正因如此, 他们才把诉求集中在地面上看得见的权利上, 比如归还被没收的房屋与土地, 以及请求发展援助, 而不在现阶段触及信仰自由或政治权利一类问题。

与此相类, 一个月后的 2022 年 7 月 19 日, 艾哈迈德·沙拉探访了一批当地基督教宗教名流。与德鲁兹社群不同, 叙解军自 2019 年末起就经由该地区的行政机构与基督徒建立了接触, 这强化了双方在多项事务上的合作, 例如房屋返还、就外出者名下农地的收益分成达成协议、减少仇恨言论, 以及让伊德利卜的基督徒返回政权控制的境内流离失所地区。基督教名流承认了这些改善, 也称许该地区行政机构的工作。作为回应, 沙拉建议不要纠缠于过去, 包括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背景以及政权对少数群体的操弄。他还指出各派系时期所犯下的种种侵害, 并强调今日之不同:

你们说 2018 年或 2019 年以来情况一直在改善, 那是因为有一个权威正在建立起来。我们正在着手纠正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希望公正法治之下、也在伊斯兰教法之下得到伸张, 但要以公平的方式。举例来说, 我们正在做土地返还的工作。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叙利亚, 一

166

个有多重共处的叙利亚。我们正在为未来的叙利亚作准备，而它的核心是公正的原则。¹⁸

对基督教社群，沙拉守的是相对常规的穆斯林教法。他提醒基督徒享有安全与践行信仰的权利，并把这些权利安放在双重规范框架之内：法律与伊斯兰教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反对派领导人第一次系统而一贯地采取一系列与其新话语相合的具体行动。无论在德鲁兹人还是基督徒当中，第一个看得见的改善主要都在安全形势上。这包括驱逐或疏远那些侵夺土地的好斗武装人员——他们往往是乌兹别克人以及与宗教卫士组织有关联的团体——设立新的警察所，与本地组建的社区自卫队开展安全合作，¹⁹ 德鲁兹人与基督徒更多地诉诸法庭，²⁰ 为基督徒返还房屋，²¹ 对散布仇恨言论的伊玛目或武装人员施以处分，²² 以及协助库奈耶、杰迪达、亚库比亚三村最后几户仍居于政权控制区的人家返回家园。²³ 救国政府还促成了居民与外出者名下财产的返还，随后又把土地归还于民，其中包括基督教教产（*awqaf*）。²⁴ 另有四座教堂获得返还，唯伊德利卜那座教堂因缺乏修复资源而未归还。当地神职人员决定暂时把它置于叙解军的保护之下。²⁵ 境内迁徙与武装团体及其家属的强行落户所引起的人口动荡，成了与少数群体社群紧张关系的焦点。在德鲁兹人的萨马克山，多数流离失所者是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

他们在宗教上激进而封闭。过去是有过麻烦的。激进的头目煽动他们反对我们。但现在这种情形少多了，因为激进分子已经不见了。而且这一年来局面一直在平静下来，或者靠叙解军出面，或者直接在房地产交易所里以民间和解（*sulh*）了结，或者走法庭。²⁶

叙解军还促成了伊德利卜一座教堂的重开，使圣安妮瞻礼日得以在同名教堂中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举行，这是十年来的头一回，尽管全程处在总安全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²⁷ 在基督徒当中，起初占上风的是谨慎。有人承认：

现在安全形势不错，偷盗与劫掠的时期过去了。安全措施加强了；与一两年前不同，叙解军如今会主动处理在我们地面上发生的犯罪：调查、安全措施、逮捕，以及与我们村庄自卫队的合作。

另一方面，把这一观察落到政治上，还只是刚刚起步：“仍有许多与新当局有关联的人在从我们的土地上牟利。但救国政府如今已是既成事实，我们必须参与，否则就会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方针是他们给什么我们就拿什么，然后一点一点提出自己的诉求。我们不想对沙拉开辟一条战线。”²⁸ 在德鲁兹社群这边，他们同样看在眼里，并与叙解军展开对话，同时谨慎地不作过深的承诺。艾哈迈德·沙拉提出的说法²⁹是宗教之事绝无强迫，这在现阶段还不是他们准备抓住的机会：

沙拉谈“宗教之事绝无强迫”。可叛教裁定 (*hukm al-rida*) 又怎么说呢？我们需要澄清，然后才能接这个话头。到目前为止，我们担心这种进展会招来反弹。眼下我们有的是口头承诺，但我们需要书面承诺。沙拉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成问题。但我们还得看。³⁰

在环境依旧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抓住叙解军“把话说开”的机会，风险相当大。因此，要拿回自己的房子，寻求非正式的私了仍是首选，因为“要是走法庭，结仇的风险太大了”。³¹

不过，局面远谈不上完美，难题仍在。安全确有实实在在的改善，¹⁶⁸ 在基督徒当中尤其如此，但侵害行为虽然大幅减少却并未停止，主要针对的是德鲁兹社群。沙拉探访之后，仇恨言论、投石袭击乃至凶杀接连发生，迫使叙解军与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多次出面降温。举例来说，一位德鲁兹名流在向一位亲近同僚通报叙解军领导人探访之后山区的情况时说：

朱拉尼谢赫探访山村之后，我们察觉到多数邻人对我们心怀怨恨。其中有些人开始设法在山里人与住在山上的乌兹别克、维吾尔外国武装人员之间制造嫌隙，好让叙解军所做的工作落空。盖勒卜卢泽一座清

真寺里发现了垃圾，伊玛目便借此发动众人反对我们，激怒了维吾尔人。他们朝天开枪，逼得叙解军出面平息此事。另一起事件发生在希拉村，据说一位年长的村民要求外国武装人员即迁士（*muhajireen*）离开山区。他们觉得受了挑衅，叙解军只得再次出面平息局面，这一次的办法是让那位老人离开。³²

在房地产权（HLP）方面，2024 年之前基督徒的财产返还已近乎完成，德鲁兹人这边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涉及农地时，问题更为复杂。流亡在外者家庭的农地被没收，分配给各派系及其家属，其中也包括叙解军。叙解军与本地农户之间存在协议，但土地经营所得收益的分成比例一直有争议，且随时间调整，往往对合法地主或其家人不利。这些协议是与农业司口头议定的，而农业司隶属救国政府的农业部。因此，协议高度依赖具体经办人。人事一变动，比例很容易被重新界定成不利的样子。萨马克山的一位德鲁兹村民作证说：

这两年来，我们感觉到叙解军有了新的方向，他们说他们在保护我们。可房子还占着，地方议会又把移居外地者的农地拿走了。他们起初把地给了乌兹别克人和突厥斯坦人，后来给了政府官员和安全人员。协议是叙解军与新农户分收益。起初是 50 对 50，现在是叙解军 73%、我们 27%。眼下他们在把地交给与合法地主最亲近的人。农地我们大概拿回了 30%，还有 70% 悬着。³³

169

威胁、煽动仇恨与暴力行为——从投石到武装袭击乃至凶杀——虽然频次下降、也有处分施加，却仍未断绝。举例来说，2023 年 4 月一名基督徒妇女遇袭，引来解放区行政机构（*Idarat al-Manatiq*）本地人员出面干预，将行凶者逐出该地区。据德鲁兹社群说，清真寺的布道者难以跟上叙解军新的政治立场，迫使叙解军一再出面干预。沙拉探访之后干预更加频繁，迫使叙解军领导层采取行动。一些非叙利亚籍圣战派仍是当地人紧张的来源。³⁴ 此外，盖勒卜卢泽与卡夫廷两村还发生了袭击与两起暗杀。据一位德鲁兹名流说：

显然有人在挑动内乱 (*fitna*)。就是今天,清真寺的布道者还在谈论土耳其人,批评土耳其与政权的接近。挑衅不断,而且在增多。就好像萨马克山成了清算旧账的舞台。我们真的害怕。我们清楚,有一伙激进分子拒绝叙解军对我们的开放。但叙解军一直很在意别让山里出事:调查从来都是立刻进行,随后是逮捕与安全措施的加强。如今这一带已经封闭起来,村里和山口都有巡逻。叙解军的应对表明,这个组织对它纠正冤屈、教际平等的承诺是当真的。外国武装人员承受着很大压力。举例来说,为便于安全管控,叙解军不再允许外国武装人员戴面罩,还抓了他们不少人。³⁵

170

少数群体政治与隐性的世俗化: 政治压倒之处, 宗教见解付出代价

这套对待宗教少数群体的新进路,也显露出在 2024 年胜利之前叙解军在政治上与宗教上正在变成什么。就如何为自己在少数群体问题上定位,这个组织有两条可走的路。第一条是从事一场复杂的现代主义教法创制 (*ijtihad*),这要求对宗教典据作全面的重新诠释,以形成一种当代的理解。然而,对一个军事化而精英化的运动来说,这构成了很大的难题:它缺少必需的学术积累,还有招致内部抵制的风险。

于是叙解军采取了更偏政治的进路。第二条路是用非宗教的范畴重新界定这些群体,由此调动起少数群体的话语。这一转向代表着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因为叙解军开始依据脱离神学框架的范畴来给这些群体归类。值得注意的是,叙解军并未援引传统的伊斯兰参照,如有经人 (*Ahl al-Kitab*)、齐米^①群体 (*Ahl al-Dhimma*),也未对德鲁兹人援引内学诸派 (*Firqat Batiniyya*, 常含贬义)。这种重新界定使叙解军得以绕开传统上与这些分类相联系的种种政策。这个问题对德鲁兹人尤为紧要,

① 齐米 (*dhimmi*) 是传统伊斯兰法中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居民身份,主要指犹太教徒与基督徒,须缴人丁税 (*jizya*) 并守若干限制,以换取生命财产与信仰的保障。——译注

因为基督徒在伊斯兰中享有得到承认的地位——即便在萨拉菲派看来也是如此——德鲁兹人却不享有同等的宗教正当性。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看来：

我看德鲁兹人的时候，是就他们相对于革命的作为来评判的。他们拿起武器打过我们吗？他们站到政权一边了吗？没有。他们没有打我们；事实上，他们还在自己家里收留过难民。所以我据此判断这件事。至于你问我，作为一个宗教布道者是否应当设法让他们改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信仰伊斯兰，也信仰宣教。可是，如果我走进德鲁兹社群去宣讲伊斯兰，他们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布道者——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权威和武力撑腰的人。到头来那就等于强迫，而强迫不是伊斯兰的做法。³⁶

叙解军的这一转向重塑了它的话语与身份。该组织的政治修辞逐步告别了那个一度塑造、或者说为其辩护的萨拉菲框架——它曾塑造该组织对这些群体的政策——转而开始向一套世俗的、现代的少数群体叙事靠拢，³⁷ 其着眼点在于这些群体与国家的关系，而不在宗教的超验性，并不时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³⁸ 这套话语在该组织领导层内部已成常规，代表着一次高度战略性、高度政治性的转变。正如艾哈迈德·沙拉解释的：

政权把自己的治理原则建立在恫吓少数群体这个念头上。它想抓住权力不放，办法是把阿拉维派卷进来，把他们推入一场对逊尼派的战争，好把自己摆成少数群体的唯一保护者。我们对待德鲁兹人与基督徒的做法，是发给政权控制区民众、甚至发给阿拉维派本身的一个信息。我们提出的是一份面向叙利亚未来的社会契约，无论主导力量是谁，它都以共处（*ta'ayush*）为根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用“少数群体权利”的思路来想问题。³⁹

这一转向对该地区的激进分子也有重大影响。基层压力日增，暴露出对常态化的明显抵制，促使本地激进分子以越来越极端的方式作出反应。这反过来又迫使叙解军通过法律手段出面干预，包括逮捕、调查、

禁止仇恨言论以及驱逐,有时也波及少数群体中的个人。与此同时,这一变动中的局面也促使某些意识形态相近的武装团体,如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自由人军,在少数群体问题上采取更为开放的政治立场。

这也意味着叙解军并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宗教立场。据沙拉说:

基督徒是不是齐米群体 (Ahl al-Dhima)? 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这些人处在救国政府的权威之下,对待他们时必须给予与其他人同等的权利。教法事务我们不介入。⁴⁰

据他的一位顾问说,思路也是一样:

172 与其调整我们在德鲁兹人与基督徒问题上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宁可
通过政治行动来建立信任。意识形态立场以后再说。在少数群体问题
上采取宗教立场并非必需。法特瓦委员会迄今没有就这个问题表
态。⁴¹

如果我们把世俗化看作政治考量优先于宗教世界观的过程,那么叙解军至少在面对 (*vis-à-vis*) 其他宗教社群时是在世俗化的,因为宗教在治理中仍然起着作用。不过这种世俗化是就事论事的、隐性的、系于某一具体议题的;它并不是公开的或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正如沙拉的顾问所指出的,法特瓦委员会始终回避就此表态,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叙解军的政策在权力的行使 (*al-sulta*) 与沙拉所说的教法事务 (*al-masa'il al-shar'iyya*) 之间划出了一道界线。这种刻意的分割是一种手段,用来避免卷入可能引发内部冲突的神学问题。叙解军的话语由此绕开神学议题,转而使用历史上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联系的政治概念。

吊诡的是,宗教教义之所以得以保全,恰恰是通过对待基督徒与德鲁兹人时政治实践与政治表述的世俗化。那么,何必费这许多力气? 因为基督徒与德鲁兹人的问题,远不止于管理伊德利卜的地方社群。其中的利害在于叙解军更大的全国抱负。就此而言,对少数群体的开放深深织进了这个运动的霸权工程之中。

第八章 亲近沉默的大多数：大叙利亚解放军的主流化转向

173

尽管到 2024 年，对圣战主义的拒斥与对萨拉菲派影响力的遏制已经看得出来，宗教上的去激进化与威权政治结构这一现实之间的关联，却仍是争论的题目。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一例凸显了这个地区的一条关键规律：宗教上的自由化往往安放在更大的现代化议程之下，却并不当然带来政治上的开放。就伊德利卜而言，我们同样认为，大叙利亚解放军（HTS）在意识形态上的重新定位以及它对圣战主义的弃绝，并没有转化为权力与控制结构的实质改变。

叙利亚冲突的热月动态以几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影响了对圣战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拒斥。这里所谓“热月式的”，指的是革命阶段之后针对激进主义的一段反动时期，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期那样。叙利亚西北部事实上的停火——前线只有有限的小规模交火，没有高强度作战——改变了叙解军。处在霸权地位上的叙解军明白，自己可以谨慎地向革命中间派敞开，同时与自身昔日的激进边缘拉开距离。尽管该组织仍旧倚重武力，对革命中间派的压力却减轻了，这一点从政治与媒体圈中批评之声遭逮捕的人数下降上就看得出来。吊诡的是，这一向中间靠拢的转向虽然使伊德利卜省内部安定下来，却也催发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重新抬头与伊德利卜之外的出击，因为叙解军开始滋生出更大的抱负：在与政权对立的意义上，更广泛地代表革命中间派。

174

重新发现革命

叙解军在革命上的重新定位,始于它接纳革命的象征,例如革命旗帜及其公开庆祝,这与它作为支持阵线时期的反对姿态截然不同。伴随这一转向的,是与其他革命行为者的逐步接近。在这一阶段,这种接近促成了叙利亚西北部的去极化,尽管它并未真正吸纳叙解军之外的精英,也未对新的权力结构构成任何真正的挑战。这一转向反映出叙解军与本地政治版图关系的重大演变,而这片版图此前一直大体上抗拒它的统治。

叙解军对革命象征的承认是一步一步来的。与革命圈子的最初接触发生在 2018 年,即救国政府成立一年之后。若干有革命背景的人士,包括自由叙利亚军的前战斗人员和地方议会成员,敦促沙拉升起革命的旗帜。据他们说,沙拉当初表示接受,但认为必须循序渐进,因为他手下一些战斗人员在意识形态上有抵触。叙利亚西北部各地解放区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也呼吁动员地方议会。据一位参与者说:

我们发现自己与叙解军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庆祝革命。对叙解军来说,这是表明自己已经成为社会一员的一种方式。他们在后勤和安保上帮了我们,不过我们面临一个两难:合作可能导致被接管、导致一党式的逻辑,尽管庆祝的动议本来是我们提出的;可拒绝伸过来的手,又可能与那个实际上的一党发生冲突。¹

庆祝活动是逐步扩大的。2020 年,它只限于与土耳其之间的边境口岸巴布哈瓦。一年后的 2021 年 3 月,叙解军承诺更主动地赞助并保护 2011 年革命发端的纪念活动。叙解军在一些城市搭起舞台,在伊德利卜市中心的米赫拉卜环岛 (Dawar al-Mihrab) 把革命旗帜升上了全省最高的旗杆,救国政府各部则提供后勤支持。2022 年,政府号召各行政机构与学校参加,在一些地方还分发了长期查禁的革命旗帜。救国政府的官员与协商委员会成员到场并发表讲话,²不过组织者仍然主要是那些当年出现在 2011 年示威协调委员会里的活动人士。叙解军与革命

活动人士之间的关系各地不一。在有些地区,叙解军参与而不干预讲话内容与讲话人身份;在另一些地区,它对上台设了更严格的准入控制,还审查讲话人的讲稿。³

在通往 2024 年攻取大马士革的这段时间里,叙解军与革命精英的关系有所演变,不过对叙解军治理方式的批评一直不断,这提醒我们不要高估这一转变的幅度。双方的接近并不只是象征性的:接纳革命纪念活动打开了新的政治空间,同时也加深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据一位参与者说:

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拒绝,另一派更务实,说与叙解军一同参与也是保护并强化革命这一参照的办法。我参与,就等于承认我的参与对他们有利。我不参与,就削弱了自己的位置。占上风的立场倾向于参与,以免与叙解军发生冲突。⁴

革命圈子与叙解军之间第一次正式接触,源于 2019 年末一群革命者与叙解军协商委员会公共关系官员的一项动议。此前不久,叙解军于 2019 年 1 月决定性地击败了大叙利亚自由军,就此坐稳了对伊德利卜的主导地位。这项动议促成了与叙解军领导层的数次会面,但双方都心存戒备。一边是过往对抗留下的紧张、地方议会被迫归附,以及许多革命精英出走阿勒颇北部的反对派控制区,这些都构成障碍。另一边,叙解军则担心失去控制,或者招来自家强硬派系的反弹。这些因素最终使

176

2019 年至 2024 年间,叙解军还设法把革命精英中的一部分人收编进自己的行政架构。它没有与既有的政治机构对话(那本可以带来更有实质意义的政治让步),而是着力吸纳个别人物,以安抚长期觉得受外来者排挤的本地革命圈子。⁵然而,这些努力在革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人那里遭到了怀疑。一位妇女家中虽有支持阵线的烈士,家人却屡遭逮捕,她回忆说:“一方面,革命者们有兴趣;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

牢里。在这些圈子里，人们常说叙解军与政权没什么两样。”⁶ 革命精英中间生出了一种新的、多少有些苦涩的现实主义：

是的，本地精英正在一点一点靠近叙解军——不是因为立场一致，而是出于必要。我们是本地人，我们在叙解军之前就存在，我们也还守着自己的位置。我们要民主，要公民权，而且要在哪里实现。变了的是，叙解军如今在与我们对话。我们与它的领导层有直接联系，明白地告诉他们：他们改变不了我们。作为回报，他们不再谋求把我们彻底铲除，而是施加压力，好把我们拢到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一套熟悉的威权策略——少靠肉体强制，多靠受控的迁就。⁷

革命政治机构的另一位干部原籍迈阿赖特努阿曼，曾任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临时政府的部长，他指出：

177

对革命者的安全压力减轻了。有些人如今在考虑组建政党，重新加入里面的博弈。心态在变。几年前，2017年救国政府成立时，我们拒绝了叙解军发出的参与邀请。他们提出给我们几个部，我们拒绝了。第一，因为我们要求军事行动与文职承担明确分开。第二，我们很难加入一个由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所控制的行政体系。现在我们谨慎地与他们会面，因为只要行政体系还由一个军事组织控制，我们要加入仍然不可想象。⁸

另一位干部虽然承认治理仍在一个被列为恐怖组织的武装团体控制之下，却也让步说：“说句公道话，叙解军把激进分子清除掉了；今天，艾哈迈德·沙拉是可选项里最好的一个。”⁹

叙解军对待革命圈子的政策是多管齐下的：挪用象征、收编、强制。该组织采纳了它作为支持阵线时曾经反对的旗帜与革命意象，通过在救国政府名义下精心安排的集会，逐步接纳革命纪念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象征上的对齐不断加深，使叙解军得以把自己摆进革命运动之中。与此同时，叙解军也在使用有选择的强制，只是烈度有限，以非政治的名义定点逮捕活动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策略与叙利亚民主

军(SDF)——叙利亚东北部由库尔德人主导的运动——的做法惊人地相似：后者同样把政治挪用、个别收编与受控镇压糅在一起，以维持自身的权威。

政治化的妇女赋权受制于叙解军与西方的双重含混

叙解军与革命圈子关系的回暖，也延及伊德利卜的妇女。过去十年间，叙利亚妇女在更大的革命斗争之内发动了自己的革命，其政治化沿两条主轴展开。第一，妇女谋求融入革命所催生的新权力结构，这一过程主要由本地行为者推动。第二，另有一股独特的女性主义动员，目标是通过一般性的政治培训实现个人的赋权(*tamkin*)，往往并无立竿见影的具体目标。第二股赋权潮流得到了西方援助的大力支持。起初，西方资助的项目也曾服务于第一个目标；但在叙解军崛起之后，这些基于性别的项目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它们使那些常被称作“被赋权的妇女”(*al-nisa' al-mutamakinat*)的政治参与去政治化，并受到限制。这些项目一度是投身公共事务的催化剂，如今却成了在叙解军治理下充分融入政治的障碍。¹⁷⁸

叙利亚的革命政治化始于第一批地方行政实体的组建，这一过程完全由国内行为者推动，与外国支持项目无关。反对派力量联盟内部的一位候选人、药剂师工会成员回忆说：

我们从革命之初就参加抗议。我们的正当性正是来自革命行动。后来我们通过选举得以进入革命的政治机构。2012年，在雷伊汗勒流亡的伊德利卜市议会选举中，7名妇女与40名男子参选，25人的议会里选出了5名妇女。省议会成立时，妇女的席位得到了保证，一些知名人物给予支持，有时甚至是艾曼·穆赫辛(Shaykh Ayman Mohsen)谢赫这样的宗教领袖，尽管另一些人有权保留。¹⁰

这位候选人还记得：

影响妇女参与的关键因素，不是伊斯兰主义者或宗教人物与其他人之间的对立，而是城乡之别。伊斯兰主义者，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与苏菲派，当时并不反对妇女参与。¹¹

不过，妇女在地方议会中的人数一直很少，很少超过两三人，萨勒金、哈雷姆和宾尼什的议会就是如此。¹²

从 2011 年到 2013 年，妇女的参与完全是内生的动态，直到西方非政府组织为妇女提供了第一批培训班与工作坊。妇女的各种倡议开始围绕这些培训项目形成。其中最重要也最持久的一项是“希望一瞥”¹⁷⁹ (Barikat Amal)，它在反对派控制区建起了约 70 名妇女的网络，并作为支持政治参与的游说团体运作。另有若干倡议也应运而生，如“变革的缔造者” (Sani'at al-Taghir) 和“希望的空间” (Masahat Amal)。这些倡议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绩，鼓舞妇女走进公共领域。在海外培训与谋求革命代表性的内生动力共同作用之下，妇女在职业工会、学生会、民防以及其他代表这场进行中的革命的机构里确立了存在，尽管规模有限。¹³ 举例来说，伊德利卜政治委员会 (al-hayat al-siyasiya) 执行委员会的 15 名成员中有 3 名妇女，而该委员会是当地最重要的现存政治实体。总的说来，妇女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存在始终处在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中：一边是捐助方要求参与的压力，一边是本地父权制的抵制。¹⁴

妇女走向政治参与的道路虽已启动，却很快撞上了叙解军这一现实。随着时间推移，妇女和男性同侪一样，逐渐认识到叙解军既是一股会长期存在的力量，也是一股有能力调适的力量。其结果是，抵制参与的态度让位于一种更为复杂的看法：一面仍有异议，一面又务实地愿意接触。正如一位活动人士所说：

就在两年半前，我还会拒绝参与，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叙解军对救国政府的完全控制。但现在情况更复杂了，我们看得出这种控制在减弱，救国政府正在变得更文治、更少军事色彩。¹⁵

首要的障碍,说来或许吊诡,来自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系统所推动的去政治化。这些组织把私人性的目标,比如个人保护,置于公共性的目标之上,比如妇女参与政治结构,于是无意中妨碍了妇女接近权力。尽管口口声声致力于妇女赋权,国际非政府组织尤其推行了一套去政治化的议程,限制了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参与。正如一位中学教师所观察到的:

遗憾的是,捐助方在确定目标时很少征询我们的意见,资助的又是对我们而言次要的事情,把优先次序引到了别处。他们把我们往保护与提高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的认识上推,而我们希望得到支持的是自己的政治行动。我们希望国际非政府组织能更直接地支持妇女参与既有的治理结构,可惜联合国的援助不碰政治。¹⁶

180

对保护与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强调,把妇女的注意力从直接的政治参与引向了私人领域。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常常以提供有薪职位的方式劝阻政治参与,在公民社会内部造成了去政治化的效应,这一动态同样影响到男性:“薪资差距有时达到1比20,我会放下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承担,也就是教育领域的承担,转而专注于我认为不那么重要、却能养家的事情。”¹⁷ 这位妇女描述了政治化妇女与外国捐助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伊德利卜是一个保守的社会,在这个前提下,凡我们看来与自身文化相悖的东西,我们只能拒绝。有些项目在婚内强迫性关系问题上所依据的平等精神,是有问题的。我们感兴趣的是技能的养成,那是我们随后可以用来对付当局、并借以进入伊德利卜权力位置的东西。

第二,受资助妇女的赋权也培育出她们个人的利益,包括参加会议、出国以及接触西方官员的机会,而这些都可能因为与叙解军相近的机构、包括救国政府打交道而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都是一种风险。据曾是联合国妇女咨询委员会中最活跃的妇女之一的拉伊法·萨米娅(Raefa Sami'a)说:

181

有人接触过两位妇女，商谈进入救国政府任职。其中一位接受了，后来又因恐怖组织名单问题而退出，那对妇女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障碍。两年前，我曾主张让妇女进入伊德利卜地方议会。我找过三位妇女，鼓励她们竞选地方议会。可她们担心这会影响到自己继续出国培训。而且这担心不无道理。其中一位当选了，如今主持伊德利卜地方议会的妇女委员会。我本想带她去参加土耳其的一次国际会议，却因她与救国政府有关联而被主办方拒之门外。¹⁸

不过，叙解军本身也是妇女政治赋权的障碍。尽管公共空间有所开放，政治体系仍大体封闭。¹⁹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协商委员会——相当于议会——以及各部之中都没有妇女。该组织对妇女参政的迟疑是总体原则问题，尽管叙解军领导人并未就此作出最终决定，仍对变化持开放态度。据叙解军的高级宗教权威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

现在就妇女的代表权表态还为时过早。我们首先得就她们可能进入的那些政治机构的性质取得共识，比如协商委员会或地方议会。如果这些地方议会走向专业化，那么或许可以考虑让她们进入教育、卫生、儿童事务或妇女事务等领域。一切都需要仔细斟酌。²⁰

于是局面有可能演变：政治化的妇女与其他革命干部一样，对参与既有权力结构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兴趣，尽管伊德利卜领导层对此只作出迟疑的示好。因此，与某些部委的联合项目，比如2022年与农业部的项目，有可能吸纳妇女。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出任职位已不再是禁忌。这既包括地方议会的职务，也包括更高的职位，例如教育部副部长。行政事务局曾向一位隶属该部的学校女校长提出这一职位，她起初接受了，后来又因担心叙解军被认定为恐怖组织可能带来的后果而婉拒。²¹一位参与过与救国政府谈判的妇女讲述了自己的经历：²²

182

我们去见救国政府的农业委员会、介绍我们的“盖姆哈”[小麦]项目时，12名农业工程师里只有我一位女性。第一次会面，他们看到我们代表团里有位女性，明显吃了一惊。我们解释说，许多男人已经不在——战死、被关押或被杀害——而我在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社区

中的女性打交道。费了四个月的持续努力才让他们接受，但如今与该部的合作很牢固。起初的抵制是真实的，可说服是可能的；到今天，这事行得通了。²³

在通往攻取大马士革的这三年里，与我们在少数群体那里所见相似，“妇女问题”的含义发生了重大转变。它一度被界定为道德与宗教问题，直到2016年一直由风纪监察 (*hisba*, 道德警察) 暗中规管，后来逐步演变为政治问题，这从规管方式的变化上就看得出来。隶属叙解军的安全机构或救国政府下属的行政机构，取代了已经解散的道德警察。其结果是，妇女虽仍面临压力，这种压力却不再主要是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毋宁说，它是由一种政治逻辑塑造的，与施加于更广泛的革命圈子的约束如出一辙。

叙解军领导层在妇女参政问题上并没有一套明确或一贯的主张。占上风的反倒是含混：持续的安全压力与对参政妇女迟疑的开放并存。然而紧张仍在，尤其是在政治化妇女的价值观与叙解军领导层所秉持的社会与宗教保守主义能否相容这一点上。归根到底，妇女问题已越来越与更大的革命问题、也就是该组织对政治反对派的管理交织在一起。叙解军的威权主义虽未消失，却世俗化了：它变得更多由控制的政治考量驱动，而不再由一项规范性的宗教工程驱动。其结果是，它的运作烈度相对较低，转而倚重更隐蔽的控制方式。

收敛锋芒：对意识形态中间派态度的转变

叙解军在革命上的重新定位，带来了它威权掌控的相对松动。这种掌控虽仍存在，烈度却减弱了。推动这一转变的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叙解军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反倒降低了它对强制的依赖。革命阵营已经缩小、也不再那么强硬，许多人不再把叙解军看作不可调和的敌人，而看作一个可能的——尽管别扭的——伙伴。其结果是，维持控制所需的公开镇压变少了。²⁴ 第二，叙解军的政治战略起了关键作用。叙解军开始去争取温和的多数，也就是那个组织松散、对抗性较弱、却有广泛

正当性的革命中间派,而只对强硬的少数、无论在运动内外,加强镇压。这一路数与后革命时期法国热月党人的战略如出一辙:在那里,巩固权力的办法是把国族从恐怖统治的过头之举中拯救出来,同时把激进派系挤到一边。²⁵

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不敏感,而在当地监测局势的人权组织却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巴萨姆·艾哈迈德(Bassam al-Ahmad)指出:

叙解军对待革命圈子的政策正在演变。逮捕人数在下降,狱中酷刑的烈度也在减弱。这可以归因于若干原因。第一,由于外流或境内流离失所,这个圈子小了很多。此外,当地的革命者也明白自己的限度和红线在哪里。局面仍有问题,尤其是审判缺乏透明、也没有辩护律师。但总的说来,这里的逮捕比自由叙利亚军各派系控制的反对派地区要少。²⁶

萨拉·卡亚利(Sarah Kayali)根据自己为人权观察所作的局势监测,也观察到随着叙解军霸权固化,政治压力的下降明显放慢:

他们过去压制得厉害得多,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目标是削弱现有的竞争性结构。等到确立了霸权,第二阶段的压制就转向限制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那段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活动人士和记者。这么做是为了把这些人 与外部世界隔开,并向伊德利卜内部的人传话:与外部捐助方的任何联系都会被视为可疑。不过,在2019年间,由于活动人士发起了协同的行动,把内部抗议与外部媒体报道结合起来,记者与活动人士被捕的情况减少了。²⁷

在当地,年轻的活动人士证实,社交媒体仍是严密监控之下的空间,在上面发表对叙解军过于尖锐或刻薄的内容,可能招致吊销记者证、收到正式警告一类后果。威权控制虽有松动,这种松动仍是局部的,以至于人们对当下究竟有多大政治空间可供行动与批评意见分歧。习惯于街头动员的年轻革命者,对叙解军在公共政治表达上的做法看

法不一。有人看到的是谨慎的开放,也有人仍怀疑该组织是否愿意容忍异见。举例来说,哈雷姆的一位年轻活动人士就观察到:

现在是可以抗议的。反对安卡拉与大马士革接近、支持革命,等等。但我们知道也有红线,比如伊德利卜的权力结构、经济事务和对外关系。我们在媒体上发声时,我会接到电话和警告,但不再被捕了。²⁸

另一位活动人士提到:

活动人士组织的自发抗议,多数是反对安卡拉向大马士革开放、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反对政权的饥饿政策。也有几次抗议是针对本地局面的,要求释放叙解军关押的犯人,或者抗议物价上涨。叙解军容忍这些抗议,除非抗议者转向挑衅和辱骂,否则不抓人。²⁹

在第三位活动人士看来,压力并不是冲着中间派去的,动用街头抗议也未必是革命初期那批中间派活动人士的做法。威权主义的延续影响到的——或许主要影响到的——是支持阵线昔日的据点。举例来说,2022年,达纳附近的基利村有激进青年被捕,引发抗议示威,该片区的安全监控随之加强。“村里的年轻人以激进著称,叙解军很想把他们中和掉。于是就有了这一轮任意逮捕与抗议的循环。但这个过程很慢,因为这些圈子正是当年让沙拉在2015年解放伊德利卜的突击力量。”³⁰

185

本地革命精英,即那些在起义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如政治活动人士、知识人与社区领袖,也注意到了威权主义的松动。举例来说,伊德利卜省政治委员会(*al-Hay'at al-Siyasiyya*)驻萨勒金的一位成员就指出,威权主义的松动、“社会惰性”的重新发现(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曾就法国大革命提出这一概念)以及内部转变,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开始,支持阵线没有本事,一门心思要改造我们:禁水烟、逼女人戴面纱(*niqab*)、强推道德纠察。等他们把别的派系收拾掉了,就向社会敞开了。他们开始寻找与社会的交汇点。是的,我被抓过,但他们待我不错,把我放了,还道了歉,请我跟他们一起干。我拒绝了。起

初他们把自己的正当性建在圣战上，后来建在伊斯兰上，再后来建在行政上，最后建在社会接受度上。所以他们一点一点变了，不再批评革命旗帜，放弃了忠诚与决裂 (*al-wala wal-bara'*) 这类制造分裂的宗教概念，接受了公开庆祝，等等。他们不再想改造人，又开始批评自家的激进分子。事实上，如今在变的是他们，而不是社会。³¹

叙解军开始推行低烈度威权主义的模式，越来越倚重约束的内化，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执行。今天仍留在伊德利卜的政治机构之一叙利亚民主人士联盟的一位成员证实：

经过所有那些对抗之后，我们陷入了一种自我克制的逻辑，对此我们很遗憾。我们自我设限，动员时犹豫不决。你看到媒体活动人士不断受到威胁、批评叙解军有时还会被抓，到头来我们就不敢太活跃了。在叙利亚民主人士联盟，我们只是维持自己的网络，怕遭报复而不敢抛头露面。³²

186

在妇女议题上，同样可以观察到威权主义的松动。一位女性活动人士说：

直到三四年前，道德警察还设有一个妇女科，会出面施压，主要靠外籍妇女，多数是突尼斯人和埃及人。这在公民社会组织中引起了公愤。有一次，这些妇女在市场上遭到殴打。即便如此，叙解军还是退了一步。道德警察如今已不复存在。曾经有过一个虔信兴盛中心 (*Markaz al-Falah*)，监视我们妇女团体的活动，但连他们的动作也越来越有节制。他们在，开着车，却不再出面干预。他们到我们组织来，我们谈了谈，说清楚我们能做什么，他们就走了。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比起劝善，他们更有兴趣的是搜集信息。他们在市场上，却不再干预。就更大的范围看，我们观察到保守式的男女混杂又回来了，化妆品也重新出现，如此等等。³³

不过，公共空间里道德压力的减轻，确实伴随着对政治化妇女组织的政治与安全压力的松动。安全上的骚扰是持续不断的，包括调查、传唤、行政上的刁难、对活动的严密审视、索要报告，以及威胁不给这些

妇女所领导的组织续发许可，这些往往由发展局 (*Maktab al-Tanmiyya*) 经手。与男性一样，由于这种相对拿捏得当的压力，妇女把约束内化了，自行限制了自己的行动。正如一位活动人士所说：

我们仍然担心叙解军的变化只是表面文章。我们仍要接受讯问，哪怕他们说只是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我们知道，比如与公民权有关的活动是敏感的，所以我们发布得很少，也限制自己的行动。³⁴

事实上，据另一位活动人士说：

过去一年里，调查明显加强了。所有女性活动人士都被调查过，有些人的组织还遭吊销许可。我在办了一系列线上会议之后受到调查。我们觉得这些做法出自该运动的下层，而且那里弥漫着一种担心：怕我们接受外国援助，散播可能与他们的价值观相抵触的价值观。因此，与该运动的领导层对话对我们至关重要。³⁵

187

尽管如此，仍有活动人士被杀害。拉伊德·法里斯 (Raed Fares) 和哈穆德·杰奈德 (Hamoud Jeneid) 是叙利亚知名的活动人士与记者，以公开批评包括叙解军在内的多个团体著称。他们以卡夫兰贝尔为基地，借助媒体、尤其是独立电台广播，为民主、公民权利以及叙利亚革命最初的理想发声。法里斯尤其因其别出心裁的抗议标语和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而获得国际声誉。两人都因自身的行动而屡遭威胁，最终于 2018 年 11 月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暗杀，许多活动人士把这笔账算在叙解军某些指挥官头上。

亲近沉默的大多数何以养出军阀化

就在对革命圈子谨慎示好之际，也正当沙拉谋求公开与德鲁兹人和基督徒群体和解之时，叙解军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对伊德利卜以北、朝向阿夫林方向、由其他武装反对派团体控制的地盘发动了突然攻势。叙解军部队离开伊德利卜的据点，越过加扎维耶过境点，迅速夺取了土耳其边境线上的小镇坚迪雷斯。数百名战斗人员突然出现，土耳其猝不及防，随即出面干预，坚持要叙解军尊重既有的势力范围、撤回伊德利

卜。对峙持续了三天，其间叙解军部分后撤，同时在分界线一带巩固阵地。最终，在土耳其的压力下，叙解军于2022年6月底完全撤出了叙利亚国民军控制区。

叙解军把这次进犯说成是先发制人之举，并力图安抚土耳其，把它描述为对其宿敌大叙利亚阵线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不得不作出的回应。据艾哈迈德·沙拉说：

188 我们邻居之间的紧张，意味着我们自家队伍里的紧张。在伊德利卜抓到的7名伊斯兰国头目，全都是从那边来的；伊斯兰国在那边公开活动，成员被吸纳进某些派系。我们也在各派系的力量对比中维持平衡。我们担心大叙利亚阵线的扩张野心，它想主宰北方。他们每次企图扩张，我们就把平衡恢复过来。政权可以利用这些紧张。我们必须不让任何人打开作恶之门。我们的抱负是维持均势而不制造混乱。³⁶

叙解军最关切的，是大叙利亚阵线与伊斯兰军之间日渐结成的同盟；伊斯兰军是一个萨拉菲派系，历来敌视支持阵线。两者都因政权在大马士革古塔击败的团体大批投奔而增强，而古塔在伊斯兰军重新落地北方之前正是它的据点。但这套解释并没有说服土耳其人。据一位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分析人士说：

有一阵子了，叙解军一直想在北方扩大影响力，但我们反对。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与他们在伊德利卜有一笔交易，给了他们一些权力，但不包括阿夫林。别的地方由我们说了算。他们脑子里总有这么个念头：北上去控制别的团体。叙解军领导层想北上，是要立规矩、减少混乱。土耳其承认他们有组织能力，但不会接受这一点。³⁷

第一次进犯使与土耳其的关系略有紧张。³⁸在西方外交圈子里，攻打反对派派系一事让人对叙解军所谓的转变的可信度更添疑虑。它看上去与该组织自称的种种努力相抵触：与萨拉菲主义拉开距离、推行内部去激进化、围绕革命理想在政治上重新定位，以及向少数群体社群伸出手。³⁹

尽管政治代价高昂,叙解军还是往前推进。2022年夏,该组织发起了一场密集的争取行动,拉拢各路愿意归附其扩张影响力的武装派系。这次“北进”在叙解军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一些领导人主张激进扩张、以统一全部解放区,另一些人则把与土耳其保持稳定关系放在首位。以敢冒险著称的艾哈迈德·沙拉最终倾向于扩张战略,只是带着精心的谨慎。⁴⁰这次争取的对象包括与大叙利亚阵线有冲突的团体、此前被叙解军击败而遣散的旧部,比如赞吉运动的某些成分,甚至还包括大叙利亚阵线内部的派系。通过结成战略同盟与收编,叙解军谋求巩固自己对叙利亚北部的掌控,尽管与土耳其的紧张持续、西方行为者也心存疑虑。⁴¹

189

2022年10月12日与13日,叙解军再度对前自由叙利亚军(FSA)的各派系动武。它用惯常的说辞,即大叙利亚阵线构成威胁,来为攻势辩解,对内则把它说成保卫北方、抵御政权可能发动进攻的必要一步,并把北方称作“革命最薄弱的一环”。⁴²叙解军打着统一反对派队伍的旗号发动第二次闪电战,再次打了土耳其一个措手不及。不到两天,它的战斗人员就完全控制了库尔德人聚居的阿夫林地区,仅在阿勒颇北部几个自由叙利亚军重要据点的外围停下,起因是土耳其于10月13日斡旋达成停火,同时土耳其军队直接发出军事报复的威胁。⁴³与6月第一次进犯不同,这次北方攻势引发了真正的战斗,主要是对伊斯兰军和大叙利亚阵线核心力量作战,造成约10人伤亡。虽然叙解军主力几天后撤回了伊德利卜,但有报道称他们在阿夫林保持着隐蔽存在,混在盟友派系之中,以确保在该地区的持续影响力。

此举激起了土耳其军方官员的愤怒,他们视阿夫林为自己拿下的地盘。尽管叙解军部队小心避免与土耳其军队正面冲突,土耳其军方仍在叙解军控制区与阿夫林及阿勒颇北部原叙利亚民主军据点之间划了一道清楚的界线。⁴⁴土耳其坚决反对叙解军北扩,把这次进犯视为对其地区战略控制权的直接挑战。美国也谴责了叙解军的冒险主义,重申它仍在恐怖组织名单上。不过在地面上,第二次北进远谈不上失败。它暴

190 露了该地区各派系的虚弱与不得人心，也凸显出叙解军在阿勒颇以北与阿夫林的派系世界里所作收编行动之成功。

面对该地区两个主要对手，即出自阿勒颇的伊斯兰主义派系大叙利亚阵线与原本出自大马士革古塔地区的萨拉菲团体伊斯兰军，叙解军成功地与多个派系织起了一张同盟网，包括哈姆扎特师、苏莱曼沙阿苏丹师（又称阿姆沙特）、大叙利亚自由军、沙赫巴联合体、穆拉德苏丹师、起义者、穆阿台绥姆师、第 50 师，以及数百名自大叙利亚阵线倒戈者。这些协议带来互利，包括叙解军对这些团体的保护、安全合作以及经济安排，尤其是在保障贸易通道方面。叙解军对大叙利亚阵线就其自叙利亚东北部进口石油所征之税尤为不满，这给双方的对立又添上了经济与政治层面的紧张。⁴⁵

驻阿扎兹的一位武装团体指挥官对叙解军略有批评，此人曾任某地方议会负责人，他承认：“由于各武装团体不顶用，人们未必对叙解军看法负面。”一位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还讲述了一次反叙解军的革命协调机构会议，会上一位妇女问道：

作为革命者，我已经不知道该跟谁站在一起了？如果沙拉不在名单上，他难道不比阿布·阿姆沙[一名地方武装团体头目]更好吗？救国政府难道不比叙利亚临时政府更好吗？革命阵营内部确有真正的分裂。各派系在平庸上倒是一致的。⁴⁶

叙解军的推进几乎没有遇到军事抵抗。据一位观察者说：

泰勒里法特的军事委员会在交火后中止了自己在第三师中的成员资格，没有参战。撒马尔罕旅也拒绝作战。来自贾拉卜卢斯、原籍曼比季的一些派系没有参加。大叙利亚阵线的许多地方头目与沙拉关系不错。主要是伊斯兰军和荣耀师站在对抗叙解军的最前面。⁴⁷

191

当地的反应主要由武装团体推动。多位见证者断言，是本地派系发起了抗议。在阿扎兹，大叙利亚阵线及其附属组织领头示威；在巴卜，则是伊斯兰军起主要作用。⁴⁸

这些新的进展大大削弱了叙解军晚近在西方与土耳其两边的外交定位。该组织此前一直努力与全球圣战拉开距离,西方的观感也在逐步转变:叙解军越来越被看作威胁较小者,在某些圈子里甚至被看作管理其控制区内外国武装人员的潜在伙伴,或者对人道主义行为者而言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尽管如此,这些行动仍给许多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⁴⁹ 它们引发的担心是:这些较为友善的观感也许并不能充分反映该组织的真实意图。

叙解军虽然总体上避免与土耳其部队在其部署区内正面冲突,这些行动却仍迫使土耳其出面干预。土耳其要求叙解军拆除某些检查站,并封了道路,以阻断它在卡夫尔詹纳的推进。⁵⁰ 这一升级对叙解军与土耳其的关系造成了更直接的不利影响。据一位土耳其官员说:

他们进入阿夫林,就是在给我们的体系制造巨大压力。阿夫林不是伊德利卜。我们在伊德利卜合作,是因为我们的军队进入伊德利卜是去支持他们的。在阿夫林则不同。那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未经我们同意进入阿夫林,他们必须明白,在我们军方看来,那就等于在跟土耳其军队作战。⁵¹

2022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一位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土耳其观察人士指出:

在军队看来,叙解军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但它的历史记录不言自明。自2020年3月停火以来,已有数名土耳其士兵在伊德利卜境内被杀——死于简易爆炸装置、反坦克导弹、火箭筒和轻武器。在军队看来,叙解军往好里说是无力保护他们,往坏里说是这些袭击的同谋。⁵²

这种两可态度凸显出土耳其与叙解军交往的脆弱,也凸显出塑造双方互动的深层紧张。

10月的对抗之后,叙解军暂时中止了军事攻势;但2023年2月的毁灭性地震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得以借软实力而非直接的领土控制来扩展影响力。应白盔组织之请,叙解军向该地区派出搜救队协助救

灾,那里援助匮乏、伤亡逾 1000 人。这使该运动得以在当地嵌入一支军事单位,借人道援助之名强化了自身存在。一个月后的 2023 年 3 月 20 日,武装团体东部自由军在诺鲁孜节庆祝活动中杀害了 4 名库尔德人,激起当地人的愤怒;他们长期饱受各武装团体的侵害。一些库尔德人转而寻求叙解军的保护,请求其领导层恢复阿夫林的秩序。遇难者遗体转送到叙解军势力范围内的阿特梅一家医院时,家属与沙拉见了面,而沙拉此时与当地社群的接触正日益增多。他们表达了对派系割据这一乱局的不满与拒斥,这就给了沙拉把叙解军呈现为稳定力量的机会。此举强化了叙解军在北方的正当性,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对手派系的可信度。

叙解军的北进分四个阶段展开:2022 年 6 月的象征性推进,夏季针对各武装派系的争取行动,10 月的全面军事对抗与领土斩获,最后是 2023 年 3 月地震之后的战略性软实力行动。这一序列凸显出叙解军对霸权的执著追求:它把收编、对抗与机会主义糅在一起,无视土耳其的存在及其明确的限制。土耳其力图把叙解军圈在伊德利卜之内,一面维持“间接统治”的战略,一面对加扎维耶过境点以东地区施加更严格的控制。然而叙解军一再挑战这些约束,同时借军事力量与政治手腕把影响力扩张到自己指定的据点之外。

叙解军的北进迫使土耳其重估它对叙解军已获影响力地区的治理方式,结果是土耳其加强了对其他武装派系的控制,并开始讨论增强自身的军事存在。⁵³此外,土耳其还着手削减武装团体的存在,通过减少检查站、代之以部署军事警察来减轻它们加于当地民众的负担。把监狱统一起来、交军事警察管理的工作,也在 2024 年之前展开。与此同时,军事力量撤出各城市,各派系的安全机关开始遭到拆解。关键的一点是:凡考虑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都收到警告,这么做将失去自己的薪饷,这进一步凸显了土耳其针对叙解军领土野心所作的战略再调整。

叙解军与它在伊德利卜的土耳其监护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战略上的猫鼠游戏,因为土耳其始终确信沙拉在不遗余力地推行一场多管齐下的北进。土耳其试图反制或遏制叙解军,该组织却一再调适:迫于压力

暂时后撤，随后又通过对抗、隐秘结盟以及机会主义的软实力行动（比如地震后的人道回应）重新伸张自身。一位土耳其官员承认了这一难题，他说：

我们不打算接受这个趋势，可沙拉还在继续。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多的地盘、更多的控制。沙拉起初把重心放在通过除名来取得国际正当性上，但随后又转回扩张主义，随着军事选项日益受限，他越来越倚重经济经营与战略伙伴关系来巩固在北方的影响力。⁵⁴

沙拉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土耳其保护者的地盘上豪赌军事冒险主义，冒着遭到直接军事报复的风险？在安卡拉的政治信用不断消耗之际，他又为什么还要坚持？热月这一参照又一次给出了启发。随着叙解军转向更务实、宗教色彩更淡的姿态，它反倒催生出新的政治抱负与军事上的强势。

不妨重温导言中已经引过的让-弗朗索瓦·巴亚尔那句话：“热月并不寻求为革命翻篇。它仍忠于革命，哪怕只是通过战争。”⁵⁵意识形态上的软化，恰与霸权冲动的增强同时发生。沙拉感到眼下的现状束手束脚，看到了两条出路。当时重启对政权的敌对行动是行不通的，因为土耳其划下了坚决的红线。于是，向北的领土扩张提供了一条出路：既可以挣脱自己在伊德利卜的微型国家，也可以把自己摆成革命的合法政治代表。为此，他力图把自己重塑为一位民族主义领袖：向德鲁兹人与基督徒群体伸出手，同时向苏菲派敞开，并有策略地庆祝革命，以扩大自己的号召力。

194

从这个角度看，2022年6月与10月对北方反对派派系的军事攻势，与同时推行的革命与宗教上的重新居中、以及向少数群体伸出手的政策，并不矛盾，而是同一套总战略的两个互补面。两方面的努力服务于双重目的：一面削弱对手派系以巩固叙解军的主导地位，一面把自身正当性拓展到传统的伊斯兰主义基本盘之外。⁵⁶通过军事扩张，叙解军伸张了自己的权威与领土控制；通过与少数群体打交道、接纳革命象

征,它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支民族主义力量而非教派运动,最终指向的是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叙解军力图推行一种能吸引全体叙利亚人的治理模式,尤其着眼于生活在政权控制下的人;它的领导层认为,无论这一判断是否正确,这些人身上如今蕴藏着最大的革命潜能。⁵⁷沙拉的一位顾问认为:

2017年以来,革命经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度化过程,各个社群都参与其中,也都在寻求彼此承认。伊德利卜作为叙利亚的多元缩影,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一个可能样板。叙解军设想的是一个伊斯兰的、同时又是民族主义的方案,它超出伊德利卜;它有别于穆斯林兄弟会一类团体,因为它强调的是逊尼派身份,而不是一个严格意识形态化的伊斯兰主义框架。争取少数群体虽不是核心优先事项,却是一种战略工具,用来厘清并巩固叙解军更大的政治愿景,把它摆成一支凝聚性的力量,而不是一个派系性的实体。⁵⁸

叙解军的终极抱负,是把自己摆成唯一有能力体现叙利亚革命叙
¹⁹⁵ 事的政治力量。这一战略包括系统地削弱大叙利亚阵线一类对手派系,同时逐步收编那些在土耳其控制下的叙利亚北部遭排除于同盟之外的团体。艾哈迈德·沙拉的旧日同僚阿布·马里亚·卡赫塔尼在推特上的一则声明,把这一愿景概括得很清楚:他把叙解军说成不可避免的霸主,是碎片化反对派唯一可行的替代者。他把叙解军称作“一个在所有解放区都已证明自身的完整方案的尖兵”,并把它与“那些质疑伊德利卜模式可信度、押注它会消失的人的现实”对照,说后者那里除了“混乱与不团结”别无他物。⁵⁹

与许多分析相反,沙拉并不是在与西方眉来眼去,而是把叙解军摆进既有的叙利亚格局之中,以不同方式同时对付政权与北方的对手反对派派系。他的目标是把叙解军立为最可行的替代者——无论这是否现实——同时让竞争者失去信誉。从这个角度看,叙解军在少数群体权利上的话语转变、它内部的去激进化努力以及它军事上的权力操弄,都服务于同一个总目标:在叙利亚反对派内部确立主导地位,而(截至本

书写作之时) 那里仍是其领导层竞争的首要场域。除了这次北扩之外, 大马士革早已——而且始终——在这位伊斯兰主义领袖的视野之中。¹⁹⁶

第九章 2024 年伊德利卜的阿拉伯之春：作为权力政治的去激进化

197

2024 年 3 月至 8 月间，一波规模不小的抗议公开与大叙利亚解放军（HTS）叫板，叙解军的治理由此面临一场严峻考验。一批本地行为者开始公开谴责叙解军及其治理，尤其是在人权与政治自由方面。诉求虽各不相同，这些抗议在根本上都是反威权的。它们矛头所指，是叙解军对权力的垄断与对伊德利卜省经济的掌控，以及总安全机构的任意逮捕与大量施加酷刑的案例。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这场抗议运动往往回响着 2011 年反阿萨德的说辞，让人得以更深入地看清宗教上的去激进化与威权政治结构这一现实之间的关系。

似曾相识的气味：2024 年伊德利卜的阿拉伯之春与人民的归来

198

2011 至 2012 年民众抗议与十年武装冲突之后，仅仅过了十来年，叙利亚社会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来。这一轮新的动员，打破了冲突已经“冻结”这一流行看法。几乎与此同时，街头再度成为表达政治不满与诉求的空间。在苏韦达，德鲁兹人对政权的反对日益激进化，自 2023 年 8 月起开始武装化。在东北部，部落起事与反对生活成本高涨的示威同样自 2023 年夏起蔓延开来。2024 年春，在土耳其与本地武装团体主宰下的阿勒颇北部，示威者对若干落户当地的武装团体的地方统治提出了挑战。

伊德利卜于 2024 年 2 月 25 日跟进。那天晚上，几十个人聚集在边境小镇萨尔马达的广场上，抗议叙解军自家内部安全机构总安全机构

的任意逮捕与虐待。这一轮新的动员，属于一场反威权的“民众运动”（*hirak*），而这样的运动早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就已上街要求改革。但在 2024 年，民众运动规模更大、持续更久，也更激进。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叙解军控制的全部地盘。它的诉求越来越政治化，参与者也是新的、多样的。它还很持久。抗议持续了半年多。这段时间里，约 3 万人以各种形式参加了示威，宣泄愤怒与不满。¹

2011 年的影子清楚地体现在这轮新抗议所用的方法上。它们借用了 2011 至 2012 年活动人士网络首创的动员技巧，标志着协调委员会（*tansiqiyyat*）与基层互助结构的回归。村际互援（*faza'a*）——即面对镇压时村与村之间的战斗性声援——这一做法也重新出现，同时回潮的还有旧日反政权的口号，只不过如今把巴沙尔·阿萨德的名字换成了沙拉。这些口号包括“人民要朱拉尼下台”“让总安全机构垮掉”“我们要囚犯回来”“不要朱拉尼也不要阿萨德，我们要建设国家”“凭真主起誓，让朱拉尼滚开”，不一而足。²在叙解军的批评者看来，结论很清楚：叙解军不过是政权威权主义的本地翻版。正如一位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头目所说：

沙拉表面上听一听，承认一些错误，许诺改革，试图收编或腐蚀地方头面人物，甚至把责任推到伊斯兰主义者身上。然后他就搬出一个更高的事业来压制异见——对叙解军来说是对政权的圣战，对阿萨德政权来说是抵抗以色列。到头来出现的，说白了就是一个警察国家。³

这种似曾相识（*déjà vu*）之感，给这个基地组织前分支的改头换面之举投下了阴影。沙拉虽然放弃了激进的宗教观点、遏制了萨拉菲主义，却仍牢牢待在中东威权主义的框架之内。乍看之下，他与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十分相似：一面松开宗教激进主义，一面收紧威权统治。然而细看之下，伊德利卜呈现的其实是另一种动态：宗教激进主义的松动，似乎与威权主义的略微松弛同时发生。

要探究这一点，就有必要回顾抗议的动态，以及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是如何应对的。随后，我们再来考察叙解军阴暗的一面，即它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挥之不去的关系。

人民的热月式疲惫及其被工具化

吊诡的是，在叙解军治理数年之后，恰恰在大规模对抗趋于平息之际，民众中间却生出深深的疲惫。一方面，停火为新的诉求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一个多年来靠有限的余粮撑下来的社会，已经到了临界点。⁴ 战争不再是遮挡的烟幕，各地的驻守力量如今都要在治理问题上受到追责。热月提醒我们：革命或战争的结束，永远是一个有风险的时刻。⁵ 在政治上，重归平静是革命最危险的阶段。正如叙解军一位高层所深知的：

年复一年，我们成了执政的力量，到某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跟你算账。我们走出了全面对抗，诉求随之上升，而这是建立在多年来对叙解军累积下来的恶感之上的。我们在为稳定付出代价。⁶

在伊德利卜，民众中间的普遍感受是：秩序的回归固然广受欢迎，代价却是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过度管控。“安全部门为什么要插手贸易？”民众运动的一位领袖抱怨说。

200

“为什么随便哪个商人都得找个安全人员——几乎无一例外是支持阵线的旧部——来当合伙人？安全部门在民事领域太无处不在了。我把材料交给教育部，结果被驳回。”⁷

对叙解军过度管控的疲惫，再加上它的威权做法，在总安全机构羁押场所施加酷刑一事公开曝光之后进一步加剧。这些内情是2023年末流出的，起因是叙解军领导层怀疑某些干部与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军勾结。大规模清洗导致逾135名成员与高层被捕。这引发了多起叛逃，有人逃往其他反对派控制区，甚至逃向政权一方。⁸ 叙解军的内部分裂与其说是务实派与强硬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如说是内部的派系角力，而这些角力往往由地域归属所塑造。据说紧张关系源于宾

尼什出身的头目与叙利亚东部出身的头目之间的竞争。多年来,艾哈迈德·沙拉一直设法削弱叙解军激进一翼的影响力。然而,在认定存在内部阴谋之后展开的这轮镇压,却是由该运动安全部门首脑、2025 年 3 月之后出任内政部长的阿纳斯·哈塔卜主导的,而当时许多人视他为强硬派。与此同时,卷入所谓政变的人物如阿布·马利亚·卡赫塔尼,虽对沙拉持批评态度,却把自己摆在光谱上更“温和”的一端,实际上是从那个方向对他形成夹击。这轮逮捕导致叙解军前干部普遍遭受虐待。

叙解军对自家干部的这场镇压,在内部与更广泛的支持群体中都激起了哗然。艾哈迈德·沙拉公开承认了这些侵害,还亲自登门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提供经济补偿。然而,随着酷刑幸存者开始发声,他们的家属也提高了嗓门。这引发了一波公开的异见,政治与军事力量又进一步把它煽起。其中包括伊斯兰解放党(Hizb al-Tahrir),这是一个非武装的伊斯兰主义团体,宗旨是恢复伊斯兰哈里发国,它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成员。此前脱离大叙利亚自由军、后来短暂并入叙解军的自由人军,同样对本方成员遭受酷刑一事感到愤怒。抗议爆发了,尤其是在宾尼什以及各处难民营,要求问责与公正的呼声由此放大。据动员的一位领袖说:

我们在经济上被扼住了喉咙,而叙解军不肯容忍任何不在其核心圈子里的人。除此之外,言论自由还一直受着压力——连昔日革命者的聚会都被禁止。这一切养出了深深的挫败感。等到清洗开始、安全部队动手抓叙解军自家军队的成员时,一波针对沙拉的新抗议就被点燃了。民众普遍的不满,随后与被镇压波及的军人的具体怨愤合流,进一步给动荡添了柴。⁹

随后诉求升级了。最初几天,诉求主要集中在终止任意行为、争取释放被羁押者。然而到 3 月中旬,几乎每日一场的示威已开始承接革命精神,迅速蔓延到叙解军控制区内的各个城镇。宾尼什、阿尔马纳兹、塔文、福阿、萨尔马达、达纳。据一位本地组织者说,很快“恐惧之墙就倒了。头几场示威之后,伊德利卜市跟了上来。就跟 2011 年一样,因

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施过酷刑、杀过人的团体。只不过没有政权那么坏，因为它的资源少些”。¹⁰

老资格的革命者及其久经历练的活动人士网络，成了民众运动的中坚。3月15日革命周年纪念日，是他们介入的高峰。然而，2011年的那批革命者也面临不小的难题。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大体上不参加动员；许多已经制度化，失去了上街的冲劲。更广泛的革命圈子也有分裂：有人抱着最高纲领派的立场，要求彻底变革；另一些人则采取更务实的路数，主张通过改革让这个体制更具包容性。后一派坚持认为，鉴于并不存在现实的替代者，改革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正如一位在民众运动期间被关押的领袖所解释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现实：叙解军唯一的替代者就是政权。我们能与叙解军共存，却不能与政权共存。”¹¹ 革命者组织不力，又常被人盖过风头，很难取得这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面对的难处，既来自那些为重新谈判自身权位、或为了让本派系重返影响力而加入抗议的叙解军前成员，也来自另一些人的顾虑：把叙解军逼得太紧，要么会招致自身覆灭，要么会无意中壮大政权。

到3月末，叙解军收编这场运动的种种尝试已经放缓了它的势头。社交媒体页面调子一变，对叙解军前领导人转为更低调、甚至带嘲讽的姿态。动员一度消退，当月晚些时候又被各派系重新点燃。小规模示威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轮转，由不同团体带头：伊斯兰解放党、大叙利亚军团、大叙利亚自由军。一位观察者指出：“我见过示威在宾尼什晚上7点半开始。有150个人，他们往萨尔马达走。然后从萨尔马达到伊德利卜。”¹²

内部分裂与彼此竞争的议程也使这场运动四分五裂。分歧出现在现实派与最高纲领派之间：前者主张务实的诉求、主张与叙解军对话，后者则拒绝任何谈判。代表2011年革命的旧政治机构保持沉默，留下了领导权的真空。伊斯兰解放党一类宗教民粹团体呼吁严格施行伊斯兰教法；阿布·胡马马·哈拉比（Abu Humama al-Halabi）法官这样的伊

伊斯兰主义民粹人物，则把狱中的侵害归咎于伊斯兰教法未获施行。另有人从更强硬的立场批评叙解军，指责它一贯反对设立宗教警察。

派系利益使这场运动更加复杂，其中包括要求释放阿布·舒艾卜·马斯里这类强硬派——此人是被逐出该运动的叙解军前教士——以及伊斯兰解放党持续带头的示威，参加者往往有囚犯的妻子。机会主义的昔日弃儿力图借抗议来谈判自己重返政治舞台，行业性的诉求也浮了上来，比如教师工会抗议要求补发拖欠的薪水。这些彼此竞争的说法与议程使运动碎片化，冲淡了它的焦点与凝聚力。

203

在这样一片碎裂的图景中，一位 2011 年的活动人士观察到：

抗议者严重两极分化。有人想把时钟拨回去，也有人仅仅因为“协商委员会”这个说法听着像宗教的就加以拒斥。二十来位革命者的讨论里，有人批评叙解军，也有人承认：哪怕一年前，他们都想不到选举竟会成为可能。

这场运动的领袖往往缺少统合其代表性与诉求所需的筹码。正如一位活动人士坦言：

咱们把话说明白：革命者是弱的。我们没法要求阿布·马利克·塔拉伊 [被逐出该运动的叙解军前强硬派]、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 (Abd al-Razzaq al-Mahdi) [一位民粹教士] 这类有影响力的人物让位。有时他们会把自己或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因为说到底，谁掌着话筒谁就掌着议程。我们不想疏远那些至少还守着基本游戏规则的关键人物。

最终，只有伊斯兰解放党遭排除于这场运动之外，只得另择时间地点组织自己的示威，这就更加凸显了民众运动的碎裂本性。

战略耐心及其之外：叙解军对民众运动的多层次回应

民众运动在原则上广受认可，却因其过头之处与易受操弄而令人忌惮；叙解军为此定下应对方针。据沙拉的一位顾问说：“我们对民众运动的回应是战略耐心、密集对话，以及划出清楚的红线，尤其是涉及主权部门的时候。”¹³ 叙解军很快看清了这场运动的碎裂本性，并部署

了多管齐下的战略来应对。这包括施加安全压力、发出威胁、偶尔采取强硬的人群管控手段¹⁴，以及组织反示威，而这类反示威往往借重那些已收编进叙解军所设代表机构的部落头人。该组织还请本地名流出面开导抗议者，并支持“改革倡议”一类第三方动议，以摆出妥协的门面。与此同时，叙解军也作出战略性让步以回应具体的怨愤，比如释放囚犯、¹⁵ 调整税负、¹⁶ 压低面包、电力、白糖等必需品的价格。就更长远而言，它力图通过提出整套政治与制度改革方案来缓和动荡，既回应民众诉求，又保住自身权威。

然而，面对各派系对民众运动的利用，叙解军重申了它对激进派系的强硬立场：

政治与军事组织一直试图借民众运动推行自己的议程。可我们很快就碰到了红线，因为这些团体把与我们的关系看成零和博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对与宗教卫士组织〔基地组织分支〕结盟的团体，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吉斯尔舒古尔就是一例。你请他们来对话，他们的回应却是把你说成叛教者或不信者，甚至诉诸暴力，比如炸弹袭击。对付过激者（*ghulat*），光靠遏制是不够的。¹⁷

总体而言，叙解军对抗议的立场更为细致。“民众运动并不是纯粹的坏事，”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说，“它也逼着我们去处理那些我们一直忽略的问题。在最初阶段，民众运动是民间的、民众性的，诉求可以接受，并不威胁我们的机构。”¹⁸ 沙拉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承认这些抗议出乎意料：“这些示威对我们完全是个意外。许多诉求是正当的，我们认为与其对抗，不如去适应。”¹⁹

自2024年3月12日起，叙解军开始与本地名流和民众运动的活动人士会面，商讨一项实质性的改革方案，以化解日渐壮大的抗议运动。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叙解军宣布了一揽子制度改革。其中有四项改革，对评估叙解军在应对抗议时的威权倾向尤为重要。第一项改革是设立一个咨议会，让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有一个就战略与军事问题发表意见的平台。不过，这个机构将完全由委任产生，且只有咨询职能，说

明决策权并无实质变动。第二项改革涉及立法议会（协商委员会），席位将由 90 席增至 160 席。议员将经由区域选举团选出，既添上一层代表性的外观，又保留了叙解军对整个过程的掌控。叙解军还计划强化地方议会的作用，使之与地方政府和市政部相配合。据受命起草地方议会新法的委员会一位成员说，此举被说成是要“把 2011 年的革命者重新拉回博弈之中”。²⁰ 这些变动表面上意在回应怨愤，实则受严密控制，以确保叙解军的主导地位。

最后一项关键改革涉及安全部门的重组。这些宣布听上去令人期待：情报机构将不再有直接的逮捕权。总安全机构将转归总安全管理局统辖，而后者向内政部负责；羁押中的虐待也将停止。但这些变动仍将处在总安全机构前首脑阿纳斯·哈塔卜的督导之下。

革命者内部有分歧。一边是最高纲领派的强硬人物，断然拒绝任何妥协。另一边则是持较细致看法的人，他们认可，而且是肯定地认可，改革方案中有一部分直接对应了示威中提出的诉求。不过，他们的抱负并不高：

我们当然知道叙解军想抓住权力。但只要我们能哪怕逼出一点点参与，那就已经是成功。我们想要的是参与事务的政治管理，但不是在叙解军的伞下。叙解军想收编我们，我们争取的却是一个独立公民行动的空间，不受任何武装团体控制——不管是叙解军还是别的谁。²¹

叙解军在让步、承诺制度改革乃至有限开放政治博弈方面，一直采取着一贯的步骤。它的算盘是什么？在艾哈迈德·沙拉看来，

我们不知道谁会进协商委员会，我们冒的风险是弄出一个非常混乱、非常两极化的协商委员会，而它还握有以前没有的权力，比如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可你又不能把太多权力下放给一个完全碎裂、根本玩不了制度游戏的政治光谱。这里头是有风险成分的，但另一方面，战略耐心与对话确实让街头平静了下来。事实上，如今 90% 的示威者已经回家了。²²

他的一位顾问同样认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是重归平静所要付的代价：

我们不知道这些选举会选出什么来，我们将不得不去适应由此造成的新现实。新的协商委员会将能够质询部长、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显然，我们冒的风险是让政府背上过多的期待，而它不过是一个危机管理政府。²³

不过两人都同意，协商委员会最终在战略问题上不会有多少权力，那些问题将由一个委任产生、非民选的小型委员会即咨议会来讨论。显然，风险不会超出一定的添乱能力。

被革命所缚：叙解军宽和的威权主义

民众运动持续了约半年，随后趋于边缘。但它究竟揭示了叙解军威权主义的什么，更广泛地说，又揭示了宗教激进主义的松动与政治威权主义的松弛之间是什么关系？协商委员会一位前成员如今是叙解军的批评者，他提出这样的看法：“在宗教教义上确有实实在在的进步，可这并没有转化到政治领域。那种旧的等级心态，即组织本位的心态（*hala tandhimiyya*），还在，而意识形态上的积极变化主要是强化了这个运动对权力的胃口。”²⁴ 这是不是又一个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式的翻版？或许不尽然。不过，这位前武装人员的观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宗教激进主义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究竟如何互动。虽然激进主义的减少与政治威权主义的烈度之间并无直接因果，但平心而论，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那一例而言，伊德利卜确有值得细看的显著相关。

207

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远不止于“战略耐心”或仅仅重申红线——比如保证战略性部门顺畅运转——它采取了更主动的做法。它对运动领袖施以定点威胁，偶尔还对示威者动用肢体暴力。²⁵ 这些行动意在孤立民众运动的各条战线，打断村际互援即城镇之间声援的势头。为阻碍活动人士流动而设的检查站往往手段粗暴，恫吓潜在的抗议者，强化恐惧

的气氛。不过,人群管控措施仍相对克制:半年间只记录到几十起逮捕,多数人很快获释。²⁶ 受伤事件极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死亡。

叙解军的人群管理并非只靠强制,远非如此。解放区行政机构是直属艾哈迈德·沙拉的机构,由负责管理并化解地方局势的伊斯兰主义技术官僚组成,它主动与示威者对话。抗议者时常批评该地区行政机构无力处理更广泛的政治诉求(那些问题本就不在其职权之内),但这些对话往往有与叙解军一致的本地名流参与,并常常促成地方性的协议。这类协议最常见的是围绕逮捕问题的了结。

叙解军还小心避免全盘否定这场抗议运动。叙解军在评估民众运动时固然常常强调竞争性派系的影响,实际做法上却也表现出细致的分寸:它把特定团体在安全与政治上的操弄,同这场运动更广泛的诉求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落实为差别对待。对更广泛的运动,对话始终是一项持续、多层次的做法。参与其中的行为者五花八门,从艾哈迈德·沙拉本人到本地名流,还有救国政府、叙解军政治局与解放区行政机构。

该运动领导层所定义的“治安理解”²⁷并不质疑抗议的正当性,叙解军也从未把民众运动界定为敌人。恰恰相反,该运动的领导层对这些抗议表现出相对清醒的理解,把它们看作一些广受承认的问题——比如酷刑盛行——所导致的结果。这些抗议出现在停火趋于稳固的阶段,那时执政当局对一个比战时更为挑剔的平民群体日益负有交代之责。抗议者往往表达的是正当的怨愤,领导层的回应也据此拿捏分寸。另一边,最高纲领派虽然存在,多数人却避免对抗。这份克制源于一个共识:在当时的条件下,想不出任何可信的替代者能取代叙解军的主导地位。

归根到底,叙解军不只是管控了抗议,也提出了一些改革。为了从结构上化解这场运动的动员,其领导层部分或全部接纳了抗议者的一些诉求,比如释放囚犯、重振地方议会,以及为协商委员会引入选举。

在 2024 年 12 月胜利之前,要全面评估这些承诺的政治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叙解军确实通过一部选举法接受了以选举产生议会精英这一原则。虽然一部法律的内容往往不如其施行来得重要,这部法律摆出

的姿态，是回应当局所面临的一场真正的正当性危机，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叙解军如何设想政治变革与转型。

要更好地理解这部新选举法，就有必要把立法过程与法律内容分离开来。就过程而言，有几点很突出。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部法律是叙解军对民众运动的让步，而民众运动此前一直要求一个更有代表性、由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组建委员会负责起草选举法一事，是在3月叙解军领导层与一批领袖、技术官僚及其他知名人物的讨论中敲定的。

209 最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同样体现出亲反对派的立场，却没有纳入最高纲领派的成分。这个七人委员会包括3名独立技术官僚和4名自认是革命者的活动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里没有叙解军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²⁸ 据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伊萨姆·赫莱夫（Essam al-Khleif）说：“当局把球踢到了我们这一边，对我们说：把你们的立场统一起来，拿出一部能解决协商委员会代表性问题的法律。说真的，当局没有真正干预。”²⁹

在叙解军是否干预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伊萨姆·赫莱夫的说法大体正确：叙解军基本上没有插手最高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最初，最高选举委员会曾提议把候选资格限于“革命者”，即那些在2014年1月1日之前居住在叛军控制区的人。这一标准本会把伊德利卜市相当一部分人口排除在外，因为该市2015年才从政权手中夺回。这样一来，它也会使协商委员会失去许多如今在叙解军控制区活动的技术官僚。在与沙拉的亲近之人商议之后，最高选举委员会最终同意放宽立场。叙解军在这一点上固然干预了，结果却是候选人范围更广，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性反而提高了。

接下来是妇女参与的问题。最高选举委员会起草的这部法律并未明确反对妇女参与，但这个话题仍有争议，即便在革命者中间也是如此。有些人，比如该委员会主席，虽然并不积极鼓励女性参选，却也不反对。³⁰ 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更多保留。最高选举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说：“妇女可以投票，大门是开着的。可要当候选人？不行，因为这份差事

对男人都已经够难了，何必再把妇女牵扯进来？”³¹ 一张讨论现场的照片流出后，争论更加激烈：照片背景里的展板提到妇女与少数群体有可能进入协商委员会。这引发了争议，保守圈子诉诸民粹说辞。有人指责沙拉是想讨好西方，³² 是拿协商委员会改革来“推销女权主义、破坏真主的律法”，³³ 甚至是在充当“革命民主化的代理人”。³⁴ 面对这一轮反弹，并应最高选举委员会之请，叙解军不得不为委员会成员提供保护。²¹⁰ 为求折中以化解紧张、安抚强硬派，一位委员会成员说：“为了平息火气、安抚鹰派，我们就说我们不会推着妇女去参选，但她们要是想选，可以选。”³⁵

考察过立法过程之后，我们再来看法律的内容。不必在技术细节上花太多篇幅：这部法律糅合了传统法律框架（部分受伊斯兰教法原则影响）与既往立法，整体上体现出受控的治理路数。法律的架构与条款显露出双重动态：一方面确有引入开放要素的真诚努力；另一方面，其框架仍扎根于一种法律传统，在这种传统中立法机构大体只承担咨议角色。这一路数是从绝对统治向更具代表性的治理形式过渡的体系所特有的。法律中对监督与资格的强调，凸显出有意维持对政治代表权的控制。有意思的是，叙解军在起草过程中的干预极少，唯一的一次介入是要求删去对革命的忠诚这一标准，而此举最终扩大了包容性。

这些特征使这部选举法与半威权政体的做法相合：在那类政体里，选举首先是为执政当局提供正当性，而不是促成真正的政治竞争。它的几项关键特征——严密控制的候选人遴选、对选举过程的集中督导、受限的政治多元、由国家主导的争议解决——反映出一套设计来保住执政精英主导地位的选举制度，同时为公众参与提供一条受限的通道。

于是政治上的开放仍然有限，尽管叙解军同意作出两项让步。第一，它推动设立一个咨议会，以扩大参与战略决策正式化过程的领导层，虽说这个机构并无任何实质决策权。第二，叙解军接受了议会选举的原则。这个机构虽不掌握战略问题上的权力，叙解军却赋予它影响行政与政治机构运作的能力，比如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在这一背景下，叙²¹¹

解军容许引入一定程度的受控不确定：用它领导人的话说，那是重归平静所要付的代价。³⁶ 政治参与的扩大虽然是真实的，却止步于不下放实权。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经过管理的威权主义调适：牢牢握住控制权，同时容许在政治包容上作出边际让步。

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阿拉伯之春的遗产仍在：叙解军不可能一举压下民众运动而不损及自身那植根于革命意识的正当性。第二，尽管镇压有限，叙解军仍是威权的：它掌控安全、压缩政治空间，并通过对领袖施压、收编与对话来耗尽社会运动。

叙解军的威权主义并不主要依靠镇压，因为它最挂心的是内部分裂与可能的政变，而不是公众抗议。有意思的是，无论安全机关还是沙拉本人，对民众运动都没有表现出偏执。沙拉展现的是战略耐心，叙解军对疑似内部叛乱的反应却过激。这一优先次序遵循的是一种威权逻辑：权力斗争的中心不在民众或政治反对派，而在叙解军自身内部。这个团体对内部政变的恐惧远甚于对民众异见的恐惧。其结果是，派系角力成了权力斗争的首要场域，在伊德利卜领导层内部激起紧张，并导致包括所谓酷刑在内的种种侵害。叙解军的权威更多有赖于控制内部派系，而不是管理与社会广泛互动。它的威权主义把政治变成了精英之间的角逐，把公众参与挤到一边，只在需要时有选择地施以镇压。沙拉的“战略耐心”因而既体现了一种精于算计的革命务实主义，也体现了在一个严密控制的核心圈子里巩固权力的努力。

威权主义的衰减：叙解军与村长综合征

面对空前的抗议，叙解军把自己的回应搭在两条主线上：偶发的强硬执法（但没有系统性的暴力），以及一场受控的政治开放，即在高度集中的决策框架之内，容许一个孱弱的立法机构有部分自主。半年之前的局面对叙解军极为不利：它遭自己的基本盘挑战，看上去正在重演它当年起而反抗的那个政权的条件反射；半年之后，这个运动却相对老练地把动荡管住了。叙解军动用了一整套宽广的回应手段，并显著限制

了武力的使用,有效应对了一场既有规模、诉求有时又相当激进的抗议运动。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一方面是促成宗教去激进化的“静默革命”,另一方面是政治威权主义的逐步侵蚀,二者是什么关系?政治威权主义的侵蚀,是宗教去激进化的延续或后果,还是反过来由一套完全独立的动态所驱动?

重新落地同时塑造了宗教去激进化与政治威权主义的侵蚀。这两件事都不是叙解军单方面决定去改变的。毋宁说,这些转变生自该团体、当地民众与伊德利卜抗议运动之间不断演变的力量关系。

要理解叙解军的重新落地如何运作,关键是要记住:它与全球圣战的决裂不只是拉开距离,也是重新嵌入。斩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导致它有意重新锚定于本地的动态。这一转向在多个层面展开。在社会学层面上,叙解军收编了本地的宗教精英、家族精英与革命精英。在宗教层面上,它接纳了占主导的沙斐仪学派,重新纳入并制度化了苏菲主义的成分,对民间伊斯兰也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在政治层面上,它重新挪用革命的象征与叙事作为正当性的来源。这套战略重塑了叙解军,使它远离全球圣战主义,更深地嵌入伊德利卜的社会政治肌理。

这一多面向的重新锚定过程,我们称之为再地方化,它启动了一套政治依赖的逻辑,近似让-诺埃尔·费里耶(Jean-Noël Ferrié)所说的“村长综合征”:一个政治行为者离自己的选民越近,就越无法无视他们的期待,也就越是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叙解军在整场民众运动中所表现的正是如此。³⁷ 一个政治行为者在再地方化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正当性的根基。那种源自全球圣战与史诗战役的宏大的、荷马式的正当性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一种更接地气、扎根于治理的正当性。治理由此成了新的着力点,用以产生、或者说挑战有效施政与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同意。一方面,这种再地方化加深了权力对民众的依赖,使反馈动态即本书通篇所说的“社会惰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使治理得以在较低

的政治成本上完成，而这对叙解军至关重要：它需要国内的社会和平，才能维持对阿萨德政权的战争努力。

其结果是，重新落地促成了社会与政治上的邻近效应，使抗议运动与叙解军本身之间出现了大量重叠。许多遭逮捕、受酷刑、后来获释的人，是叙解军军事系统里的中层成员，深深扎根于本地社会。³⁸与此相类，抗议运动中往往有救国政府的前成员，他们通过收编这一共同的政治框架与叙解军相连；³⁹也有 2011 年的老资格革命人物，这些人未必同情叙解军，对该组织却并不陌生。叙解军与挑战它的这场运动之间没有疏离感，这既得益于该团体在社会政治与宗教上的嵌入，也得益于抗议者许多诉求公认为正当；由此不仅生出前面说过的“治安理解”，也生出一种政治上的理解。这一动态促使叙解军在动武上有所克制，体现出沙拉所说的“战略耐心”。

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耐心因叙解军愿意把权力下放给管理非战略事务——具体说是民事而非军事事务——的机构而得到加强，同时它对更广泛的治理问题兴趣不大。⁴⁰这种下放的倾向与其说出自民主理念，不如说出自新自由主义式的务实，但它仍然意义重大。它容许了

214

一场拿捏过分寸的政治开放，也容许了对民众运动扩大参与之诉求的一定回应。

威权主义的衰减，还源于重新落地的第三个副产品：那不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是一种弱势的均衡，并伴随着民众运动与叙解军之间观点上的相对趋同。叙解军作为一个军事政治组织，认识到社会和平对它抵御一个始终具有威胁的政权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这一认识使叙解军系统地避免与民众正面冲突，也促成了进一步的让步。另一边，民众运动在与叙解军打交道时也有自身的脆弱。它的领导层碎裂，等级薄弱，策略上又常有严重的内部分歧。最要命的是，民众运动缺少一个能取代叙解军主导地位的可行政治替代方案；它的立场只能或是改良主义的、或是民粹主义的，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兼具。吊诡的是，这一动态在根

本问题上造成了隐含的观点趋同，使叙解军与挑战者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

政治威权主义的衰落，并不是宗教去激进化的直接结果。毋宁说，二者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齐头并进的：在这个框架里，宗教去激进化、威权控制的松动与社会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互相强化。这一互动并非源于这些因素之间某种内在的联系，而是源于各方有意为之的战略性政治操作。

沙拉的伊斯兰主义民粹批评者尽可放心：政治参与的任何增加都不意味着走向民主化。权力——即战略事务上的决策权——仍牢牢握在同一批人手里。同样，狱中条件与仅仅几个月前相比或许有所改善，却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至于对政治反对派的管理，它仍受制于上文所述的结构性限制，运作在受限的威权主义的边界之内。这一体制始终由叙解军与它 2025 年之前所治理的民众之间那种持久的弱势均衡所塑造、所限定。

215

为一种新的极端中间派服务：作为权力政治的去激进化

艾哈迈德·沙拉不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Abdel Fattah al-Sisi) 或巴沙尔·阿萨德那类独裁者的复制品。他固然时而取用威权的套路——收编、施加安全压力、实施逮捕、剥夺某些反对派行为者的正当性——却没有大规模抓人，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系统地把异见及其领袖、事由与诉求妖魔化。阿拉伯之春留下了印记，而沙拉仍受制于一种持续存在的革命意识，并主动设法把它纳入自己对正当性的主张。

怀疑者也许会说，叙解军对抗议相对克制的处置并不是开放的迹象，而是一个处在弱势位置上的意识形态鼓吹者式威权治理的表征——此人若手中有足够的手段，就会像塔利班、伊朗政权或伊斯兰国那样毫不迟疑地动用大得多的武力。换句话说，他们主张，等他实现掌权 (*tamkin*) 之后，其真实意图自会显露；眼下这份表面上的温和，不过是一种战略性的塔基亚 (*taqiyya*)；这个说法极具争议，用来指伊斯

兰主义运动据称特有的、精于算计的掩饰,甚至可能还有西方传播顾问的助力。⁴¹

要充分理解伊德利卜的政治动态(这些动态受本书所考察的意识形态变化影响,却不限于此),我们采取另一种视角。我们认为,用比较革命运动的路数来看,比起那些取自古典伊斯兰研究、经年滥用且时有偏见的概念,能提供一个更清晰也更有产出的框架;那些概念往往妨碍而非促进理解。

叙解军的意识形态转向及其对抗议的非强制式处置,既不是在掩盖一套激进议程,也不是民主。毋宁说,它体现的是法国大革命史家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所描述的极端中间派政体。⁴²在塞尔纳看来,极端中间派指的是这样一种政体:它由一种自我宣称的、或者说重新发现的中间主义所主导,作为霸权战略的一部分,它把自己摆成政治
216 两极(在法国是左与右,在叙利亚则是激进伊斯兰主义与政权复辟)之间的温和替代者,其终极目标是拒斥任何可信的、能取代既有秩序的政治替代方案。

叙解军有策略地把去激进化与“极端中间主义”结合在一起。叙解军以一种“既不……也不……”的路数为自己取得正当性:既不要政权,也不要激进圣战派;同时又约束自主的民主运动。公民社会仍处在严密的安全监视之下。面对社会运动的势头,叙解军既不诉诸赤裸的镇压,也没有把政治场域打开。相反,叙解军倚仗的是那些熟悉的威权手法:收编、威胁、有限的让步,并且拒绝把开放扩展到协商委员会这类本就没有多少权力、甚至毫无权力的机构之外。实际上,叙解军巩固的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并用“别无替代者”这一说法为它辩护。在他看来,伊德利卜的未来选项有限:叙解军若是离开,剩下的就只有极端主义或政权回归两条路。

极端中间派政体一贯的目标,是通过收编来中和反对派,从而在铲除最激进成分的同时,杜绝任何可行的政权轮替。这套战略往往服务于巩固控制这一更大的目标。其结果是造出一个非自由的社会,在那里,

“常识”就是不存在任何政治替代方案。因此，导言中所界定的去激进化，构筑起一条新的宗教正当性边界。它不只是一次意识形态转向，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它的作用是为中间赋予正当性、剥夺中间之外者的正当性，并维持一种极端中间派的动态：在这种动态中，政治替代方案的空间遭到刻意压缩。推动这一过程的，是一个正在经历意识形态重组的行为者。

因此，界定叙解军威权主义的并不是强制的使用，而是以一套双重否定的政策之名建立起非竞争性的政治秩序，以及它把“别无替代者”这一观念强加于人的能力。竞争性的模式接受激进者与非激进者共存，迫使前者为求生存或取胜而结成社会与政治联盟。在伊德利卜这样的极端中间主义模式里，去激进化使人得以在取消激进者资格的同时，把自己摆成中间主义的唯一旗手。权力竞争并未消失；它只是移出了政治与公共舞台，转入体制顶层的派系厮杀，在密室之中上演。因此，沙拉从来不怎么把民众运动放在心上，一有内部异见的苗头却反应激烈，最终引爆整场抗议运动的那桩“安全细胞”案就是明证。²¹⁷

极端中间派意味着激进主义的终结与权力的保全，其手法是有策略地借重温和的多数去对付激进的边缘，而且往往是通过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的路数。革命中间派相对无害，这就为上述做法提供了便利。在伊德利卜，革命的政治代表日益碎裂，各路实体分散在缺乏纪律、动员能力有限的团体之间，通常只有几百人。参与的愿望虽然存在，却犹疑、不硬气，还掺着几分顾忌，男女都是如此。参与者要么想护住自己既得的利益，要么想避开与一个在国际上顶着恐怖标签的权威站到一起，要么只是记着这个运动开始与自身过去拉开距离之前那些持续不断的暴力。正如“革命集团”(*kutal thawriyya*)的一位领袖所说：

我们的革命集团就像气球，让成员的个人野心掏空了——他们一面想加入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一面又不停地批评它。问题在于，革命除了武装团体之外没有产出任何政治实体。它没有实现自身的制度

化，而以为革命可以不靠实实在在的力量就成功，那是幻想。结果就是，它到头来让别人收编了。⁴³

极端中间派政体：一种新的波拿巴主义

我们该如何构想并刻画伊德利卜那种“极端中间派的威权主义”？革命的政治社会学这一分析框架又一次给出了有价值的启发，因为两个案例看上去都涉及从一种热月情境向强人政体巩固的过渡，只不过为改良倾向所调和，也受制于有限的资源。

218

正如 1789 年之后的法国那样，伊德利卜的热月时刻标志着激进革命治理的终结，以及从教义上的不妥协与恐怖统治的退却。革命式白板 (*tabula rasa*) 的理想——就伊德利卜而言，其根子在于萨拉菲派抹除旧有社会规范的种种努力——正逐步为社会惰性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重新伸张所取代，而这一切又发生在意识形态脱钩与专断者自我克制的背景之下。

此外，攻取大马士革是叙利亚革命轨迹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政治与社会日益碎裂、中央权威侵蚀、经济危机加深之际，一种对秩序与稳定的广泛需求正在浮现。在伊德利卜结晶成形的热月阶段，削去了革命的极端，培育出对意识形态节制的向往，同时也为一种扎根于强制性机构的权力集中铺下了基础。

从伊德利卜到大马士革的移转，其意义不止于地理上的转换：它凝聚着从热月走向某种波拿巴主义的过渡，也就是建立起这样一种政体：由一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统率，被赋予广泛的行政权力，一面援引革命的正当性，一面对政治机器与宗教都施以严密控制，而肢体强制的使用则有限。⁴⁴

第十章 尊重烈士，但别扼杀市场：伊德利卜新生公共领域的道德化

219

从 2017 年崛起到 2024 年 12 月战胜政权，大叙利亚解放军（HTS）发生了重大转变。该组织压住了自家较为激进的指挥官，斩断了与全球圣战的联系，并在治理中大体上悬置了萨拉菲原则的施行。尽管如此，这一转变并不排除偶有在伊德利卜确立某种伊斯兰治理形式的努力。更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不应设想叙利亚西北部一切使治理更伊斯兰化的动议背后都站着叙解军。叙解军运作在一个复杂的生态之中：它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即救国政府，对它有影响却不作微观管理。与叙解军无涉的重要地方人物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有时甚至对该组织多有批评——继续独立于叙解军的战略方向推行自己的议程。这些行为者反过来又回应着本地的经济与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塑造着他们的议程。2023 年至 2024 年间，救国政府一度试图通过一部法律设立道德警察，而叙解军随后把这部法律冻结了；上述背景正是这件事发生的语境。

这部公共道德法格外耐人寻味，因为它凸显出叙利亚西北部一系列并不受叙解军控制的行为者之间那种复杂的动态。它显示出叙解军在强加伊斯兰规范一事上的定位，而当时叙解军正试图重新与社会、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并缓和省内与自家队伍中的激进主义。吊诡的是，叙解军并不是这部法律的源头：法律出自一种自下而上的动态，由道德与经济上日益开放的势头所推动，而这股势头在 2020 年 3 月 4 日停火所造就的新生公共领域中不断壮大。这部法律映照出伊德利卜社会肌理中彼此冲突的潮流之间的文化冲撞。叙解军对待这部法律的做法，展现

220

出在一场分裂性的文化争端之中小心翼翼的平衡术，这表明其领导层的行事方式从根本上是交易式的，因而是政治的而非教义的，它是在回应保守社会阶层对伊斯兰规范的要求。最后，这部法律凸显出政治伊斯兰在应对一种已然变形的激进主义时的难处：这种激进主义已从其原初的圣战遗产，演变为一副保守民粹的新面孔。叙解军在宗教上遭遇的种种难题，让我们得以清楚看到它近年发动的静默革命有哪些限度。

宗教规范之求：一个倚靠松散道德联盟的自下而上过程

2023 年末，协商委员会批准了一部公共道德法 (*qanun al-adab al-'ama*)。¹ 该法分若干节，分别规管婚礼厅、市场与商场、餐馆与咖啡馆、公共空间与游乐场等不同领域。禁止之列包括：侮辱先知、批评穆斯林礼仪或宗教学者 (*ulama*)、行巫术、在主麻日^①礼拜时间做买卖、性别混淆的着装、文身、同性恋、卖淫、通奸、饮酒吸毒、赌博与打赌、辱骂、虐待动物、工作场所的男女混杂、在公共交通工具与医院内吸烟、嘲弄老人或残疾人。该法还设立了一支新的道德警察，直属最高司法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些禁令。法中所列各项违禁行为并无配套罚则，只规定了不超过 48 小时拘留的惩戒措施。它还要求在剥夺人身自由期间给予保全个人尊严的对待。

2023 年 12 月 24 日经协商委员会批准后不久，该法的一份草案外泄，立刻引发公众争议。外国代表本就对一个被形容为“有毒”的地区心存戒备，如今更是群情激愤，考虑公开谴责，并就最佳应对办法向负责叙利亚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咨询。² 有人主张从伊德利卜撤资，也有人呼吁把重点转向意识形态上问题较少的地区，比如政权势力范围或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³ 至于负责叙利亚事务的外交官，他们立刻把这看作一次“激进的倒退”，并抬出“塔利班化”的幽

① 主麻日即星期五，穆斯林的聚礼日；正午的聚礼含一场讲道（呼图白），历来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公共舆论场。——译注

灵，⁴指出（而且指得不错），这部法律实际上与该运动的主流化背道而驰，它非但没有复制伊德利卜占主导的保守社会道德准则，反而把这些准则收紧了。⁵

这部法律还激怒了叙利亚反对派圈子，他们把它看作倒退的信号，也看作强硬派在该运动内部占上风的证据，并援引伊朗与沙特的先例为佐证。⁶ 甚至一位来自大马士革、当时定居于保守小城巴卜、对该运动的演变原本持肯定看法的知名伊斯兰主义学者，也大吃一惊：

在我们巴卜这儿，女人一律戴全脸面纱(*niqab*)，极端严苛是常态。相比之下，伊德利卜的气氛一向更开放，即便在叙解军治下也是如此。后来这部法律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让我们想起沙特阿拉伯和它的劝善惩恶局。⁷

该法的支持者坚称，它填补的是叙解军放弃宗教纠察所留下的真空。自 2017 年救国政府成立以来，叙解军就交出了对宗教事务的直接掌控。它在 2017 年撤销了旧有的宣教局 (*al-makatib al-da'awiyya*)，把宗教纠察 (*hisba*) 交给救国政府去做，而叙解军领导层一再要该政府守规矩、有节制。⁸ 叙解军还在 2017 年撤销了救国政府的风纪监察机构 (*jihaz al-hisba*) 及其后继机构“行善之臂” (*sawa'id al-Khayr*)，平民批评后者压制过甚。最后一次道德纠察的尝试是虔信兴盛中心 (*markaz al-Falah*)，隶属该部宗教事务下属的宣教处。艾哈迈德·沙拉本人于 2021 年末解散了这个中心，原因是该机构成员犯下种种侵害，也因为预见到国际上的批评，而那有可能在叙解军正把除名列为首要目标之际，阻断外界对该组织观感的调整。

222

一部分社会成员热切接纳了战争结束与 2021 年撤销道德警察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由此得到的新的社会自由；另一部分人则动员得更起劲，决意重新对公共行为施加规管。自 2023 年起，由一些老城市家族的名流带头的城中保守圈子，尤其是那些自己曾受骚扰之害的人⁹，主张叙解军撤销风纪监察、即旧日的伊斯兰道德警察，造成了必须填补的

真空。¹⁰“城中的大家族有一阵子了都认为，近几年的开放太过头，需要加以规管，”城里一位保守派名流坚称。¹¹在本地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端，一位女性主义活动人士作出的判断也差不多：

战争结束了，社会重新有了活力，道德压力也松了一些。伊德利卜的科尼什环路成了男女混杂之地。自从允许女性上驾校，女司机就多了起来；伊德利卜大学里化妆变得常见，女装也越来越有颜色。社会真的在变。车里的男女同乘多了起来，检查站的岗哨也被交代不要盘问他们是什么关系。过去两年商场的兴起放大了这种开放，而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种开放是失控的。¹²

2023年夏，伊德利卜家族议事会（*Majlis 'Awa'il Idlib*）出手了：那是夏天。正是购物活动的季节，局面变得乱糟糟，男女混杂在蔓延。女学生也四处随意走动。这事不小。所以我们作为伊德利卜家族议事会，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协商委员会，请他们出台一部公共道德法。¹³

223 一个最初由伊德利卜一些大家族名流组成的道德联盟就此形成。他们向地方当局提出了一项政治诉求，依据是某些社会阶层中弥漫的一种情绪：2020年以来，伊德利卜经历了“过度的开放，由此生出诸多乱象”。¹⁴这种情绪只是众多看法中的一种，并非人人认同。但它很快被一些相当有影响力的教士公开传扬开来，其中多数并不隶属叙解军，或只在其外围活动。这些人包括：前司法部长易卜拉欣·沙绍（*Ibrahim Shasho*），他曾任大叙利亚自由军的法官，后加入救国政府；¹⁵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原为大叙利亚自由军的关联教士，曾短暂待在叙解军队伍中，后因不认同与其他派系对抗的政策而离开；梅勒罕·哈瓦姆（*Melhem Khawam*），人称阿布·瓦基德·沙米（*Abu al-Waqid al-Shami*），来自哈马城的谢赫，以萨拉菲倾向著称，在宗教事务部注册为清真寺伊玛目但不隶属叙解军；还有性情急躁的埃及籍教士阿布·法特赫·法尔加利同样出自大叙利亚自由军，因难以适应该运动的新政治路线而被叙解军好聚好散地打发走。据一位活动人士、也是早期革命者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反动的时刻。停火之后社会的过度开放、科尼什环路与商场里的男女混杂，在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看来是个问题。叙解军2018年禁掉风纪监察之后，一种需要重新规管的感觉正在生长。虽然许多人批评这部法律，但在需要规管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¹⁶

这个道德联盟是脸书行动主义、虔诚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怨气、本地与外来的教士批评者的混合体；它未必占多数，却成功造出了势头：由内政部成员、法特瓦委员会教士与法律事务办公室成员组成的三方委员会开会研拟这部法律。经过三次长会，最后一次开了三个多小时，协商委员会终于在2023年12月24日批准了该法。

该运动的政治领导层——艾哈迈德·沙拉及其核心圈子——显然不是这部法律的推动力量。起初，沙拉对它的进展不甚留意；等到他终于知晓，态度也相当迟疑。但他同时也不愿在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所支持的敏感议题上投入政治资本。¹⁷因此，把道德联盟的规管诉求传递上去、并使之进入伊德利卜既有治理机构的，是救国政府教士机构的人员，而不是叙解军的领导层。据沙拉的一位亲近同僚说：

224

在沙拉撤销道德警察 (*bisha*)、撤销“行善之臂”、再撤销虔信兴盛中心之后，我们碰上不当的个人举止 (*tabarij*) 的案例增多，守教之人 (*al-mulazimeen*) 圈子的压力也更加紧逼。叙解军既已把宗教领域的管理下放给救国政府，就没有介入。救国政府那边则很清楚这个真空，一年多来一直在琢磨新的道德警察模式。它认为最好的应对是某种形式的道德警察，而那需要一部法律才能运作。这部法律主要是救国政府与宗教谢赫们的本地动议。整个过程都在叙解军政治领导层的雷达之下进行。艾哈迈德·沙拉当然知道，但他没怎么上心。后来事情进展飞快，我们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宗教事务部会同内政部把法律草案定了下来，法特瓦委员会通过，协商委员会批准。¹⁸

因此，这部法律是一个因停火所带来的开放而临时结成的道德联盟从事行动主义的副产品。它的发生基本上独立于叙解军，尽管其推手有效地借用了叙解军所搭建的制度化治理中的渠道来表达诉求。叙解

军的政治领导层虽相当勉强,却听任其发生。它起初不愿在一个意识形态上无可指摘的议题即伊斯兰规范在公共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上投入政治资本,何况这个议题得到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支持。这部法案是循一条源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路径确立起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逆着该运动领导层而成的,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专断—激进决策过程的产物。

225

消费主义公共领域的诞生

这部公共道德法,是要规管一个在社会与宗教问题上仍然分裂的社会中蓬勃兴起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公共领域。这种规管意在防止这样的环境成为社会不和的源头。¹⁹

新公共空间的出现,在伊德利卜省是晚近的现象。2020年之前,安全形势脆弱,把社会逼进一种狭窄、向内的日常:出门只为必要之事,如上班、条件允许时送孩子上学,以及参加武装斗争,而后者往往需要家人参与,提供后勤与照料。慈善与人道努力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延续下来,但闲暇活动几乎不存在。²⁰局面随着停火的宣布而改变,2020年3月4日的俄土协议使停火正式化。随着战争与新冠相关限制的钳制开始松动,一种新的公共生活逐步展开,让有条件的人得以试探性地重拾闲暇。起初是餐馆领头,接着是2023年的咖啡馆,往往配着播放欧洲足球赛事的等离子屏幕。不久之后,与小型游乐场配套的动物园出现了,伊德利卜体育场也重新开放。闲暇活动的这一复苏,标志着与政治伊斯兰所主张的秩序与纪律那套严格伦理的分道扬镳,反映出社会规范与期待的转变。

商业场所的成倍增加,是这一公共空间成形过程中最显眼的一个阶段。投资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的商场自2021年开始出现,主要在免于政权轰炸的边境城镇,尤其是达纳与萨尔马达两镇之间,其次是伊德利卜本身。这些商场多数依靠小规模投资者群体与本地资本,比如萨尔马达的巴达维家族或谢赫家族,达纳的卡什家族(哈姆拉商场的主要股东)与哈吉哈米迪家族,背后往往还有阿勒颇的商人撑腰;这些人当年

落脚于一种临时状态，如今这状态几近永久，他们便开始在本地重新投资。消费主义场所就此为本地仅存的精英——本地商人家庭与非政府组织雇员——而生；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是闲暇的时光。人们到那里喝杯咖啡、社交。对最困顿的人而言，那也是一个见识消费主义之梦最基本形态的地方：电梯、扶梯，都笼在一片喜庆的、有音乐的氛围里。²¹

公共闲暇空间的出现是新鲜而在意识形态上多元的现象，其发育与叙解军有部分合作。不到两年间，沿边境带并向纵深处，近 29 家商场开张，尤其是在伊德利卜、萨勒金和宾尼什。餐馆也纷纷冒出，在该地区有策略地分散布置以减少暴露，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自助餐厅，有些还提供水烟。这一增长还包括 4 座动物园，每座都配有儿童游乐场。新生的公共闲暇空间由此不仅铺展开来，而且极为有利可图。这一公共空间虽在意识形态上多元，倚仗的却是全球性的参照与流行文化，而不是打“穆斯林”身份牌。其中固然有一些明确的本地文化指涉，比如贝特卡拉姆 (Beit al-Karam)，或者达纳的拉瓦格 (Rawaq) 餐馆，但占主导的是带西方指涉的名字，与伊斯兰主义身份的行头相去甚远。事实上，取自全球流行文化的名字数不胜数，比如巨大的“Charisma”（魅力）咖啡馆、萨尔马达的“Grand Arizona”（大亚利桑那）、在达纳与哈扎诺各有一家分店的“North Cafe”（北方咖啡）、“Wings”（翅膀）、“Mister Black”（黑先生）、“City Rose”（城市玫瑰）、“KFC”（肯德基）与“Green Parc”（绿园）。公共闲暇空间的开发往往由与执政当局关系密切的商人所结成的财团推动，因而是在叙解军的默许下运作的，而叙解军多半也从利润中分成。²² 迪士尼乐园餐馆就是这种安排的典型。它紧邻新建的伊德利卜动物园（园中有瞪羚、鸚鵡，还有一家新近从巴格达动物园购入的狮子），这家餐馆所在的地产原属战利品委员会 (*lajna al-ghana'im*)。餐馆由与叙解军有联系的商人持有，接待混合家庭，但禁止家庭之外的男女混杂，并在花园里提供水烟。²³

吊诡的是，合乎伊斯兰规范的程度——大体以是否禁止男女混杂、水烟与音乐来界定——与是否有与叙解军关系密切的投资者之间，并

226

227

不存在相关性。举例来说，迪士尼乐园供应水烟，这家场所允许以受控的、保守的方式男女混杂，允许混合家庭以及有马哈拉姆（mahram）陪同的女性入内，而叙解军正是这家店的主要投资者。反过来，拉瓦格餐馆不对男女混杂开放，资本却与叙解军无涉。“Charisma”咖啡馆是一家两层的水烟馆，用叙解军的资本开办，却允许男女混杂。哈姆拉商场部分依靠与叙解军有关联的商人，却是男女混杂、每层都有音乐的。伊斯兰规范与叙解军及其关联者的伊斯兰主义投资之间的这种脱节，解释了社交媒体上一些保守派对商场庆典的批评，为何把矛头指向该组织所容许的道德松弛。批评者谴责叙解军在一个原本由革命与伊斯兰主义的清苦所界定的公共空间里，助长了这种享乐主义的风气。²⁴ 据商场的一位常客说，“大家都知道多数投资者与叙解军关系密切，人们常指出叙解军的虚伪：它一面号召恪守教规（‘iltizam）、严守穆斯林道德，一面又给腐败开了门”。²⁵

市场享乐主义与战时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斗争

倒向社会规管的转折点，随购物商场的迅速增殖而来，尽管社会上的争论开始得更早。规管的推力最初源于两桩争议：不当的个人举止（*tabaruj*）的案例增多，以及男女混杂的上升，这在伊德利卜科尼什环路（一条环城公路，同时是热门的休闲去处）一带以及伊德利卜大学格外显眼，该校男女同校的程度前所未有的，2.5 万名学生中如今女生占多数。²⁶ 然而，购物商场的迅速增殖进一步凸显出意见上持续的分歧：有人拥抱当下的自由化潮流，也有人强烈反对。

2023 年 12 月 8 日，哈姆拉商场在边境小镇达纳庆祝开业两周年，²²⁸ 引发争议，也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²⁷ 九天的庆祝与促销、人山人海、男女混杂与音乐，成了这一天的调子。这类活动并非头一回。但商场里的庆祝与另一件事同时发生：就在庆典开幕前几小时，11 公里外的阿勒颇西线一次渗透行动失败、有人牺牲；这就放大了批评，也凸显出社会的两极分化。²⁸

在 2023 年 12 月 8 日商场落成庆典的气氛里，一种近十年未见的新享乐精神清晰可辨。²⁹ 伊德利卜的一位媒体活动人士哈立德·哈提卜（Khaled al-Khatib）挖苦地指出救国政府也想“follow the trend”（原阿拉伯文中即用英文）。另一边，宗教事务部的几位布道者在这片消费主义的荒漠里尝到了传教士的孤独，费力也找不到听众和愿意听的耳朵。在伊德利卜，如同在世界别处，人们到商场来不是为了听讲道的，³⁰ 宗教事务部也没有再来第二次。³¹ 一些革命活动人士，比如迈阿赖特努阿曼的穆罕纳德·纳贾尔（Mohand Najjar），则为商场里的享乐辩护，把它说成革命成功守住并发展起来的成果本身的表达。纳贾尔质疑伊斯兰主义道德企业家所提出的那套保守的公共端庄的定义，并提醒我们：这家商场事实上就是一个市场，而在伊斯兰早期，市场这一建制从来都是男女混杂的空间。³²

然而，这种新的享乐精神，加上一个以闲暇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在一片长期被战争与革命的闭门现实所界定、又被伊斯兰主义叙事进一步强化的地方史无前例地出现，几乎注定要激起敌意的反应。这些反应没让人等多久。第一轮批评主要是宗教性的。一些主麻日布道者与叙解军前宗教学者，尤其是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与性情急躁的埃及学者阿布·法特赫·法尔加利，认为这类庆典是“通敌”。³³ 前司法部长易卜拉欣·沙绍在敏拜尔^①上表达了他的愤慨，抱怨说“加沙数千人的死，还有几公里之外那些人的死，在这些血商³⁴眼里都不算数；他们还偏要用音乐和不成体统的场面挑逗人，好把货卖出去”。³⁵

第二波批评源自一种“战时保守主义”，³⁶ 它谴责一切形式的享乐主义，转而主张一种由战争处境、营地里的苦难以及一场看似正在失去势头的革命所塑造的苦行伦理。它要求社会生活与仍在进行的武装行动相称，有时经由清真寺，偶尔由萨拉菲派谢赫传达，但也常常出自普

① 敏拜尔（*minbar*）是清真寺内供传道主麻日讲道的阶梯式讲坛。“夺下敏拜尔”意味着夺取一座清真寺的话语权。——译注

通武装人员之口。³⁷ 本地记者兼油管博主穆罕纳德·马斯里 (Mohand al-Masri) 对庆典恰在突击行动烈士牺牲之时举行表达了愤懑:

我们看到的是庆祝和男女混杂, 好像 [烈士的] 事跟他们无关, 好像他们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些人为我们牺牲自己, 好让我们在这里安安稳稳过日子 [……] 我们不反对庆祝, 但庆祝得在传统与习俗的框架里做。³⁸

保守派的反弹最终在一群蒙面人朝商场开枪时达到顶点。袭击与随后的批评浪潮之后, 救国政府召集商场管理层与地方官员开会, 决定商场活动继续办, 但要收敛: 只允许家庭入内, 无人陪同的年轻男子不得进入; 禁止男女混杂, 不过只限于工作场所; 并要求各店把音乐音量调低、只播不违伊斯兰规范的歌曲。内政部派出巡逻队保护商场。庆祝虽在重压之下照常进行, 其他原本计划办类似活动的商场, 比如皇家商场, 却把活动推迟了。

我们所观察到的——就结构而言——是两个不同公共领域别扭的并存。第一个是由战时保守主义所塑造的政治空间, 它在宗教与媒体舞台上发号施令。第二个是社会学意义上、非政治的领域, 以消费主义、
²³⁰ 闲暇和一定程度的享乐为特征。后一个空间既是社会的压力阀, 也是叙解军财源积累的一处来路。它是前者在道德上的反面, 却缺少一套自己的正当化话语。这两个领域自然会冲撞, 把叙解军推入一场如履薄冰的平衡术: 既要规管这个空间, 又不能干脆禁掉它, 因为它在社会上不可或缺、在经济上又有利可图。

管理两极化的公共空间: 叙解军的平衡术

在这一两极化的语境中对公共道德法案的处置表明, 它并不是叙解军强硬派要把某种激进的伊斯兰规范解释强加于一个据说温和的社会, 某些分析在阿富汗塔利班一案上就是这么说的。相反, 它凸显出该运动领导层在两条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平衡: 其一, 在两个各自深深扎根于本地的对立公共领域之间周旋; 其二, 处理内部动态与外部压力之间

的互动，而后者系于伊德利卜的国际交往，尤其要看捐助国在人道援助上的反应。

叙解军扶持了以闲暇与温和享乐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成长，这体现在公开的欢庆、社交混杂、水烟的存在，以及西方符号与阿拉伯流行文化的糅合上。这一路数力图让恪守伊斯兰规范与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大势相调和。³⁹ 然而，叙解军同时也要对一个深受战时保守主义影响的政治公共领域有所交代，而那个领域既是伊斯兰的——有时在意识形态上是萨拉菲式的——又是反享乐的，它诉诸革命的清苦与对烈士的敬重。

其结果是，这部法案不只是以压制手段规管新生的公共空间，也是在护住叙解军投资的一个关键部门。这部法律是一场平衡：一面需要以规管措施安抚保守圈子（于是有了立法的推动），一面又必须保住这个投资部门、不减损它对顾客的吸引力，也就是它在公众面前的可见度。这就导致了一个怪异的结果：法律出台了，却没有配套的罚则，而罚则本来是可能吓退顾客的。

231

第一重内部平衡之后，还有第二重平衡，与外部压力的处理有关。介入伊德利卜的外交官与捐助国把这部法律放在塔利班化的棱镜下看，彼此磋商，与联合国和土耳其外交部沟通，并在是否谴责上犹疑不决：

时间久了，我们开始觉得西北部的当局比政权那边的表现要好。但这部法律很可能成为我们投入之争中的一个大变数。的确，我们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把重点放到政府控制区，而左翼政党则倾向于把援助投到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⁴⁰

面对人道援助预算缩水这一非常现实的幽灵，叙解军领导层不动声色地冻结了该法的施行，为自己争取时间，好把来自伊德利卜内外的批评与意见收拢起来，然后再看是否回头修改法律文本、据此调整。叙解军由此在一套复杂的交易式动态中周旋：它一面权衡本地社会实

在在的反应,一面权衡国际社会可以预料的回应。面对社会上对道德规管的诉求,以及以法律回应这些诉求所带来的风险,叙解军不讲道,它搞政治。

伊德利卜可疑的塔利班化:叙解军及其交易式的道德治理

要更好地理解当下这一动态的特殊性质,不妨作一番与塔利班的比较,叙解军的批评者正是拿塔利班来说事的。在美国出兵推翻塔利班之后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早在2007年,喀布尔就出现了商场。生活方式是保守的,但男女混杂与音乐得到容忍,至少在首都如此。此后,2021年之后,这个闲暇与消费的公共空间遭到塔利班压制性政策的打击:一切音乐与男女混杂,哪怕是夫妻之间,在从动物园到公园再到商场的²³²所有公共空间一律禁止。在塔利班公共道德化的三重夹击之下(它毫无阻力地强加了自己的新道德秩序),再加上美国的制裁与中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这些商场逐渐或者关门,或者被重新传统化,比如古尔巴哈商场就被改成了珠宝市场。在极短的时间里,这个由消费主义与闲暇所主导的公共空间就崩塌了。⁴¹

在伊德利卜,情形与喀布尔的塔利班形成鲜明对照。塔利班把一套乡村的道德秩序强加给一个城市社会,叙解军则不同,它深深嵌在自己所治理的共同体之中。在社会学上,伊德利卜并不存在城乡之别,因为叙解军在全区各处招兵。在意识形态上,它接纳了本地公认的政治与宗教传统,这一点与叙利亚东部阿拉伯地区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不同。此外,叙解军对这个新生的公共领域并非外人;它以资本投入主动塑造并促成了它的发育。

后美国时期的阿富汗秩序里商场活不下去,是因为塔利班在经济上、道德上与社会上都置身这一领域之外,也因为塔利班就像2014至2016年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一样,在与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上风,能够不作任何妥协地把它碾碎。叙解军则不同,它在伊德利卜一贯是以交易的方式与社会打交道的,而这发生在一个以战争

为背景、社会和平属于战略必需的处境里，因而镇压是一个可能代价高昂的选项。⁴²但最重要的是，面对一个分裂为两个公共空间的社会，一个由战时清苦的伦理支配，另一个由消费与闲暇的实践支配，叙解军从来没有选边站：它投资于后者（并在边缘上参与其中）⁴³，同时让自己的大多数成员认同前者的那套价值。

塔利班以彻底的禁令来贯彻自己对伊斯兰规范的理解，叙解军采取的却是一种交易式的路数：它力图斡旋两个规范框架相互对立的公共领域之共存，同时也把国际社会的反应算进来。叙解军很少下彻底的禁令；即便立法，通常也是姗姗来迟，而且是针对具体的触发事件作出反应。举例来说，它并没有完全禁止男女混杂，而是加了限制：允许混合家庭，允许在公共空间混杂，却禁止在工作场所混杂。同样，音乐并没有被一概禁掉，只是必须合乎伊斯兰原则与本地习俗。店铺不必因每日礼拜而关门，只在主麻日讲经时关。叙解军虽然施行了一系列禁令，却没有为这些禁令配上一套罚则，把制裁限于不超过 48 小时的惩戒措施，并避免肉刑。头巾被定为必须，因为这是社会共识；面纱则不然，因为它仍有争议。等到领导层意识到可能引起的国际连锁反应，比如援助预算被挪走，或者外界对伊德利卜局面的观感变得更苛刻，它就冻结了这部法律，并启动新一轮磋商以修改法条，这体现出它务实而善于调适的路数。

233

叙解军面对的是一个与逊尼派阿拉伯保守国家相似的经典两难。沙拉处理公共道德的做法，与已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面对采纳伊斯兰刑法的压力时所用的策略如出一辙。萨达特面对左翼与民族主义派系的反对，试图通过让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合法化、并把自己摆成一位“信教的总统”来强化自己的伊斯兰资历。然而，当伊斯兰主义者与教士在 1978 至 1982 年间拿出“伊斯兰教法法典化”的草案并在人民议会中辩论时，萨达特便进退两难。他一面公开拥抱伊斯兰，一面又谋求与西方保持一致。他既不能断然否决那些拟议的刑法典，也不能全盘背书。于是他悄悄把它们束之高

阁，避免再作辩论。⁴⁴ 同样地，沙拉身为宗教价值的护卫者，也不能公开反对一小撮声音很大的人施行伊斯兰戒律的呼吁。两位领导人都在宗教义务与对外战略结盟之间的张力中周旋，都巧妙地避免了对严格的法律法典化作出承诺。这一路数反映出他们的需要：既要平衡内部压力，又不能疏远关键的支持群体，还要管理国内外行为者的期待。

234 不过，叙解军同时也作了一笔成本收益的算计，结果是既规管、又不设惩罚机制，最终还把这部法律的施行悬置起来。该组织意在把伊斯兰教法作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坚持下来，却避免施行肉刑；即便在伊斯兰主义者当中，肉刑也可能极具争议。通过冻结这部法律，叙解军所取的立场近似瑞士穆斯林思想家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他曾在2005年公开呼吁“在穆斯林世界对肉刑、石刑与死刑实行暂停令”。⁴⁵ 叙解军力图在开放与规管之间取得平衡，并试图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重新诠释对宗教规范的管理。据沙拉身边的一位人士说，“这部法律代表着风纪监察概念的一种世俗演进：执行由文职政府而非宗教权威掌管。它与源自1951年宪法的叙利亚法律相合，而那部宪法同样规定过设立道德警察”。⁴⁶

归根到底，叙解军以一部信仰取向的法案来把公共道德法典化，这一路数并没有效法塔利班、伊朗教士政权或沙特瓦哈比主义的模式。它所映照的，是保守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面对民粹的宗教诉求时历来采用的那套经典策略。伊德利卜的新意不在叙解军的政策本身，而在这股民粹潮流的出现。对叙解军这样一个刚刚走出传统圣战萨拉菲激进主义的运动来说，这类民粹主义的兴起带来了新的、复杂的难题。

以民粹语汇重铸的后萨拉菲激进主义

在2024年攻取大马士革之前，伊德利卜出现了一种与全球圣战截然不同的新型激进主义，它给叙解军出了一道独特的难题。与此前以安全为中心的激进主义不同，这个新问题首先是政治性的：停火所带来的道德松弛，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弹，而反弹又利用实在法把此前被视为文

化上不言自明的规范加以正式化、僵硬化。⁴⁷ 消费主义与享乐文化的兴起激起了规管公共空间的诉求，这让叙解军领导层没有几条路可走，并带来了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双重两难。伊德利卜的保守家族主张秩序，其表述采用道德与宗教的语汇，并成功把它形成政治诉求，得到叙解军内外教士的支持。²³⁵

尽管在公共领域推行更多伊斯兰规范这一诉求与叙解军的原则相合，但保守派要求全面施行伊斯兰教法、又大力支持这部道德法，这就把该运动领导层逼到了两难之地。这一新的发展迫使叙解军去处理一个它本认为次要的问题，这也解释了它在法律起草初期何以兴味索然。它还迫使叙解军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明确表态，而这有可能撕裂社会、迫使该运动选边。在国际上，这个问题使叙解军处境尴尬，也给它谋求与西方实现常态化的抱负添了麻烦。

要求社会规管的呼声，凸显出一边是叙解军内外的教士、另一边是叙解军自身领导层之间的清楚分野。这种内部分化——教士由宗教考量驱动，领导层则主要依据政治因素作决定——是政治伊斯兰的一个标志。⁴⁸ 在伊德利卜，该组织领导层把教士视为一股外部影响，与自己的政治议程判然有别：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现实：一股民粹趋向 (*tawajuh shaabawi*)，它建立在一股谢赫派潮流 (*tayyar al-mashiyakhi*) 之上，而这股潮流深深扎根于社会与清真寺之中。这股潮流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叙解军。在该运动的架构之内，事情是可控的。但多数主麻日布道者并不是该运动的成员。这一点上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麻烦。前不久，艾哈迈德·沙拉与好几百位这样的谢赫见了面，他们对眼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缺乏政治自觉，把他吓了一跳。会上有人要艾哈迈德·沙拉给他们 200 枚导弹去解放大马士革，另一个人则催他去把苏菲派潮流碾碎。⁴⁹

激进主义的问题不再以安全的语汇——圣战萨拉菲主义——来界定，而是以“民粹”的语汇来界定。⁵⁰ 民粹主义是革命保守主义以伊斯兰语汇实现的“公共化”，它带来的宗教与道德上的法律诉求，往往与²³⁶

叙解军的战略选择相抵触。民粹主义直接源自叙解军自己所支持的社会经济开放。一位与叙解军领导层关系密切的研究者认为：

今天在伊德利卜，充当萨拉菲主义发动机的已经不是叙解军了。宗教上的过头与话语上的通胀如今来自该运动之外，道理很简单：没有担责位置的人可以轻易搞言辞通胀，而手放在火上的人不行。⁵¹

因此，这股民粹潮流的范围超出了叙解军内部的强硬派。⁵²它不大是有组织的团体或派系所为，那些团体与派系大体已被叙解军收服于自己的政治意志之下。民粹主义也不源于内部的派系角力，比如上一章所讨论的沙拉核心圈子与阿布·马里亚·卡赫塔尼、阿布·艾哈迈德·扎库尔（Abu Ahmad Zakour）的网络之间的角力。

这段插曲再一次表明，叙解军领导层行事所依的理性更多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该组织承认社会中现存的分裂，因而寻求妥协。在施行公共道德立法时，叙解军必须在一个融贯的政治与法律框架内平衡多重目标。它既要维持社会秩序，又要护住自己的经济利益，还要遏制自家队伍中的激进成分。该组织还必须应对一个强大的“道德联盟”的影响，同时管理两个价值相冲突的公共领域的并存。此外，叙解军也顾虑这类立法可能引起的国际连锁反应，包括援助减少的风险。归根到底，这些努力还与它更大的目标相连：从联合国与基地组织及伊斯兰国相关联的武装团体名单中除名。显然，叙解军以交易式的、被动反应的方式来贯彻宗教规范，不同于塔利班那种主动而不妥协的清教主义；它并非自上而下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在一个被前文所述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撕裂的社会中周旋，同时还要应付自己追求国际常态化所带来的种种限制。

从圣战萨拉菲激进主义转向民粹的社会保守主义，显露出一个双重的常态化过程。第一，激进主义进入了主流。它不再是一股仅仅系于

守主义某些方面的激进性质有所减弱。法中所列种种行为要受刑事与宗教规管这一诉求，在两个意义上仍是激进的：它坚持毫不妥协地施行宗教规范；而若不从上面加以缓和，在通奸或同性恋这类严重情形上，它会直接导向施行伊斯兰固定刑（*hudud*）的呼声。在叙解军内部，这种极端路数因其严厉，甚至在领导层最高层引起不适。

然而，把伊德利卜的治理拉离逊尼派穆斯林主流，就意味着退回一种领导层想要避免的激进主义。这就带出我们的第二点：叙解军回应方式的常态化。面对民粹主义，沙拉的反应是政治务实主义，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安瓦尔·萨达特这类逊尼派阿拉伯保守领导人相似。他先是接受了这部法律的原则，随后又试图通过冻结其施行来化解其效果，并就可能的国际反应作了成本收益分析。

一种施加约束的“消极团结”：身份陷阱与静默革命的脆弱之处

公共道德法草案以及叙解军对它的处置，不只是揭示出伊德利卜有一套骨子里激进或萨拉菲式的政治秩序；它同时也印证了我们关于该运动如何把政治战略置于首位的论点。不过，政治的这种支配地位是两可的：它既是资产也是负债。一方面，叙解军的政治务实主义使其领导层得以伸张自主，把自己与运动内外的教士派别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如此看重政治考量而轻宗教教义，也造成了一处重大的脆弱。由于把政治算计放在首位，领导层无意中把这个运动导向了一场“静默革命”：这一转向虽然避开了直接的宗教死磕，却使它在面对一套威胁自身利益、日益高涨的宗教话语时拿不出清楚的教义替代方案。

238

由于缺少一套足以抗衡宗教高涨的概念框架，叙解军领导层认为直接在教义上对抗代价太高。面对一部连它自己都觉得成问题的法律，艾哈迈德·沙拉只能提出一种暗中的悬置，类似塔里克·拉马丹的暂停令或安瓦尔·萨达特悄悄的冻结，却不公开宣布。这一做法正是该运动结

构性优柔的缩影，那是它在“静默革命”的限制之内持续转型的一个标志。

叙解军对公共道德法的处置，凸显出它正向教义上的中间主义转移。该组织力图平衡两项彼此竞争的优先事项：一面应对一股仍嵌在主流之中的民粹保守潮流（这与欧洲中右政党所面临的两难相似），一面推动“社会常态化”，而这一过程既契合社会需求，也契合它自身的经济利益。商场与餐馆这类生意按伊德利卜的标准提供了相对男女共处的空间，满足了多年冲突之后一种真实的社会松弛需求。这种务实的路数，挑战了那些把叙解军立场说成激进或近于塔利班化的解读；它的立场毋宁是一步扎根于中间派务实主义的、精于算计的政治动作。

然而，正是这种政治优先，使叙解军难以顶住来自下面的保守信仰民粹压力。这暴露出它那场“静默革命”的一处根本弱点：由于没有自己一套融贯的宗教教义，叙解军缺少必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去对付一个在灰色地带活动的草根保守运动。这个运动强化着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主义，却又不越入过激（*ghulu*）的范围；若越入，叙解军便有理有施以基于安全的镇压。其结果是，叙解军只能在一片模糊的空间里周旋，受制于自身教义上的局限。

239 面对民粹情绪的兴起，该运动领导层发现自己处境微妙。它反对这套民粹主张，这从它拒斥道德警察法一事上就看得出来：那部法律与该运动废除风纪监察的政策相抵触，而艾哈迈德·沙拉自2017年以来一直公开重申这一立场。尽管该法某些方面明显偏离了社会保守的常规，比如禁止在公共空间或工作场所男女混杂，或者禁止音乐，领导层还是不愿公开反对。即便这部法律可能带来种种不利后果，这份迟疑仍然存在：内部抵制、人道援助捐助国的支持减少，以及叙解军那套包容性“民族主义”话语可信度受损，而那套话语意在争取所有人、包括少数群体，是其霸权战略的一部分，该组织借此把自己摆成革命与／或反对派的化身。

未能废止这部道德法，并不是因为叙解军领导层身上有什么固有的或特别的激进性。同一个领导层过去做过大胆得多的事。过去八年里，它的战略决断远远超出废止这部法律的分量：与基地组织决裂并随后与之对抗、镇压伊斯兰国、边缘化强硬派、与主流伊斯兰和解、与一个北约成员国达成安全与军事协议，甚至向少数群体与西方行为者敞开渠道。何况领导层对这部道德法本来就要么没兴趣、要么积极反对。这一僵局也不是内部权力斗争阻止其回头的结果。叙解军内部的强硬派并未结成一个足以否决该运动政治领导层的凝聚性派系。事实上，该组织此前接受过争议大得多的政策，比如俄土联合巡逻的部署，也没有遇到显著的内部抵制。这说明真正的障碍另有所在，不在意识形态的僵硬，也不在内部派系。

如果叙解军不愿废止道德法既非出自个人信念、也非出自内部权力斗争，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在于一个悖论：领导层认为放弃一部公共法律在政治上代价太高，尽管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力支持过这部法律。这份迟疑扎根于“消极团结”，即一种由宗教参照在伊德利卜公共领域中的霸权影响所塑造的动态。伊德利卜的社会肌理仍深深带着革命清苦的印记，这种清苦往往以宗教语汇表述，并由对叙解军正当性至关重要的有力行为者所维系，其中包括显赫的城市家族与受敬重的教士。消极团结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而是一种隐含的约束：无论是领导层还是其他有影响力的派系，都不能公开反对这部法律而不遭反弹。叙解军领导层虽在主观上与自家的宗教一翼（通常被称作“谢赫们”（*mashaikh*）或“教法官”（*shar'iyyeen*））保持距离，却不能断然拒绝加强伊斯兰规范的诉求，哪怕它私下里对这些诉求的内容心存疑虑。这一两难源自宗教话语的意识形态霸权，那是一股连叙解军的政治主导地位也无法完全抗衡的力量。²⁴⁰

伊斯兰主义者的思考是政治的，但他们在存在论上又系于伊斯兰。因此，他们不能轻易而自由地操弄这一参照来配合自己的成本收益算计，因为这一参照自带一整套约束，摩洛哥国王的话就表达了这一点：

他这一次是被一部过于自由化的属人法弄得难堪，于是重申了自己的限度，划出改革的范围，指明改革不能违背《古兰经》的明文：“真主所禁止的，我不能许可；至高者所许可的，我也不能禁止。”⁵³ 叙解军陷入了类似的“存在论陷阱”：一个人不能既把自己立为伊斯兰的护卫者，又去否认多数人并不质疑、且有一群活跃的少数人捍卫的穆斯林原则。而当政治理性与宗教规范的诉求发生张力时，一位伊斯兰主义领导人的回应总是同一套：稀释、无视、冻结，或者下一道暂停令，以便把原则的施行往后推，同时不去动摇它的根基。换句话说，如今我们可以给伊斯兰主义者下这样一个定义：他是一个受政治驱动的行为者，在存在论上依托一种偶尔会让他难堪的宗教身份。

因此，这部法律的通过并不源于自上而下的强加，也不源于该运动政治领导层的明确支持。它也不反映社会共识，因为该法超出了社会保守主义的范围，即便在伊德利卜内部也遭到反对。毋宁说，它出自一种集体性的难处：谁都难以公开表达异议，无论政治领导层的威权程度如何。简单地说，该运动领导层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一贯把教义更新的需要往后拖，这就使它易受“民粹姿态”左右，而这些姿态是领导层本来（尽管是不出声地）不认同的。因此，尽管激进派系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已落败，民粹主义以社会保守主义为框架重新出现这一点表明，激进主义仍有可能收获可观的进展。民主之中未必需要民主派，⁵⁴ 同样，激进主义也可能在没有激进分子的情况下冒出来。

第十一章 大叙利亚解放军的静默革命：去激进化为何不需要温和派，意图为何无关紧要

243

关于去激进化的争论，常常绕着行为者真实意图的问题打转。然而，死盯着大叙利亚解放军（HTS）是否真心致力于其意识形态转向这一点，就有可能错过一个更关键的动态：最初的意图——无论是战略的、战术的还是真诚的——归根到底不如它们所启动的那些转变来得要紧。一个运动一旦踏上主流化的热月之路，就会引发内部权力结构的移位，往往削弱强硬派、增强较为务实的力量。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这一过程如何展开，以及它经由哪些机制从内部重塑这个运动。

战术调整何以导致战略转型

叙解军的转型源自一连串战术选择，而这些选择逐渐带上了战略的分量。叙解军要面对治理叙利亚西北部这一角色，同时还有其他武装团体的存在、有活力的社会、土耳其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一部分人的某些期待；它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决定，而这些决定塑造了它的演变。它必须调适，必须清洗自家队伍，必须自上而下地定下新的方向。到头来，这一过程带来了一场从来不在它原初计划之内的、走向去激进化的转型。

叙解军的转型更多由实际的必要驱动，而不是由意识形态修正驱动。这个团体 2017 年成立时的目标是统一武装反对派，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因为许多派系不愿加入一个自己并不信任的、遭列名的团体。2017 年至 2019 年间，叙解军并没有一套界定清楚的政治方案；它只是不断因应新出现的威胁来调适，以求生存。这就解释了它为何先选择打大叙利亚自由军及其盟友：它把这些人看作外国、包括土耳其可能支持

244

的可行替代者。随后它又掉头对付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团体,因为这些团体拒绝接受它不断变化的战术选择,并有可能把叙解军自己的一些指挥官拉走,从而危及其内聚。但除了单纯的生存之外,它的近期目标仍不清晰。

真正改变叙解军的,是领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再地方化。在促成救国政府的建立、并收编那些参与一个叙解军从未完全控制的文职行政体系的本地精英之后,这个团体肩上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得多。叙解军经由文职治理而发生的转型有多重表现:从该团体对周边地区环境日益加深的依赖——尤其是不得不向土耳其作出让步——到它治理平民方式的演变。

叙解军与土耳其这个伊德利卜事实上的治理者之间的关系,迫使它作出此前一直反对的选择。支持阵线虽然从未对土耳其发动全面战争、也从未像伊斯兰国那样宣布它为敌人,却一贯拒绝与安卡拉扯上任何关系。在它的第一份公报里,该团体谴责土耳其;后来又反对那些谋求与土耳其建立联系的武装团体,尤其是在阿勒颇北部活动的那些,也反对自己的盟友,比如到2016年谋求与土耳其加强关系的大叙利亚自由军。然而2017年之后,伊德利卜对土耳其的依赖越来越深。土耳其的军事观察哨与安卡拉同俄罗斯的政治谈判,成了该省最终的保障。没有土耳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支持,无论叙解军还是任何别的派系,都顶不住俄罗斯支持下的政权攻势。随着叙解军接掌伊德利卜的治理、并对它的命运直接负责,它不得不承认这一新的现实。它与土耳其展开了战略上的接近;虽然它偶尔也抵制自己这个邻居,比如在接受俄土在M4公路上联合巡逻一事上曾有迟疑,最终却别无选择,只能让步。

对土耳其的依赖改变了叙解军。更激进的声音,包括基地组织的同情者与与之结盟的派系,力图把叙解军的指挥官们拉到反对这些新选择的一边。威胁不在军事上,而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这些派系指控其领导层背叛,动摇对领导层的信任,从而挑战叙解军的内部内聚。为反制这一点,叙解军短期内必须把异见之声边缘化,同时也要重新调整自

己的长线路数。因此,该团体调整了对新兵的内部训练,减少意识形态的分量,包括在训练营中禁掉此前讲授的那些意识形态鼓吹者的圣战文献,转而采用一套更本地化的宗教参照系来使新兵社会化,那样也更好管控。教育程度较低、意识形态驱动较弱的战斗人员的加入,为这一转向提供了便利:这些人主要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或从政权手中夺回自家房屋而来的。

把内部激进主义挤到一边、重新伸张控制这一需要,与治理的实际要求交汇到了一起。通过救国政府成为伊德利卜的统治者,迫使叙解军作出新的选择。换作过去,它也许只会给法官授权去施行伊斯兰法,认定这样就够了。这也正是萨拉菲派对待司法裁判的路数,往往与传统和既有的宗教权威相抵触。然而这一路数有失去司法控制的危险:更强硬的法官所作的裁决可能过于激进,会开罪国际社会、损害叙解军的战略位置。为防止这一点,叙解军加强了对司法治理的控制,一面保留伊斯兰的法律框架,一面确保其解释权掌握在沙拉的亲近同僚手中。它还对那些开始在政府控制之外蔓延的宗教学院加以规管。

叙解军与其他宗教社群的和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基督徒与德鲁兹社群仍然生活在该省,尽管许多人已流亡在外。作为执政的权威,叙解军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这是躲不开的现实,也迫使它作出调适。起初,该团体谋求某种形式的和解。沙拉 2023 年 6 月首次重要的媒体亮相是一步精心算计的棋,是一套更大的传播战略的一部分,意在把这位叙解军领导人呈现为对少数群体持开放态度。当时,该运动正日益把自己摆成叙利亚反对派的民族主义领袖、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主导力量。然而,这次向媒体的示好引来了叙解军中层与非关联武装团体的反弹。一些地方指挥官的回应是直接威胁德鲁兹名流、辱骂,甚至动手。这场骚动最终迫使叙解军出面干预。¹

246

对下层指挥官失控的担忧,加上德鲁兹社群的戒备,意味着叙解军必须更主动。据一位德鲁兹名流说,“我们害怕。如果说我们清楚地看到叙解军正试图向我们敞开,那么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山里有一些激进

团体拒绝这种敞开。眼下要紧的是，沙拉要把他在讲话中向我们许下的兑现出来”。²沙拉公开的保证——许诺安全、“宗教之事绝无强迫”以及对德鲁兹社群的开放——在叙解军自家队伍中遭到抵制，也激起了盘踞在德鲁兹村庄所在的萨马克山中的激进派系的敌意，有时还是暴力的敌意。为化解紧张，叙解军收紧了安全掌控，并对运动内外的激进成分动手。在吉斯尔舒古尔区，地方官员加大了调解力度，敦促倾向于煽动性言辞的清真寺谢赫有所克制，同时逮捕或驱逐了一些激进化的青年。应德鲁兹名流之请，叙解军设了3个新检查站，并加强了山村的巡逻。盖勒卜卢泽清真寺周边发生骚动之后，叙解军在当地设了常驻警力。为进一步稳住局面，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首领为与叙解军的重新落地政策保持一致，应叙解军之请到该村走了一趟，传达和解的信息。³

247 这一轮意识形态让步、抵制与激进声音遭边缘化的循环，造出了自我强化的动态。随着叙解军稳步把内部反对者挤到一边，它发现采取更居中的立场变容易了，而这反过来又迫使它把剩下的异见者边缘化。随着时间推移，内部抵制日渐稀薄，留下来的人越来越与该运动的新政治方向一致。该运动领导层看待局面的方式正是如此。正如沙拉的一位顾问2022年8月所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加速了：面对的反对方越少，我们前进的自由就越大。对我们有利的是，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替代去处。”⁴到这一过程走完时，该组织内部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而持久的改变。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说：

时间久了，抵制就淡了，转变也更容易推行。沙拉如今已把内部一切反对力量收服——再没有真正能挑战他的力量了。以前可不是这样。2017年土耳其要他接受观察哨时，沙拉同意了，但他还得征询该运动协商委员会的意见，那里的抵制既强烈又有意识形态色彩。⁵

因此，叙解军的转型与过去那些立场趋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大不相同，因为它的转向既不是由正式的意识形态修正所驱动，也没有伴随这类修正。叙解军走的不是埃及与利比亚圣战团体的路：那些团体在

目标落空、身陷囹圄之后，在狱中重估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在一系列出版物中质疑对穆斯林政权动武的正当性以及基地组织的战略。它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后者为回应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的激进主义，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文本来驳斥他的观点。叙解军则是务实地演变：它作出的种种决定与自己过去的立场相抵触，甚至反转了自己此前对别人作出类似决定时的严厉批评，而这一切都没有把这些转变在意识形态上的含义讲清楚。阿布·马利亚·卡赫塔尼是叙解军的一位重要头目，2024 年被伊斯兰国的一个细胞杀害，他曾自豪地坚称，该团体是自己行动的，并未受任何压力：

我与埃及圣战派的关键区别在于，我是握着枪作修正的。我曾是基地组织在黎凡特的教法负责人（*mas'ul shar'i*）。我认为基地组织袭击五角大楼是错的。我通过揭示 [阿布·穆罕默德·] 马克迪西与赛义德·伊玛目（Sayyid Imam）[一位埃及圣战意识形态鼓吹者] 的偏离，驳倒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根基。我坚持我们应当离开基地组织，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它打的是一场我们并不认同的战争——对西方的战争——而我们正投身于自己对伊朗的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作这些修正不是在牢房里，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一位领袖，从强势的位置上作出的。⁶

248

越过不可逆的临界点

于是，一连串战术决定导致了一场战略转型（一种新的政治取向，在内部由有利的力量对比所支撑），而这场转型是在没有正式意识形态修正的情况下发生的。既然叙解军并未把自己的核心原则讲清楚，也许有人会说：一旦形势有变，这个团体大可掉头，重回旧路。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这些变化的持久性质。

第一重理由既关乎全球格局，也关乎地区约束。2025 年之前，叙解军力图把自己与土耳其那份脆弱的伙伴关系变成政治同盟，同时在战略上向西方靠拢——主要是针对俄罗斯与伊朗——以取得西方人道

援助的通道，并让西方默认它事实上的统治。与此同时，它的激进对手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这些人在运动内部遭排挤、在外部则四分五裂，也不再像 2012 至 2013 年那样得益于国际圣战支援网络。伊德利卜对这些团体的私人资助枯竭了；冲突冻结三年多之后，叙利亚的圣战不再吸引非国家赞助者，国家支持者也换了优先事项。随着地区降级进程展开，所有主要玩家都收缩了对任何形式伊斯兰主义武装活动的支持。⁷

第二重理由是，该运动的激进分子因死亡、叛逃、边缘化与遏制而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力，这就使领导层更容易推进进一步的转型，尽管一部分基层并不情愿。叙解军的内部构成由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核心领导层虽大体未变，第二梯队却经历了剧烈的转变：外籍干部与战斗人员大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本地精英的结盟，这些精英属伊斯兰主义者或保守派，却很少是萨拉菲派，更谈不上圣战派。与此同时，基层的很大一部分是新近本地招募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承担。

这一转型强化了自我维持的动态。通过一步步战术性地偏离自己原初的萨拉菲世界观，这个运动越过了不可逆的关键门槛。将近四年里，它心照不宣的战略就是团结温和的多数去对付激进派系。而如今，经过五年与强硬派的内部斗争、与基地组织的决定性决裂、意识形态上的重大转向，以及重新接续革命遗产要义的种种努力——甚至还有限度地向少数群体示好——叙解军发现自己已到了不可逆的临界点。回到它原初那种超激进立场，不仅在地区与国际两条战线上于战略与外交都会适得其反，而且与它较新一批支持者不断变化的心态严重不合。何况，这样的反转还会重创它的可信度，损毁它通过重新定位在内外辛苦积攒下来的那点脆弱的政治资本。

在治理这一面，维持社会和平的需要维系着叙解军的转型。叙解军是从弱势位置上开始它的治理试验的。伊斯兰国随着治理结构的固化而变得更加威权，叙解军则不同：它既缺财力也缺人力，还不得不一面与政权公开交战一面治理。其结果是，它必须适应一个自己无力开罪的

环境。这就解释了它何以愿意因公众压力而退让，2021 年反对橄榄油税的抗议以及要求释放被羁押者的诉求就是例子。这带来了妥协，也有助于抵消激进分子的影响。在这一力量对比中，治理提供了工具，用以巩固对该运动意识形态与结构方向的掌控。集中化拆掉了昔日属于支持阵线地方指挥官的那些微型权威。制度约束限制了激进谢赫的影响。此外，治理还使遏制其他激进团体成为可能。不过，这些工具之所以有效，只因为确有去激进化的真实政治意愿，而它由前面所述的种种因素所驱动。伊德利卜这块飞地虽以威权为标记，却从来不是一个埃米尔国。

250

阿布·马里亚·卡赫塔尼承认，治理以及与外部行为者的往来，对这个团体的演变影响甚大：

每一个伊斯兰主义运动都是自己人民的产物，也反映着人民的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外来影响——比如种种观念与方法论——会改变它的结构本身，就像基因突变一样。此外，实情是权力不留情面，而治理就是政治。政治反过来又要求与国际体系打交道，同时保住一种伊斯兰身份——一种宗教的而非圣战的身份。

归根到底，那些一度助燃激进主义的因素消失了。该运动早年那种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已通过一系列澄清得到化解，即便并无意识形态修正。该运动与全球圣战的联系断了：在组织上是通过有意脱钩，在武装人员构成上则是因为一波波叛逃、分裂、对抗与去激进化重塑了它的队伍。与此同时，神学上的激进主义逐渐褪去，推动这一褪去的是热月式算计、意识形态分野与务实调适三者自我强化的动态。

一场静默革命发生了，无论领导层最初的意图或诚意如何。叙解军的领导人也在他们自己启动的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尽管他们原本并不打算朝这个方向走。因此，吊诡的是，他们的诚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们开始被这个体系及其约束的逻辑推着走。这一过程带来了真正具

有转化力的效果，不只是战术上的调整，而是持久的战略转移。在这场博弈里，没有回头路。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叙解军的转型不仅持久，还影响到了别的派系。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场效应^①”，即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 *effet de champ*：在一个给定的空间里，占主导的力量确立起新的常规，逼得其他玩家相应地调适。⁸ 一个清楚的例子发生在 2022 年 8 月 24 日：一对年长的德鲁兹夫妇在伊德利卜以西的卡夫廷（Keftine）村中被杀害。⁹ 对德鲁兹人及其他少数群体施压并不是新鲜事，但这起事件标志着一个转折。德鲁兹领袖第一次收到伊斯兰主义派系头目的慰问信息，他们谴责这起袭击，并重申视德鲁兹人为友人与盟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回应并不限于叙解军，伊德利卜的其他派系也跟了上来。¹⁰ 就连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也公开与这桩凶杀撇清关系，强调其战斗人员并不在德鲁兹人的山区。这一反应凸显出叙解军不断演变的立场如何在重塑更广的武装版图，逼得其他行为者向它所确立的新常规看齐。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例尤其能说明问题。历史上，该党为寻找军事训练机会，抓住叙利亚内战作为立足的良机。¹¹ 八年间，它辗转多地，包括叙利亚东部、阿勒颇和吉斯尔舒古尔，同时大体上设法避免正面冲突，连与叙利亚政权也是如此。不过，它有时也被卷入交火，比如在东部与人民保护部队作战、在阿勒颇与伊斯兰国作战。它最终落脚吉斯尔舒古尔，在那里领头发起一次攻势，巩固了自身位置并获取了可观的资源，包括坦克、财富与不动产。该党还扩展了自己的经济活动，成为土耳其境内维吾尔战斗人员的一个枢纽。在伊斯坦布尔，该党与伊斯兰国竞相争取维吾尔社群的效忠，从而稳固了自身影响力。

① “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社会由若干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每个场域有自己的规则与资本形态，进入其中的行动者不得不按场域的逻辑行事。所谓“场效应”，即场域对身处其中者的塑造之力。——译注

一种与叙解军相类的领土化与再地方化动态，也在影响着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该党确立起独特的领土存在，随后为守住控制权苦战多年，这强化了它的归属感。这一领土化过程随着社会融入而巩固，其中包括通婚：据说有 300 名维吾尔男子娶了叙利亚女子。该党把保全社群放在首位，为此创办学校，强调语言与以哈乃斐学派教法学为本的宗教教育，并把后者摆成对抗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屏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虽仍与其在阿富汗、由阿卜杜勒·哈克 (Abdul-Haq) 统领的领导层保持象征性联系，却在决策上主张自主。它对东突厥斯坦事业在情感与家庭上的牵系仍然强烈，成员时常讲述亲人在中国被关押的故事。尽管如此，²⁵² 该党在中国境内实施行动的能力已大体丧失。展望未来，该团体似乎着意复制过去的落户策略：在叙利亚边缘化的地区立足，此前在东北部，如今在西北部，以深化自身的社会与领土融入。

这些发展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那时激进化塑造着整个叛乱，连非圣战派也受其影响。许多武装团体，包括自由叙利亚军 (FSA) 内部的团体，都有过教派行径。比如亵渎基督徒墓地与教堂的事，就不只是圣战派干的，非伊斯兰主义的自由叙利亚军旅也干过。¹² 同样，武装人员的战歌也常取自伊斯兰主义的曲库，用的是阿布·拉提卜 (Abu Rateb) 或阿布·杜贾纳 (Abu Dojana) 这类人物的歌；给敌人命名时用教派修辞也是家常便饭。¹³ 这未必出自深刻的意识形态承担，而更像是一种“头脑的萨拉菲化”，即一个日复一日暴露于暴力之中、世界观与行为方式逐渐成形的过程。推动这轮激进化的有三个关键因素：一个强大的极端主义极点即伊斯兰国的存在，它逼得对手团体在言辞与行动上不断加码；地区上对圣战强有力的支持，既有私人的也有国家的；以及无限期冲突本身的动态，它助燃了自下而上的激进化，使武装萨拉菲主义成为日常生活中占上风的意识形态框架。

在许多方面，2025 年之前的叙解军为伊德利卜其他派系立下了新的行为标准，因为那些一度助长极端主义的条件大体消失了。有四个关键因素同时推动了这场转型：新的主流霸主取代了伊斯兰国的位置，

后者已于 2019 年丧失其领土据点；自下而上的激进化衰退，因为随着 2020 年冲突冻结，那种曾点燃极端主义的战争暴力平息了下来；叙利亚圣战在地区舞台上的吸引力减退，这由地缘政治转变所驱动，比如卡塔尔的国际常态化（与政治伊斯兰及武装伊斯兰拉开距离）、土耳其与卡塔尔日益接近，以及那些曾支持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之间更广泛的降级；¹⁴ 最后是某些外国武装人员团体、尤其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意识形态上缓慢地向叙解军靠拢。在圣战萨拉菲主义失去势头、叙解军新的外部参照点变成西方与土耳其的背景下，治理与国际援助成了中心议题。头两篇关于艾哈迈德·沙拉的重要长篇特写由西方媒体刊出，一篇美国的，¹⁵ 一篇法国的，¹⁶ 这并非巧合。

2025 年之前，武装反对派的一场总体重组正在进行。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界定了武装文化，其方式恰与 2014 至 2018 年的激进化相反。冲突头几年，温和团体常常自下而上地激进化，因为它们要回应战场压力以及伊斯兰国周边更激进团体的影响。但自 2016 年起，情形反了过来：昔日的激进团体开始自上而下地为自己的基层去激进化。这一转变尤其在叙解军不同层级之间造成了紧张。一方面，武装基层中有些人是在早先那个圣战势头正盛的时代被社会化的：那时国际网络推动着激进化，战争强化着极端倾向，强大的意识形态极点如伊斯兰国在吸引战斗人员。另一方面，领导层圈子对新的战略格局适应得更快：在那里，圣战萨拉菲主义失去了牵引力，成为中心关切的是治理而非圣战。这一转型还以新的交往渠道为标记：与土耳其、与西方智库、与联合国机构。

顺带一提，值得注意的是，叙解军精锐部队的训练员对在长期停火与意识形态去激进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持战斗意志表示忧虑。据其中一位训练员说，战斗人员如今花太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新兵的总体素质也开始下降。这一变化部分是因为这支力量日益本地化，新来的战斗人员比前辈受教育程度更低、意识形态驱动也更弱。¹⁷

重认根脉：去激进化、再地方化、再传统化

那么，若要确切界定叙解军是什么，该如何刻画它？2025 年之前，这个团体从未明确说明自己主张什么。倒是它的政治实践随时间推移，不出声地把它改变了。这场没有意识形态修正的转型，正是叙解军的独特之处：不仅在圣战派当中独特，与主流伊斯兰主义运动、包括与穆斯林兄弟会或萨拉菲派伊斯兰相关联的运动相比也是如此。更广阔的伊斯兰主义版图远非铁板一块。其中存在种种占主导的潮流，而把叙解军放到其他伊斯兰主义者——无论使用暴力与否——的坐标里，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它独特的轨迹与单一无二的演变。让我们从这些存在论式的考量中比较直白的一面入手：先看叙解军不是什么，或者说它已经不再是什么。²⁵⁴

第一点很清楚：叙解军不再是圣战派。该团体拒斥了圣战潮流的核心信条，即反对不施行伊斯兰法的穆斯林政权，以及敌视西方。这一转向不只是 2013 年与伊斯兰国、2016 年与基地组织的组织性断裂；它标志着一次根本的意识形态重新定向。叙解军是以实践而非正式的意识形态声明或一份界定自身主张的新政治纲领来显示自己的演变的。它与国家打交道，包括与土耳其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又放弃了圣战的核心原则——比如不再在宗教训练营中鼓吹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概念——这都表明它已明显告别过去的意识形态倾向。

第二点很清楚：叙解军也明显有别于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扎根于一种全体性(*shumulia*)的路数，谋求在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的一切层面上掌控并改造社会；叙解军出自支持阵线的来路，则更接近先锋式的武装精英主义，而不是兄弟会那种有结构的社会政治愿景。兄弟会把社会化、草根行动主义与参加议会选举结合起来，以逐步建立一个伊斯兰社会，这体现在它那句有名的口号“伊斯兰就是出路”(*al-Islam huwa al-hal*) 之中；叙解军则从未接受过一种全面对待社会的路数。这一根本差别也意味着叙解军的转型更为流动。兄弟会信奉一套特

定的意识形态传统与方法论,叙解军则没有僵硬的框架,这就给了它的领导层更大的灵活余地去适应变动中的政治与战略现实。

255

第三,尽管叙解军并未把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纲领正式化,却有清楚的战略努力在两个方面与萨拉菲主义拉开距离。在教义层面,该团体逐步把萨拉菲派的根本信条搁到一边,尽管走的是我们如今已经熟悉的那场静默革命的路子。该团体并未明确拒斥萨拉菲主义的根本信条;然而通过自己的实践,它实际上把这些信条**卸载**了,不让它们再塑造自己对待政治与社会的方式,却又没有明确发展出一套新的神学框架。其结果是,叙解军虽不拒斥这些根本信条,它们却在逐渐遭到搁置。举例来说,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信仰根基书》(*Kitab Usul al-Iman*)至今仍是教法学院课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与社会打交道时,这个运动似乎在推行一种倒转过来的萨拉菲主义,一种有选择地拆解自身传统眼光的萨拉菲主义:叙解军不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民众,反倒越来越被社会压力、社会输入或对温和多数的战术倚重所塑造。这一转向(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大概会称之为“社会惰性”)与经典萨拉菲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后者谋求以教义的纯洁改造社会,而不是去适应社会。

而一旦一个运动主要出于可接受度与社会稳定的考虑放弃了主动重塑社会的努力(放弃风纪监察就是一例),那么开始界定宗教规范的就是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叙解军至多是一个传统主义的运动,而沙拉在断言强制执行只应限于穆斯林中有广泛共识的事项时(前文已提及),就等于含蓄承认了这一点。这么一说,他就是让步承认:宗教权威不再自上而下地施加,而越来越由社会期待所塑造。这一由社会惰性带来的再传统化过程,可以从伊德利卜老城区斋月报晓人(*musaharati*)习俗的复兴,以及重新到墓地扫墓这类做法上看起来。再传统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叙解军那套倚重“温和的多数”之政治战略的意识形态维度。再传统化是叙解军自觉接纳并加以借重的、完全担得起的一项选择。

叙解军在三个方面变成了传统主义者：第一，以传统为参照，它认可沙斐仪学派就是一例；

256

第二，看重或容忍传统，民间伊斯兰实践或获接受（如拜谒圣墓），或获制度化（如本地教士的继续存在，以及像斋月报晓人这类角色获得官方承认）；第三，把传统用作正当性的来源，而这一策略同时也有助于把强硬派挤到一边。经由这一转型，叙解军接纳了一种保守的身份，把务实与本地适应力置于意识形态的不妥协之上。就核心而言，叙解军领导层几乎接受主流逊尼派传统之内的一切，只排除极端的苏菲主张与激进的过激（*ghulu*）。他们并不强加一套僵硬的教义，只强制执行穆斯林中有广泛共识的那些事项。

本末倒置：一位伊斯兰主义者眼中的务实主义

界定叙解军不是什么、或不再是什么，相对直白；难的是在它这条转型轨迹的终点上抓住这个运动的身份。一个有用的起点，是把该团体的自我认知与它意识形态同道的看法、以及约旦的阿布·卡塔达这类知名圣战思想家的看法作个对照。有一条共同的线索浮现出来：除了“一个反对政权的保守逊尼派革命运动”之外，叙解军并没有界定清楚的身份。说法五花八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称之为“行动的伊斯兰”（*Islam haraki*）。它的一位顾问把它描述为“保守而革命的伊斯兰”，并补充说：“我们是一个与圣战萨拉菲主义决裂的革命组织。我们是一个轮廓仍不确定的文人方案，我们的问题是缺少一个奠基性的参照。”协商委员会的一位前成员也发出同样的批评，他说“叙解军正从一个清晰的身份——圣战萨拉菲主义——转向一个漂浮的身份”。在他看来，

他们丢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核。他们不再是圣战萨拉菲派，也不真正属于政治伊斯兰。他们是一个昔日的圣战团体，如今靠实践经验来界定自己。可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锚。他们从传统圣战文献转向一堆五花八门的参照，把自己的政治身份稀释了。

257

这种流动性凸显出叙解军仍在进行的转型：一次有意识地与自身萨拉菲圣战根源的决裂，却没有界定清楚的意识形态框架来取而代之。这个团体在务实与教义之间周旋，一面适应政治现实，一面在意识形态上无所依托。昔日的同路人阿卜杜拉·穆海萨尼证实说：

沙拉站在受不义之害者一边，他仍然是一个伊斯兰主义者。但他并没有主动接受当代圣战思想的根本支柱，比如把非认主独一者逐出并宣判其叛教 (*ikhraj wa takfir al gheir al muwahideen*)，或者宣判国家叛教 (*takfir al-Dumal*) 的观念，因此不能称他为圣战派。¹⁸

长期亲近基地组织的宗教学者阿布·卡塔尔·法拉斯提尼，同样认为叙解军从事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方案：它经由亲历的经验而演变，而不是把一套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强加到伊德利卜的处境上：

从观念的角度去看叙解军是错的。别用意识形态的棱镜去分析他们。因为叙解军首先是一个由实践引导的运动。的确，叙利亚与其说是一个圣战的现实，不如说是一场革命。伊德利卜经验最根本的特点是试错。叙解军的经验与其说是在应用一套先行构想的理论，不如说是在因应处境而调适。他们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是伊斯兰主义经验的继承人。这就带来了含混与大量即兴。叙解军跟一切以政党形式组建或运作的伊斯兰主义团体一样。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总是政治压倒一切。引导他们的，是高于其他一切考量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本末倒置，实践先于意识形态。¹⁹

阿布·卡塔尔说叙解军本末倒置，先搞政治行动，然后才去找意识形态根据；他这话抓住了务实主义的要义：把实践置于一套僵硬而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上。在这一模式里，是本地（有时是国际）的约束决定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反过来塑造这个团体不断变化的身份。它不遵循一套固定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在松散界定的“合乎伊斯兰”框架内运作，而这个框架里可接受的边界已大为扩展。除了一端的道团主义（苏菲教团）与迷信 (*khurafat*)、另一端的哈瓦利吉派（极端分子）之外，

其余大体都得到容忍。叙解军一面应付来自自家宗教右翼的压力,一面保持灵活的立场:主麻日讲道即呼图白(*khutba*)仍然宽泛而不具约束力,伊斯兰教法的法典化与其说是要造出一套新的伊斯兰法律体系,不如说是要合乎穆斯林的保守规范。在实践中,叙解军容忍或迁就一切,只除了被视为极端偏离的东西,无论那是过度的苏菲实践(拜谒圣墓大体不在此列)还是过激(*ghulu*);而它所强制的,也不超出穆斯林中通常接受的范围。

叙解军确实斩断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缆绳,却没有去寻找新的教义之锚,这就解释了它何以不愿采纳一份新的奠基文件,以及它在界定自身时那种更深的存在论难处。我们至多只能辨认出这个运动不再是什么,或至少不再完全是什么。它从政治伊斯兰那里保留了“一个植根于宗教的政治方案”这个理念,却放弃了全体性(*shumuliyya*),即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那种掌控一切社会实践的构想。武装行动即圣战,变得与非伊斯兰主义者的构想没有分别,成了对一个暴力政权的自卫。萨拉菲教义的残余虽仍留在它的教学之中,叙解军却从根本上把萨拉菲主义与社会的关系倒转了过来:它吸纳萨拉菲主义的某些概念,而不是谋求彻底改造社会的组织原则。

毋宁说,这场由社会的重新崛起与热月式惰性这两股力量所塑造的转型,也就是界定了我们所谓再传统化的东西,最好通过本书通篇所追踪的那场静默革命来理解:这场革命在没有一套充分表述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展开,拒绝塞进研究其他伊斯兰主义团体所用的那些既有范畴。

叙解军的热月转向

伊德利卜各路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对话者都证实,叙解军内部变化的动能是真实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是批评沙拉的机会主义,是称许他的务实,还是担心圣战运动的定则(*thawabit*)有被“稀释”(*tami'a*)的危险。²⁰ 该团体在解放大马士革之前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把它在组建

新的叙利亚政府之前的战略愿景讲清楚。它也把这些变化历史化，以便在“温和化”与“务实主义”这两个用滥了的范畴之外重新思考这些转型。

2025 年之前的晚近转型表明，叙解军致力于确立一种热月情境；这一概念抓住的是革命动能中的一次倒转：一个曾体现激进断裂的行为者，如今更多着眼于巩固权力，而不是把颠覆性的转变强加于社会肌理。²¹ 2025 年之前伊德利卜的政治处境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是热月式的：对革命乌托邦的祛魅、武装斗争的推迟、治理中对乌托邦的放弃、对外部行为者的倚重、社会惰性的重新发现，以及该运动铁杆部分的边缘化。

叙解军领导层与本地权力结构之间那种祛魅的关系，是伊德利卜热月情境的第一重体现。救国政府是一种“暂定的现实”，²² 艾哈迈德·沙拉称之为“看守政府”，²³ 其领导层则称之为“技术官僚政府”。²⁴ 对地方治理的这种祛魅眼光，不应贬义地说成一种放弃之举。它同时也为该运动打开了重新掌握主动的机会，让它得以从此前不可想象的同盟角度去思考问题，包括与土耳其的庇护关系，以及谋求与西方国家实现常态化。在一位消息灵通的本地分析人士看来，叙解军正处在一个“开放”的过程中，成了“一个有能力现实的运动”。2024 年之前，目标与其说是拿下大马士革，不如说是保住权位、把叛军控制区组织起来。

260 第二，热月是“社会惰性”的重新发现，也是在“真实社会对意识形态的复仇”这一背景下对政治协商的需要。社会的复仇在这套政治方案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见到。该团体在神学上的再地方化就是热月式的。回归各教法学派、把制造分裂的概念边缘化、倚重下层教士，同样是热月式的，它们意味着承认社会的自主。在这一与本地民众接近的过程中，是社会定了调子、灌溉着公共话语、塑造着规范性工程。正如该团体的领导人所解释的：“我们的政策出自处境的条件。我们不追随任何特定的谢赫或某个参照。我们的参照就是周遭的现实，即 *al-waqi‘a*。”²⁵ 换句话说，聚焦本地也就是白板 (*tabula rasa*) 这一幻想的终结。这标志着

一次重大的反转。这个运动不得不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彻底改造社会。它是“被人民改造”的。

革命祛魅与社会的复仇所允准的同盟博弈的重新开局，给叙解军施加了重大约束。民众、土耳其的要求以及对西方期待的预判，事实上(*de facto*)都不容许一处安全庇护所或一个激进的埃米尔国。埃米尔国这个念头对土耳其、对与叙解军合作的其他派系都不可接受。第二，把宗教向民众靠拢这一选择意味着，任何公开宣称的伊斯兰方案都会变得冒险，因为按一位与叙解军关系密切的本地分析人士的说法：

有一个埃米尔国，就预设了要施行种种标准。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埃米尔国反倒是对激进分子的一种回应。要害就在这里：宣布建立埃米尔国，会让发起者暴露在某些标准之下，而叙解军出于管理自身社会基础的考虑，宁可不去施行这些标准。²⁶

救国政府被呈现为非政治的，遵循的是同一套逻辑：为了化解激进派“伊德利卜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秩序”这一批评，它在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把地方政治秩序伊斯兰化的情况下，索性把这一秩序去政治化。

这就带出热月情境的第三个特征：必须中和那些拒绝服从革命动能之保守转向的强硬派。他们的好战有两重理据。第一，战争自我证成。战争是一项宗教义务，是个人义务(*fard 'ayn*)，它既界定手段也界定目的。这正是对基地组织常见的批评，大叙利亚自由军与叙解军都谴责它把圣战本身当作目的。第二，战争有红利可分。资助圣战的外来援助需要261有活跃的战线才能带来现金流，随后还有战利品。因此，战争对他们既是道德理想，也同样是生存所必需。另一方面，对叙解军来说，活跃的冲突有三重适得其反之处。战争会启动一种不利的力量对比。这个运动在军事上顶不住政权与俄罗斯人。而且，战争可能挫败土耳其所推行的庇护区政策；最后，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包括对货物征税与项目扩展）需要停火。

对付激进分子可以有三种做法：拉开距离、边缘化与对抗。叙解军三种都用过。该运动与基地组织总指挥部拉开了距离。2016年斩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很合乎热月的逻辑，因为与原初母体之间的那根脐带在各个层面都是妨碍。这些联系阻碍了政治上的反转，也阻碍了一套新的韧性路数的形成，而那套路数意味着在实践上放弃活跃战争前线，代之以对全省的集体自卫，前后达四年多，直到2024年12月的胜利。此外，这份效忠还妨碍了“重新发现社会的惰性”所内在要求的神学再地方化。2020年7月，叙解军对宗教卫士组织发动了一场对抗，那是最后一个拒绝接受庇护区及其政治（与土耳其结盟）或军事（放弃活跃战争的逻辑）约束的基地组织加盟者。最后，叙解军把那些仍抱纯粹主义、无法适应社会惰性的铁杆宗教学者边缘化了。有些人遭逐出该运动，有些被打发去管司法，还有些教士则因该运动把宗教规范的生产制度化而被消了声。其结果是，据叙解军一位顾问说，早在2019年：

艾哈迈德·沙拉如今处在强势位置上。内部已经没有强有力的反对了，他也觉得安稳。但他同时又很愿意征询。他不想把想法强加给别人、要别人服从。他想说服他们。为处理这一点，政治决定会被导入该运动的宗教领导层，以确保他们的支持。这一内部转型的过程是真实的。但它需要时间。²⁷

262

艾哈迈德·沙拉的战略愿景正是在这一热月背景下凝结成形的。他承认地面上占上风的力量对比，却不支持一个由外部强加的“政治解决方案”。他解释说：“利益的趋同永远行不通。利益的分歧太大了。我们怎么能设想以色列、土耳其、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找到共同点？那不可能。”²⁸沙拉确信这场冲突会遭悬置，而不是在政治上得到解决。他明白，因此首要目标是巩固停火：“如果我们没法再往前推进，那至少守住现有的地方，保护民众，先在这里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²⁹2019年5月，与政权和俄罗斯的最后一轮对抗才刚刚开始时，一位消息灵通的分析人士补充说，叙解军领导层看到的是“一个被分成

三块、有同样多保护者的叙利亚。叙解军的战略目标是保住这片地盘，因为一旦失去，革命就到头了。而为此，叙解军必须向西方敞开”。³⁰ 呼应这些看法，沙拉解释说：“巴沙尔·阿萨德继续掌权将导致国家分裂。只有政权更迭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³¹ 因此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在等待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转变的同时保持韧性，并设法把自己嫁接到地缘战略的博弈之上。该运动的两个根本目标由这一判断而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对外争取自己在政治上获得接纳。

第一个目标是通过悬置规范性工程、适应本地处境来推进的。“我们没有一套现成的方案。我们的参照点是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也将把它考虑进去，以增强我们这套方案的可接受度。”³² 尽管如此，对社会接纳的追求，当时还没有通过大幅修正叙解军的人权记录来实现。第二个目标即进入地缘战略博弈，推动该运动积极支持土耳其的庇护区化战略，指望长远来看，地面上的合作能转化为与北方邻国的一种战略关系，由后者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这样一来，叙解军便可以基于某种共同利益感，比如反对政权、反对伊斯兰国、反对伊朗，以及在本地把人口组织起来、避免难民外溢的愿望，去谋求与西方靠拢。²⁶³

不过在 2024 年攻取大马士革之前，沙拉对终局并没有清楚的愿景，对叙解军在其中的角色也没有。³³ 这有两重原因。首先，沙拉的愿景是一套生存战略。既然叙解军不断因应短期情势作调适，长线的战略愿景本来就难以成形。但含混也有它的好处。没有清楚表述的终局愿景，使该团体得以处理内部矛盾、安抚较为激进的支持群体，避免因一次可能显得过于突兀、过于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转向而疏远他们。与此同时，半心半意的意识形态澄清也有反噬的风险：国际层面上，国家行为者可能把这类姿态解读为不够，因而仍不愿与之打交道。³⁴

从这个角度看，沙拉的愿景确实是热月式的。这位自认的“革命伊斯兰主义者”领袖，不再相信仅凭革命行动就能得救，而相信要靠外部力量的支持。³⁵ 他采取了一种观望的姿态，反映出一种以韧性与对外部

力量的依赖为原则、向内看的取向：因为那意味着把治理与地盘的经营，摆在立刻拿下大马士革之上。

第十二章 非自由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重归中间

265

叙解军的经验虽属独一无二，却为“政治伊斯兰可能变成什么”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观察角度。伊斯兰主义本身在政治上仍然界定不清，因为它始终是一套松散搭起来的意识形态框架，除了在治理与社会中援引伊斯兰之外，几乎给不出什么直接的政治指引。¹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相仿：社会主义也曾催生出面貌迥异的种种运动，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到红色高棉那样的暴力政权，后者在伊斯兰主义的谱系里相当于伊斯兰国。伊斯兰主义的场域在形形色色的具体权力格局中运作，其中许多格局在不同的国别语境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个场域容纳着范围广阔的行为者，从伊斯兰国到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每一个所处的条件都大不相同，从内战一直到政治机会与约束不断浮动的半威权国家。

叙解军是少数几个真正而且持久地确立起领土控制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运动之一。当代另外两个例子（叙解军对这两个都很留意）是哈马斯截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对加沙的治理，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不过叙解军既没有复制哈马斯的威权，也没有复制塔利班那套僵硬的宗教敕令。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虽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过去二十年里却大体已与伊斯兰主义拉开距离。穆斯林兄弟会 2012 至 2013 年在埃及的统治同样短命而有限，因为军方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终控制权。同样，伊斯兰国虽一度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占据地盘，它在别处的所谓“省”却依旧组织松散，包括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²⁶⁶而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加盟者青年党（al-Shabaab）则主要在乡村地区活动。这也使叙解军成为唯一一个出自圣战萨拉菲主义、却成功行使了

治理的运动，尽管它是在放弃圣战主义、并把萨拉菲主义从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中掏空之后，才做到这一点的。

持久的伊斯兰主义治理经验数量有限，这就促使我们把叙解军的比较对象扩展到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案例之外。更要紧的是，还没有哪个伊斯兰主义运动是从强势位置出发去走一条去激进化道路的。我们在第十一章里是在一个“伊斯兰主义”框架内讨论叙解军的，把它摆在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派与圣战派之间的某处；然而我们发现，现实并不服从现有的分类。这些既定范畴只能让我们从否定的方向去界定叙解军：说清楚叙解军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全球圣战派、萨拉菲派或穆斯林兄弟），或者它没有变成什么，比如没有变成政治伊斯兰的新版本，要比精确界定它今天究竟是什么容易得多。唯一可能适用的宽泛标签是“传统主义者”，可这个标签仍然太笼统，交代不了叙解军内部已经发生的那些转变，对于把握该运动当下的现实用处也有限。

因此，我们虽然会讨论宗教范畴与分析框架来剖析叙解军，我们的路数却并不依托伊斯兰研究。我们反倒是通过反复援引法国大革命，力图以一种或许是野心过大的方式来呈现叙解军的历史，也就是追求某种程度普遍性的方式。这就解释了我们何以频频动来自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概念与历史类比：它们为理解这个团体的轨迹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洞见。这样做，是为了超越那种一味倚重圣战团体既有研究成果的做法，尽管那些成果无疑是丰厚的。我们希望以同样的精神来收尾。

叙解军的轨迹围绕两条主轴展开：一次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以及一次热月式转向：后者的标志，是放弃“一块意识形态白板”的抱负，转而认可一条倚重沉默的大多数的战略。这一转向从未被公开承认过，也不是出于对革命本身的断然拒斥。该运动的领导层始终在谈论、也始终期待着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攻取大马士革——同时保有自己的军械库，继续与政权作局部对抗。然而早在2017年，尤其是在2017至2024年间，政治盘算就越来越偏离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议程。首要的着眼点转向了几件事：巩固对已得地盘的控制、发展一套官僚结构、把

自己摆成叙利亚革命的代表、避免军事上摊子铺得过大,以及为持续的武装活动争取机会。²不过自2019年起,叙解军的军事行动大多针对的是其他反对派团体,而不是政权。2019年,它的首要目标是以主流革命派系为代价巩固对伊德利卜的控制;2022至2023年,它谋求确立对阿勒颇以北自由叙利亚军地区的支配。这些行动反映的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霸权战略,而不是要对政权发动一次宏大的革命突破。因此,叙解军暂时离开革命,最好理解为政治优先次序上的一次客观转移,而不是在战略上背弃革命理想。

意识形态重定位与再地方化紧密相连,其中也含有去激进化的成分。它是通过本书通篇所探讨的种种机制展开的,其中包括一套霸权战略:2020年夏天起,叙解军从遏制政策转向与激进分子的直接对抗,对手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加盟者。塑造这一转向的另几股关键动能是:“社会惰性”的确立、“社会的复仇”、“良性循环”的自我强化效应,以及不可逆门槛的形成。这些机制合起来解释了本书两大中心主题——离开革命与意识形态重定位——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的。

传统伊斯兰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在把握该运动当下轨迹方面能给的概念工具有限。要更有效地理解它的演变,不妨与那些经历过类似的向中间重定位过程的运动作个比较。在这一点上,叙解军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与其说像早前的圣战经验,不如说更像极右政党的轨迹。²⁶⁸这类政党往往采取一些与政治极端拉开距离的策略,其典型情境是:自身实力相对雄厚、怀有夺取权力的抱负,而在教义打磨上着力甚少。

激进主义转瞬即逝的年代:中间与极端的交叉潜流

随着叙解军政治与宗教上的激进主义软化,革命的中间地带反倒成了激进主义再度滋长的沃土;极端的中间并不是主流的激进化。它是一套让政治竞争丧失正当性的做法:把自己摆在中间的位置上,同时把

一切替代选项统统判定为激进派。^①无论是为公共道德法的游说，还是2024年的反叙解军抗议，都例示了新形态激进主义的浮现：它不是圣战式的，而毋宁说是民粹伊斯兰主义式的。这种激进主义是从伊德利卜的意识形态中间地带里长出来的，由革命成分与社会保守成分的混合所塑造，用不着把它归因于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的暗中复起。

在公共道德法一事上，“道德企业家”们谋求把伊斯兰规范强加于公共领域，而这是艾哈迈德·沙拉本来宁可避开的一桩事。³这就把叙解军的领导人逼进了一场微妙的平衡术：一面悄悄冻结一部其实算不上多伊斯兰主义的法律，一面又没法公开拒绝它。毕竟，公共道德与道德纠察是当代阿拉伯国家寻常的正当化与控制工具。2024年2月至7月的反叙解军抗议，是激进主义从主流中冒出来的又一次显现。那段时间里，伊德利卜及周边城镇的街头出现了新一波革命式的不妥协，诉求包括赶沙拉下台、解散总安全机构、释放全部在押者；在边缘处，还有人呼吁恢复哈里发国、全面施行伊斯兰法，甚至设立……一支道德警察。

叙解军的回应是容忍街头抗议持续，同时摆出近六个月的武力姿态，这就凸显出低烈度威权政体的固化。这套策略靠的是自我节制、尽量少抓人、不作暴力镇压、反复呼吁对话，以及在税收与羁押等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整个动荡期间，叙解军持续开展民众协商，强化了自己“宁可谈判而不直接镇压”的政权形象。归根到底，它把选举视为权力轮替的一条原则，却把选举严格限定在非主权性的民事机构内，把安全、军事机器与经济控制这类要害领域排除在外。

与围绕公共道德法的那场争论一样，民众运动（*hirak*）的抗议标志着“主流的激进化”再一次得到确认，其表现形式同样是宗教民粹主义。叙解军又一次发现自己在右翼一侧遭到超越。在民众运动领头的这场反威权运动内部，伊斯兰解放党重申了建立哈里发国的诉求，一些

① 原书此句有逗号粘连的语法断裂，并含 *deligitimisation*、*disqualifying* 两处拼写讹误。译文照原样译出，不代作者修补。——编注

教士则把施行伊斯兰法说成防止刑讯的终极保障。与此同时,叙解军提出的改革,尤其是它经由选举作出的谨慎政治开放,成了民粹批评的焦点。围绕这些改革中是否可能纳入妇女与少数群体的争论激起了反弹,社交媒体上有人径直给艾哈迈德·沙拉贴上西方傀儡与民主代理人的标签,实际上是把划进了“真主之敌”的阵营。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倒转的动能:主流夹在节节上升的革命不妥协与伊斯兰民粹主义之间,把激进主义吸收了进去,显出自己远不如想象中居于中间,如果它当真居中过的话。与此同时,叙解军自身的激进主义却在收缩,宗教一面是它渐渐远离早年的萨拉菲信奉,政治一面则是僵硬的威权让位于对异见更具战略性、更有分寸的处置。在中间与极端之间的这场辩证移位中,意识形态的边界模糊了,各种立场也去领土化了:激进主义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派系或意识形态,正如中间主义如今也可能从昔日极端主义的边缘地带长出来。

归根到底,真正棘手的是激进主义这个概念本身。随着它不断演变,激进主义变得弥散开来:一面是极端的去激进化,一面是“极端的中间”的固化,两者同时在塑造它,正如第六章与第八章所勾勒的那样。²⁷⁰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难以捉摸了。

关于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的九条教训

意识形态范畴如此模糊,其实算不上新鲜事,历史上向中间重定位的例子不胜枚举: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左翼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化”了;到了下一个世纪之初,极右政党又开始“去妖魔化”,这是法国国民联盟^①领袖玛丽娜·勒庞的用语。⁴若把视野放宽些,叙解军的经验又揭示出意识形态重定位的哪些动能呢?

① 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是法国极右政党,一九七二年由让-马里·勒庞创立时名“国民阵线”。二〇一一年玛丽娜·勒庞接掌后推行“去妖魔化”,淡化党的法西斯与反犹历史包袱、争取主流选民,本书以之与叙解军的转型互为参照。——译注

1.意识形态重定位从来不是纯粹工具性的

没有哪一次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是纯粹工具性的。它必定招来反弹,打乱内部的一致,制造出可观的内部张力。在许多情形里,要维持凝聚就得作内部清洗。叙解军正是这一模式的例证:它的重定位一路伴随着分裂(包括亲基地组织的宗教卫士组织)、叛离、边缘化、好聚好散与开除。一句话,意识形态重定位很少能不带来实质性的内部摩擦,而首当其冲的正是激进的边缘部分。因此,重定位是“从反面”去激进化的:它并不培育温和,而是把最不肯妥协的成员逐出去,逼他们沉默或流亡。这反过来又为一轮自我强化的转型循环创造了条件。

2.意识形态重定位还取决于中间行为者的状况

激进运动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强弱:它的意识形态一致程度、组织能力、民望与动员力。中间越弱,重定位越容易。竞争者少了,完成重定位的昔日激进派就能把自己摆成可行的替代选项。在伊德利卜,这一动能格外明显:革命的中间地带塌了,留下一片真空,等着人来填。这场塌陷表现在好几个方面。第一,军事上,中间地带解体了:曾经体现它的那些自由叙利亚军派系输掉了对激进派的战争,也断送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可信度。第二,治理上,革命的中间地带被蚀空了:随着救国政府巩固权力,地方委员会在2017年与2019年遭到拆散,而它们没能有效制度化,又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正当性。第三,中间地带的政治能力碎裂了:所谓的革命政治机构死气沉沉、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对2024年春天抗议的再度兴起束手无策。最后,对外没有留下可信的代表:反对派联盟与其说是个正当的代表,不如说更像个象征性实体,在国内国际两头都已失去影响力。

3.没有哪一次意识形态重定位不伴随中间地带自身的转变……

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会改造“中间”本身。即便中间地带已不再作为一股活跃力量存在,它仍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延续下去,塑造着意识形态主流的轮廓。然而这个主流并非静止不动,它会随“极端的中间”的动能而演变。正如法国有过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所说的“头脑

的勒庞化”(*lepénisation des esprits*), 他用这个说法描述与让-马里·勒庞相关联的极右观念如何逐渐被正常化、进入主流; 在这里, 我们同样看到一种弥散而难以捉摸的影响力: 它在政治场域中不可预测地重新浮出水面, 一有机会便冒头, 比如伊斯兰主义民粹势力为公共道德法所作的游说, 又比如有人拿 2024 年抗议运动去推进宗教议程。换句话说, 重定位并非只有激进行为者向中间移动的单向过程; 中间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塑。它不是一根固定的意识形态锚, 而是一片流动的空间, 靠吸收自己激进边缘的成分而不断变异。这是通过两套关键机制发生的: 基层活动分子文化日益无所顾忌, 以及右翼政策在移民与安全等议题上日趋激进。

272

4.……也没有哪一次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不伴随与激进生态圈的切割

在另一头, 没有哪一次意识形态重定位不伴随激烈的对抗, 有时还伴着暴力与流血, 伊德利卜就是如此。叙解军试图与基地组织和平分手, 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⁵ 大批拒不从命者脱离出去, 拿起武器, 坚守原有的组织路线与意识形态路线, 扛住了遏制的种种努力, 到 2020 年夏天与叙解军公开武装冲突。一句话, 意识形态重定位很少是平顺的过渡。它几乎必然导致向中间移动者与“极端派”之间一次尖锐而且往往是暴力的决裂, 无论那些“极端派”是激进右翼派系, 还是拒不放弃原初立场的圣战萨拉菲派。

在这一背景下, 把重定位的不同维度及其各自的判准区分开来至关重要: 对外传播、政策纲领与公开倡议、政党联盟、活动分子生态圈, 以及教义根基。

法国的国民联盟是衡量意识形态重定位的有用标尺, 尽管它的轨迹交出的是一份好坏参半的成绩单。一方面, 它的传播策略很清楚: 玛丽娜·勒庞 2018 年力推“去妖魔化”是一例, 如今则体现在约尔当·巴尔德拉那副精心经营的“理想女婿”形象上。然而重定位不止于修辞。

该党还把让-马里·勒庞打发进了过去，以此昭示与自身法西斯遗产的决裂，从而强化了它向更广泛选举正当性的移动。

政党联盟也经历了可观的重新校准。国民联盟与传统主义天主教徒拉开了距离，同时与法国极右中最激进的派系保持着暧昧联系，包括新纳粹运动与强硬的认同主义团体。与此同时，它曾试图与共和派右翼靠得更近，但没有成功。这些努力虽未结成持久的同盟，却有助于把国民联盟与主流右翼政党之间的界线搅模糊。在欧洲舞台上，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中促成“认同与民主”（ID）党团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把民族主义与疑欧派政党聚拢起来，比如马泰奥·萨尔维尼的意大利联盟党和海尔特·维尔德斯的荷兰自由党。不过，对于希腊金色黎明党或匈牙利尤比克党这类更极端、更有争议的政党，它仍持谨慎态度，不与之结盟。

然而，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大体上仍锚定在激进右翼的传统曲目里。它固然避开了那些明目张胆的极端主张，比如德国选择党（AfD）所鼓吹的“再移民”，即把处境不稳或身份非法的外国人大规模驱逐出境；但它仍与保卫联盟集团（GUD，*Groupe Union Défense*）一类极右极端团体以及别的极端民族主义派系保持着私人联系。其结果是，它的归属关系与活动分子基础仍旧横跨在主流政治的边缘上。

在伊德利卜，这场决裂显得更为剧烈。去妖魔化的策略是明摆着的：标志是公开与基地组织脱钩、向少数群体伸出触角、与西方媒体和智库打交道。与此同时，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生态圈的碎裂既广泛又暴烈。冲突与安全整肃针对的是与基地组织结盟的派系或伊斯兰国的细胞，激进分子则被驱逐、压服或羁押，为的是巩固控制。

该运动的政策全面完成了重定位。规范性工程受到抑制，哪怕面对来自基层的反向压力也是如此，第六章公共道德法一事即为其例。意识形态部门被下放给外部行为者，比如教育交给西方非政府组织、宣教交给本地下层教士，尽管并没有一套特定的意识形态议程。该运动还遵守国际承诺，包括土耳其与俄罗斯谈成的停火。与此同时，叙解军建立同盟的种种策略往往是为确保支配地位而设计的，瞄准的是中间地带。这

包括吸纳 2011 年革命运动的旧人物、与自由叙利亚军派系培育庇护关系,以及向“中间”作出象征性让步,比如参加 2011 年叙利亚革命的纪念活动。

至于教义框架,叙解军的革命虽在意识形态修正上大体没有明言(很可能还要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它却已经全面完成了重定位。这一点可以从几件事上看出来:认可伊德利卜占主导的教法学派,即沙斐仪学派;在叙解军控制的宗教学校以及伊德利卜大学伊斯兰法学院里对萨拉菲主义的默然弃置;以及为战斗人员开设去激进化课程。推动这些步骤的,并不是对某种“温和”伊斯兰路数的偏好,而是防止分裂、防止人员向更激进派系流失的需要,就像支持阵线 2013 年随着伊斯兰国崛起而经历的那场武装人员出走。

274

于是,国民联盟的去妖魔化策略虽已超出传播层面,而且尽管出现过重大裂痕,激进意识形态生态圈与该党之间的连续性仍然很强;与之相对,叙解军的激进意识形态生态圈则因多年派系冲突与多轮清洗而被深深打断。

5. 意识形态重新定向: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事

意识形态重新定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去激进化——往往更多是通过实践发生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意识形态转变。这里没有教义更新(*aggiornamento*),没有新神学,也没有“修正”(*muraja'at*)。革命依旧是无声的。推动观念转变的是政治盘算与权力斗争,而不是教义上的革命。在法国,国民联盟的去妖魔化主要是个风格问题(体现在约尔当·巴尔德拉那副光鲜形象上)以及政治传播问题,而不是深层的教义转型。其结果是,该运动的政治文化有时会跟不上趟;无论在国民联盟还是叙解军队伍里,中层头目发推特或讲道时都常常流露出排外或教派色彩的观点。这些言论与其说是暴露了该运动的“真面目”,不如说是活动分子文化在艰难地适应缺乏清晰教义框架的新政治方向。在叙解军这一边,活动分子文化始终落在领导层政治转向的后面。挥之不去的教派

倾向与萨拉菲姿态的残留仍渗透在队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层的某些暴行，尤其是 2025 年 3 月的教派暴力。

乍一看，“静默革命”似乎是个弱点，一个日后可以靠教义上的“出柜”来补救的弱点，可事情未必如此！与其说静默革命表明有所欠缺或留有空白，不如说它更接近威廉·赖克所界定的“策略操控术”^①（*heresthetic*）。应当把它理解为彻头彻尾的政治行为。在赖克看来，“策略操控术”指的是这样一门技艺：把一个政治情境构筑成某种样子，使得一项艰难的决定摆到公众面前时，并不触动他们底层的偏好与原则；换句话说，不与他们很可能持有的信念正面相抵。若去驳斥这些信念，可能重新点燃旧日的争端，激起危险的争议。目的是避免陷进教义修正或教义更新的泥潭，圣战团体内部的那些辩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一份正式的宪章或澄清性的奠基文件，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

6. 政治只是其中一面：意识形态重定位始终是与社会的互动

意识形态重定位从来不是纯政治的；它与社会深深缠绕在一起，被巴亚尔所说的“社会的复仇”、孚雷所说的“社会惰性”这类现象所塑造。正如叙解军不得不去正视本地语境的社会宗教现实，欧洲极右的议会政党也必须与自己那套社会学现实打交道，也就是由文化革命与性革命所塑造的现代行为与实践。⁶叙解军远离了自己的萨拉菲过去，不再把先知启示当作唯一的意识形态棱镜；与此同时，占主导的欧洲极右政党尽管在许多方面仍是认同主义的，却不再把某种“犹太—基督教”认同理想化，无论人们怎样解释这个概念。它们也不再拒斥自 1968 年五月风暴以来演化出来的自由主义价值。

今天议会中的极右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经适应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承认同性恋，有些领袖如海尔特·维尔德斯甚至公开表示支持。这些

① 赖克（William H. Riker，一九二〇—一九九三）是美国实证政治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所谓 *heresthetic*，指的不是说服对手改变偏好，而是重新构造议题与选择情境，使既有的偏好导出自己想要的结果。——译注

政党不再鼓吹传统家庭模式；焦尔吉娅·梅洛尼与玛丽娜·勒庞都未婚，两人也都不仇视同性恋。举例来说，2012至2013年法国“人人可婚”的辩论中，勒庞并未反对同性婚姻。此外，反堕胎立场在选举上已证明没有吸引力。“就社会、价值与文化而言，极右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向中间移动，吸纳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形的社会学现代性的新参数。”⁷ 其结果是，就社会、价值与文化而言，极右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向中间移动，吸纳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学现代性的新参数。^① 于是，“社会的复仇”同样适用于这些完成了重定位的极右运动。

276

7. 倒退是例外

意识形态重定位是持久的，此后很少跟着出现倒退或“再激进化”的反弹。轨迹大体上是一致的：甩掉旧日的包袱，比如与让-马里·勒庞相关联的前武装党卫队成员，或是叙解军这边的全球圣战派；与边缘拉开距离，无论那是新纳粹、法西斯团体，还是形形色色的萨拉菲圣战派系；并且向“中间”靠拢。这个中间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如伊德利卜的革命；可以是宗教意义上的，如广泛的逊尼派共识；也可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革命式清苦与战后开放之间的一种合题。向中间努力会带来种种约束，而这些约束从根本上重塑了完成重定位的行为者的性质，哪怕当事人主要把它看作战术目标。这一转变之所以持久，有本书通篇所勾勒的几种去激进化机制作支撑：棘轮效应、不可回头的逻辑，以及良性循环。

倒退是罕见的。在经历热月阶段之后又再激进化的革命行为者，伊朗大概是唯一一例；而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个政权始终分裂为改革派热月分子与更死板地依附原初正统的深层国家。⁸ 后者从未真正因改革派崛起而被削弱。反观伊德利卜，热月政体恰恰是深层国家本身——

① 原书此处把同一句话说了两遍：引文末句与紧接其后的“*As a result...*”一段措辞几乎全同。译文两遍都译，照原样保留。——编注

也就是沙拉的核心圈子——建立起来的,出于上文所说的种种理由,倒退在那里本来就不大可能。

8.选举盘算并非重新定向背后唯一的政治理据

277 向中间移动未必只是选举动能的专属产物,而这些动能所处的,是一个已经制度化的、民主的政治场域。一般来说,推动这类转型的是这些团体的制度化,即嵌入议会程序与选举盘算。然而在伊德利卜,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并非源自选举理性,因为叙利亚根本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游戏;毋宁说,推动它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政治盘算。

有三个因素起了特别的作用。第一,追求社会和平,努力确保该运动在伊德利卜的可接受度。叙解军所处的环境使它不能——或者说不愿——靠武力压服社会,这与伊斯兰国所采取的战略正相反。第二,叙解军把赌注押在自己的国际可接受度上:随着叙解军接手管理叙利亚西北部的责任,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对这个团体就变得至关重要。叙解军是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运作的:资源有限、国家保持最小限度,并且强烈倾向于把服务供给(包括教育这类带有意识形态分量的服务)下放给公民社会,具体说就是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这类国际行为者。于是,叙解军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第三,意识形态重新定向的动机,还在于想要代表革命,同时又为政权提供一个替代选项。这也解释了该团体何以要与少数群体打交道,此外还有别的考量。

9.意识形态重定位与威权主义问题

意识形态重定位可以塑造威权主义的性质,尽管两者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对应关系。在欧洲,极右运动被纳入主流,有时正与自由民主政体内部的威权化倾向同时发生,表现为日益军事化的人群管控手段、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对涉伊斯兰言论的审查,以及借反恐措施收紧公民自由。在伊德利卜,意识形态重新校准与革命抱负的退潮结合在一起,不仅带来了宗教规范执行上的松弛(这与2024年重申严格道德纠察的塔利班形成对照),也带来了政治威权主义的相对减弱。与加沙的哈马斯(2007至2023年)或革命后法国的热月政体不同,叙解军既与宗教激进

278

主义拉开了距离（放弃萨拉菲规范与全球圣战网络），也在较小程度上与赤裸裸的政治镇压拉开了距离。叙解军吸纳了革命理想，也把反对派的一部分收编进来；异见虽偶尔遭到武力对待，羁押场所中的刑讯也依然是事实，但对这类做法的抵制在不断增长。为回应激进的反对声音，叙解军甚至考虑过在自己的治理中引入有限的选举机制。

叙解军并没有像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或巴沙尔·阿萨德那样，以刻板印象中的“东方专制君主”方式统治，但它也不容许真正的政治多元。与摩洛哥的政治模式相仿，叙解军为维持社会稳定而向抗议者作出可观让步，给议会与政府有限的监督权，但归根到底让深层国家保持原样，把权力牢牢攥在手里。通过把日常治理、社会政策以及经济的一部分甩给受控的政治结构，叙解军既保住了最终权威，又缓解了直接的反対。

意识形态上的温和化虽然往往同时意味着宗教戒律的松弛与政治镇压的减少，这两种转变之间却并没有因果关联。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毋宁说，两者都是叙解军更广泛政治战略的副产品，而这套战略是由几个目标推动的：社会和平、全国范围的正当性（把自己塑造成一场属于全体叙利亚人的革命，包括与基督徒、德鲁兹人和库尔德人往来），以及国际承认。又一次，决定该运动在宗教治理上的立场与在威权主义上的取径的，是政治盘算，而不是意识形态转型。

与基地组织前穆夫提马赫福兹·乌尔德·瓦利德——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布·哈夫斯·毛里塔尼——的看法相反，⁹ 叙解军并不是一个注定要在本地区被仿效的模板。阿布·哈夫斯认为，处境类似的圣战团体或许会追随这个叙利亚组织走上意识形态重新校准的道路。然而并不存在可比的处境：叙解军的轨迹太过特殊，在本地区大概找不到多少仿效者。推而广之，它也提供不出去激进化的规范性配方。我们应当就叙解军本来的样子去理解它：一个富有启示的案例，照亮了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这个更广的问题。它更多地映照出“全球时代精神”，¹⁰ 而不是为全球圣战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提供了解药。叙解军晚近的轨迹在思

想上引人入胜，可它对反恐战争不会有多少全球性的影响。往好里说，
280 西方失去了一个昔日的对手，也许还得到了一个战略盟友。

跋 寻找自我：逊尼派认同政治的暧昧崛起

伊德利卜母版在大马士革当政

281

2024年11月27日，叙解军领导的联盟（此前围绕“明胜”联合行动室组织起来，后更名为军事行动管理局）发动了新一轮攻势。不出几天，这场原本只为把伊德利卜东部战线向阿勒颇推进的局部进攻，就成功击碎了政权的防线。联军迅速抵达阿勒颇，随即掉头南下，经哈马、霍姆斯一路推进，最终直指大马士革。不久，其他派系也加入了叙解军及其盟友，其中包括北方隶属叙利亚国民军的团体，以及叙利亚南部的一批武装行为者。

12月8日，叙解军正式接掌新政府。艾哈迈德·沙拉此时已启用本名，执掌全国，组成了一届看守政府。他的政治顾问阿萨德·谢巴尼出任外交部长。叙解军的军事主官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出任国防部长；该团体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阿纳斯·哈塔卜先是被任命为叙利亚国家情报首脑，随后转任内政部长。加上叙解军的宗教首脑、现任总统宗教顾问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那个曾引领该团体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决裂并为它谋定新战略航向的核心领导层，如今握住了国家权力的缰绳。

作为本书的收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一场胜利之后的转型作一份详尽的记述；这场转型仍在流动之中，大体上是由新政府因应情势变化而作出的临时决定所塑造的。我们要做的，是把焦点收窄到伊德利卜意识形态归入主流的轨迹上，并思考革命的这一新篇章如何照亮本书的中心主题：向中间的意识形态重定位的动能，以及与之相应的激进主义的变形。

282

一种植根于倭马亚遗产的新逊尼自豪

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倭马亚^①清真寺正准备迎来谢赫亚辛·阿卢什的一场讲道。阿卢什是位重要人物，曾任伊德利卜伊斯兰教法学院院长，本人是伊德利卜人，也是新格局政策方向的主要设计者之一。2014至2015年间，他多次在支持阵线与伊德利卜其他革命派系之间充任调解人，同时在对待伊斯兰的路数上既不站苏菲一边，也不站萨拉菲一边。

此时距离哈桑·纳斯鲁拉——真主党前领袖——预定的葬礼只有两天，整个地区的气氛处在剧烈的两极对立之中。清真寺里却很平静。由身着传统红黑袍服的谢赫们组成的苏菲修行圈(*halaqat*)诵唱着神秘主义的赞辞，将近一个小时，等待着按惯例在讲道之前进行的《古兰经》诵读。

亚辛谢赫腰间佩着那柄传统的剑（自倭马亚首任哈里发穆阿维叶·本·阿比·苏富扬的时代起，这柄剑就一直是主麻日讲道的象征，而当代逊尼派也常把穆阿维叶本人援引为政治领袖的典范），他把讲道牢牢扣在当下的时事上。他毫不迟疑地谴责“魔鬼党”(*Hizb al-Shaytan*)，这个蔑称如今已牢牢扎根在当代逊尼派民粹的词汇里，用来贬损“真主党”。不过，正如研究者、政治学教授穆罕默德—阿里·阿德拉维所观察到的（上面的描述便出自他的详细记述，讲道时他也在场），这位谢赫保持着一种“历史的中立”，刻意避开长期分隔逊尼与什叶两个传统的那道深刻的神学裂痕。

这一幕相当传神地浓缩了叙解军当下的现实，它如今是叙利亚新政府的骨干：从大马士革出发，巩固对一片界限清楚的领土基础的支

① 倭马亚王朝（六六一—七五〇年）是以大马士革为都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疆域西抵伊比利亚、东至中亚。它在逊尼派记忆中是阿拉伯强盛的象征，在什叶派记忆中却是杀害侯赛因的篡位者——新政权重新起用倭马亚符号，这两重含义都在场。——译注

配；向逊尼派的“沉默的大多数”敞开，把历史上早已扎根的苏菲成分也纳进来；并且透过与自身对抗伊朗轴心的地缘战略主张相连的“逊尼自豪”这一棱镜，动员性地援引倭马亚遗产，同时又自觉避开公开的反什叶教派修辞。摆在亚辛·阿卢什身旁的那柄剑遥指可敬的倭马亚传统，传递出有力的讯息：逊尼派收回了权力，正在回到自己历史上执掌国家的位置。

剑不过是倭马亚遗产更广泛的再动员中的一个元素。就在亚辛谢赫讲道前几天，2月19日，支持新政府的知名记者穆萨·奥马尔在自己的X账号上贴出一段视频，画面里沙拉骑在马上，配的歌开头一句是：“倭马亚人出自黄金的血脉；他们的名字让波斯诸王胆寒；书册也颂不尽他们的功业”。¹而这一现象远不止于总统的宣传。首都各处街头小贩兜售的、印着黑色清真言^① (*shahada*，穆斯林的信仰宣示) 的白旗，以及社交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对倭马亚家族 (*Banu Umayya*) 的援引，都已随处可见。这些符号有时表达逊尼自豪，有时宣示象征性的权力，有时则是针对假想敌的恫吓工具。

12月临时政府就职仪式上出现了印着黑色清真言的白旗，社交媒体上的批评者迅即抓住这一点，把它当作大马士革新统治者仍在延续圣战的铁证。实际上，这面旗子本身的含义正在演变。这面白底黑字的旗曾为各路武装团体采纳作伊斯兰符号，用以对抗基地组织所推广的白字黑旗；它强调的是建国而非无休止的战争，尽管它同时也恰好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旗帜。在新叙利亚，这面白色的伊斯兰旗同时也是倭马亚人的旗帜，今天它投射的是一种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伊斯兰认同。它的复兴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框架正嵌入一种伊斯兰主义美学之中，为全球圣战那种激进的普世主义提供刻意为之的反符号。

284

① 清真言 (*shahada*) 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穆斯林的信仰宣示，也是入教的唯一形式要件。——译注

就内容而言,倭马亚这一参照象征性地体现了再地方化的过程,与那套最初在伊德利卜成形、如今在大马士革得到主张的政治方案的核心信条紧密契合。其次,它唤起的是一个对有经人——犹太人与基督徒——相对宽容的历史时代,象征着逊尼霸权与对少数群体有限的包容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第三,在地缘战略层面上,倭马亚这一母题与叙解军 2019 年之后的信条严丝合缝:与邻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保持零紧张,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伊朗的政治什叶主义及其地区野心。毕竟,倭马亚人在记忆中正是萨法维^①人的历史对立面(萨法维王朝是十六世纪初至十八世纪统治伊朗的波斯王朝,并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立为国教),这就使这个符号既成了向西方伸出触角的载体,也成了与阿拉伯世界重新接续的载体。

这种以倭马亚为中心的逊尼自豪超出了象征性话语与宽泛的政治宣示;它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领导层就宗教事务作出的具体政策决定之中,与此同时也在塑造着基层的认同与社群动能,而后者往往与自上而下的走向相背离,或与之处在紧张关系中。

打造逊尼自豪:热月继续,掌权一事上手法轻柔

叙解军正是在伊德利卜初次夺取权力期间完成了它的“热月转向”:离开萨拉菲式的白板(*tabula rasa*)理想——把信条与社会彻底涤净——转而开始迁就社会的惰性。该团体在战略上把重心挪向了沉默的大多数。不出所料,如今胜利已不只由领土控制来界定,而是由治理一整个国家的能力来界定,这一押在沉默的大多数身上的赌注仍在继续塑造它的政策。²

285 大马士革的宗教治理把这一路数体现得淋漓尽致。全球圣战的谢赫们对此大为失望:他们痛斥昔日的盟友没有利用这个新的掌权

① 萨法维王朝(一五〇一—一七三六年)统治伊朗,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立为国教并强力推行,是今日逊尼—什叶地缘对立格局的历史分水岭。——译注

(*tamkin*) 阶段去全面施行伊斯兰法、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叙解军却既没有启动、也没有复活萨拉菲式的白板革命理想。它反倒守住了自己热月式中间路线的方向，在倚重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战略上加倍下注。在伊德利卜，这意味着保全民间伊斯兰的现状；在大马士革，如今它体现为对这座城市由精英家族与多样伊斯兰传统所塑成的、久已确立的宗教平衡的小心尊重。

这份尊重的迹象是明摆着的。2025 年 1 月 6 日，在萨里亚·里法伊的吊唁仪式上，艾哈迈德·沙拉当众亲吻了乌萨马·里法伊的头顶；后者是大马士革一位资深谢赫，也曾直言批评叙解军。这一举动不仅表明对大马士革传统伊斯兰一位重要人物的敬重，还含着三重默认：承认大马士革的伊斯兰遗产，承认反对派的宗教学者，承认艾什尔里神学传统。两个月后，沙拉任命乌萨马·里法伊为共和国大穆夫提，把他摆在了叙解军自家宗教学者的前面。

这种在革命派、大马士革派、萨拉菲派、艾什尔里派、有时还有苏菲派精英之间刻意维持的平衡术，如今已成为首都新的宗教编舞的一部分。³⁴ 4 月 19 日，倾向艾什尔里派的传道人阿布·海尔·舒克里在沙斐仪清真寺作了主麻日讲道。礼拜之后，礼拜者们留下来聆听后起之秀、年轻诵经人穆阿台绥姆·阿斯利的苏菲赞辞。站在他身旁的是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叙解军意识形态重定位背后的首席理论家——神色沉静有度，却不为裹住某些同道信众的那股宗教热忱所动。这一刻印证了叙解军在战略上把自己锚在大马士革宗教精英身上：这是象征性兼战术性的举动，对内对外同时发出双重讯息，凸显该运动向中间的重新定向。

新的教法裁决委员会的组建，凸显出这一与教义强加的决裂，也表明有明确的意图要让国家机构向主流逊尼取向看齐，而这需要微妙的教义平衡。委员会的新构成刻意向与库夫塔罗系和里法伊系有关联的艾什尔里派学者倾斜。阿布·海尔·舒克里出任宗教事务部长（他正是与这一潮流关系密切的人物），也合乎同一套逻辑；把与宰德集团(Jama'at

Zayd) 有关联的行为者吸纳进来同样如此,那算得上在大马士革两大主导宗教学派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

新成立的教法裁决委员会取向传统,既不现代主义也不激进,由人数大致相当的艾什尔里派与萨拉菲派学者组成。就其核心而言,该委员会“意在应对一个根本的挑战:管住宗教规范的生产,防止相互竞争的法特瓦杂乱地泛滥开来”。⁴它权限的完整范围虽仍有些不清楚,其构成却传递出清楚的讯息:刻意倚重本地几大教义家族,力求在安抚与机构公信力之间取得平衡。

不过,做艾什尔里派或做萨拉菲派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上这与界定人如何理解真主的神学信条相系),如今连这层含义本身也在演变。实际上,从大马士革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的资深人物,到隶属或曾隶属伊斯兰军、叙解军等派系的知名教士,范围广阔的宗教学者都承认:部分是因为战争,萨拉菲主义在叙利亚的含义已经根本改变了。⁵受沙特影响而来的传统萨拉菲主义模式常叫作影响过许多圣战分子的纳季德宣教(Najdi da'wa),如今已大体褪色,如今只代表少数人的看法。委员会里只有一位瓦哈比萨拉菲派人物:海尔·阿拉·塔利卜,一位曾在沙特阿拉伯生活的传统纳季德萨拉菲派。相反,许多学者与信众谈论的是回归他们所说的“大叙利亚萨拉菲主义”,一个更驳杂、更扎根本地、教派色彩明显更淡的传统。大叙利亚萨拉菲主义保留了自己的萨拉菲身份,其中的一些成分却越来越向艾什尔里神学学派靠拢;另一方面,也有些苏菲谢赫公开承认自己受了萨拉菲主义的影响。

最要紧的或许不是各股潮流之间的平衡,而是这些范畴今天的流动性。正如伊斯兰军的一位苏菲谢赫所说,苏菲群体中有一部分正在经历他所谓的“萨拉菲化”过程,而许多萨拉菲派对艾什尔里派教义也越来越开放,在去激进化的背景下尤其如此。⁶归根到底,这不是界限清楚、彼此对立的各股潮流之间僵硬的共存,而毋宁说是一种流动:范畴的流动、意识形态身份的流动,以及在仍然变动、仍在建造之中的宗教场域内位置的流动。穆斯林兄弟会也是这片流动的宗教版图的一部分。

他们虽然在当前任何机构中都没有组织上的代表，却有一些成员与他们立场十分接近，尤其是在宰德集团受训的谢赫们。政府各部新任命的技术官僚中，有许多出自昔日与穆斯林兄弟会有渊源的家族的年轻一代，只是这些家族早就与该运动断了往来。

叙解军不得不在大马士革的宗教版图中周旋（这是它此前未曾涉足的领域），那里主要由围绕知名传道人组织起来的宗教学院构成。处在这场复杂的宗教—政治重组中心的是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他向我们强调了组建新委员会所依循的原则：成员的能力，以及地域与教义两方面的代表性。⁷ 委员会从叙利亚各省选人，尤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为多，包括奈伊姆·伊尔克苏西、伊斯梅尔·迈杰祖卜和阿拉丁·卡西尔，最后这位与某个苏菲传承有关联。机构上的代表性覆盖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如阿布·努尔学院、由大马士革穆夫提阿卜杜勒·法塔赫·巴扎姆代表的法塔赫学院（他在巴沙尔治下就已担任此职，如今获留任），以及宰德集团这个有苏菲根底、在大马士革颇得人心的宗教潮流。然而叙解军的介入并不只是把人纳进来。它同时也清洗了大马士革宗教场域中的一些成分。推动这番动作的与其说是神学考量，不如说是政治盘算：具体说，就是把知名学院里那些被认为与旧政权走得太近的传道人清除出去。举例来说，法塔赫学院的侯萨姆丁·法尔富尔及其同人就因与政权的牵连而遭免职。同样，阿布·努尔学院的谢里夫·萨瓦尔连同其他许多人，也因过去亲政权的活动而遭冷置。在这一背景下，艾哈迈德·沙拉与他的核心圈子精心编排了一套平衡术：把萨拉菲派与苏菲派人物平行安置，同时把更激进的成分边缘化。这套战略意在把叙解军的权威锚定在公认更加制度化、也更有广泛共识的大马士革伊斯兰之中。

这并不是说萨拉菲主义已经从叙利亚消失。在机构之内，它仍是众多行为者中的一个，不再具有霸权地位，却依然在场。在地面上，起支配作用的是本地的权力格局。今天萨拉菲主义的延续，与其说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所塑造，不如说由深深嵌入本地的种种力量所塑造。

萨拉菲主义的存在在某些地区扎得很深。在大马士革的卡达姆区，一批昔日的战斗人员依和解协议从伊德利卜返回，回来时萨拉菲色彩明显浓了许多。在杜马，萨拉菲身份仍然强劲；那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一直是萨拉菲主义的堡垒，战争期间又因伊斯兰军这类团体而得到加强。在大马士革郊区塔勒，叙利亚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关键人物、支持阵线与叙解军的前高层成员阿布·马利克·塔利的归来，触发了接管清真寺、安插亲信的种种尝试。相反，在大马士革市区，新当局选择把宗教场域留给传统主义者。在后阿萨德时代的拉塔基亚，萨拉菲派的介入方式已从公开的强制（比如武装接管清真寺）转向更为隐微的、以性别为切口的策略。国家介入遏止了直接对抗之后，萨拉菲派的女传道人（*da'iyat*）便在组织宗教学习圈（*halaqat*）上唱起了主角。这一转变把库巴伊西亚特这类竞争团体挤到了边上，办法是限制她们进入清真寺、限制她们担任公共宗教角色。这套新的、女性化的路数，配的是僵硬的教派话语，把什叶主义、苏菲主义与艾什尔里主义统统斥为不信道者。

凡萨拉菲行为者握有本地正当性的地方，新政府都容忍他们的存在，条件是他们守在清真寺里。可一旦他们试图靠武力或基层鼓动来伸张自己，宗教与政治两方面的权威往往就会合力压制。举例来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年轻的萨拉菲分子渗入各大城市的清真寺，有时靠武力夺下敏拜尔，举办冗长而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培训，并咄咄逼人地上街宣教；有时甚至采用教派修辞，或在国家机构失灵的情况下把自己摆成道德治安队，这一点我们在第十章已经讨论过。比如在拉塔基亚，一位新近从伊德利卜来、原籍周边乡村的传道人，就借清真寺讲道鼓吹肉刑、鼓吹妇女穿全身罩袍，还鼓吹掳掠女俘（*jawari*）的正当性。²⁸⁹在大马士革，2025年5月也发生了几起针对夜总会的暴力突袭。

面对这样的现实，宗教事务部有时在政治事务部门的本地代表与本地宗教学者的支持下，不得不出手干预，目标只有一个：维持公共秩序。而且和在伊德利卜一样，制度化成了规束这一波扰乱性宣教的关

键：一切活动都必须申报、受监管、经许可。事情并不总是照这个路子走，但政治上的指南针如今已经定了方向。

总而言之，对宗教场域的管控，首要目的并不是强加单一而统一的宗教愿景。毋宁说，它在战略上意在化解紧张、缓和教义冲突，并防止那些可能动摇政治格局的挑衅举动。这套小心的平衡术凸显出当前政权更大的倾向：行使宗教权威不是为了强制推行教义，而是作为巩固自身控制、周旋于叙利亚复杂教派动能之间的手段。

在大马士革新统治者的头脑里，又一次是政治考量占了上风。叙解军对宗教领域的管理背后并没有连贯或集中的逻辑。该团体虽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竞争，一旦这种竞争外溢到公共领域，尤其是当宣教行动主义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时，它就会出手。缺少统一的宗教权威，结果就产生了本地临机应变、见招拆招的治理形态。叙解军押在“温和的多数”身上的赌注，与其说化作了意识形态上的温和，不如说化作了由本地条件所塑造的、不断流动的力量平衡。

这种中间路线的务实主义，还进一步体现在宗教事务部的重组上，如今那里通行的是温和而务实的路数。新的领导班子体现出有为之的平衡：萨米尔·比拉克塔尔，一位萨拉菲派、反对派联盟的前朝协调人，获派到大马士革任职，与他并肩的是传统艾什尔里派人物阿布·海尔·舒克里。这种共处标志着在逊尼派意识形态版图之内广纳的政策：所有伊斯兰思想学派，萨拉菲主义、马图里迪主义、苏菲主义、艾什尔里主义，都得到容忍，只要它们避开制造分裂的修辞。

290

主麻日讲道大体上不受规管，只偶尔有些指令，比如鼓励在12月8日胜利之后传递庆祝的讯息。有争议的神学文本，包括伊本·泰米叶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著作，一般都避开不用。同样，公开的哈德拉（*hadra*，狂喜状态下的集体诵唱与律动）这类外露的苏菲仪式也不受鼓励，宁可代之以更为低调的记主集会（*majalis al-dhikr*）。据几位教士的粗略估算，约有10%的主麻日传道人遭撤换，主要是那些与

前宗教基金部长或阿萨德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人。排除的唯一标准是政治上与旧政权的一致，而不是神学或意识形态取向。

叙解军已经被它所治理的这个社会重新塑造了。它的去激进化体现的是萨拉菲路数与核心信条的一次倒转：它吸纳进来的规范、价值与宗教人员，多于它强加出去的，同时又刻意抗拒连贯的意识形态路线。在伊德利卜，叙解军办事是交易式的，连宗教事务上也是如此，避开明确的意识形态承担，转而偏好艾哈迈德·沙拉的一位顾问所说的“建设性的含混”。从这个角度看，叙解军这套含混的路数里无疑有一层战略性的隐藏，用带东方学倾向的批评者的话说，就是塔基亚(*taqiyya*)。可究竟隐藏的是什么呢？是一股仍在闷烧、只待权力完全巩固之时便要发作的激进主义？还是一次意识形态转轴，转向一套革命、逊尼而保守的方案，这套方案虽已去激进化，却宁可不给自己命名？一套精心设计出来、好让脆弱的政治模式更容易嵌入一块仍以疑虑眼光打量它的保守社会肌理的方案？这套方案眼下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其说在于该运动的奠基原则，不如说在于它自身社会基础内部不断演变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潮流。

在穆阿维叶之剑的阴影下：激进主义的教派化重铸

291 激进主义依然存在，只是形态变了。它如今不大从执政派系内部生出，更多是作为一股来自它们外部的民粹潜流涌起。叙利亚革命的头几年，激进主义大体上就等同于圣战主义，等同于那些公开拥抱圣战主义的组织，比如基地组织（以及后来的宗教卫士组织）、伊斯兰国的外籍战斗人员，以及程度稍轻的、有圣战倾向的派系如大叙利亚自由军。那时的威胁可以辨识，意识形态上自洽，组织上有结构。然而今天，叙解军的轨迹显示出一场双重转变。一方面，沙拉与他核心圈子领导的这个团体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重定位，把自己挪到更靠近中间的位置，融入了主流。另一方面，一股民粹潮流从更广泛的逊尼派主流内部涌现出来，

要求在基层把伊斯兰表达得更强硬。这场运动大体上不受叙解军控制，尽管它偶尔能在该团体较为强硬的成分中找到支持。

这一动能在推动设立道德警察一事上表现得很明显，第十章已有探讨。到那时，激进主义已经开始脱离它原初的圣战框架，越来越多地由更难辨识的行为者散播开去：虔诚的外省有产者、独立传道人、社交媒体网红。这一转变反映的是民粹动能，由基层伊斯兰热忱的加剧所推动，结构比此前几波武装行动主义松散，却比它们更深地嵌在社会里。

攻取大马士革之后，激进主义的版图循着同一模式又变了。一种新的、弥散的激进主义出现了，它没有清楚的意识形态或组织边界，却围绕一种被激进化了的逊尼自豪感在动员。与伊德利卜的民粹激进化相似，这场运动源自社会，而不是源自权力中心。它汲取的是针对旧政权支持基础——尤其是阿拉维社群——的复仇情绪，同时动员认同政治去挑战那些处在新政权核心社会基础之外的群体；而这个核心基础主要由外省的逊尼派中下阶层选民构成。

这新一波激进主义的燃料，来自新当局支持基础中意识形态驱动较弱的那些部分。其中包括被复仇激情与认同主义吞噬的一部分叙利亚国民军。它涵盖了来自北方的武装派系（往往是昔日的自由叙利亚军部队，如今已并入叙利亚国民军），涵盖了与邻近阿拉维派人口有长期战时积怨的乡村社群或对立街区，涵盖了各地的贝都因部落，也涵盖了想为家人之死讨回公道的逊尼派反对派青年。这些群体动员时常常动用与圣战文化相关的符号，比如基地组织的旗帜或倭马亚旗帜、战歌、宗教头带；这并非出自意识形态承担，而是认同与复仇的表达。²⁹²

萨拉菲圣战的文化符号经历了一场可观的转变，与其原初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母体越来越脱钩。这些符号不再只在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这类圣战团体的教义边界内运作，而是让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场域重新征用、商品化了。它们如今充当的，是新近变得强硬的逊尼身份的展演式表达，而这种表达常常呈现为排他的、有时甚至是至上主义的样态。

这一符号学上的转移，在被动员起来的公众所拥抱的图像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举例来说，在公开示威中，所谓的“圣战旗”压过了传统的革命旗帜，这就对政治想象的演变提出了要紧的问题。革命旗帜曾是包容性抵抗与民族团结的象征，如今却越来越让一部分人看作妥协与政治温和的标志。相反，通常与萨拉菲圣战运动相关联的黑白旗帜，如今成了决裂、抗拒与教派立场的有力图标；而在这样一个处境里，受推崇的恰恰是这些品质：排斥与对抗的象征姿态，被认为比和解的姿态更有政治回响。2025年3月6日与7日的反阿拉维动员就说明了这一点，点燃那场动员的，是批评者指当局的政策有意保护阿拉维派。政府的安全部队让这些事件压垮了，其中一些成员参与了暴行，另一些则纯粹是寡不敌众。

293 意识形态转向、民粹压力与激进符号的商品化，三者之间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凸显出当下激进主义正从圣战主义演变为逊尼至上主义。它也凸显出新当局所面临的挑战：在这样一片版图上周旋：昔日那个激进主义的母体已被更弥散、更教派化、更深植于社会的象征暴力与肉体暴力所取代。

激进问题的倒转：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精神的危险

叙利亚当前这波激进主义特别违反直觉的地方在于，领头的不是叙解军——那些昔日的圣战派——而是一个围绕认同类积怨与讨还公道的诉求进行动员的新革命主流。这种角色的倒转并非没有先例；它呼应的是当初在伊德利卜围绕道德警察一类议题、随逊尼民粹兴起而首次出现的动能。那时与现在一样，叙解军的领导层已经改了方向；他们从2012到2017年，从支持阵线的早年一直到救国政府成立，都曾领着激进议程走。自2024年12月掌权以来，新的统治者继续推进意识形态重定位，如今又因国家治理的种种要求而得到加强，把自己重塑为降级的推手。相反，革命主流的一部分却成了动荡的主要引擎，把民众的不满导入认同政治与对报复性正义的渴求之中。

这一倒转在多条战线上上演。面对该运动社会基础中边缘成分所犯下的暴力，新权力结构的核心反倒推动自我克制。2025年3月在沿海地区，总安全机构的部队虽不能说没有暴行，却在恢复秩序上起了作用。大马士革的领导层承诺调查并惩处作恶者，同时与宗教领袖接触以推动温和。在阿拉维山区，总安全机构部队的在场如今普遍视为对付那些更无纪律、更暴力的派系的一重保障，尽管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界线常常仍旧模糊。⁸

一个月后，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当地民众面对以色列部队日益咄咄逼人的入侵，本地话语对以色列充满斗志，要求“民众抵抗”的呼声不断上升。有人拿起了武器，有时也丢了性命。在与以色列军队冲突中丧生的年轻人的葬礼上，传道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道。⁹然而，面对这种基层的激进化，深知贸然升级之风险的国家代表们却呼吁冷静，敦促“战略耐心”、“自我克制”，敦促倚重大马士革及其新伙伴所主导的外交努力。

逊尼至上主义的驱动力，已不再只是针对历史上与阿萨德政权相关联的社群——首先是阿拉维派人口的一部分——的复仇积怨。毋宁说，暴力的认同政治越来越多地瞄准了别的少数群体，比如德鲁兹人；到4月末5月初，他们自己也成了这股不断扩散的仇恨浪潮的目标。

这一转变的直接触媒，似乎是社交媒体上一段广泛流传的音频，有人将该音频归到一位德鲁兹长老名下，此说有争议，据称含有亵渎内容。紧接着，紧张迅速升级。2025年4月28日，霍姆斯与大马士革的校园成了第一处动员现场，德鲁兹学生在那里遭到人身攻击、被迫逃离。4月29日夜间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派系对贾拉马纳发动攻击，那是大马士革东南一个与德鲁兹社群密切相连的街区。这些冲突造成至少三十名战斗人员死亡。

总安全机构的部队最终虽有介入，反应却慢了，也没能阻止暴力：暴力持续了好几天，最终夺去100多人的性命。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不作为使德鲁兹社群中普遍形成一种看法：这些事件是一次精心算计的

挑衅的一部分，是一出“红脸白脸”的戏，总安全机构扮演和事佬，好战的逊尼派系动手行凶；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逊尼派社交媒体平台上教派话语的迅速升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解读，其烈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恶毒的修辞助长了更广泛的两极化气氛，并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总安全机构的基层人员，而其领导层
295 在日益高涨的教派狂热之中似乎难以维持凝聚与控制。

最终达成的一项协议，印证了我们此前所描述的情形。正在成形的，是一种新激进主义，在政权不断演变的社会基础外围溃烂开来，而节制却在中心处结构性地扎下根来。无论是面对阿拉维复仇主义、回应以色列在南部的军事入侵，还是周旋于与德鲁兹人之间不断上升的教派紧张，模式都是一致的：自上而下去激进化，自下而上再激进化。

如今引导这个国家新领导层的意识形态，无疑比 2011 至 2012 年的革命精神更保守、更伊斯兰。伊斯兰主义民粹由早期激进主义的遗产与保守派游说的压力所塑造，正对该运动的中层干部与基层基础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有时迫使叙解军领导层重新校准、抑制保守冲动，无论是在 12 月底政治领导层的一道指令之后搁置大马士革学校课程伊斯兰化的计划，还是在伊德利卜收回推行道德纠察的努力，抑或是勒住那些同时针对阿拉维派与德鲁兹人的、由认同驱动的暴民。

其结果是一个经历了自上而下去激进化的运动，而这引发了领导层与自身社会基础一部分之间挥之不去的紧张。叙解军长期奉行的热月战略（通过机构巩固与倚重沉默的大多数来实现温和，同时在宗教领域接受社会惰性）在伊德利卜是成功的，把激进的边缘行为者挤到了一旁。可攻取大马士革却把这一动能倒了过来。它固然使该运动接触到新的行为者与世界观，却也催化出一种局部激进化的**逊尼自豪**，从而印证了一重更深的倒转：昔日的激进派成了降级的鼓吹者，而革命主流的一部分却漂向认同政治、复仇热忱与教派至上主义日渐喧嚣的叫嚷所构成的一剂不稳混合物。

到头来,静默革命的航向开始偏离轨道,被它自身矛盾的引力拽着走。面对一种不断膨胀且不稳定的逊尼自豪,又面对伊斯兰国可能重新崛起、成为唯一有能力驾驭这股社会认同浪潮的有组织力量这一令人不安的前景,这场如今已经掌权的革命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为稳定的航线定向,因为它至今仍缺一枚清晰的意识形态罗盘。在伊德利卜,当目标是拿温和的多数去平衡强硬派时,建设性的含混曾证明是一项战略资产。今天,在治国的种种约束之下,同样的含混已不再是审慎的工具,而成了对连贯性与权威的威胁。²⁹⁶

在一个以民粹的反复无常与逊尼至上主义的兴起为标记的时代,“被人民改造”、倚重沉默的多数这一姿态,已经成了一项负债,不只对领导层如此,对更广大的民众也是如此。如今掌控着大马士革的静默革命,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正待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之锚定牢。

政府已经开始作出回应。它的宗教学者,无论是此前在伊德利卜领导叙解军去激进化努力的那些人,还是身在大马士革的较新的盟友,都力图打造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宗教话语。这套正在成形的话语承认伊斯兰教法学与宗教信条内部的多元,并意在把自己摆在伊斯兰的主流之内,以对抗排他性的激进主义。规束宣教的努力也在推进,尤其是在较不保守的地区以及有宗教少数群体的地区,同时还要对抗仇恨言论。这些努力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一套真正具有包容性、能够在更广大的受众中激起共鸣、能够塑造大众吸引力、能够在神学细节的樊篱之外培育出一种共享宗教认同的宗教叙事,眼下仍不清楚。

注释

导言

1. Drevon, J. (2022). *Institutionalizing violence: Strategies of jihad in Egyp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Jean-Francois Bayart, “Le concept de situation thermidorienne: régimes néo-révolutionnaires et libéralisation économiqu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Questions de recherche*, no 24, March 2008.

第一章 奠基母体

1. See for instance: Charles R. Lister. *The Syrian Jihad: Al-Qaeda,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Insurgency*. London: Hurst, 2016. Hamming, T., *Jihadi Politics: The global jihadi civil war, 2014–2019*, Hurst, 2022.
2. 该组织的全名为 Jabhat al-Nusra li ahl al-Sham min mujahidin al-Sham fi sahat al-jihad, 即“黎凡特圣战者在圣战战场上支援黎凡特人民的阵线”。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w3g9vMMLw>
4.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5. 这些信件经 Telegram 外泄。
6. <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5/03/05/the-great-pretender-how-ahmed-al-sharaa-won-syria>
7. 访谈, 安塔基亚, 2022 年。
8. 访谈: 艾哈迈德·沙拉, 伊德利卜, 2020 年。
9.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10. 这些信件经 Telegram 外泄。
11. 访谈: 艾哈迈德·沙拉, 伊德利卜, 2020 年。
12. 访谈, 安塔基亚, 2022 年。
13. 访谈: 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多个武装团体头目, 2017 年至 2022 年。

14. 访谈：被关押于塞德纳亚监狱的狱中头目，2018 年。
15. 访谈，土耳其，2022 年。
16. 访谈：2012 年至 2015 年间的众多平民。
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3QCWTPz_4
18. 访谈，伊德利卜，2019 年。
19. 访谈：欧洲与埃及的欧洲籍和埃及籍外国武装人员，2012 年至 2016 年。
20. 访谈：欧洲籍战斗人员，2018 年。
21. Theo Padnos. *Blindfold: A memoir of capture, torture, and enlightenment*,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2021.
22. 访谈，安塔基亚，2022 年。
23. 该信当时在网上公开发表。
24. Al-'Uraydi, 'Aqidatna' .
25. 访谈，安塔基亚，2022 年。
26. 访谈，伊德利卜，2021 年。
27. 艾曼·扎瓦希里公报，2013 年。
28.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29. 访谈：大叙利亚自由军头目，土耳其，2017 年。
30. 访谈，安曼，2022 年。
31.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32. 访谈，2023 年。
33. 访谈：多名记者与分析人士，土耳其，2015 年。
34. 访谈：多个武装团体头目，2018 年。
35. 访谈，伊德利卜，2019 年。
36. 访谈，土耳其，2018 年。
37. <https://www.aljazeera.net/opinions/2014/5/31/%D9%85%D9%8A%D8%AB%D8%A7%D9%82-%D8%A7%D9%84%D8%B4%D8%B1%D9%81-%D9%86%D9%82%D9%84%D8%A9-%D9%86%D9%88%D8%B9%D9%8A%D8%A9-%D9%81%D9%8A-%D9%85%D8%B3%D9%8A%D8%B1%D8%A9-%D8%A7%D9%84%D8%AA%D9%8A%D8%A7%D8%B1>
38. 支持阵线公报。
39. 访谈：卡赫塔尼，2024 年。

40. Rhodes, B. *The World As It Is: A Memoir of the Obama White House*.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9.
41. 访谈, 土耳其, 2020 年。
42.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43. 访谈, 安塔基亚, 2022 年。
44. <https://www.aymennjawad.org/2015/08/archive-of-jabhat-al-nusra-service-documents>
45. 访谈, 土耳其, 2022 年。
46. <https://www.aymennjawad.org/2015/03/archive-of-jabhat-al-nusra-dar-al-qaa-documents>
47. For more details, see Svensson, Isak, Daniel Finnbogason, Dino Krause, Luís Martínez Lorenzo, and Nanar Hawach. *Confronting the Caliphate: Civil Resistance in Jihadist Proto-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48. 访谈, 土耳其, 2018 年。
49. 访谈, 伊德利卜, 2019 年。
50. 访谈, 安曼, 2022 年。
51. <https://www.aymennjawad.org/2017/12/the-hayat-tahrir-al-sham-al-qaeda-dispute-primary>

第二章 争夺主导权

1. Drevon, J. *From Jihad to Politics: How Syrian Jihadis embrace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2. 阿布·法特赫·法尔加利的 Telegram 频道。
3. 访谈, 土耳其, 2017 年。
4. Ahmad Abazeid, “How did the Ahrar al-Sham Movement Collapse?” (in Arabic), *Syrianoor*, 9 August 2017.
5. 访谈: 大叙利亚自由军领导人, 2019 年。
6.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访谈: 叙解军与大叙利亚军团的军事领导人, 2020 年。
8.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9. 访谈: 叙解军军事与政治领导人、大叙利亚自由军领导人、大叙利亚军团领导人, 伊德利卜与伊斯坦布尔, 2020 年。

10. 访谈，安卡拉，2020 年。
11. 同上。
12. 访谈：叙解军军事指挥官，2020 年。
13. 访谈：多位大叙利亚自由军领导人，伊斯坦布尔，2020 年至 2022 年。
14. 访谈：宗教卫士组织指挥官，2018 年。
15. 访谈：多位叙解军官员与安全分析人士，2019 年至 2020 年。
16. 叙解军只给宗教卫士组织在前线留下了不超过七个阵地。除了在前线的存在之外，宗教卫士组织在 2020 年夏局势升级前不久，还在吉斯尔舒古尔镇保有 16 个军事阵地。
17.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18. 《叙解军领导层总声明》（阿拉伯语），2017 年，取自 Telegram 频道。
19. 访谈：艾哈迈德·沙拉，2020 年。
20. 访谈：叙解军高级领导人，2020 年。
21. 访谈：多位叙解军领导人，伊德利卜，2019 年。
22. 访谈：接近叙解军的分析人士，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See also Aymeen Jawad Al-Tamimi, “Why Ansar al-Tawheed Ended its Alliance with Hurras al-Din,” *Pundicity*, 10 June 2020, <https://bit.ly/33Sikmr>
23.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同上。
27. 访谈：艾哈迈德·沙拉，2022 年 2 月。
28. 据我们对叙解军领导人的访谈，阿布·马利克·塔拉伊与叙解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源于地缘战略考量（他拒绝向土耳其靠拢），也同样源于该组织内部的权力博弈。
29. 他们随后在 2020 年 6 月上半月被捕，罪名是参与组建“坚持住”行动室；就阿布·萨拉赫·乌兹别基而言，则是加入了该行动室中的某个团体。
30.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31. 与一位接近叙解军的分析人士的 WhatsApp 通话，2020 年。
32.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33. 叙解军《通告》(Ta'mim), 2020 年, 取自叙解军的 Telegram 频道。6 月 18 日, 多个圣战派系在一份声明中重申支持叙解军。最引人注目的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其他小团体则包括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阿尔巴尼亚、伊朗、塔吉克斯坦、阿拉伯半岛与高加索的个人。
34.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35. 同上。
36. 这并不意味着叙解军在 2020 年实现了完全的领土控制。正如一位土耳其研究者兼学者所解释的: “叙解军的巡逻队穿过吉斯尔舒古尔时提心吊胆。这座城市仍然到处是外国圣战分子。叙解军并没有在那里与宗教卫士组织作战。旗帜和指挥部都没有了, 但宗教卫士组织仍在那里, 也没有人去追捕他们。”(访谈, 安卡拉, 2020 年 11 月。)
37.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38. Adnan Ahmad, “Attack Against a Russian Base in Eastern Syria: Hurras al-Din Returns to the Confrontation” (in Arabic), Al-Arabi al-Jadid, 2 January 2021, <https://bit.ly/2KVguek>
39. 访谈, 伊德利卜, 2021 年。
40. 访谈: 叙解军安全官员, 2021 年至 2024 年。
41. 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42. 访谈: 接近救国政府的研究者, 伊德利卜, 2022 年 10 月。
43. 访谈: 接近叙解军的研究者, 2022 年 2 月。
44. 据卡尔达什助手的女儿说, 伊斯兰国的头目们频繁转移住所。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2 月。此外, “穆里菲克”(murafiq, 随从) 是同情者而非伊斯兰国成员。头目们藏身于没有组织关联的商人背后。依靠非本地商人, 恰恰也是巴格达迪当年的做法。访谈: 卡尔达什藏身处住所的邻居, 2022 年 2 月。
45. 访谈: 卡尔达什的邻居, 2022 年 2 月。
46. 卡尔达什警卫家人的证词, 2022 年 2 月。
47. 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2 月。
48. 访谈: 阿卜杜·拉希姆·阿顿, 2022 年 2 月。
49. 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2 月。
50. 同上。

51. 访谈：多位叙解军领导人，伊德利卜，2020 年至 2024 年。
52. 访谈：叙解军安全官员，2022 年。
53. 访谈：叙解军安全官员，伊德利卜，2021 年至 2023 年。
54. 访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指挥官，土耳其，2022 年至 2024 年。
55.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与安全官员，伊德利卜，2021 年。
56.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57.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与安全官员，伊德利卜，2021 年。
58.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59. 访谈，大马士革，2025 年。

第三章 拆解激进的未来

1. 访谈：参与这些谈判的多方人士，土耳其，2020 年。
2. 访谈：部落领袖、本地商人与学者倡议成员，伊德利卜，2019 年 7 月与 2020 年 7 月。
3. 访谈：其中一人，伊德利卜，2020 年。
4. 访谈：伊德利卜商会代表团，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5. 每当一个法庭恢复运作，被羁押者家属若不接受前任法官的判决，有一个月时间复核案件。访谈，达纳法庭，伊德利卜，2019 年 7 月。
6. 与萨拉基卜居民的交谈，2019 年 7 月。
7. WhatsApp 访谈：迈阿赖特努阿曼的两名本地活动人士，2020 年 5 月。
8. 访谈：达纳与萨拉基卜的本地名流，2019 年 9 月与 2020 年 3 月。关于叙解军与伊德利卜地方委员会关系的初步类型学，见 Ayman Aldassouky, “The Role of Jihadi Movements in Syrian Local Governance,” *Omran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4 July 2017, <https://bit.ly/3n4JXk>
9. 在走访上述各部委与社会群体期间收集的信息，伊德利卜，2019 年 6 月与 2020 年 7 月。
10. 访谈：其中数人，伊德利卜，2020 年。
11. 访谈：若干此类群体的代表，伊德利卜，2020—2022 年。
12. 关于库尔德运动，见 Patrick Haenni and Arthur Quesnay, “Surviving the Aftermath of Islamic State: the Syrian Kurdish Movement’s Resilienc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 Middle East Directions, Wartime and Post-Conflict in Syria, 2020), <https://bit.ly/3mTSZQx>
13. 据联合国估计。访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雇员，2020 年 3 月。
 14. 访谈：救国政府前总理，伊德利卜，2021 年。
 15. 尽管利用部落执行法律并非新事（叙利亚政权自身也曾广泛实行），但这一趋势反映了伊德利卜的一次真实转折，因为此前各派系直接执法，部落被边缘化。访谈：法官与律师，达纳法庭，伊德利卜，2019 年 7 月。
 16. 访谈，柏林，2020 年。
 17. 尽管实地存在众多运营方，伊德利卜的教育水平仍在显著下滑。受难民营教育部长委托、由十一名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 2020 年底，难民营人口中的文盲率高达 40%。访谈：救国政府官员与非政府组织运营方，伊德利卜，2020 年 12 月。
 18. Syria Relief. “Syria Relief Announces 107 New Schools through Partnership with Chemonics” *Reliefweb*, 15 November 2019, <https://bit.ly/2VMQTGF>
 19.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20. 叙解军曾两度试图借开放口岸恢复贸易，分别于 2020 年 4 月在迈阿赖特哈塔特（Maarat Hattat）、2020 年 5 月在萨拉基卜。民众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一决定将意味着默认失去萨拉基卜与迈阿赖特努阿曼，并将抬高伊德利卜的生活成本。
 21. 访谈，西方各国首都，2020 年。
 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kish_military_operation_in_Idlib_Governorate#/media/File:Syria_Idlib_November_2020.svg
 23. 法尔加利的 Telegram 频道。
 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yrian_civil_war#/media/File:Syrian_Civil_War_map_\(November_24,_2023\).svg](https://en.wikipedia.org/wiki/Syrian_civil_war#/media/File:Syrian_Civil_War_map_(November_24,_2023).svg)
 25. 访谈，安卡拉，2020 年 4 月。
 26. 访谈：俄罗斯与土耳其外交官，安卡拉，2020 年 12 月。据叙解军的军事总指挥称，南部安全缺口在 2020 年已得到填补，因为土耳其如今已在伊德利卜南部三角地带的卡夫尔阿维德（Kafr Awid）、代尔辛贝尔（Deir Simbel）、

- 加利云 (Ghalioun) 与瓦格芬 (Waqfin) 等地设立了七个新阵地。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12 月。
27. 访谈: 一位土耳其官员, 安卡拉, 2020 年。
28. WhatsApp 访谈, 2020 年 4 月。
29. 访谈: 本地分析人士与记者, 伊德利卜。
30. 访谈, 安卡拉, 2020 年。
31. 访谈: 叙解军军事部门负责人,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月。
32. 访谈, 哈塔伊, 2020 年 3 月。
33. 访谈, 2023 年。
34. 访谈: 参与伊德利卜事务的国际对话方, 2020 年。
35.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36. 访谈: 一位土耳其官员, 2020 年 12 月。
37. 访谈: 阿纳斯·艾鲁特 (Anas Ayrout), 伊德利卜, 2022 年 4 月。
38. 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4 月。
39. 访谈: 亲叙解军的教士, 2022 年 4 月。值得注意的是, 宽容的幅度是相对于激进化风险来界定的。官方对沙斐仪学派的认可提供了非激进化的保证, 使各学院得以规避救国政府与叙解军的潜在制裁。就此而言, 占上风的确是安全考量, 即去激进化及其所带来的控制。
40. 与伊德利卜一位法官的 WhatsApp 交流, 2020 年 5 月。
41. 访谈, 伊德利卜, 2021 年。
42.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月。
43. 访谈: 本地教士,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月。
44. 访谈: 法特瓦最高委员会与宗教事务部的官员,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月。伊玛目脑威学院创建于 1962 年。该学院属苏菲—艾什尔里派传承, 2011 年追随了革命运动。与学院教授及苏菲谢赫的 WhatsApp 通话, 2020 年 5 月至 6 月。
45. WhatsApp 访谈, 2020 年 5 月。
46. 书面交流, 2020 年 11 月。
47. WhatsApp 访谈, 2020 年 5 月。
48. 接受采访的校长与教师中, 无人抱怨督导过度干预。WhatsApp 访谈, 2020 年 5 月与 6 月。

49.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间与教育部教授、主管及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的交谈。
50. 访谈，伊德利卜，2019 年 6 月。
51. 与四名学校教师的 WhatsApp 通话，2020 年 4 月。
52. 据一位如今持批评立场的救国政府前官员称，救国政府运作的第一年里约有二十名谢赫被免职。四名亲近叙解军的布道者因反对土耳其政策被遣回哈雷姆。数位反对叙解军的消息人士称，无人因宗教原因被解职，只有政治原因。WhatsApp 通话，2020 年 5 月至 6 月。
53. 访谈，伊斯坦布尔，2022 年 8 月。
54. 访谈：一位叙解军领导人，伊德利卜，2021 年 10 月。
55.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9 月。
56. 访谈，伊斯坦布尔，2022 年 9 月。
57. 访谈：一位叙解军指挥官，伊德利卜，2023 年 6 月。
58. 访谈：一个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的领导人，伊斯坦布尔，2022 年 9 月。
59. 同上。
60. 同上。
61. 访谈：一个与叙解军结盟的派系的领导人，伊斯坦布尔，2023 年。
62.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2021 年 2 月。
63. 同上。
64. Binder, Leonard, *In a Moment of Enthusiasm: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second stratum in Egy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65.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2021 年 2 月。
66. 伊德利卜市分部负责人来自卡米什利，吉斯尔舒古尔分部负责人来自德拉；哈雷姆的负责人来自代尔祖尔。
67. 例如，围绕土耳其在萨尔马达的阵地出现了紧张关系，土耳其部队在那里强占民房。作为回应，解放区行政机构介入充当调解人。访谈：行政机构一名成员，伊德利卜，2021 年 2 月。
68. 在伊德利卜，关键问题之一是阻塞主要广场交通的街头摊贩。这一现象源于贫困加剧与人口的大规模涌入（伊德利卜人口估计已升至 60 万，而 2011 年前仅为 16.5 万）。地方委员会受到激励去建立一个替代市场，该市场成功落地，使 430 名街头摊贩得以搬迁。联络办公室说服摊贩们迁往新址。

第四章 退出圣战主义

1. 访谈，安曼，2022 年。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同上。
8.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9. 访谈：教法最高委员会成员，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10.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3 月。
11. 访谈，2019 年。
12.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9 月。
13. 访谈，2022 年 8 月。
14. 同上。
15. 访谈：与叙解军结盟的一个派系的领导人，2022 年 8 月。
16. 同上。
17. 叙解军公报。
18.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伊德利卜，2020 年。
19. 同上。
20. 访谈，2023 年。
21. 与支持阵线前指挥官及叙解军现任领导人的讨论，土耳其，2022 年 8 月。
22. 访谈：支持阵线前指挥官，土耳其，2022 年 8 月。
23. 访谈。
24. 访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伊德利卜，2022 年 4 月。
25. 访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伊德利卜，2023 年 6 月。
26. 同上。
27.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9 月。
28. WhatsApp 通话，2020 年 5 月。

29. WhatsApp 通话, 2020 年 5 月。 *Fiqh al-Nawazil wa al-Azamat* (危机与灾难教法学) 侧重让伊斯兰教法裁决适应当代紧急事态、政治动荡与社会挑战, 强调务实与灵活。相比之下, *Fiqh al-Jihad* (圣战教法学) 是伊斯兰教法学中专门处理武装斗争的规则、伦理与条件的分支。 *Fiqh al-Jihad* 为战争提供刚性的教义准则, *Fiqh al-Nawazil wa al-Azamat* 则允许在危机时期作出更具情境性与战略性的决策。
30.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12 月。
31. WhatsApp 访谈, 2020 年 5 月。
32. 同上。
33.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34. 访谈: 叙解军领导人, 2021 年 2 月。
35. 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第五章 掏空萨拉菲主义

1. 访谈: 一名前学生, 伊德利卜, 2019 年。
2. 访谈: 伊德利卜大学教法学院副院长, 伊德利卜, 2020 年 12 月。
3.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4. 同上。
5. 同上。
6. 叙解军公报。
7. 同上。
8. 同上。
9. 这类布道的例子见 <https://bit.ly/3pMtIsz>。另见马兹哈尔·韦斯在“向人求诚”节目中就伊斯兰中的勇气所作的讲演, 其中把圣战举为《古兰经》所言勇气的一例, 未展开细节。 <https://bit.ly/2MoyMF4>
10. 叙解军宣传视频, 2019 年。
11. 受过这一训练者的现身说法, WhatsApp 通话, 2020 年 5 月。
12. 访谈: 教法最高委员会成员,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月。
13.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3 月。
14. 宗教事务部前谢赫, WhatsApp 访谈, 2020 年 5 月。
15. 访谈, 伊德利卜, 2020 年 7 月。

16. 访谈，伊德利卜，2021 年。
17. 同上。
18.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19.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伊德利卜，2022 年。
20. 访谈，2022 年。
21. <https://www.syria.tv/>
① مؤتمّر-تقنين-الشرعية-بإدلب-يُغضب-السلفيين-المناهضين-لتحرير-الشام؟
22.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4 月。
23. 访谈，伊德利卜。
24. 法特瓦委员会两名成员之间的讨论，2021 年 10 月。
25. 访谈：救国政府宗教基金部部长。
26.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27. 同上。
28.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29. 与一名亲近叙解军的教士的书面往来，2020 年 5 月。
30. 公开发言不多，并不意味着法特瓦最高委员会无所作为。事实上，它的大量工作是对个人的直接指导，更重要的则是与救国政府各部之间的往来。救国政府颁行的全部法律也都经法特瓦最高委员会复核。访谈：最高委员会三名成员，宗教事务部部长在场，2020 年 7 月。
31. 法特瓦最高委员会：〈论一再散布诋毁先知穆罕默德的图画〉，2020 年，取自该委员会的 Telegram 频道。
32. 访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伊德利卜，2022 年 4 月。
33. البيعان بالخيار ما لم يتفرقا، فإن صدقا وبينا بورك لهما في بيعهما. وإن كنما وكذبا محقت بركة بيعهما
34. 协商委员会的法律产出相对不多，而且并非全部都得到过法特瓦委员会的建议。截至 2022 年 10 月颁行的 50 部法律中，有 27 部收到了法特瓦委员会的建议。以下分析所依据的，是 2022 年 4 月对法特瓦委员会所提交书面建议的一次梳理，该委员会逐一评议了协商委员会颁行的各部法律。

① 原书尾注中的若干阿拉伯语网址，在底本里是以图片形式嵌在链接文字中间的（共十三处），无可转写的文本层。译本照原书形制保留影印件，不代为转写，以免误植网址。——编注

35. 访谈：法特瓦委员会成员，2021 年 4 月。
36. 访谈：叙解军领导人，2023 年。
37. 访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伊德利卜，2022 年 2 月。

第六章 面向苏菲主义的热月开放

1. 访谈，2024 年。
2. 与托马斯·皮埃雷的 WhatsApp 通话，2024 年 11 月。
3.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9 月至 11 月。
4.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1 月。
5.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0 月。
6.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1 月。
7.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0 月。
8.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1 月。
9. 同上。
10. 同上。
11. 访谈，大马士革，2025 年 2 月。
12.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0 月。
13. 同上。
14.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1 月。
15. 访谈，大马士革，2025 年 1 月。
16.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
17. 据两位知名苏菲派教士，WhatsApp 通话，2024 年 10 月。
18. 访谈，2024 年 11 月。
19. 在某些街区，它们回来得可能还要早些，与 2017 年救国政府的建立同时。
访谈：伊德利卜的叙利亚青年，伊德利卜，2023 年 6 月。
20. 访谈：伊德利卜老城区的一名斋月报晓人，WhatsApp，2023 年 5 月。
21. 访谈：一名宗教歌手，伊德利卜，WhatsApp，2023 年 5 月。
22. 访谈：两名户主，WhatsApp，2023 年 5 月。
23. 访谈：一名录音棚老板，伊德利卜，WhatsApp，2023 年 5 月。
24. WhatsApp 访谈，2023 年 5 月。
25. 访谈，大马士革，2025 年 2 月。

26.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1 月。
27.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0 月。
28.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11 月。
29. 同上。
30. 同上。

第七章 不再是齐米，尚未成公民

1. 2023 年的一次访谈中，库奈耶村的一位基督徒名流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他对伊斯兰国的观感相对不那么负面——他形容伊斯兰国暴力却有纪律，约定通常都算数——而对自由叙利亚军各派系的观感更差：这些派系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没那么僵硬，却往往公然带有教派色彩，行事也无章法。
2. 访谈，2022 年 10 月。
3. 访谈，2023 年 6 月。
4. 同上。
5. 访谈：当地居民，盖勒卜卢泽，2020 年。
6.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访谈，2023 年 6 月。
8. 与一位德鲁兹教授的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6 月；另见：<https://syriansg.org/18073/>
9. 与萨马克山一位德鲁兹教授的书面通信，2022 年 6 月。
10. 2023 年 6 月访谈中由仅存的教士权威提供的估计数。
11. 访谈，2022 年 9 月。
12. 访谈，2023 年 6 月。
13. 同上。
14.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15. 访谈：当地居民与叙解军领导层，伊德利卜，2022 年。
16. 与德鲁兹名流的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17. 同上。
18. 叙解军视频。
19. 访谈：德鲁兹与基督教名流，卡夫廷、库奈耶，2022 年 2 月。访谈：解放区行政机构官员，2022 年 9 月。

20. 库奈耶、杰迪达、亚库比亚三个基督徒村庄共提出 180 起房地产权 (HLP) 申诉, 其中 80 起已经了结, 申诉人得以收回权利。须说明的是, 房地产权类案件多数是通过仲裁处理的。
21. 被没收的房屋除一处外全部归还了各自的所有者 (访谈: 基督教名流与神职人员, 2022 年 9 月)。
22. 至少有两次, 仇恨言论导致涉事者被免职, 其中一次是宗教事务部免去了一名伊玛目的职务。访谈: 宗教事务部部长, 伊德利卜, 2022 年 2 月; 访谈: 基督教与德鲁兹名流, 2022 年。访谈: 解放区行政机构官员, 2022 年 9 月。
23. 解放区行政机构一作出归还房屋的承诺, 这些家庭就在当地亲属的鼓励下决定返回。返回过程颇费时日, 因为回程要走偷渡路线, 先经库尔德地区, 再经自由叙利亚军控制区, 然后才能进入伊德利卜, 费用不菲, 每户合 800 至 950 美元。抵达伊德利卜后, 叙解军会同各村的宗教名流照料他们的所需。访谈: 基督教名流与解放区行政机构的本地官员, 2022 年 2 月、2022 年 10 月。一位基督教神职人员提到: “去年有 15 户从阿勒颇回来, 今年我们正在张罗另外 3 户回来。回来是有顾虑的, 但经济状况恶化在推着他们走。他们回来之后, 都为这里的安全感到意外之喜。促使他们回来的决定性因素, 是收回自己的房子和可耕种的土地。在政府控制区流离失所, 代价太高。” 访谈, 2022 年 10 月。
24. 访谈: 基督教神职人员, 亚库比亚, 2023 年 6 月。
25. 访谈: 基督教名流与教士人物, 库奈耶, 2023 年 6 月。
26. 与一位德鲁兹名流的访谈, 2022 年 9 月。实际上,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与少数群体常态化的政策上是跟着叙解军走的。其领导层促成了房屋返还。举例来说, 2022 年 12 月, 他们指令自己的武装人员腾出杰迪达基督徒中间被本党成员占用的 20 处新房。德鲁兹社群对该党的存在也心中有数: “在我们山上, 我们认得他们的车、他们的旗。紧张的时候, 他们的埃米尔好几次来平事, 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控制得了多少。” 访谈: 德鲁兹名流, 2022 年 9 月。
27. 据叙利亚人权观察台说, 经谈判, 占据该教堂及其附属修道院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武装人员的家属撤离了 (来源: <https://www.syriahr.com/> /اليعقوبية-وان 557703 بعد أيام-من-افتتاح-كنيسة-)。

28. 访谈：基督徒名流，达尔库什，2022 年 6 月。
29. 艾哈迈德·沙拉以《古兰经》“宗教之事绝无强迫”一语来回应一位德鲁兹名流所表达的身为穆斯林的自豪时，他不只是在引述一条原则，而是在勾勒一项对待他们的政策。他的一位顾问就此详述了这位叙解军领导人探访伊德利卜德鲁兹社群的政治含义：“2015 年盖勒卜卢泽的屠杀发生后，支持阵线的宗教教士确实对下令行刑的那位指挥官作出了死刑判决。然而内部压力太大。判决没有执行，那位指挥官最终逃走，后来死于与我们的一次交火。叙解军今天想做的，是把这件事彻底了结、对历史有个交代。艾哈迈德·沙拉强调宗教之事绝无强迫，用意是把钟拨回零点，忘掉过去与被迫的改宗，接受德鲁兹人保有其原本的信仰。”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9 月。
30. 与一位德鲁兹知识人的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31. 与一位基督教名流的访谈，库奈耶，2022 年 2 月。
32. 书信往来，2022 年 8 月。
33. 与一位德鲁兹活动人士的访谈，2022 年 9 月。
34. 与萨马克山德鲁兹名流的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至 10 月。
35. 与一位德鲁兹名流的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36.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37. 据伊莎贝尔·里瓦尔说：“尽管该词在法国早在 1437 年就有记载，但把少数群体理解为一种法律—政治建构、用以在通常按领土界定的结构之内标定某些群体，这一观念是在十八与十九世纪、在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形成的。它的出现与主权观念的演变、以及承认人民而非神明为正当性的终极来源密切相关。” Isabelle Rivoal. “Minorité religieuse.” R. Azria & D. Hervieu-Leéger (dir.), *Dictionnaire des faits religieu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p. 718–725, 2010, Quadrige.
38. 对本地当局与基督教名流会面的观察，伊德利卜，2021 至 2022 年。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对少数群体开放而来的平等话语也有其限度。礼拜自由虽有保障，却仍限于私人领域，因为公开展示虔诚被视为一种传教：“我们需要区分宗教仪式的践行与这些宗教仪式的公开宣示。凡属内部之事我们一概不介入，但公共空间是穆斯林的空间”（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2021 年 2

月)。基督徒村庄里教堂与修道院的钟声不再响起，或者说尚未开始响起。

所谓“权利与义务”的提法则更为含混。

39.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40. 访谈，伊德利卜，2021 年 10 月。

41. 同上。

第八章 亲近沉默的大多数

1. WhatsApp 访谈，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2. 与参与者的 WhatsApp 访谈，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3. 访谈。

4. 访谈：救国政府前干部，此人与伊德利卜内部的革命圈子关系密切，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5. 自 2015 年起，革命精英多次尝试为革命建立代表性机构，如革命叙利亚联合体（Tajamua Suriya al-Thawra，2015 年）、伊德利卜省政治委员会（al-Hayat al-Siasiyya fi Muhafathat Idlib，2016 年）、叙利亚公正联合体（Tajamua al-Adala al-Suri，2018 年）以及建设叙利亚联合体（Tajamua Bina Suria）。其中一些并入了海外的既有团体，如米歇尔·基洛的叙利亚民主人士联盟（Itihad al Dimuqratieen al-Suriyin）。虽有若干政治机构存续下来——最著名的是拥有约 800 名成员的政治委员会（al-Hayat al-Siyasiya）——却没有一个成功实现自身的制度化。它们并未演变为有结构的组织，而主要充当了辩论的论坛，缺少确立持久政治影响力所需的凝聚力与权威。

6. 访谈：拉伊法·萨米娅，安塔基亚，2022 年 11 月。

7. 访谈：艾哈迈德·巴克罗，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8. 访谈：奥斯曼·巴达乌，2024 年。

9. 访谈：亚西尔·赛义德，2024 年。

10. 访谈：拉伊法·萨米娅，日内瓦，2022 年 11 月。艾曼·穆赫辛谢赫是教法学科班出身，革命前在一座清真寺任伊玛目。

11. 访谈，2022 年 8 月。

12. 访谈：拉伊法·萨米娅，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13. 教师工会由一位女性领导，妇女在药剂师工会与学生会中也有较好的代表性。WhatsApp 通话，2022 年 10 月。

-
14. 访谈：拉伊法·萨米娅，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15.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11 月。
 16. 与一位中学教师的交谈，WhatsApp，2022 年 11 月。
 17.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11 月。
 18. 访谈，安塔基亚，2023 年 8 月。
 19. 与一位中学教师的交谈，WhatsApp，2022 年 11 月。
 20. 访谈：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2021 年 10 月。
 21.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11 月。
 22.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12 月。
 23. 同上。
 24. 从这个角度看，叙解军的轨迹与伊斯兰国正好相反：伊斯兰国在巩固期几乎不施压，等到霸权到手才转向大规模的极权统治。叙解军处理内部反对派的手法，更让人想起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做法。在叙利亚东部，该党起初对其库尔德政治对手与阿拉伯革命圈子施加强压，随后又随时间推移显著放松了这种压力。
 25. Bronislaw Baczko. *Comment sortir de la terreur. Thermidor et la révolution*. Collection NRF Essais. Gallimard, 1989.
 26. 访谈。
 27. 访谈。
 28. 访谈：艾哈迈德·巴克罗，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29. 与优素福·卡尔杜什的访谈，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30.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4 月。
 31. 访谈：艾哈迈德·巴克罗，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32. 访谈：阿里·哈马德，安塔基亚，2022 年 8 月。
 33. 访谈：拉伊法，2022 年 8 月。
 34. WhatsApp 访谈，2022 年 8 月。
 35. 欣德，WhatsApp，2022 年 10 月；访谈，2023 年。
 36.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11 月。
 37. 访谈：土耳其官员，安卡拉，2022 年 8 月。
 38. 访谈：土耳其专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罗马，2022 年。

39. 与西方外交官的访谈，巴黎、伦敦、日内瓦、柏林，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
40. 叙解军一名高层，2023 年 6 月。
41. 访谈：各武装团体指挥官，安塔基亚与伊斯坦布尔，并经 WhatsApp，2022 年 8 月至 10 月间。
42. 访谈：该运动一名前干部，加济安泰普，2023 年 6 月。
43. 访谈：土耳其官员，安卡拉，2022 年 10 月。
44. 访谈：土耳其官员与研究者，安卡拉，2022 年 10 月。
45. 与阿夫林、阿扎兹的武装派系头目以及土耳其和叙利亚专家的交谈，2023 年 3 月至 4 月。
46. 经 WhatsApp 的访谈，2022 年 11 月。
47. 访谈。
48. WhatsApp 访谈：阿扎兹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2022 年 11 月。
49. 访谈：人道工作者与外交官，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布鲁塞尔，2021 至 2023 年。
50. 与自由叙利亚军指挥官及土耳其官员的 WhatsApp 交谈。
51. 访谈，安卡拉，2022 年。
52. 同上。
53. 访谈：土耳其官员，2023 年 11 月。
54. 与一位土耳其官员的 WhatsApp 访谈，2023 年 2 月。
55. Jean-Francois Bayart, “Le concept de situation thermidorienne: régimes néo-révolutionnaires et libéralisation économiqu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Questions de recherche*, no 24, March 2008.
56. 一位土耳其专家中肯地指出，经济因素在北进中也起了作用。他强调说：“除了政治抱负之外，经济是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问题是哈姆兰—加扎维耶贸易线。这条线上中间环节太多，大叙利亚阵线光是放行叙利亚民主军地区的石油进入伊德利卜，每月就抽走 75 万美元。保障供应线是沙拉想要北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他需要更少的中间环节和更多的‘合作’，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与各派系有更多的‘合作’。”

57. 沙拉的一位亲近同僚说：“‘阿拉维派是最有条件参加革命的群体。他们把全部赌注押在巴沙尔·阿萨德身上，而他什么也没给他们。’”据 2022 年 10 月叙解军一名高层转述。
58. 访谈，伊德利卜，2022 年。
59. 4 月 29 日的公报，发布于其 Telegram 账号：<https://t.me/c/1535549123/4267>。

第九章 2024 年伊德利卜的阿拉伯之春

1. 数字来自密切跟踪伊德利卜局势的土耳其观察人士。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 年 7 月。叙解军安全部门有专门小组统计示威。据他们说，规模最大的一场示威动员了 3000 人（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据叙解军说，高峰出现在 3 月 15 日革命纪念活动期间，叙解军控制区全境共 1 万人。与叙解军一名高层的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2. 与示威者的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4 月。
3.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4 月。
4. 访谈：非正式营地的居民，伊德利卜，2023 年 6 月。
5. Bronislaw Baczko. *Comment sortir de la Terreur. Thermidor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Gallimard, 1989.
6. 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7. 与民众运动一位领袖的 WhatsApp 通话，2024 年 4 月。
8. 访谈：消息灵通的土耳其研究者，安卡拉，2024 年 2 月。
9. 与民众运动一位领袖的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5 月。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本地社区领袖，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 年 5 月。
13. 与艾哈迈德·沙拉一位顾问的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14. 在宾尼什、吉斯尔这类动员热点，叙解军会把该区域围起来以限制进出，阻止已知的活动人士入内，避免出现声援的势头。叙解军还在检查站对抗议者施压，偶有殴打发生。
15. 叙解军承诺释放没有明确指控的被羁押者（释放确已发生，因“安全细胞”案被捕的逾 130 人获释——叙解军一名高层，2024 年 6 月），在酷刑属实

- 的案件中停职处理调查人员，并原则上同意独立观察员探视总安全机构的羁押场所。这些承诺的细节见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的一份新闻稿，载于 Telegram: <https://t.me/abomuhammad2022/1600>。
16. 一些税项遭到取消，尤其是那些涉及投资者的税项。举例来说，在达纳，建设商场的许可费——最高可达 7 万美元——已被取消。私人住宅建设税下调了 90%，此外还有许多此前应向地方议会缴纳的税项。
 17. 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与该运动在吉斯尔舒古尔一位干部的访谈，WhatsApp，2024 年 6 月。
 22. 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23. 同上。
 24. 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 年 3 月。
 25. 尤其是 2024 年 4 月 19 日，伊德利卜的安全人员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数人轻伤（与民众运动活动人士的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5 月）。
 26. 举例来说，吉斯尔舒古尔发生了 17 起逮捕，那里是民众运动最热的地点之一，也是最敏感的地点之一，因为一些示威中有阿克萨军这类激进团体在场（与吉斯尔舒古尔活动人士的访谈，WhatsApp，2024 年 6 月）。
 27. 此语得自奥利维耶·菲勒尔，他把它界定为“一种职业气质以及与之相连的种种世界观”（WhatsApp 往来，2024 年）。
 28. 访谈：最高选举委员会，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与常驻土耳其和伊德利卜的独立活动人士的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7 月。
 29. 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30. 他因此表示：“法律说的是全体叙利亚人，男女不限。在法律上，我们不排除任何人。至于谁来当候选人，我们交给社会去定。”与伊萨姆·赫莱夫的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31. 与最高选举委员会一位成员的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32. <https://t.me/fromidlib/32164>
 33. <https://t.me/fromidlib/32187>
 34. <https://t.me/c/1295115437/32201>

35. 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36. 与艾哈迈德·沙拉的访谈，伊德利卜，2024 年 6 月。
37. 与让-诺埃尔·费里耶的 WhatsApp 访谈，2024 年 8 月。
38. 正是部分受刑武装人员的兄弟与家属的动员，可以解释宾尼什这类城镇何以成为民众运动的热点。
39. 这并不妨碍他们采取最高纲领派的立场，其中一些人拒绝与本书作者对话，认为作者与该运动领导层过从太近。与已转入异见的救国政府前干部的亲属的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 年 3 月。
40. 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东北部设立的自治行政机构不同，救国政府从来不是叙解军领导层任何乌托邦投射的所在。
41. 西方主流媒体因此把塔基亚这个说法内化了，给那支关于“两面派话术”的老调添上了一层东方主义色彩，据说伊斯兰主义正是此道高手。例见：<https://youtu.be/uS2xFbSBPk4?feature=shared>
42. Pierre Serna. *L'extrême centre: un poison français*. Éditions Champ Vallon, Paris, 2019.
43. 亚西尔·赛义德，雷伊汗勒，2022 年 8 月。
44. <https://orientxxi.info/magazine/syrie-ahmed-al-charaa-un-jeu-d-equilibre-pour-le-pouvoir-d-un-seul-homme,8093>.

第十章 尊重烈士，但别扼杀市场

1. 英文的一份好摘要见：<https://english.enabbaladi.net/archives/2024/01/enabbaladi-publishes-details-from-idlibs-public-morality-draft-law>
2. 与多位国际行为者的访谈。
3. 访谈：欧洲外交官，巴黎、柏林，2024 年 2 月。
4. WhatsApp 访谈与交谈，巴黎、日内瓦、柏林，2024 年 2 月。
5. 该运动若把这部法律看作源自社会保守主义的文化规范的法律译写，那么它其实是在大幅收紧这些准则。举例来说，强制戴头巾属共识范围，禁止音乐或工作场所男女混杂却是社会上有争议的价值，不能算作社会内部的共识。叙解军与多数伊斯兰主义运动一样，（有意地）把伊斯兰规范（按它们自己的界定）与社会保守主义混为一谈。关于后一点的详论见：Jean-Noël Ferrière. *Le régime de la civilité en Égypte. Public et réislamisation*. Paris, Presses du CNRS, 2004.

6. 与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及本地名流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1 月至 2 月。
7.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8. 关于道德警察的种种试验的概览见: <https://www.syria.tv/-الفلاح-في-إدلب-وتستحدث-شرطة-أخلاقية-①> .
9. 一名受骚扰女性的姐妹的证词。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10. 与女性主义活动人士、店主、伊德利卜城市名流、革命活动人士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11. 与伊德利卜一位医生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12. 与伊德利卜一位女性活动人士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13. 与伊德利卜家族议事会一位成员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14. 据说确有成问题的案例: 女学生离校时受骚扰、年轻女性因裸照遭勒索。与城市名流及前警官的访谈, 2024 年 2 月。
15. 他于 2021 年遭伊斯兰国袭击后失明。
16. 与一位女性活动人士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17. 访谈: 叙解军雇员, 伊斯坦布尔, 2024 年 2 月。
18. 同上。
19. 这里我们把公共空间界定为不受家庭或同侪群体规范与管控支配的空间。它是一个在地理上、有时在性别上具有多样性的空间, 也是一个未必受村庄或街区熟人关系支配的社会互动空间。第三, 它是闲暇的空间。
20. 瓦迪代夫战役期间的观察, 伊德利卜省, 2012 至 2013 年。
21. 与这些商场顾客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22. 与本地活动人士和商人的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23. 亲身观察, 伊德利卜, 2023 年 6 月。

① 底本此处两次引用同一幅影印件 (pg313_1), 而同一编号序列中另有一幅 pg313_2 从未被引用; p314 序列同样是第三次引用重复了 pg314_1, 而 pg314_3 从未被引用。逐件核对确认这四幅是各不相同的网址, 且两处缺号恰好落在两处重复引用的位置上; 据此推断, 重复的两处原应分别是 pg313_2 与 pg314_3。惟此系推断而非实证, 译本仍照底本原样落位、不作替换, 谨此说明。——
编注

24. 举例来说,一位反对叙解军的律师(他因加入伊斯兰解放党而正在服刑)却浸透着“战时保守主义”,他痛斥叙解军不去救援几小时前留下5名烈士的那支突击队,反倒庆祝商场开业: https://x.com/ibrahem_maaz/status/1733543174172197145?s=46&t=bAlimr5HX1D9yp96T8WXpA
25. WhatsApp 访谈, 2024 年 2 月。
26. 与该校校长的访谈, 2023 年 2 月。
27. <https://cofjustice.substack.com/p/brouhaha-at-the-mall-the-study-of>.
28. https://syria.news/c96937a9-08122312_m.html
29. 这可以从这些商业狂欢的视频里看到: <https://x.com/khaleedalkhteb/status/1733046700778938536?s=46&t=bAlimr5HX1D9yp96T8WXpA>; https://youtube.com/shorts/CFO-znVnsvo?si=UbP9_HN8Z9cRLDGX
30. <https://x.com/khaleedalkhteb/status/1734583267641237695?t=7cKp7Uy0MEpQvjBn8ohRog&s=08>
31. 与叙解军一名高层的访谈, 伊斯坦布尔, 2024 年 2 月。
32. <https://x.com/md2020k/status/1733635089282547971?t=jZjLwcLM1p6psGQecROUKw&s=08>
33. <https://www.syria.tv/> - إلب-هجوم-مسلح-بزع-الاختلاط - إلب-هجوم-مسلح-بزع-الاختلاط - مول-تجاري-يشغل-الرأي-العام-في
34. “血商”(tujjar al-damm) 这个说法,被这位失明的布道者用在此处并不恰当。它让人想到靠战争发财的战争贩子。可就哈姆拉商场而言,情形恰恰相反:这些是本地商人,他们把自己摆在战争的空间之外,也摆在战时保守主义力图与之绑定的那套道德秩序之外。
35. <https://www.syria.tv/> - إلب-هجوم-مسلح-بزع-الاختلاط - إلب-هجوم-مسلح-بزع-الاختلاط - مول-تجاري-يشغل-الرأي-العام-في
36. 这种“战时保守主义”也可以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当中见到,只是程度较轻:2018 年,一次筹办选美比赛的尝试激起了该运动部分领导层的怒火,他们援引对烈士记忆的尊重来叫停这场典礼(访谈,卡米什利,2021 年 11 月)。同样的战时保守主义,也在 2014 至 2018 年的战争期间构造了前线士兵与后方人员之间的对立:前者指责后者趁自己不在时与其妻子有染,而后方洒水正畅流。

37. 梅勒罕·哈瓦姆谢赫、人称阿布·瓦基德·沙米，来自哈马城，以萨拉菲倾向著称，在宗教事务部注册为清真寺伊玛目但不隶属叙解军；他的布道恰切地反映出这种战时保守主义的萨拉菲版本：<https://x.com/D1MHMOF4KPr53P9/status/1733427005780115765?t=P17whoyOWYkrbvxA9KTzKQ&s=08>
38. https://youtu.be/D15nKlyenCs?si=tW1w_FX8B0h-ACK1
39. 关于伊斯兰世界这一平衡术的更宽泛的探讨，见 Patrick Haenni. *L'islam de marché. L'autre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 Paris, Le Seuil, 2005.
40. 与欧洲外交官及联合国官员的访谈，日内瓦、巴黎、柏林，2024年2月。
41. 与研究者及喀布尔商场旧日顾客的 WhatsApp 访谈，2024年2月。
42. 艾哈迈德·沙拉 2024年2月的退让——他为一场在他看来过于大规模的清洗道歉——只是众多例子之一，另如取消 2020 年的橄榄油生产税。不愿镇压抗议示威，丝毫不妨碍狱中的人权侵害，最近这几轮清洗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43. 迪士尼乐园餐馆与水烟园经常有该运动的一些高层光顾（作者观察，2020 至 2024 年）。
44. 这段插曲的更多细节，见贝尔纳·博蒂沃出色的分析：« Islamiser le droit? L'exemple égyptien », *Monde Arabe*, 1989/4 (no 126), pp.12–13.
45. <https://tariqramadan.com/appel-international-a-un-moratoire-sur-les-chatiments-corporels-la-lapidation-et-la-peine-de-mort-dans-le-monde-musulman/>
46. 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年2月。
47. Olivier Roy. *Holy Ignorance: When Religion and Culture Part Ways*, London, Hurst, 2010.
48. 关于这一点，见奥利维耶·罗瓦的经典之作 *L'échec de l'islam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94. 也有少数由教士领导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运动，比如塔利班，但那是例外而非常规。
49. 与该运动一名高层的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年2月。
50. 该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在道德与宗教保守问题上爱层层加码的布道者与媒体操盘者。与该运动一批宗教领袖的访谈，伊德利卜，2021年3月。
51. 访谈，伊斯坦布尔，2024年2月。

52. 如果所谓强硬派指的是叙解军的教法官 (*sharaiyeen*), 那我们就得承认: 他们固然是这部法律的热心捍卫者, 却不是它的发起者。
53. Aurélie Collas, “Au Maroc, la réforme annoncée du code de la famille suscite l’espoir d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s femmes”, *Le Monde*, 23 October 2023.
54. Ghassan Salame.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I. B. Tauris, 1994.

第十一章 大叙利亚解放军的静默革命

1. 德鲁兹名流的证词, WhatsApp 访谈, 2022 年 8 月。
2. 与萨马克山一位德鲁兹领袖的 WhatsApp 访谈, 2022 年 7 月。
3. 与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头目的访谈, 2021 年 6 月、2022 年 2 月。与萨马克山各村德鲁兹名流的 WhatsApp 访谈, 2022 年 8 月至 9 月。
4. 访谈, 伊德利卜, 2022 年 8 月。
5. 访谈, 伊斯坦布尔, 2022 年 8 月。
6. 访谈。
7. 与安全消息源的访谈, 伊德利卜与欧洲各国首都, 2022 年。
8. Pierre Bourdieu, “Effet de champ et effet de corp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 59, September 1985, *Stratégies de reproduction*-2, p. 73.
9. 相关背景见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syria-north-druze-murder-uyghur-militants-suspicion>
10. 与一位知名德鲁兹社群领袖经 WhatsApp 消息交换的私人通信, 2022 年 8 月。
11. 与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数名指挥官的访谈, 2020 至 2024 年。
12. 田野观察, 伊德利卜、阿勒颇, 2012 至 2013 年。
13. 同上。
14. 值得注意的是, 半岛电视台是第一家采访艾哈迈德·沙拉的国际媒体, 此后六年多再未采访过他。
15. 即 PBS 《前线》。片中各段访谈的文字稿以及影片本身可在网上取得: <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interview-collection/the-Jihadi>
16. <https://www.france24.com/en/video/20230511-inside-idlib-syria-s-last-rebel-held-enclave>
17. 访谈, 伊德利卜, 2021 年 3 月。

18. 访谈，伊斯坦布尔，2023 年 6 月。
19. 与阿布·卡塔达·法拉斯提尼的访谈，安曼，2022 年 7 月。
20.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1 月。
21. 与救国政府高层的访谈，2020 年 1 月。
22. 书面往来，2020 年 4 月。
23.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16, 123–4.
24. 与艾哈迈德·沙拉的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1 月。
25.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26.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12 月。
27. 访谈，伊德利卜，2019 年 5 月。
28.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7 月。
29. 与艾哈迈德·沙拉的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1 月。
30. 他说：“我们怎么能作长期规划呢——连几个月后谁掌着这些地盘都不知道？”访谈，2020 年 1 月。
31. 这种小心的平衡，在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 2020 年 1 月与我们会面之后发布的公开公报中表露无遗：Aymeen Jawad Al-Tamimi, “Hay’at Tahrir al-Sham’s Abd al-Rahim Atun on Meeting Western Analysts,” *Pundicity*, 10 March 2020, <https://bit.ly/2K4E5Z3>
32. 访谈，伊德利卜，2020 年 1 月。
33. 访谈，伊德利卜，2019 年 6 月。
34. 视频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可在此取得：<https://bit.ly/3926Tdx>
35. 大叙利亚自由军在试图统一伊斯兰主义叛乱者方面起过带头作用。支持阵线通过地方治理结构（如在阿勒颇）以及征服军这类军事行动室与该团体结盟。

第十二章 非自由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重归中间

1. 对这一点更深入的分析见：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Translated by Carol Vol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沙拉的这位亲信就坚称：“叙解军当然是由解放这个战略目标所驱动的。但自 2020 年起，因为我们肩上有治理民众的责任，盘算变得更复杂了。这是

有代价的。我们不会不考虑对民众可能造成的影响，就贸然投入一场新的战斗。”访谈，伊德利卜，2024年6月。

3.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4. 应当指出，何谓中间，其界定当然带有很深的政治性，会随时变化，而且一般来说是文化与媒体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后形成的一种常识的产物。
5. 为此，艾哈迈德·沙拉在公开宣布脱钩时，特意让当时基地组织派驻叙利亚的特使阿布·法拉杰·马斯里陪同在侧。访谈，沙拉，伊德利卜，2021年1月。
6. 关于这一问题见 Olivier Roy, “La montée des populismes n’est pas corrélée à une remontée des valeurs traditionnelles dans la société”, *Le Monde*, 29 October 2023.
7. Olivier Roy, 同上。
8. Bayart, Adalshah, & Roy. *Thermidor en Iran*.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1993.
9. 访谈，努瓦克肖特，2022年。
10. Zaki Laïdi. *Le temps Mondial*. Paris, Le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0.

跋 寻找自我

1. <https://x.com/mousaalomar/status/1892321641549484361?s=48&t=bAlmr5HX1D9yp96T8WXpA>，转引自：Charles Lister, *The New Umayyads. Syria’s leaders is turning nostalgia into strategy*. <https://www.syriaintransition.com/thenewumayyads>
2. 另见 Laila Alrefaai, *Restructuring Fa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igious Domain in Postwar Syria* in al-Jabassini, Abdullah & Daher, Joseph, *Syria: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Shadow of the War*（即出）。
3. 更多细节见 Thomas Pierret 的分析：“Le nouveau pouvoir syrien face au champ religieux, ou les limites d’une stratégie hégémonique”. *Bulletin de l’Observatoire international du religieux* 5, April 2025.
4. 与阿卜杜勒·拉希姆·阿通的讨论，大马士革，2025年4月。
5. 与隶属大马士革大学、叙解军及其他派系的一批教士的访谈，大马士革，2025年。
6. 访谈，大马士革，2025年。
7. 访谈，大马士革，2025年1月。

8. 田野观察，霍姆斯、拉塔基亚、塔尔图斯，2025 年 2 月、3 月、4 月。
9. 田野观察，德拉、苏韦达，2025 年 4 月。

Patrick Haenni, Jérôme Drevon

Transformed by the People:

Hayat Tahrir al-Sham's Road to Power in Syria

